

西北红军的 创建与发展

朱根生 著

XIBEIHONGJUN DE
CHUANGJIAN YU FAZHAN

军事科学出版社

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

朱根生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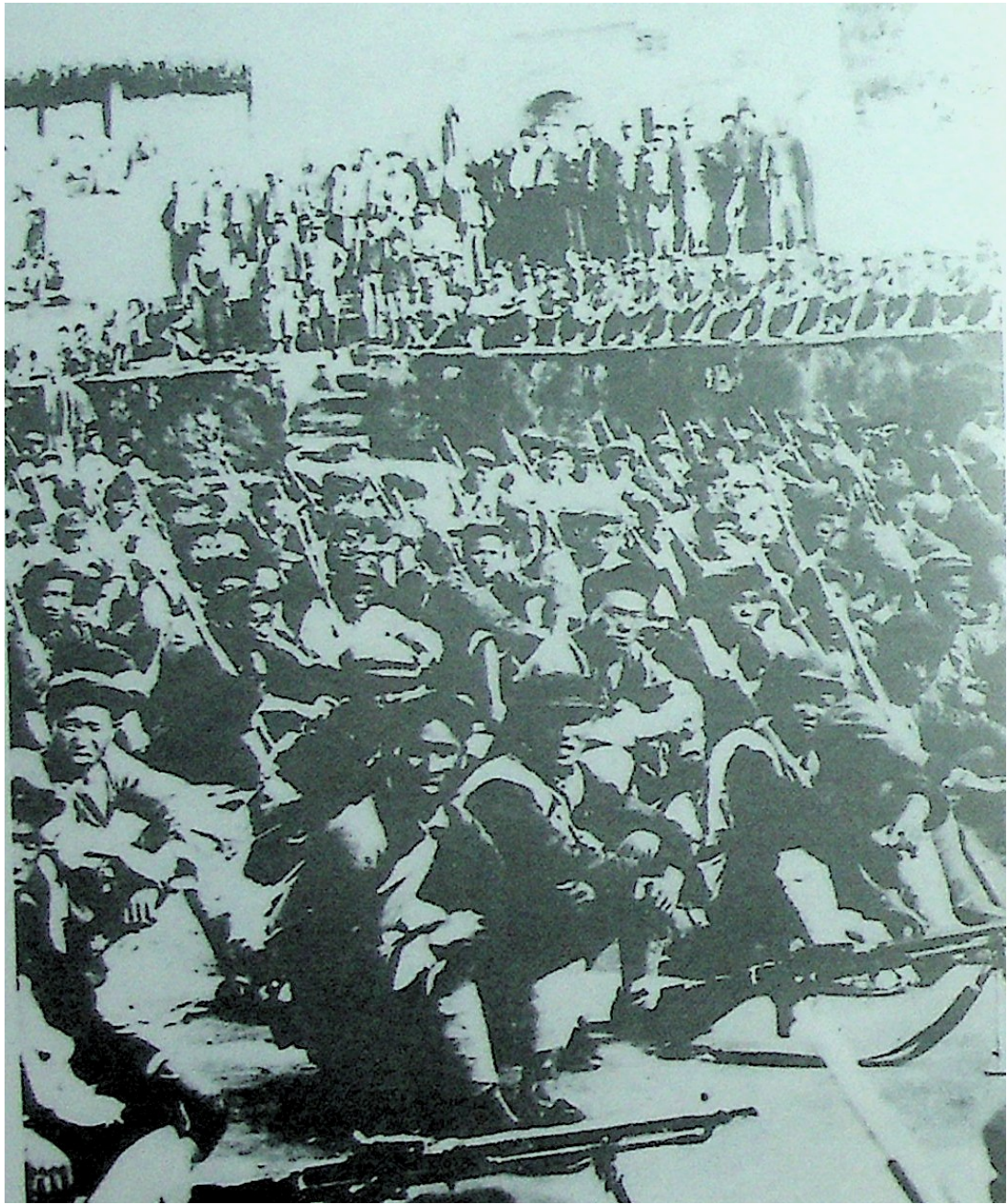
西北红军主要创建人刘志丹



西北红军主要创建人谢子长



西北红军部分干部合影



西北红军与红 25 军会师时的情景

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 西北火种	20
一、中共建军思想的萌芽	20
二、中共早期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工作	23
第二章 红色风暴	36
一、冯玉祥“清党”反共	36
二、中共的应变措施	39
三、清涧起义	43
四、渭华起义	49
第三章 开展兵运	60
一、开展兵运工作的依据	60
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兵运工作	64
三、兵暴——兵运工作的最高形式	71
四、西北地区兵运工作的得与失	76
第四章 幼年武装	80
一、晋西游击队的创建	80
二、南梁游击队的成立	85
三、“借水养鱼”——新堡整编	91
四、打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旗帜	95
五、“三嘉塬缴枪”事件	97
第五章 打出红旗	102
一、三嘉塬整编	102
二、违命出击	108
三、“南北分家问题”的解决	114
四、艰苦奋斗	119
第六章 正式建军	126
一、红 26 军的成立	126
二、红 26 军成立后的曲折斗争	131
三、开辟照金根据地	138
四、兵败渭华	142
第七章 重整旗鼓	149
一、红 26 军的恢复及第 42 师的组建	149
二、陕甘边根据地的开辟	158
三、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65
四、红 42 师的发展壮大	170
第八章 陕北崛起	177
一、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的创建	177
二、陕北游击队的建设与发展	182
三、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0
四、陕北根据地的创建	196
五、红 27 军第 84 师的成立	199
第九章 统一指挥	205

一、周家硷联席会议.....	205
二、谢子长去世	208
三、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210
四、加强西北红军建设.....	225
第十章 汇入洪流	228
一、开始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228
二、红 15 军团的组建.....	233
三、没有躲过的错误肃反.....	237
四、肃反问题的解决.....	242
五、参加革命的奠基礼.....	248
六、刘志丹的牺牲.....	252
附录一：西北红军大事记.....	259
附录二：西北红军人物谱.....	277
附录三：西北红军序列表.....	310
附录四：西北红军的演变.....	320
主要参考文献	323
后记	326

绪论

西北红军亦称陕甘红军或陕北红军，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甘肃两省边界和陕西省北部的两部分工农红军，正式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和第 27 军，主要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西北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陕甘边地区和陕北地区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近代工业缺乏。这里地方军阀林立，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和利益的战争接连不断。劳动人民同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对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既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又有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所以，西北红军在其发展过程中，除表现出中国工农红军共性的本质特征外，同时也形成了一些鲜明特点：（1）西北红军是西北地区成立最早并坚持到土地革命战争胜利的正式红军；（2）西北红军主要由农民武装和游击队发展而来，由于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西北红军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3）西北红军的军政主官多参加过兵运工作，兵运工作在西北红军创建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4）西北红军主要组成部分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互为犄角，进行了战略上的相互配合；（5）西北红军远离其他主力红军，是一支相对独立、战斗力较强的地方红军。

一、西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一度遭受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在红区损失 90%。西北红军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宁晋等西北诸省的反动统治，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武装斗争，推动了北方土地革命的发展。其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工农红军硕果仅存的一块战略基地，为中共中央和南方主力红军的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基地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西北红军及其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军队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的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西北红军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南方的革命根据地相继遭到挫折和失败，主力红军陷入无后方战略基地的窘境，被迫相继实行战略转移。而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却因西北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得到蓬勃发展。西北红军成立时，正值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特别是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地区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的前线。此时，西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创建的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不久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对于处于转折关头的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中日矛盾的日益加深，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步转向北方，而从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来讲，西北革命根据地东面与华北相望，着眼于全国、着眼于抗日、着眼于未来，易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左右整个形势。中共中央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这里，极具战略眼光。同时，西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中北部，北到长城与鄂尔多斯沙漠相连，南面延伸到渭河流域边缘，西与陕甘高原和六盘山山麓相临，东面有黄河天险隔断了华北之敌。这一地理位置，使红军避开了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给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造成了较大困难，为红军的生存创造了条件。

中央红军长征最初，中共中央的意图是向湘西发展，与红 2、红 6 军团会合。黎平会议放弃了北出湘西与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计划，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红军有了重大转机。之后，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几乎每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都要讨论落脚点问题。1935 年 9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制止了陕北正在发生的错误肃反，挽救了危机中的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陕北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中国的东南转到了西北。此后，中共中央在陕北坚持斗争长达 13 年。继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也完成长征，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巩固和扩大，1937 年改称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中指出：“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是对西北根据地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西北红军的充分肯定。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西北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适合中国国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西北地区虽然远离中共中央，但有一批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领导骨干，他们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从中国和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通过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井冈山斗争经验，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在偏僻的西北地区摸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陕甘地区有着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从地理环境上看，陕甘边地区，特别是照金和南梁地区，沟壑纵横，道路崎岖，村落疏散，人烟稀少，梢林密布，便于隐蔽。加之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反动统治阶级横征暴敛，人民群众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有着实行武装割据的基础和条件，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成和发展。陕北人民有着强悍淳厚、勇敢善武的性格，历史上发生过多农民起义。如隋朝的刘加伦曾在延安聚众数十万，反抗荒淫暴虐的隋炀帝；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清朝同治年间广大回民斗争，遍及陕甘各地；义和团运动时，甘肃庆阳群众起来烧毁帝国主义的教堂；辛亥革命时期，农民起义更是如火如荼。这些农民革命斗争在陕甘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曾不无感慨地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嘛！这里群众条件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西北红军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干扰，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广大山区农村，坚持革命斗争，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以积蓄力量，逐步发展，从而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经过艰苦探索，先后建立陕甘边和陕北地区两个革命根据地，最后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通过建立苏维埃政权，初步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文化事业，为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

西北红军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归根到底是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按

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有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与西北实际相结合，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政策，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这不仅是对刘志丹个人的褒扬，也是对西北的党和红军的充分肯定。

第三，西北红军的革命斗争，打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局面，在战略上配合了南方红军反“围剿”的斗争，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与南方主力红军相比，西北红军不仅成立较晚，而且兵力不多。但在刘志丹、谢子长的正确指挥下，西北红军越战越强，人数越打越多，到1935年上半年，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这一数字从绝对量上看虽然并不是很多，但从长征结束时的全国红军总数来看，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随着西北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在陕甘地区的开展，西北人民群众得到了广泛的发动，在20余县范围内建立了革命政权，打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局面。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记述：“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上述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西北人民群众中的广泛影响。西北红军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就连国民党军也不得不承认，西北红军的活动“其气焰之猖獗，声势之浩大，几遍及陕北各乡村。更因陕北地势险阻，其严重性实不亚于过去赤匪盘踞之江西。”西北红军的发展和胜

利，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为中共中央和南方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准备了条件。

南方主力红军的英勇作战，吸引了国民党军主力，在战略上掩护了西北红军在北方的发展，西北红军的革命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军对南方红军的进攻，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陕甘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对国民党在西北的反动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及国民党西北当局为进攻西北，调集大量军队对西北红军多次进行“围剿”，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民党军对南方红军的军事压力。

1934年9月11日，中共陕北特委在《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案》中，号召陕北党、红军和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彻底地配合南方红军的英勇斗争，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胜利争取陕北以至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9月15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在给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目前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响应红军北上抗日，在鲜明的抗日反帝旗帜之下去团结群众武装群众，为红军北上抗日肃清道路开辟阵地。”西北红军积极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配合了南方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和战略大转移。

在西北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顺利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向北方挺进。南方主力红军的北上和西北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1935年8月，他调动东北军主力和陕甘宁晋绥5省地方军阀及部分嫡系部队共10多万人，对西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在主力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之前，一举剿灭西北红军，使北上主力红军陷入无立足之地的窘境。但西北红军与红25军合编的红军第15军团，在根据地人民的配合下，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

劳山战斗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策应了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的军事行动。

第四，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治国的干部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成为领导陕甘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群众领袖。刘志丹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被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 36 位军事家之一。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锻炼，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还涌现出了习仲勋、马文瑞、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杨琪、张达志、张秀山、汪锋、王世泰、贺晋年、吴岱峰、马锡五、黄罗斌、刘景范、郭宝珊、张邦英、张策、郭洪涛、黄子祥、黄子文、马佩勋、马万里、王兆相、龚逢春、崔田民、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等一批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下，引导陕甘地区人民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们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关系，不仅积累了一套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经验，也积累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经验，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即使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处于十分险恶的关头，西北红军广大干部仍然坚信党的领导，不畏艰险，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表现了献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忠诚，使武装斗争的火焰一直在陕甘高原熊熊燃烧。可惜的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年早逝，是党和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随红 25 军一起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战役，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做出了新的贡献，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又立下了丰功伟绩。其中一些人在全国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和国家以及地方的领导工作，有的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国家和军队建设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西北红军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

西北红军在以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在西北人民积极支持和参与下，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由弱小的游击队逐渐发展为正规的红军，在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不断加强自身的整顿和改造，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确保西北红军成为无产阶级性质军队的关键

中国的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西北红军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毛泽东三湾改编，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建军原则，从自身特点出发，坚持政治建军，不断加强部队的整顿改造，为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取得了成功经验。

由于西北地区社会的特殊情况，最初共产党是依靠兵运工作的骨干，改造农民武装，组建农民游击队，作为创建红军的主要方式，因此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要把这支部队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首先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8年2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严密党在军队的组织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中规定：应按军队之伙食单位——连，组织支部。晋西游击队时期，游击队即成立有党的支部，支部下设党小组。后来，先后在西北反帝同盟军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红26军第2团成立不久，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26军的信中指出：“巩固党的领导是红二十六军的一切工作的前提。”红26军坚持“支部设在连上”的原则，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团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第26军第42师成立后，建立了师党委，各团和连队也先后建立了党委和支部。陕北红军游击队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也不断得到发展。红27军第84师成

立后，从连到师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西北红军各级军政领导职务，均由共产党员担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完成党赋予任务的重要保证。按照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在陕甘游击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列宁室（俱乐部）。红 26 军第 2 团成立后，连设指导员，团设政委，团部成立政治处，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红 26 军制定了《政治工作训令》，建立了宣传队。红 27 军第 84 师成立后，也按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建立了政治机关，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在无产阶级建军思想指导下，西北红军实行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了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确立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和政策，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红军进行整顿改造，开展政治建军的中心环节。西北红军成立之初，由于部队成分复杂，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不良习气盛行。为解决这一问题，专门组织官兵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井冈山的斗争》。为提高部队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各部队一成立，就开展了红军性质和宗旨教育。刘志丹曾在根据地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把国家搞强盛，把人民生活搞得富起来。当共产党员、当干部、当红军战士，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而且要准备为之献身。”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红军指战员克服了雇佣思想，懂得了自己是为工农阶级而战，激发了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红军的纪律是建立在全体官兵政治一致和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建军宗旨，是红军行动的准则。加强纪律建设是西北红军整顿改造，克服部队存在旧习气的一个重要措施。在部队纪律方面，西北地区共产党人在创建革命军队初期有过沉痛的教训。

西北反帝同盟军组建后，由于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懈，导致了“三嘉塬缴枪”事件的发生，新生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部队经过整顿，纪律有了明显改观。西北红军各部队主要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严重存在小农意识和散漫习气。为将这些部队建设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红军，各部队加强了纪律教育。红 26 军制定有纪律暂行条令 18 条，后来在红 27 军也得到了推行。第二次反“围剿”期间，西北军委颁布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例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定。西北红军严格执行纪律，赏罚分明。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是哪一级干部，都坚决给予处罚。受处分后改正了错误表现好的，还可再提升为干部或官复原职。如红 26 军第 42 师成立不久，师政委高岗严重违反群众纪律，师党委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撤销了其师政委的职务，后来高岗在游击队工作有了一定成绩，又恢复了他的师政委职务。由于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同时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西北红军在其成长发展的历程中，尽管由于“左”的和右的错误严重干扰，部队遭受过失败的挫折和严重的危机，但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这一关键环节，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正确的发展方向。西北红军的历史证明，不断加强部队的整顿改造，实行政治建军，是确保红军成为无产阶级性质革命军队的关键所在和根本措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第二，合理确定编制体制，加强军政训练和后勤保障，是西北红军战斗力不断提高的主要因素

体制编制是人与武器装备的有机组合，被军事家认为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必须根据战争的需要和部队的实际，合理确定体制编制。红 26 军成立时，由于物质条件不具备，没有完全按照中

央的规定确定其编制。鉴于红军中遂行作战任务的主要是团以下各级基层部队，红 26 军以团一级为最高指挥机构，团以下以连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中步兵连完全按班、排、连序列，采取“三三制”（9 班制）构成。红 26 军的这种编成方法充实了连队的战斗力，部队也十分精干、灵活，便于机动作战。后来红 26 军发展到 5 个团，红 27 军发展到 4 个团，西北红军有两个军的番号，但根据实际，只确立两个师的编制，即红 42 师和红 84 师。设立军的番号，但不设领导机构。这种设置，一方面有利于壮大红军的声威，扩大红军的影响；另一方面，坚持了充实基层的基本原则，保证了红军战斗力最大限度的发挥。适应西北地区地形特点，西北红军设有骑兵部队。红 26 军第 2 团创建时，建有骑兵连；红 42 师组建时，又成立了骑兵团。骑兵部队的建立，使西北红军的机动性大大加强。此外，从指挥体制上讲，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北红军的红 26、红 27 军有着不同的上级，分属中共陕甘边和陕北两个特委的领导，这种状况不利于红军战斗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为协同两军指挥，后来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并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适应了红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作战要求，为西北红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教育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军队的教育训练，孙子曾把“士卒熟练”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西北红军主要由游击队改编而来，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使之尽快成长为正规红军，部队领导把教育训练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西北红军的领导大部分参加过兵运工作，经受过战争的锻炼，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其中主要领导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系统的军校训练。他们深知培养干部对提高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意义，红 26 军第 2 团成

立不久，即成立了随营学校。红 26 军第 42 师组建后，在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后来在陕北成立了陕甘晋红军干部学校。通过举办红军学校加上临时的一些训练班，西北红军对红军干部和战斗骨干进行了分批轮训，培养了部队急需的军政干部，适应了部队发展的需要。由于作战频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主要还是依靠实战锻炼和作战间隙的训练。每次战斗后，西北红军各部队都要进行讲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提高红军战士的军事技能，一些军事首长如刘志丹、贺晋年等，亲自担任教官，给红军战士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战术。在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军选用了部分军事技术较强的俘虏当教官，训练红军的机枪、炮兵射手。通过采取以上措施，西北红军的技术战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工农红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

人类战争史表明，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战争离不开后勤保障。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同其他各地红军一样，西北红军的后勤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陕甘游击队建立后，设立了军需处和经济部。红 26 军第 2 团成立后，设立管理处和经理处。第二次反“围剿”期间，西北军委成立了总务处、经理部以及军委办事处，颁布了战勤动员条例，后勤管理工作开始走向正规。红军的物资来源，主要靠打土豪和打仗缴获。其中武器弹药主要向敌人夺取，同时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者，给予特别奖励。在陕甘游击队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红军游击队长期没有解决战略发展方向问题，陷于流动作战，部队物资来源极为困难，基本上采取就地取给的保障方式。在物资分配上，在开始较短的一个时期，提出“官兵每人月薪 20 元”的口号，不久适应客观情况和军队政治建设的需要，明确宣布以供给制代替薪金制，并实行经济民主制度。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扩大，为保障红军的供应提供了相

当的物质基础。陕甘边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的物资供应和经费筹措开始部分由地方政府有计划的办理。在根据地，设立了集市，发行了货币，满足了人民物资交流的需求，对红军收集战时物资，起了积极作用。此外，苏维埃政府、红军在根据地还办有牧场，开展种植养畜，这不仅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同时增加了红军的供给。特别是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对动员农民支援红军，为红军提供更多的物资保障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维护和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是西北红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

西北红军的历史是一部团结战斗的历史。它再次证明：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凝聚力，团结一致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前提和基本保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个时期，陕甘边、陕北红军隶属于不同的上级，分别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两个根据地活动。但从红军创建起，两个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双方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援。从历史上看，陕甘边根据地在武装斗争的开展、红军游击队的产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等方面都较陕北早。而陕北根据地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组织，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在创建红军游击队过程中，陕北特委给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输送了不少干部。1934年，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两次南下陕甘边，得到了红26军的帮助。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26军派出主力第3团北上陕北与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并肩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进攻。红27军成立不久，面对国民党军队新的“围剿”，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以及西北军委前敌指挥部，实现了西北红军的统一。西北红军所以能够结成一个战斗集体，除了红军在政治上的一致这一根本条件外，主要是两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具有高度的党性，对形势任务的一致认识和对组织领

导的正确解决。刘志丹、谢子长作为西北革命斗争中杰出领袖，他们从革命利益出发，从大局着眼，相互信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创造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在西北红军发展史上，初期和后期在团结问题上都曾有过沉痛的教训。陕甘游击队建立后，发生过“南北分家”问题，由于及时得到制止，未能造成严重后果。后来，在红 15 军团组成后发生的错误肃反，则严重破坏了红军的团结，给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带来严重危机。所幸的是中共中央及时到达陕北，停止了错误肃反，重新巩固了红军的团结。正是有了红军兄弟般的团结，才有红军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西北的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中国革命在西北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西北红军发展的实践证明，高度的团结和统一是红军发展壮大、战胜艰难险阻的一个基本保证，以后人民军队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西北红军发展壮大、取得胜利的源泉

红军是工农大众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可靠后盾。在土地革命中，西北红军一面作战，一面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尽管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与南方苏区相比进行得也比较缓慢，但由于土地革命的开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打击了封建势力，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斗争热情，同时又团结了中间力量，有力地动员了广大农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

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离不开群众武装的配合。从陕甘游击队时期起，就十分注意帮助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发展。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赤卫队、少先队。他们平时劳动、站岗放哨、肃清敌特，战时袭扰敌人，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

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采取的是志愿兵役制，在各县、区、乡组建赤卫队（军）、少先队的基礎上，广泛成立游击队，成为准红军部队。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和战斗锻炼，成建制地编入红军部队。在游击队、赤卫队（军）升级为红军的同时，又组成新的游击队和赤卫队（军）。这样逐步形成了赤卫队（军）——游击队——正式红军的扩军方式。此外，还组织根据地群众分别参加贫农会、青年、妇女、儿童等非武装团体，平时帮助苏维埃政府开展各项工作，拥军优属；战时实行坚壁清野、侦察敌情，前送后运，支援红军作战，形成了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军）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正是有了人民群众武装力量的发展，弥补了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不足，为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和不断胜利提供了力量源泉。

第五，根据西北地区的社会特点，开展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是西北红军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军事统一战线是对武装斗争的重要配合，对夺取武装斗争胜利有着重大意义。刘志丹曾说过：“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西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面对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包围和残酷“围剿”的环境中，军事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

当时西北地区存在诸多的割据势力，刘志丹等人为使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尽最大可能，同政治上保持中立、不与红军为敌的割据势力，达成互通情报、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协议，为红军和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对同情革命者积极进行争取，使其站在人民一边，扩大了革命力量，达到了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为革

命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南方由共产党掌握的国民党正式武装或工农自卫军为主力，举行武装暴动，尔后成立工农革命军，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创建正式红军。但西北的中共党组织通过其掌握的国民党武装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的计划却遭受重大挫折。根据西北地区军阀林立，派系复杂，官兵矛盾突出等特点，遵照党的指示，刘志丹、谢子长等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长达 3 年的兵运工作。尽管通过兵运工作发动的国民党军兵变大都没有成功，但作为中共在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兵运工作不仅扩大了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影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为陕甘边、陕北红军游击队和西北红军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力量。担任过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主要干部及西北红军师团一级军政主官大部分都参加过兵运工作，这些干部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对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和红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军事统一战线工作除在士兵中开展外，还必须在敌军上层开展。西北地区国民党当局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矛盾重重，大小军阀竞相争雄，派系林立，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并不完全一致。早在大革命时期，西北地区的国共两党就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共产党通过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工作，在当地国民党军队打下了一定基础。大革命失败后，西北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基于历史上形成的私人感情、亲友关系和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各种方式，掩护共产党组织，营救共产党员，或者对共产党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西北地区的党和红军开展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左”倾路线在西北地区的代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复杂性、革命的艰苦性和曲折性缺乏清醒认识，对刘志丹、谢子长等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将高度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实际斗争策略相结合的做法不理解，

在政治上主张打倒一切，反对任何统一战线，单纯强调阶级路线，搞“红白分明”、纯之又纯的工农革命。对于收编的一些农民武装不是进行教育引导，而是采取排斥的态度。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不对敌我双方阵营进行分析，更不懂瓦解敌人的重要性。即使是支持或接近革命的人，也要一律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结果是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弄得红军供应无着，立足艰难。特别是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污蔑、攻击刘志丹等“勾结军阀、白军军官”，并将其作为在红军和根据地开展肃反的重要依据，使西北根据地几乎陷入灭顶之灾，教训极为沉痛。

军事统战工作对红军的生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克服来自“左”和右的错误干扰，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红军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奠基时期，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时期。对红军问题的研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红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在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特点鲜明，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沉痛的教训。加强西北红军的研究，对于深刻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促进当前的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历史启迪。

鉴于西北红军在中国革命中所做的重大贡献，西北红军及其创始人的业绩至今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仍有广泛的影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1992年12月29日，江泽民《在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军队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这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必须始终注意和认真解决好的

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本书通过对西北红军的系统研究，总结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人民军队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为解决“打得赢，不变质”人民军队建设两个重大历史课题，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同时，研究西北红军，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对发挥军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舞西北人民继承革命传统，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也不无裨益。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西北红军的创建、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演变为主线，探讨西北红军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揭示人民军队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

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进行中国革命战争的首要条件。因此，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本书以人民军队的建设为重点，论述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将成分复杂的农民革命武装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军队的成功经验，分析了“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红军建设的干扰和破坏，同时对西北红军各个时期的编制体制、政治建设、军事训练、后勤工作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和分析。

根据地是红军执行战略任务、实现战争目的的依托，是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地。本书探讨了西北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过程和经验，论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指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从领导红军游击队开始游击战争起，就遭到强大敌人的“围剿”，同其他地区的红军一样，反“围剿”作战始终是西北红军的主要作战

形式。本书论述了西北红军从创建到编入红一方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总结了其基本经验。

关于西北红军的历史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有过争论。1983 年中共中央指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有关负责干部座谈，形成了《五人小组对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文件，作为中共中央〔1983〕28 号文件转发，解决了西北革命和红军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完全停止。到 1985 年，遵照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指示，由冯文彬、宋时轮主持，邀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部分领导干部，对 1965 年由兰州军区组织编写的《西北红军战史》中若干有争论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对西北红军争论的一些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会后形成《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办公厅〔1986〕103 号文件印发。以上两个中央文件为研究西北红军提供了原则依据。

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为指导，在研究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注重比较分析，力争做到论从史出，客观公正。紧紧围绕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的主题，系统研究西北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展壮大的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为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第一章 西北火种

西北红军产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但其渊源却要前溯到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军队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并在中国的南方和西北地区进行了军事实践活动。这些理论探索和军事实践活动，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对以后红军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前导和借鉴作用。

一、中共建军思想的萌芽

军队作为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是附属和服务于一定的国家和阶级的暴力工具。无产阶级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掌握武装，建立自己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军队是被压迫阶级对付压迫者的工具，是革命大众用以“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非常权威的手段”。列宁也说：“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战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军队重要性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专制的统治；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革命的对象异常强大，他们建立了极端野蛮的军事独裁统治。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以后，革命的果实被军阀攫取，中国呈现出一个军阀混战和军阀割据的局面。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揭示了中国政治这一特点。他说，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视军如命，他们都看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中国的政党，离开了军队就无所作为。一些政党虽然没有自己的军队，但也知道在政治上要依附某个军阀，才能生存下去。革命政党要有所作为，实现革命的目的，必须用革命的军队战胜反革命的军队，用革命战争战胜反革命的战

争。正如斯大林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毛泽东也深刻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所以，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发展，能否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革命斗争主要斗争形式——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就成为必须充分认识和正确解决的重要课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学说。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将主要精力放在从事组织建设、工人运动，只有一部分党的领导人对军队的重要性有所认识。1922年3月，阮啸仙在《青年周刊》上发表《社会主义与军人》专论，提出要“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周恩来在1922年发表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同时，蔡和森也发表文章，总结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只有破坏和遣散旧军队、建立新军队才能巩固政权。上述这些认识还是初步的、概念性的，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宣传口号上。

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表明，没有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军阀。孙中山也从“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陈炯明叛变革命的事变中认识到掌握和建立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中国进入大革命时期，在中国的南方，中国共产党开始帮助国民党创建黄

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党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展开工作。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进行，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党的部分领导人关于军队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27年2月，瞿秋白提出了争夺革命军队领导权的思想。他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在争领导权的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我党要“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毛泽东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由于当时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的正确主张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26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但这还只是一般性的号召，对如何建立自己的军队、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决议并没有提及。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出现了严重危机。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并没有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在危急时刻召开的中共五大，把中国革命的基点寄希望于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政府和西北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不是组成一支中共自己的军队。中共五大虽然确定了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的军事工作的新方针，但会后并未认真执行。针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危急情况，1927年5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求把2万名共产党员和5万名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以避免革命的失败。可惜，这个指示来得太晚，而且，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因担心与国民党决裂，也拒绝执行这

一指示。两个月后，大革命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的背叛完全失败，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破产。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自己的军队重要性的认识有了一个重大飞跃。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早期中国共产党已有部分领导人对军队重要性有所认识，并提出了争取军队领导权的主张，但这些主张当时在党内并不占主流。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入的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全面的、完整的理解。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支配下，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放弃了领导权。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军队问题上始终处于帮助国民党的地位，这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二、中共早期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工作

西北地区是大革命时期革命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帮助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推动北伐战争的同时，在西北地区，开展了以帮助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主的军事活动，成为共产党早期军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以后中共在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中共在该地区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帮助国民军经略西北，策应北伐战争

国民军亦称西北军，是冯玉祥领导的、在大革命影响下由北洋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部队分化出来的一支军队。对于这支军事力量，中共中央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非常重视，力争促其参加国民革命，推动大革命在北方地区的发展。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广东政府北伐问题。会议对国民军进行了分析，

认为其“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会议充分估计了国民军对国民革命和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的影响，决定党“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惟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会议决定成立军委，指导党的军事工作，特别是国民军中的工作。从此，中共中央有了专职的军事工作机构。

鉴于西北地区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认为“应极力维持冯玉祥在西北存在”，“对于西北工作当十分重视”。

早在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受到了北方各派军阀压迫和排挤。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遭到冯玉祥的拒绝。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对冯玉祥进行了积极争取，认真分析了国民军的处境和西北地区的特点，认为西北地区虽然贫困，远离出海口，但军阀势力却鞭长莫及，加之 1921 年冯玉祥曾任陕西督军，国民军在西北地区有一定的基础，大有经营余地；同时背靠苏俄，便于接受援助。如果冯玉祥不接受西北边防督办职务而引退，国民军则会失去中心而分化瓦解，对国民革命不利。在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的劝说下，冯玉祥接受了段祺瑞政府的任命，这为国民军以后在西北地区的经营提供了条件。此后，冯玉祥开始与中共合作，并通过中共北方区委与苏俄建立了联系。

1926 年 7 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并迅速取得两湖、江西战场的胜利。国民军为策应北伐，与北方军阀进行作战，但遭到重大挫折。在直奉军阀的猛烈进攻下，“国民军匆遽撤兵，损失甚巨，余众不过七八万人，合二、三、五军不过十二三万人，集中包头、甘肃一带”。这时，冯玉祥正在苏联考察。鉴于国民军面临的严峻局面和全国形势的发展，在李大钊的敦请下，冯玉祥于 8 月 17 日离开苏联，回到国内。9 月 17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冯玉祥及其国

民军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国民军参加北伐战争。

五原誓师后，为了帮助国民军重振军威，确定一条正确的进军路线，国民军撤离南口不久，李大钊认为：“国民军既如此失败，其出师路线不免于向甘（肃）、新（疆）垦殖边疆与占领陕西”。但是“前者迟慢而且敌之随踪而来，并未能安以垦殖”，“后者则虽有几分冒险，但国民军唯一有希望的出路确不离乎此”。9月8日，李大钊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明了他对国民军进军路线的意见。他主张国民军应该“即出兵陕西，经府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李大钊的意见符合国民军的实际，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同。9月20日，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军现时之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大钊派共产党员方仲如给冯玉祥送去密信，提出了“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冯玉祥接信后，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并据此提出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根据上述方针，冯玉祥以一部分兵力集聚在包头、归化一带牵制奉军，其余主力进入陕西、甘肃两省。在甘肃基本平定后，又分两路由甘肃平凉、陕西榆林南下。在陕西共产党的帮助下，由李虎臣、杨虎城作内应，于11月28日解除了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围困。刘镇华全军溃退，逃回河南。西安的解围，保全了国民军的西北根据地，使陕甘绥连成一片，促进了陕西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国民军再起西北，粉碎了帝国主义和直奉各派军阀“围剿南北二赤”的战略计划，策应了北伐军武汉、江西战场，同时也为国民军东出潼关，

参加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此后，在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下，国民军致力于经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遂成为北伐战争又一重要战略基地。

2.以军队政治工作为重点，促进国民军向革命的转变

根据苏联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建军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中开展了政治工作。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西北地区军事工作的重点，目的是通过军队政治工作，促进国民军这支旧军队向革命的转变。

为了促进国民军向革命转变，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对于国民军“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必须“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为此，中共确定了党在国民军中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9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给李大钊去信，说明了对加强国民军工作的意见，根据党在广东国民革命军建设经验和国民军的特殊性，提出了三项原则：

“（一）此时国军（指国民军，下同）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肯定了蔡和森提出的三原则，就党代表的设置、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要求。中共北方区委也制定了《北方区对于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对冯玉祥的思想状况、国民军的战略地位，以及党对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作了全面分析和指示。

蔡和森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原则规定和具体要求，基本上符合国民军和陕甘宁绥等西北地区的实际，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有利于共产党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中共中央右倾路线的影响，其中对党与冯玉祥及其部下的关系的规定，是有

些欠妥的。

国民军联军组成后，在共产党的帮助和主持下，军队政治工作开始展开。当时全军的政治工作由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政治部实际上由共产党员“刘伯坚主其事”。当时，政治工作人员十分缺乏，为此，冯玉祥一方面集合其干部学校学生“交于刘伯坚加紧训练”，一方面给李大钊写信请求协助解决。李大钊接到信后，即派人到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同时迅速报告中共中央。此后，由北方区委、莫斯科、黄埔军校、上海派遣邓希贤（小平）、刘景桂（志丹）、唐澍等人陆续到达西北地区，加上五原誓师前就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如刘伯坚等人，在国民军工作的中共党员最多时达 240 余人。

在共产党积极帮助下，国民军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逐步得到建立和完善。除设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统辖全军政治工作外，各路总司令部、独立师师部及各路、各师、各旅均设立政治处。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军联军各部各级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为开展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在中共的具体参与下，国民军联军制订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职责》、《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人员组织条例》等规章条例，对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各种组织设施与政治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作了详细规定，保证了国民军政治工作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广大官兵，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持创办了《新国民军周报》、《革命军画报》，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创办了《新国民军》、《中山画报》等刊物。同时，还翻印了一些革命刊物，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与中国》、《向导》、《中国青年》等。此外，还在一些部队成立了政治俱乐部、士兵自治会等群众组织，举办政治训练班、时事报告会、讲演会，教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创办了连队

小报，组织士兵做群众工作。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还组织了战时宣传队，成立了前敌宣传慰劳总队，深入前线，进行宣传慰问活动，鼓舞士气。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红军和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经验，结合国民军的实际确立起来的，但又与前者有明显的区别，如虽然国民军已宣布全体加入国民党，但重要的党代表制在国民军中并没有实行，这无疑影响了对这支由旧军阀军队转变而来的部队的革命改造。尽管如此，通过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还是取得了相当成效，提高了国民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国民军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正如冯玉祥所说：北伐战争中国民军之所以“能忠勇奋发，拼命杀敌”，是因为有革命的认识和明确的主义，这“纯系政治训练所奏奇效。”周恩来也赞誉到：“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

3.参照黄埔军校经验创办军政学校，培养军事人才

为了有效地在西北地区开展党的军事活动，中国共产党仿照黄埔军校和苏联红军学校的组织体制与办学经验，创办军政学校，积极开展培养党的军事人才的工作。为此，除派部分陕西籍的中共党员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还在陕西创办了几所军政学校。1925年6月，共产党员魏野畴协助杨虎城在陕西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杨虎城兼校长。并派人南下广州考察黄埔军校制度课程，仿照黄埔军校设置了教授部、教练部、政治部、学生总队部。魏野畴担任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刘含初、吕佑乾、赵葆华被聘为校政治教官，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担任下级军官。该校成立后，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其中一部分共产党员学员以后在杨虎城部担任师、旅、团级的职务，对杨虎城及其部队产生了积极影响。西安解围后，根据李大钊和

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魏野畴以国民军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在西安举办了一个政治训练队，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学员 120 人，都是由陕西省各地中共党组织推荐来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训练队由魏野畴主持，张汉民代理队长（队长李林未到任）。刘伯坚、刘志丹、杨明轩、张含辉等兼任教员。学习课程有政治和军事两大类。政治课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和十月革命》等；军事课为操练和练习射击，学期两个月。

为了适应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927 年 2 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积极推动下，在西安筹建了名义上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的中山军事学校。该校基本上为共产党员控制，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希贤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学员总队长。全校三个学员大队，每个大队都设有中共党的支部，受校党总支领导，成为一支中共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李子洲、刘志丹等也参加了学校的领导工作并担任教官。学校课程以军事为主，同时兼顾政治。开设课程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 ABC》、《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步兵战术》、《机关枪》、《野外作业》等政治军事科目。学校按照黄埔军校的做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时被誉为“西北之‘黄埔’”。中山军事学校前后举办两期，历时约半年，培养军事、政治骨干约千余人。

在创办中山军事学校的同时，为解决西北地区大革命运动中干部缺乏问题，中共陕甘区委于 1927 年 2 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同中山军事学校一样，学院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育大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学院成立有共产党的支部。从 2 月到 7 月大革命失败时，学院共招收 900 多学生。他们中除部分是在青年学生中招考的外，大部分是西北各地共产党组织保送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学院各班课程有专业课、政治课和军事训练。政治课所授科目是统一的，主要有：

《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农民运动》等。专业课按各班不同性质讲授。学院注重学生实践锻炼，全院学生一律过严格的军事生活。

以上军政学校，是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开办的，名义上多隶属于国民军，实际为共产党控制或影响。学校体制仿照苏联红军学校，并参照了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有的还聘有苏联军事顾问，是当时中国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全新的军政学校。由于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努力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促进了西北地区大革命运动的发展。

4.借助国民军的旗帜，建立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

借助国民军的旗帜，以在军队中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建立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这是中共在西北地区军事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在西北地区掌握了比较可观的军事力量。这些军事力量除了上边提到的中山军事学校外，主要还有史可轩领导的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和石谦旅的李象九营以及部分农民武装。

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前身为国民军联军第2军第2师，是中共直接掌握的部队。师长史可轩、团长许权中、团政治处主任马明方均系中共党员。1927年1月，该师驻防西安，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政治保卫队，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队队长。部队建有中共的“军支”。冯玉祥转向反动后，下令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合编为一个旅，由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洛阳整训。为保存党的这支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史可轩率领北上陕北独立发展。后来，史可轩在陕西富平县被反共的国民军第2军师长田春生杀害。部队由许权中继任总指挥。

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为保存党的这支武装，部队先后归陕西军阀冯子明部和李虎臣部建制，分别被改编为独立第3旅和新编第3旅，许权中任旅长。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该旅建立了旅党委。后来，根据党的指示，该旅参加了渭华起义。

李象九营隶属陕西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1925年9月，为了发展革命武装，根据党的指示，共产党员李象九被派往石谦部，在共产党员谢子长的帮助下，招收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组建了第3连，李象九任连长。不久，谢子长领导的民团也加入石谦部，编为第12连，谢子长任连长。为了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中共地方党组织从陕西绥德第四师范、榆林中学等地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充实李、谢连队。李象九、谢子长等人根据党的指示，开展部队的政治军事工作，积极发展党团员，并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直接受中共北方局领导。1926年，石谦任旅长，李象九升任营长，部队中的特别支部改由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并大量吸收进步官兵入党。至1927年春，已在石谦旅的几个营、连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有6、7个连长和100多名官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石谦旅特别是李象九营基本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在西北地区开展军事工作，促进了革命在西北地区的发展，积累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掌握了一定的军队，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成立播下了种子。但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右倾错误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丧失了历史的机遇。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西北地区军事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是促进了革命在西北地区的发展，为西北红军的成立播下了种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工作，不仅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而且传播了革命火种，扩大了革命影响，取得了创建

军队开展革命战争和组织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初步经验；通过创办军政学校，选送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军事理论知识，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在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或带兵作战，积累了军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经验。这些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保存了下来，成为武装起义的领导力量，并成为后来组建西北红军的骨干。同时，党由于在西北地区掌握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二是积累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为以后红军建设提供了借鉴。通过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活动，在军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建立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以党的理论、主义、政策为中心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士兵群众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分化瓦解敌军；主张“以革命的精神作维持纪律的基础”，实行严格的纪律，从严治军；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重要的事上”，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应以身作则，要求其生活上“应和兵士同幸福同艰苦”，“应知兵士的心理，不要有官僚习气”，战斗中“要以自己英勇杀敌的行为勉励兵士”，“要先兵士而牺牲，为兵士作模范”；等等。这些不仅在当时增强了政治工作的效果，也为以后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的政治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是为土地革命战争党的军事统战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革命失败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大革命时期在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建立的特殊关系，开展兵运工作，保存了党的骨干，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党的军事统战工作和以后抗日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1年，原西北国民军部队国民党第26路军，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策动下，由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在“围剿”红军的前线发动了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成为红军

的一支劲旅。由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高级军官中作了大量争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杨虎城表示过要加入共产党，后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3 年与冯玉祥、方振武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吉鸿昌，解放战争时期起义的高树勋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冯玉祥本人一度追随蒋介石，走了一段弯路。国民军瓦解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他思想逐步进步，最后也站到了抗日反蒋的立场上。解放战争时期，又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进行斗争。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西北地区军事工作的教训，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军队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如前述，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尽管已经认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但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而言，并没有认识到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在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独立的军事工作，而是以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为中心的。具体地讲，是以国民党领导北伐战争为中心，协助国民党进行军事活动的，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处在国民党助手的地位。“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西北地区急剧发展起来，成为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当时，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多从事政治工作，军事指挥权大都掌握在原旧军阀、旧军官手中。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中要求：“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尽管党的部分同志认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在协助国民军开展军事工作的过程中，注意发展自己的武装，掌握了史可轩部，李象九、谢子长营连，以及中山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党的军事人才。但是，这些是在协助国民军开展军事工作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手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其直接掌握的军队，在国民军中只占极少数。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具备独立发展自己武装的条件下，没有抓住历史的机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主要依靠苏俄的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更是如此。西北地区与苏联地理位置毗邻，是苏俄援助中国的一个重要陆上通道。正是通过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帮助，冯玉祥与苏联建立了联系，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国民军的军事力量在西北地区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自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得到苏联政府军火援助有：步枪38828支，日本造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1926年8月，冯玉祥结束在苏联的考察访问，准备回国参加北伐。应冯的请求，苏联政府除派来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顾问外，还支援了大批军械弹药。此外，苏联政府还帮助冯玉祥建立了军官学校和若干军事技术学校。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争取苏俄援助国民军的同时，争取苏俄在军事上给予扶助，是可能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在西北地区取得苏俄的军事援助也是十分便利的；同时，这一地区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反动统治势力较为薄弱，地方军阀林立，矛盾重重；就国民军而言，也是由多支军阀部队改编而成，内部派系斗争激烈，这也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发展自己的武装具备了一定条件。苏联在援助国民军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稍加扶持，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可以有一个可观的发展。这样，也不会在蒋介石、冯玉祥走向反动时而措手不及。然而，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历史的机遇，最后遭受严重的损失。

三是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缺乏客观清醒的认识。国民

军是由旧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军队，尽管进行了革命的政治工作，但并没有实行彻底的改造。对此，应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当时，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寄予很大的希望，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作用估计过高，抱有幻想。正如后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政策的错误，由国际、中央以至陕甘区委，都是对冯的估计太高，‘无条件’的对冯帮助！我们不是领导政治，而变成冯的宣传机关；在冯方工作的同志对冯不能影响，而只是做了冯的秘书主任，还是说取得冯的信任了。”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汉双方对峙，冯玉祥成为宁汉双方拉拢的对象。鲍罗廷、陈独秀抛出“西北学说”，即主张继续北伐，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后，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东征讨蒋。把革命的砝码放到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身上。但冯玉祥在关键时刻倒向了反革命阵营，通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和开封会议，实现了与汪、蒋的联合反共，给危急中的大革命以致命的打击。后来，周恩来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

第二章 红色风暴

八七会议以后，根据党的指示，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先后举行了清涧、渭华等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没有实现建立红军的预期目的，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军队的重要尝试，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党创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准备了条件。

一、冯玉祥“清党”反共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在共产党帮助下曾一度倾向革命，但后期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新军阀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实有兵力约8万，号称13万，同宁汉双方各自拥有的兵力相差无几，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炙手可热，成为宁汉双方争夺的对象。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武汉方面出师北伐，但对武汉政府的反蒋活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保持联系。

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的争取和右倾政策，并没有使其在关键时刻向革命靠拢。以耿炳光为书记的中共陕甘区委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面对冯玉祥逐渐右倾，主张“为革命而退让”，反对建立工农武装，“以免冲突扩大，引起政治纠纷”。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推动冯玉祥向左转。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就“清党”问题达成协议，唐生智、张发奎部调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交国民军驻防，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6月16日，冯玉祥在徐州，与南京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等举行会议，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敦促宁汉合流。19

日，开封会议，冯玉祥最终倒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了反共的道路，同时开始在国民军及其辖区豫、陕、甘进行“清党”反共活动。7月上旬，冯玉祥以“纠正”以往革命中的“幼稚病”的错误为由，致电指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在其西北辖区进行反共“清党”。他在电报中提出三条反共原则：“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任其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7月10日，石敬亭在冯玉祥的指示下，在西安红城（今新城）进行了国民党员的宣誓活动，阴谋清除共产党人。

7月15日，西安警备司令部遵照国民党中央和冯玉祥的训令，和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同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的命令。这个命令除进一步重申冯玉祥的反共三原则外，还提出“凡共产党人、共产行为与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种印刷品和奇异口号，一律禁除，现已派员严密搜查，分别惩办，如有违犯者以军法从事”。

7月15日以后，冯玉祥勒令解散大革命时期临时性的军事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成立了以石敬亭、井岳秀、岳维峻为首的陕西省政府，同时，解散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冯玉祥命令将国民军联军中的苏联顾问和著名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人“礼送出境”，并以“集训”为名，将各部政治处长和在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集中到开封，逐个进行审查。随后将这批中共党员用火车押解出境。刘志丹等20余人被分别装进两辆闷罐子车，送出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批共产党员躲过了敌人的暗算，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到武汉后，始知武汉政府已叛变，遂又辗转通过转入地下的党组织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的指示，大部分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参加了

南昌起义。刘志丹奉命回陕，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之间，负责联络工作。

在冯玉祥部的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被驱除或被迫离开，中山军事学校师生被命令开赴前线，学校解散。7月30日，著名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和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在率队转移途经富平县美塬镇时，被国民军第2集团军师长田生春杀害。

后来，在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描述了邓小平离开西安的经过：

父亲是在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四一二”以后触目惊心的国内形势早已历历在目，由于他直接和刘伯坚保持联系，因此消息比较灵通，在得到所有共产党员要被集中的消息后，他与刘伯坚、史可轩以及李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应去武汉找中央，而不是开到开封去“受训”。因此，六月底，父亲离开了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武汉。

中山学院被冯玉祥勒令放假，被迫停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无法在西安立足，回到故里陕西中部县（今黄陵）。8月15日，被陕西军阀井岳秀派人秘密杀害。在徐州会议后，国民党陕西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日报》被冯玉祥下令封闭，《国民日报》社社长、共产党员刘天章和总编辑白超然被逮捕送郑州关押，各种群众团体被强令停止活动。

恶化了的形势，由东及西，迅速蔓延到了甘肃境内，省城兰州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刘郁芬按冯玉祥指令成立“甘肃省清党委员会”后，立即开始搜查中共组织，惩办共产党员，禁止出版销售进步书刊。甘肃国民党政府接连向各县发出“缉查共产党活动”、“根本肃清逆党”、“处理共党分子办法”、“防范过境苏联外交官员的宣传活动”等一系

列“训令”。1927年秋末冬初，宁夏地方当局也开始了反共的“清党”活动。根据冯玉祥的命令，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一方面强行驱赶共产党员出境，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审查，一方面宣布解散各个群众团体，禁止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印刷品和口号，西北地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二、中共的应变措施

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陕甘区委对时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已经有所预感。1927年6月前后，出席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张含辉等人带回了武汉方面形势变化的情况，返回时在郑州会见冯玉祥，冯玉祥明显流露出对农民运动不满的情绪。这时，河南已开始“清党”，这对西北的革命形势无疑是个不祥的信号。张含辉等立即电告陕西省农协做好应变准备，并星夜赶回西安，向中共陕甘区委汇报了冯玉祥的变化，以引起党的重视。

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刘伯坚很早就对冯玉祥的变化产生了警觉，虽然冯玉祥参加徐州会议背着，但他很快知道了会议的详情。几乎在张含辉等向中共陕甘区委汇报的同时，刘伯坚也在郑州委托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陕西代表王芾南、刘炎、李守仁等，立即回陕西向党组织汇报，要求党做好冯玉祥叛变的应急准备。

当时住在潼关的共产国际派驻国民军联军的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也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向中共陕甘区委提出了应变的建议，要求党组织立即撤出西安，以避免损失。

中共陕甘区委遂于7月初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计了可能发生的变故，会议提出总的方针是“退守政策”和“整顿组织”。随后中共陕甘区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地下，已经暴露的同志尽快转移，领导干部迅速深入基层，部署应变工作。

恰在这时，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陕西代表黄平万回到西安，

带来了中央要求撤销中共陕甘区委、成立陕西省委的指示。7月11日，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了陕西省委成立会议。由于情况紧急，无法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由耿炳光、魏野畴、黄平万、李子洲和张金印等5位负责同志参加，研究了陕西省委组成人选及分工，确定由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负责组织，崔孟博负责宣传，魏野畴负责军事，亢维恪负责农运，张金印为团委书记，确定耿炳光、李子洲、崔孟博3人为省委常委。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管辖的区域包括陕西全境和甘肃、宁夏部分地区。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鉴于西北地区形势已经恶化，不便直接指导各地工作，决定建立秘密工作制度，健全各地组织，减少下级和上级的直接联系，将全省分为6路，每路设特派员一人，负责指导该路的工作。

由于陕西中共党组织对当时形势有较清醒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及时采取了有组织的退却策略，并利用西北军阀众多、矛盾重重等因素，在地方军阀中成功地潜伏下一批共产党员。加之冯玉祥“清党”初期采取了较温和的“礼送”方式，到七一五大“清党”时，陕甘宁中共党组织的“退守”工作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党员得以成功地隐蔽或转移，中共在西北地区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1927年11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陈家珂在向中共中央《关于陕西政治军事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党的努力工作，冯玉祥“清党”运动以后，党的工作“暗中仍能进行”，军事工作“未受多大打击，实力还雄厚，可轩余部约千余人，多为我们同志，枪械甚好”，部队中设有教导营“专为训练武装工作的同志”，希望党中央“对此部特别注意，以为西北武装暴动之根基”。

为了解全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央对西北工作的指示精神，7月下旬，新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派组织部部长李子洲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

请示工作。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最急于知道的是中央对冯玉祥的态度。此时，已与蒋介石新军阀合流的冯玉祥一方面仍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以从苏联获得军火，另一方面却又在“清党”反共。刚刚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在对待冯玉祥的问题上手足无措。

在武汉，几经周折，李子洲与中央取得了联系。其间，发生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国民革命军 3 万多人在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下，于 8 月 1 日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6 日，李子洲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汇报了陕西的政治形势和省委的工作特别是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8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接见了李子洲。李子洲首先向张太雷报告了陕西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对冯玉祥的“既不反冯，也不说冯好”左右摇摆的政策。

张太雷代表中央向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认为陕西“不打冯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中央分析冯在河南难以立足，将以陕西作为其根据地，要求陕西党组织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势力，从根本上推翻冯的统治，要提出代表民众利益的口号，如“抗捐抗税、反对土劣贪污”，“耕者有其田”等。用各种方法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民运动集中的几个县可开始暴动。在军事上“尤其在作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入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的去拿，失败可以上山”；可利用与冯玉祥有矛盾的原国民军第 2、第 3 军与我们合作反冯，但主要的是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中要组织改善待遇的斗争，在商人中提出不交苛捐杂税。党的各级组织要按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进行改组，吸收勇敢分子入党和参加领导机关。

9月上旬，李子洲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西安。

为贯彻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明确以后的工作方针，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27年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市红埠街9号，秘密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各路特派员、各县委及青年团的代表15人。他们是：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肖铭、潘自力、杜衡、张性初、张含辉、陈嘉惠、曹趾仁、徐梦周、张国藩、庞诚哉、蒲克敏、张金印。

会上，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的政治报告和党务工作报告，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批判了省委书记耿炳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方针和措施，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及其指示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9项决议案，选举了新的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强调了加强军事工作和农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提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同时还指出，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的兵变，并要建立独立的武装；培养党的军事干部，对党员进行军事知识教育；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开展农民运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亦可上山”。

最后，会议对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了改组，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任组织委员，李子健任宣传委员，张金印为团省委书记，刘继增为秘书长，亢维恪为农运委员；候补委员为潘自力、张含辉。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一直到 27 日深夜结束。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革命形势处于危机关头召开的。由于及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七会议精神，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并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路线和政策。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开始进入领导西北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三、清涧起义

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前，1927 年 8 月 22 日，井岳秀在榆林诱杀了倾向革命的石谦旅长。石的旧部人心浮动。不久，井岳秀任命其亲信康子祥接任石旅旅长，命令师长高双成调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同时，令谢子长连从安定县（今子长县）开到宜川换防，图谋瓦解并消灭共产党掌握的这支武装。为安抚石旅官兵，井岳秀还下令迎接石谦灵柩回白水，准备厚葬。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由中央调到陕西省委军委工作的唐澍到石谦旅开展秘密工作。唐澍到石谦旅后，与李象九、谢子长召开党的会议，研究石谦旅长被杀后的对策。决定不执行井岳秀换防的命令，采取拖一段时间，同时，由唐澍回西安请示省委下一步行动。但井岳秀新任命的旅长康子祥却接连派人来催促部队换防。谢子长和李象九决定李象九营拖辞不动，谢子长连向清涧方向移动。这表面上是执行井岳秀的换防命令，实际上是在聚拢力量，以便在必要时相互策应。

唐澍到西安后，正赶上李子洲从武汉回来，陕西省委即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红埠街 9 号，唐澍向李子洲汇报了陕北的局势和石谦被害后部队的情况。李子洲向其介绍了党的八七会议内容，指示石谦旅时机成熟后立即举行起义。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根据八七会议和中共

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发动石谦旅举行武装起义。

为了加强对起义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和在西安工作的白乐亭到石谦旅李象九营驻地陕北清涧，向陕北和石谦旅中的中共党组织传达了省委的决定，随后成立了起义领导机关——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为委员，并制定了起义具体计划，即：控制石谦旅防区的清涧、延安、延川、宜川等城镇，肃清部队中的反动势力，掌握全旅的领导权。

经过充分准备和酝酿，谢子长连封锁了交通要道，割断了通往榆林的电话线。10月12日清晨，在唐澍、李向九、谢子长等领导下，石谦旅驻清涧部队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冲进警察局，收缴警察的枪支弹药，并捣毁国民党县政府。当天下午，起义部队按计划南下延川，与据守该城的共产党员王有才率领的第1营第4连会合后，向西急进。一路上起义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少战士路过家门而不入。当晚部队在老王庄宿营。第二天，起义部队赶到延长，打死第1营营长齐梅卿，收缴了两个连的枪械。随后，又行军两天，抵达宜川。在共产党员李瑞成领导的1个连的配合下，起义部队占领宜川。此时，全旅连同沿途参加起义的进步青年，总计有1700多人，3000多支枪。

1927年10月13日，即清涧起义的第二天，陕西省组织部部长兼管军事的李子洲，就清涧起义情况代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给中央拟写了报告：

……陕西井部石旅之一营又二连，约共五百人，枪支足数，同志约四五十人，营连长全为同志。派唐澍同志（黄埔学生，党的观念好），在那边做指导工作。最近，石旅长被井暗杀，并对我们那几部分已处心积虑，首谋解决。现在我们也给以积极的策略使之抗井，先

由陕北清涧退至宜川，再不得已，即退至关中之合阳等地，投降高风五（高与营长同志李象九及石旅长有同乡关系），再谋与许权中同志联合……

起义部队占领宜川后，井岳秀十分震惊，急命所部高双成师围攻宜川。关键时刻，起义主要领导人唐澍和李象九在有关部队的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一是起义部队打什么旗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唐李争论得最为激烈。唐澍主张亮出共产党的牌子，立即打出革命的红旗；李象九则主张仍用旧的名义，理由是容易保存力量，争取在陕北与高双成部队共处，必要时可以接受改编。

二是关于军事方向问题。唐澍主张主动出击，进攻延安，以求发展；李象九则倾向于暂时驻守宜川，理由是部队初到，家属、行李、辎重很多，加之部队未及整顿，暂时不宜远走。还提出根据陕西过去地方割据状况，在宜川一带有利生存。

三是关于干部问题。唐澍主张整顿干部队伍，将非党的旧干部洗刷出去，由党员干部接替他们的位置；李象九则主张迁就，不同意撤换旧干部。他认为处决了齐梅卿，在黄龙山又枪毙了一个连长，都是同部同乡，已经引起了人心浮动，眼下应该稳定。

在以上问题上，谢子长同意唐澍的意见。由于意见不一致，唐澍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汇报。

唐澍走后，李象九即改编了部队，仍打出了陆军第 23 军（井岳秀任军长兼陕北镇守使）第 68 师第 11 旅的番号，自任旅长，原旅部参谋孟澄斋任参谋长，辖 3 个营。第 1、第 2、第 3 营营长分别由共产党员谢子长、韩子丰、李瑞成担任。

部队改编后，部队下一步开向哪里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陕西省委原指示拿下宜川后，谋求与许权中部会合。但许权中部的具体位置

在何处，是起义部队向许旅靠拢，还是许旅向起义部队靠拢，省委都没有明确交代。所以，在唐澍走后，李象九也派人去西安请示。在等待省委指示期间，李象九决定驻守宜川。

不久，高双成派 6 个营来攻，同时，井岳秀也派兵从榆林南下，企图造成大军压境之势，对起义部队围而歼之。

为麻痹起义部队，高双成一到宜川城下，就给李象九写了一封信，联络旧日感情。并说自己只不过是奉命行事，仅带了几个兵给老井做做样子，绝不会攻城云云。

两天后，高双成又派人给起义部队连以上干部写信，煽动他们投降叛变。劝降信起了作用。防守宜川主阵地凤翅山的连长雷进才叛变，战斗打响后不到 20 分钟，凤翅山阵地失守，随后，虎头山阵地一个排也投降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李象九只得命令部队仓促突围，向杨虎城部王保民旅驻地韩城转移。

突围过程中部队遇袭，受到很大损失，到达韩城西庄镇时，仅剩谢子长营三四百人。到韩城不久，李象九接受王保民的改编，称为“独立旅”，李仍任旅长。

唐澍到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尚不知起义部队在宜川失利，作出了《关于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指示部队成立旅党团委员会，由唐澍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为委员，统一指挥陕北的军事行动；整顿部队，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成立教导连或队，培训军政干部；与许权中旅密切联系，面商军事行动，互相策应；占据宜川、延长等县，以供部队发展训练的根据。随后，又从三原调回了对党员进行秘密军事训练的阎揆要协助工作。唐澍、阎揆要即赴韩城传达省委指示，在起义部队中办起了教导队，开始整训部队。

但是李象九仍念旧交情，反对整顿部队。鉴于此，唐澍、谢子长等决定抛开李象九，正式打出红旗。1927 年 12 月 30 日，以谢子长

营为基础，部队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帜，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唐澍、谢子长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唯然五人组成新的中共陕北军委。部队编为4个分队，共100余人。红旗打出后的这一阶段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清涧起义中的第二次起义。

起义部队打出红旗后，急需解决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中共陕西省委原打算清涧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南下至宜川、延长等地，补充人枪，加紧军事训练。许权中部若在关中道不能立足，可北上与清涧起义部队会合。但清涧起义部队退至韩城后，由于战斗失利，人员大减，而韩城以南，敌人兵力密集，不论起义部队南下，或是许权中旅北上，都已十分困难。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唐澍、谢子长等研究决定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北上，到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1月1日，刚刚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离开韩城北上途中，误以为宜川守敌只有1个连，决定攻打宜川。部队袭入宜川城后，发现敌人有1个营，与敌交战半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遭到重大伤亡，遂撤出城外，向北转移。行至延长交口镇时，又遭敌人袭击，部队转而西进。1月底，部队转战到达甘肃省合水县的豹子川，遇强敌围攻，部队再次遭到重创，被迫宣布解散。唐澍、谢子长、阎揆要返回西安，由中共陕西省委另行安排工作。清涧起义最后失败。

李象九在唐澍、谢子长率领部队开走后，感到失去了以唐澍为首的中共陕北军委的信任，陷入了苦闷之中，便没有追赶部队。后来，只身辗转各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李象九致力于商界，但爱国热情不减。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安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西北工商界代表、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病故。

清涧起义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其规模 and 影响都不及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在西北地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军阀的第一枪，有力地配合了各地的革命斗争，振奋了西北人民的革命精神。起义历时 3 个多月，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保安（今志丹）等 8 个县，使陕北封建军阀井岳秀损失了 1 个旅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在陕北的统治。起义部队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为在西北地区创建红军游击队锻炼了一批军事干部。

清涧起义很快就失败了，除客观上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孤立无援外，主要原因和教训有以下几点：

1. 起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与农民运动结合，实行土地革命。清涧起义爆发时，提出的口号是“为石旅长报仇”，缺乏政治色彩。部队起义后，唐澍、谢子长等主张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号召人民革命，但遭到部队主要领导人李象九的反对。由于旗帜不鲜明，基层广大官兵对起义的政治目的不明确。后来虽然抛开李象九，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旗帜，并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到土豪劣绅”的口号，但因敌情严重，未采取实际的行动。由于起义军始终没有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而是长时间忙于作战和内部争论，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没有根据地作依托。这是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2. 党的领导不得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尽管清涧起义部队早在大革命时就基本被共产党所掌握，并建立有党的特别支部。起义前还成立了指挥起义的领导机关——陕北军事委员会。但因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握有兵权的李象九的右倾，部队中没

有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虽然后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了新的军委，但部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未及加强。第二次攻打宜川失败后，部队北上途中由于不断遭敌袭扰，加上弹药缺乏，粮食不敷，许多指战员情绪低落，不少人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离队而去。在危急关头，主要领导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宣布将部队解散。

3.军事上指挥呆板，战术不灵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作战取胜的关键。起义部队占领宜川后，唐澍主张主动出击，进攻延安，以求发展。由于李象九拒绝了唐澍的建议，部队在宜川滞留 20 余日，丧失了有利战机。在优势之敌来犯时，又以阵地战迎敌，导致部队重大损失。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成立后，由于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疲于奔波，部队最后在与强敌作战中失败。

四、渭华起义

八七会议以后，受大革命失败的情绪化影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1927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强调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指出全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反对退却，主张继续进攻，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从 1927 年 12 月到 1928 年 1 月，中共陕西省委多次接到中共中央要求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函件。1928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中央致陕西省委信》中指出：“陕西的军事运动是较别的省为有基础”，因为“不仅有军官运动并还建立了士兵支部”，“依数目说陕西我们已有整个儿两旅和一些零星队伍，较之广东仅有一千多人的军队便能造出广州海陆丰的暴动局面的已多了一倍”。要求中共陕西省委以此为基础，加紧准备武装暴动。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28 年 1 月 12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

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准备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总暴动。为此，依据地理、政治、经济等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 3 个区域，关中又分为省东、渭北、省西、中区、东府 5 个区，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指挥各区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于 1928 年 3 月 18 日在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中再次指示陕西省委：“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3 月 22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决定以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固市等 5 县为陕东暴动区。为加强对陕东暴动的领导，成立了以刘继曾为书记的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指示归属陕军李虎臣的许权中旅参加陕东暴动。4 月 6 日，中共陕东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及许权中旅的行动计划。《计划大纲》对健全起义领导机构、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和政权等问题作了规定。《计划大纲》还作了如下说明：

- （1）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的工作计划；
- （2）这个计划是要在最短期间内完全实现的；
- （3）这个计划是要按照陕东客观情形决定的；
- （4）这个计划是为造成主观条件，使许旅出山，帮助暴动，而不是等待主义。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渭华暴动的条件已逐步趋于成熟。

渭华地区，位于陕西东部，北跨渭水，南接秦岭，地处交通要道，交通便利，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地区是中共在西北最早建党的地区之一，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虽然受到打击，但是共产党还掌握着部分地方武装。中共华县县委曾通过党掌握的高塘自卫团发出通告，“命令各村农民组织团体以自卫”。1928 年 2 月 28

日，渭南反动豪绅刘铭初等捣毁中共区委机关所在地渭南县宣化小学，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当地群众进行了反击。29日，领导、发动了一部分学生和农民，打死了刘铭初，打伤乐育小学反动校长田宝丰。随之国民党渭南当局查封了宣化小学，并派军队警察包围县立中学，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10多人。“宣化事件”加剧了阶级矛盾，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尖锐起来，成为渭华起义的导火线。中共陕东特委成立后，着手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并开始组织和训练农民武装。到4月底，农民反对封建豪绅的斗争已经起来，农民武装力量已经初具规模。

为配合农民暴动，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多次对党控制的许权中旅发出指示，加强对该旅的工作。1928年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要求“党领导下的军队应实际上变为工农革命军”。为加强许旅的领导力量，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到许权中旅。此后许权中旅中共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据中共陕西省委1928年3月20日的报告，许旅中共党的支部发展到18个，党员增加到165名。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内部的共产党员在驻地雒南（今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培训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公审和处决了几个恶霸地主，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

渭南“宣化事件”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的政策，1928年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了第三十九号通告，要求由“宣化事件”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通告指出：

沉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了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本党的新政策，坚决地勇敢地站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

宣化斗争，并不断地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开发群众的游击战争，猛烈地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装，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全陕东的大纷[动]乱，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

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从上海返陕，带回中共中央要求陕西党组织武装起义的指示和中央给许权中旅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共陕西省委将该信转交许权中旅党委，要其讨论执行。现将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权中同志并转旅委及全体同志：

陕西省委同志负责同志来，得知你们的近况，中央对于你们今后的工作有下列指示：

（一）关于党的一般军运原则与策略，现在节录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致朱德同志信的几段，你们详细读阅，即可明了。

（二）根据这些原则和策略及你们的特殊情形，你们现在应注意与执行下列几点：

1.你们现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的不是你们的出路，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争斗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陕西的军队无论他是冯玉祥、岳维峻或李虎臣以及一切的杂色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从今日起，必须下决心的脱离，若是犹豫妥协，终会要被他们解决的。

2.目前要做的工作：第一，肃清内部，一要军官尽量换成我们的同志，有反动倾向的，应不姑息地解决之。第二，发展组织……第三，扩充军队，你们现有一千八百支枪，至少可扩充到二千五百多人。……

3.你们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现驻地三要司农民运动及党的力

量都没有基础，又在敌人的四方包围之中，恐不能久驻。据我们想到的，你们的出路：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农民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预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哪条路，要看动作时的实际环境来决定——由陕西省委决定……

1928年4月，陕西军阀南路军副司令李虎臣乘蒋、桂、冯、阎与奉系军阀大战之际，发动了反冯战争，企图独霸陕西。当时，许权中旅奉李虎臣之命开赴潼关，参加同冯玉祥之宋哲元部的作战。

军阀混战为中共组织暴动提供了契机。5月1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陕东特委在渭南崇凝镇揭开了暴动序幕，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人民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这是西北地区最早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着手准备分配土地。随后，渭南和华县交界的赤水镇、渭南的阳郭镇、三张镇、华县的高塘镇等地也先后暴动。为了加强渭华地区的农民武装，中共陕东特委将派往许权中旅学习军事的人员正式编制命名为“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副队长薛自爽。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移驻高塘镇西南的塔山，构筑工事，形成一个军事据点。

渭华暴动开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唐澍率领许权中旅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镇，参加渭华起义。5月10日，许权中旅到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16日，起义部队在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归工农革命军指挥。工农革命军中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党的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吴浩然任中共党委书记。西北革命军设前敌总指挥部，唐澍任总指挥，政治委员刘继增，参谋长王泰吉，参谋主任高克林，总顾问许权中，经

委主任杨晓初，政治部主任廉益民，政治部副主任吴浩然，经理部主任王庆兰，卫生部主任邢运堂，军法处处长许尚志。全军近千人，辖 4 个大队、1 个赤卫队和 1 个骑兵分队。其中第 1 大队长赵亚生，第 2 大队长武培谋，第 3 大队长谢子长，第 4 大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长张汉俊，骑兵分队长许权中兼。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立即发布布告，号召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布告全文如下：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	剥削穷人真个凶
加一放账驴打滚	卖儿卖女还不清
要账手提桃桃子	打人不分老和幼
如今穷人要翻身	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	他是咱的子弟兵
大家同心一起干	铲除土豪和财东
贪官污吏都打倒	我们要做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	才能过上好光景

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委主席 刘景桂

前敌总指挥 唐澍

政治委员 刘继增

中华民国十七年

此后，一个以反对地主豪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在渭华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很快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起少华山，西迄临潼，南靠秦岭，北临渭河约 200 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起义的中心区域，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全部被摧毁，建立了 48 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先后清算了 150 多名劣绅，其中处

决 60 余名。

渭华起义动摇了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并直接威胁陕西通往河南的交通线。因此，冯玉祥在取得潼关战役的胜利、巩固西安的城防之后，迅速调集军队，以宋哲元为总指挥，在渭华地区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劣绅的配合下，发起对起义军进行的围攻。

6 月初，宋哲元以魏凤楼师 1 个旅的兵力为主攻部队，在渭南县民团的配合下，从渭南县城倾巢出动，向驻守东南方向塔山阵地的陕东赤卫队进攻。发现敌情后，赤卫队主动下山迎击敌人，在土桥与敌遭遇，展开激战。赤卫队尽管武器低劣，人数与敌人相比也十分悬殊，但队员们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在敌人猛烈攻击下，赤卫队渐不能支。危急关头，工农革命军许权中率领的骑兵小分队和雷天祥率领的第 4 大队赶来增援，与陕东赤卫队一起向敌人发起反击。附近农民也赶来助战，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仓皇逃回渭南城。

敌人缩回渭南城后，不甘心失败，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外出侦察，袭击革命武装。

6 月 10 日，宋哲元又以田金凯 1 个骑兵师为主力，出华县，东自崔家村、西到段家村的龙王庙，呈扇形向魏家塬压来，妄图一举攻占西北工农革命军高塘总指挥部。当时，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只有 1 个连和 1 个负责警卫的赤卫队，情况十分危急。从早上 8 点起，在高塘小学总指挥部，用望远镜已可以看到魏家塬上越来越近的敌军。敌人集中炮火掩护步兵，连续向魏家塬发起冲锋。总指挥唐澍冒着敌人的炮火，亲临阵地指挥。守卫总指挥部的部队凭借工事拼死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但在敌人猛烈火力进攻下，起义军伤亡越来越多。唐澍即派军委秘书长许维善火速到箭峪口及塔山送信，命令许权中、李大德、雷天祥率部增援高塘。这时，敌人又派出一支部队，从崔家村东面向起义军的侧后迂回，企图攻占魏家村后再夺高塘镇。这

时，恰逢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到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汇报工作。薛自爽见状，急忙回到自己家乡三教堂村，敲起大钟。四乡农民听到钟声，手持锄头、铁锹、土枪、大刀，迅速聚集起来。清点一下人数，有四五百之多。薛自爽将农民分成小队，整理队形，然后大声喊：“跟我走啊！”农民队伍像潮水般涌出了村庄。

薛自爽带领农民队伍赶到崔家村，敌人正分成散兵队形，一群群往坡上爬。薛自爽见状，挥手让大家爬下，然后他大声喊“冲呀！冲呀！”一时间，几里长的阵地上杀声震天，此起彼落。敌人吓得转身就跑。这时，高克林带1个排及时赶到，向敌人射击，敌人你拥我挤，溃退了下去。

薛自爽指挥农民队伍和高克林带的1个排向敌人冲去。此时，谢子长率部也及时赶到，从东西两面对敌人形成夹攻之势。敌人误以为中了埋伏，不敢恋战，仓皇逃回华县。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取得了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

6月19日，冯玉祥调集了孙连仲、田金凯、魏凤楼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的指挥下，分左、中、右3路对西北工农革命军的两个主要据点高塘、塔山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在革命军总指挥部驻地高塘附近骆驼渠，刘志丹率部与宋哲元亲自指挥的中路1个师作战。敌人用重炮轰击革命军前沿阵地，战斗十分激烈。刘志丹指挥部队英勇阻击，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唐澍指挥下，五六百手持长枪、锄头的农民，打退了自赤水西川进攻的敌人。革命军在完成阻击敌人任务后，当晚，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被迫撤到秦岭山的牛峪口、箭峪口、涧峪口一线。

6月20日上午，敌人又以全部兵力进攻起义军阵地。在敌人强大炮火攻击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遭受重大损失。当天晚上，唐澍命令退出渭华中心地区，转入南山、商洛地区。陕东赤卫队

副队长薛自爽在箭峪口前线阻击敌人时牺牲。22日，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各部相继撤至洛南县两岔口一带。25日，因给养困难，唐澍命令工农革命军主力赵亚生第1大队和谢子长第3大队继续向南转移，进驻洛南保安镇。刘志丹、唐澍率领总指挥部及其余部队仍驻两岔口。

赵亚生、谢子长率部进驻保安立足未稳，7月1日，李虎臣即派方少海率5个旅向保安镇进攻。因驻两岔口的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派出侦察的士兵侦察有误，将进攻保安镇敌军七八百人错报为100余人。于是，唐澍亲率100余人增援保安，被敌包围，激战中，唐澍英勇牺牲。

唐澍，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初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同年9月参加省港大罢工，任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同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战役。1926年秋，受党派遭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学校任主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陕西最大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牺牲时，年仅25岁。

唐澍牺牲后，赵亚生带领起义军余部，在保安镇与敌激战。突围中赵亚生等人也壮烈牺牲。此时，西北工农革命军全军仅剩不到200人，在刘志丹、刘继增带领下转移到蓝田山区。

7月15日，刘志丹、刘继增与许权中、杨晓初分别率领的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会合。当天，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在刘志丹、刘继增主持下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和军事委员会，刘志丹、谢子长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人离队，分散从事地下工作。余部由许权中领导与陕西省中共蓝田县委控制的共产党员尹耕辛领导的民团合编，争取暂时并入李虎臣部刘文伯师。之后，许权中带领部队被刘文伯收编，番号为第9旅，许权中任旅长。8月

上旬，部队移至河南邓县，被当地红枪会打散缴械，全军覆没。许权中在战斗中负伤，不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渭华起义的情况并养伤。

为了策应渭华起义，形成全陕总暴动的局面，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区的三原、泾阳、礼泉、栒邑（今旬邑）、淳化、咸阳、永寿、澄城等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以“交农”围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起义。其中，栒邑起义还成立了工农红军渭北支队。这些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加之主观准备不足，都相继失败。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继清涧起义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的起义。这次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农民运动与军队相结合，形成了红色武装割据之势，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扩大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积累了有益经验。

渭华起义的失败，也使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国民党军西北统治当局更加血腥地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革命斗争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主要是：

第一，起义的地点选择不利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渭华地区地处战略要地，西距国民党冯系军阀在陕西的统治中心西安不到 200 里，东离交通要冲潼关仅 100 公里。从西安到潼关近 300 里的西潼公路，是冯玉祥联系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冯玉祥平时即派有重兵把守。渭华起义发生在冯玉祥与陕西军阀李虎臣交战的夹缝地带，这一地带又是他们必争之地。加之该地区地域狭小，地势平坦，在强敌进攻面前，回旋余地不大。所以，当冯玉祥打败了李虎臣的进攻之后，以优势兵力连续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三次围攻，使工农革命军无法立足。

第二，渭华起义是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发动的。中共陕西省委的第二十六号《通告》和《陕西 CP 目前工作方针》提出“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盲目蛮干。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的“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切不可存在犹豫动摇的心里[理]……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和 1928 年 1 月 2 日给中共陕西省委要求杀豪绅的指示信，中共陕西省委在第二十六号《通告》更进一步提出“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西北工农革命军积极执行这种烧杀政策，对地主和富裕中农不加区别，统称“豪绅”，甚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到处烧杀，特别是冯玉祥军队发动围攻后，不是向其出击，而是继续杀“豪绅”。其实真正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多在暴动之初即被处死，后来再杀的多数算不上是豪绅，这就把这部分人推到敌人方面。在对待军阀问题上，中共陕西省委第二十六号《通告》和《陕西 CP 目前工作方针》要求“反对一切大小军阀”，“打破利用杂色军队反对冯玉祥的观念，反对新旧一切军阀”，不懂得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以致后来李虎臣、冯玉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自己。

关于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刘志丹曾在中共陕东特委与西北工农红军在陕西蓝田张家坪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总结有以下几点：1.光杆斗争；2.军事冒险；3.脱离群众；4.烧杀政策。这一分析符合当时的实际。

第三章 开展兵运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受挫后，南方各地转入以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工作中。鉴于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在中共中央指导下，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把瓦解敌军、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派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地方军阀中进行了三年多的兵运工作，组织了数十次起义和兵暴，以图通过兵运的方式建立革命武装。虽然这些起义和兵运工作大都失败了，但对西北地区以后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开展兵运工作的依据

正确认识国民党军队士兵的特点，利用其官兵矛盾，这是开展党的兵运工作的基本依据。国民党军队采取雇佣制，它的下级士兵，大多数来自贫苦工农；其军官也有出身贫寒，或同情革命的。通过适当的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和觉悟，完全有可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所以，兵运工作正是建立在对国民党军队士兵客观分析基础之上的。192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第28号通告《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中指出：

中国的士兵，极大多数是贫苦失业的工农，被雇佣而为反革命军队的兵士，他们的生活是异常的痛苦，而且现在大半是欠饷很久，受军阀的奴使虚[虐]待不堪言状。党的任务，是要在唤起他们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要号召他们及一般贫民回到乡村中去实行土地革命，去分得土地，要号召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

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兵士运动计划》中进一步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

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

士兵分子，都是全中国失业的工人，大部分失业的农民，及一部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受经济压迫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的群众。我们为要这部分群众不要为敌对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运动。兵士群众已是失业的或破产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痛苦的来源，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军阀战争剥削的结果。他们得很低的月饷，去当军阀的炮灰……住所之恶劣，待遇之坏——长官的打骂，行动之不自由……更加又是集体的组织，故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可能。

正确认识士兵的阶级性，认清他们与工农群众本属一个阶级，为开展兵运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志书》中，阐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兵士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的农民’……决不能说没有积极革命的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而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基于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分析和兵运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红军、游击区和白区党组织，充分认识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派有斗争经验的党员打入敌军内部，开展秘密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动白军士兵反对军阀压迫，反对进攻红军，并在时机成熟时组织哗变起义，投奔红军。

中共中央为指导兵运工作的开展，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策略。1928年2月，在《中央关于兵士运动计划》指出：士兵运动的目的“是用敌人自己的武装来破坏他们自己的军队，瓦解他们自己的军队，同时要使兵士群众投到工农队伍中去，帮助工农群众的暴动。”要求兵运工作的策略，应从过去主要进行上层运动，搞官变、将变，转到主要开展下层士兵运动，搞兵变方面来。1928年7月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总结了前一阶段军事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围绕这一方针，决议规定了若干兵运工作的策略，如“在士兵中作群众的鼓动工作，俾士兵群众知道而且接受党的口号”；“在各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的任何形式的团体……以便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的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用各种方法去帮助和发展士兵与官长的经济斗争”；注意“士兵成分的特点，使自己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并设法使工农群众与士兵接触予以革命的影响”。

1929年11月7日和193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第56号通告《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和第64号通告《关于组织兵变的路线与策略》，反复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

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理论、方针和策略，正确分析了国民党士兵的性质、特点及作用，阐述了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兵运工作的方式方法，为西北中共党组织瓦解敌军、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也留下了“左”倾错误的烙印，片面强调争取士兵，忽视对国民党上层军官的工作，实行“要兵不要

官”的策略，对西北地区的兵运工作产生了消极作用。

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地区开展兵运工作有着较为便利的条件。第一，西北地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驻军多为地方军阀和杂牌军队，不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所重视。特别是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军队退出陕甘地区，该地区国民党军队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 17 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和杂牌军队争霸一方，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这为共产党打入这些军队提供了条件；第二，由于西北地区地方贫瘠，1928 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使得士兵的生活到了极其恶劣的地步；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杀害，官兵之间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第三，大革命时期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军事政治工作为兵运工作打下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大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下来；许多中共党员在西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中有较多的个人关系。这些因素为西北中共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针对西北地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多次就兵运工作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1929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甘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班干部去做兵士工作，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可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土匪哥

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决议案精神，中共陕西各级组织调派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打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在取得合法身份后秘密进行兵运工作。

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兵运工作

中共六大以后，根据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加强了兵运工作的领导和部署。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大会接受了党的六大决议，承认革命形势暂时还处于低潮，认识到陕北还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党的目前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委委员。

张家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陕北特委部分委员于3月上旬在清涧高杰村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发动群众，以五抗（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为中心开展斗争，并利用一切可能，采取各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1929年4、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鉴于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政治上右倾、军事上不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生活上腐化，撤销了他的职务。决定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兵运工作）、灰色（改造土匪）、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派党员、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此后，兵运工作遂成为西北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中共陕北特委张家岔、红石峡会议后，兵运工作有了蓬勃发展。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张东蛟、贺晋年、王

世泰、焦维炽、张秀山、高鹏飞、杨林等大批中共党员，到陕西、甘肃、宁夏国民党驻军中开始从事兵运工作。

对于武装斗争，刘志丹等人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刘志丹曾强调说：“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民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陕西保安县与中共地下党员曹力如、王子宜等人，发动群众，与保安县民团原团总斗争，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并相机安插了部分党员，掌握了该县民团。

1929年8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派吉国祯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刘志丹不再担任临时省委候补常委，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调兵遣将，将在甘肃、宁夏的部队调往河南作战。为了控制后方，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4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本来官瘾十足，视兵如命。这次机会一来，他喜出望外，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打他的旗号，他都接收。

谢子长、刘志丹利用这一搞“白色”兵运的好时机，根据党的指示，带领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打入苏雨生部。谢子长被任命为第11旅旅长。谢子长上任不久，就到榆林、绥德一带招了近300名学生兵，这些人大多是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成为11旅的骨干。

刘志丹来到苏雨生部后，被委任为第8旅第16团副团长。团长是与刘志丹还沾点亲戚关系的同乡张廷芝。为提高参加兵运工作的党

员的军事素质，谢子长、刘志丹在该部成立了学兵队。在谢子长、刘志丹建议下，中共陕北特委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蛟、高鹏飞等一批党团员相继进入学兵队，并在学兵队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蛟任书记），学兵队培养了党的一批军事干部。这些人后来在靖远兵暴和西华池兵暴中起了骨干作用。党的工作在苏雨生部秘密开展起来。

正当苏雨生拼命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时候，冯玉祥却调他驻防陇东。这影响到西北“五马”（马鸿奎、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青宛）的统治，“五马”深恐苏雨生在陕甘边坐大，危及其势力，准备在苏雨生东调之际，将其消灭。双方战争一触即发。

谢子长、刘志丹研究后认为，从双方的实力来看，苏雨生绝不是“五马”的对手，双方一旦开战，苏必败无疑。为避免党的武装力量成为军阀战争的牺牲品，决定：如果苏马战争爆发，党在苏雨生部的全部人员立即回到陕北、庆阳五属区（即庆阳、环县、宁县、合水、正宁五县），以扩军为名，独立发展。

果不出所料，不久，“五马”向苏雨生部发动进攻，在彪悍骁勇的马家军面前，苏雨生部一触即溃，退至下马关一带，乞得杨虎城保护，被编为一个骑兵旅，驻守陕西邠县（今彬县）县城内。

乘苏马开战之际，为保存党的力量，谢子长、刘志丹将学兵队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安插到国民党军王子元部潜伏起来。谢子长、刘志丹带领部队转移到甘肃庆阳地区。不久，谢子长、刘志丹接到盘踞在庆阳地区的五属清乡司令谭世麟一封信，提出愿收编他们。根据特委指示，谢子长、刘志丹率部接受改编，同时他们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的结合部三道川（今属吴旗县）招募农民，编为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3团，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团长。

1930年夏，谢子长、刘志丹等率部驻防三道川，准备利用时机举行起义。这时。谢子长派李立果、阎红彦、雷恩钧等到陕西宜川后

湫，从民团杨庚武部把周维祺营拉出，编为一个营。但是，陕西土匪张廷芝被谭世麟收编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择手段将周维祺收买，缴了周维祺的械。并乘机袭击了刘志丹、谢子长的部队，发生了“三道川事件”，使刚刚拉起的队伍遭到了严重损失，兵运工作受到了挫折。

兵运工作失败后，谢子长到北平中共北方局军委工作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与薄一波相识。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子长同志在从事武装起义屡遭挫折后，于 1930 年来到北平，我负责接待他，向他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他也向我讲述了他和志丹同志共同奋斗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相处甚得，临走时我还送了他两支驳壳枪。只是，和志丹同志始终未能谋面，常引以为憾。

1930 年 9 月，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与曹力如、王子宜等党员一起制定了独立建立革命武装的计划，他们以中共党组织控制的保安县民团为骨干（王子宜时任县民团团总），联络在三道川搞兵运时的旧部，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刘志丹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中进行练兵。当地民谣曾有“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等语。

这时，共产党员杨树荣从谭世麟那里回来，他是刘志丹留在谭部的关系。他带来信说，谭世麟说很器重刘志丹，希望刘志丹去任陇东民团军骑兵第 6 营营长之职，并命令驻合水太白镇陇东民团军 24 营尽力相助。据此，刘志丹与保安县中共永宁山支部研究，决定趁机收缴第 24 营的枪械，消灭这支反动民团。

9 月 28 日，在中共永宁山支部的配合下，刘志丹、曹力如、马锡五等率领队伍，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 6 营的旗号，以商借粮草为名，只说是路过，进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陇东民团军第 24 营营长

黄毓麟，外号“黄儿子”，和刘志丹有过一面之交。10月1日，一切准备就绪。“黄儿子”请刘志丹进屋抽大烟，曹力如、马锡五领人趁机分别把住营部各个出口，然后悄悄来到营长门口。马锡五首先拔枪打死了守在门口的卫兵，里边的“黄儿子”刚想翻身下炕，刘志丹抬手将其击毙。那个副营长还没有反应过来，被杨树荣一枪打死了。别的屋里的团丁正在赌牌耍钱，听见枪声，刚想出来看看，只见门口伸进几颗手榴弹。曹力如带着人喊：“不缴枪就把你们炸成肉酱。”他们稀里哗啦把枪都扔了出来，有的吓昏了头，连烟枪也扔了出来。太白镇夺枪事件中，击毙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10余匹。在当时陕甘边界引起了不小震动。

太白镇夺枪后，刘志丹将所带武装编为两个中队，在陕西之保安、安塞、甘肃的合水、庆阳、南梁一带活动，消灭了一些反动民团和土豪，扩大了革命武装的政治影响，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来参加革命队伍，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部队建有中共支部，书记杨树荣。刘志丹还抽出部分枪支给民间武装赵连璧（刘志丹的姑表兄弟）、同守孝，让其在太白、南梁一带组织发展武装。

10月，刘志丹与谢子长到绥德合龙山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为贯彻立三错误路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由于立三“左”倾错误很快就被纠正，行动委员会没有开展实际工作。经特委批准，刘志丹辞去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职务，仍回陕甘边进行兵运工作。

1930年10月中旬，谢子长奉调上海，去中共中央特科学习，次年春回到西北地区，在甘肃平凉一带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由于刘志丹带领的队伍活动频繁，声势渐大，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军阀的注意。1931年1月，在保安、安塞一带，刘志丹部遭到陕北

军阀井岳秀部高双成旅的“围剿”，为摆脱敌人，刘志丹率部向甘肃陇东瓦子川转移，途中宣传革命政策。2月，部队进驻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武装会合，部队扩大到300余人。在固城川麻峪村，刘志丹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4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整编后，刘志丹带领部队向南进军，进驻甘肃宁县张皮塬。

2月24日，刘志丹率领的队伍在张皮塬遭国民党军陈珪璋部谢绍安旅骑兵的袭击，激战四五个小时，第1连连长卢仲祥牺牲，部队损失过半。刘志丹带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骨干力量，突围到了子午岭山区，后转到陕西中部小石崖休整。赵连璧等人返回南梁地区，收集失散人员，重建武装。其间，刘志丹派杨树荣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即派高岗找到刘志丹，传达省委关于争取苏雨生、石子俊、王子元3个旅起义的指示。于是，刘志丹再次率部到陕西邠县国民党驻军苏雨生部挂名建军，部队编为补充团。苏雨生委任刘志丹为补充团团长，杨树荣为副团长，下设两个连，第1连连长魏佑民，第2连连长同守孝，驻防陕西枸邑县职田镇。刘志丹又乘机联络旧部，筹备军需，扩大队伍。

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巡视员高岗到职田镇，向刘志丹传达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迅速扩大部队，待机拉出，打击敌人的指示。

部队在职田镇活动了3个多月，人数有所增加。其间，补充团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书记杨树荣，宣传委员刘志丹，组织委员王世泰，全团有中共党员二三十人。不久，苏雨生获悉补充团有共产党活动，对刘志丹等人产生了戒备。一天，补充团士兵到职田镇下塬大地主刘日新家筹粮。刘日新惜粮如命，死活不给，士兵们动手打了他几下。刘日新认为自己受了羞辱，便于当日服毒自杀。刘日新在枸邑一带是有名的乡绅，他的自杀引起了地方当局的重视，再加上其家属直接上

告杨虎城，杨虎城即命苏雨生严加追查。苏雨生接到杨虎城命令后，先以商量军机要事为由把刘志丹骗到邠县关押起来，随后派 1 个骑兵团和 1 个步兵团包围职田镇，勒令补充团缴械。为了保证刘志丹的安全，补充团临时负责人魏佑民、刘约三、马锡五等研究后决定交枪。交枪后，少部分人离开了部队，有七八十人改编为苏雨生部直属运输队。队长魏佑民，副队长刘约三。

刘志丹被捕后，“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后经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刘志丹的老师、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参议）和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营救，陕西省主席杨虎城令苏雨生释放了刘志丹。刘志丹出狱时，杜斌丞恰好有公干到邠县，杜斌丞与刘志丹见了面，临别还给了他一支手枪，100 元大洋。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来到平凉，准备打入平凉甘军暂编 13 师陈珪璋部。经陈珪璋的警卫团团长刘保堂（刘志丹的同乡）引见，刘志丹被陈珪璋委任为暂编 13 师第 11 旅旅长。当时，陈明知刘志丹是中共党员，但十分佩服上过黄埔军校刘志丹，想借用其扩充自己的实力，反对当地其他军阀。刘志丹乘机以陈珪璋的名义，驻防甘肃宁县早胜镇，在此招兵扩充部队，发展革命武装。他派共产党员张秀山、刘景范（刘志丹胞弟）、高岗等来到该旅工作。期间，原留在苏雨生部继续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王世泰、张文元等得到刘志丹的消息后，乘苏雨生与孔蔚如火并之机，脱离苏部，前往早胜投奔刘志丹。刘志丹见到他们，异常高兴，激动地说：“我们正在利用陈珪璋给的 11 旅的番号‘招兵买马’，你们回来太好了，部队正缺乏党员骨干。”随后刘志丹派共产党员陈鸿斌任参谋长，共产党员曹华民任书记官，张秀山任手枪队队长，高岗负责陕西省委和第 11 旅党组织的联络，不久陈回陕北，参谋长一职由朱理凯接任。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策动甘军 5 个旅兵变。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兵变没有成功。

第 11 旅成立后，陈珪璋欲利用刘志丹来收编和牵制陇东的李培霄、杨万青、高广仁等地方军阀和土匪武装。刘志丹也想利用陈珪璋给的名义来扩充党的武装力量。1931 年 8 月间，刘志丹派人与活动在正宁、枸邑县境内的李培霄部谈判，准备收编这股力量。李培霄认为没有满足他的条件，拒绝收编，并撤入陕西境内活动。

半个月后，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高广仁团哗变，带领七八百人到达宁县，被陈珪璋任命为 13 旅旅长，也驻防早胜镇。陈珪璋派刘保堂带 4 个连前往早胜收编。刘保堂这 4 个连的武器破烂不堪，而高广仁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刘保堂到早胜没几天，高广仁再度哗变，将刘保堂缴械，并扣押了刘志丹，顺手牵羊将第 11 旅的枪也收了。随后，高广仁部押着刘志丹、刘保堂等向合水进发。在合水附近的骆驼巷，被陈珪璋主力蒋云台的第 5 旅击溃。刘志丹等脱险来到合水县城。当时，刘保堂及其部队驻在城中。刘志丹等人住在合水东关一个客店。一天，刚吃过饭，天正下着大雨，刘保堂慌慌张张找到刘志丹，说蒋云台以刘志丹防务不力，丢失早胜镇和宁县为由，准备逮捕刘志丹。刘志丹得此消息后，将刘景范、张秀山、王世泰、曹华民等十几个党员安排在刘保堂特务第 2 团继续活动，自己携马锡五、王璧成离开陈珪璋部队，连夜冒雨进入子午岭，来到篙嘴堡，找到了当时任合水东区民团团总的贾生财。刘志丹等人到后不久，蒋云台派骑兵追来，贾生财将刘志丹等人藏了起来，用烟酒应酬了一番，将蒋云台的骑兵打发走了。随后，刘志丹来到太白川赵连璧处，留下马锡五帮助其整顿部队，自己则到保安、南梁一带活动。至此，刘志丹领导的兵运工作再次受到挫折。

三、兵暴——兵运工作的最高形式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在西北国民党军队中就建有秘密组织，到 1927 年 7 月，已建有 4 个军队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随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入陕甘宁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军阀部队中。从 1930 年初到 1931 年夏，谢子长、刘志丹、崔廷儒、张东蛟等分别打入驻甘肃、宁夏的苏雨生、谭世麟、陈珪璋等地方军阀部队中，取得了从排长到旅长的各级合法军职。1931 年秋，杨虎城第 17 路军参谋长兼 17 师长孙蔚如率部入甘，蒋介石为抑制杨虎城势力，以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率部入驻兰州。共产党员孙作宾、靖任秋、李慕愚等随孙、邓部队入甘。这些共产党员利用合法军职，积极活动，在所属部队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如在驻靖远甘肃警 3 旅建立了团党委，在驻两当陕西警 3 旅 2 团 1 营建立了营党委。此外，在庆阳的新编 11 旅石子俊部、驻平凉的刘保堂部、驻天水的马青苑部、驻河西的马仲英部、驻定西的段象武部、驻兰州的邓宝珊部均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为加强党对兵运工作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还派出高维翰、李艮、谢子长、焦唯炽等人，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对驻守在甘肃陇南、陇东、兰州、靖远等地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秘密组织进行了视察，并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和改组。为了便于和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1932 年 10 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甘肃平凉建立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捷三，统一领导驻陇东各地国民党军队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并负责联系和指导陇南地区国民党驻军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12 月，在兰州建立了中共甘宁青特委，加强对甘肃、宁夏、青海国民党驻军内共产党组织的领导。12 月 19 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的决议》，中共陕西军委集中力量在国民党第 17 路军广泛开展兵运工作。到 1933 年初，中共在第 17 路军从指挥部到基层连队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秘密组织系统，“各部队中如十七师、四十二师、

特务一、二、三团、骑兵团、警卫团……等都有组织”。另外，中共陕甘特委也派出大批党团员到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志清、王子元部开展兵运工作，在这些部队内建立了 9 个军支。

为了便于开展士兵工作，打入国民党各部队中的中共党员利用同乡、同学、亲友、帮会等关系，发动士兵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兄弟会、读书会、研究会、反帝同盟会等组织。在共产党有组织的国民党第 17 路军连队里，一半以上都成立了士兵抗日会。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中共党员利用这些士兵组织，积极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要求经济公开，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反对打骂士兵，宣传红军民主生活，号召士兵团结起来，打死反动官长，投奔红军游击队。同时还采取与士兵交朋友的方式，把士兵吸引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并吸取进步士兵加入党的组织。为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在士兵中散发和宣传中共陕西省军委定期印刷的《士兵的话》、以及《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等宣传品，举行反军阀战争运动周、拥护苏维埃运动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宣传活动，定期举行形势报告会，宣传红军打胜仗的消息。提出各种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如“反对开到前线去”，“不给军阀当炮灰”。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提高了国民党士兵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

组织士兵暴动，建立革命武装，是兵运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最高形式。由于国民党军队士兵生活条件的恶劣和官兵关系的恶化，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加强了对兵变的组织和领导，1932 年 10 月，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中共从 1931 年至 1933 年发动大小兵暴达 70 余次。主要是 1931 年陕西的三原、西安大营盘、蒲城、淳化兵暴；1932 年陕西的吴堡、绥德、渭南、富平、榆林、蒲城、澄城和甘肃的两当、靖远、西华池、

平凉、蒿店兵暴；1933年陕西米脂、安定、绥德、横山、商县、高陵、富平、大荔、渭北兵暴。其中两当兵暴、靖远兵暴、西华池兵暴规模较大。除西华池兵暴在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配合下取得成功外，其他各地的兵暴由于各种原因都失败了。

两当兵暴，是1932年4月刘林圃、习仲勋领导国民党第17路军警备第3旅第2团1营在甘肃两当县城发动的。该部原属军阀苏雨生的陕西骑兵第3旅第2团2营。从1929年到1930年秋，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等3人到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发展党的秘密组织，积蓄力量。1931年春，杨虎城与苏雨生发生战争，围攻邠县。为保存力量，中共党组织发动全营官兵脱离苏雨生，暂归杨虎城，部队番号改为17路军警备第3旅第2团1营。1931年冬，部队移驻陕西凤翔，陕西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李当时极力主张发动兵变，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实行。随着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工作，全营发展党员50多人，营建立了党委，各连建立了党的支部，士兵的斗争情绪也日益高涨。1932年2月初，杨虎城命令警备第3旅第2团前往甘肃两当、徽县、成县攻打四川军阀邓锡侯、黄隐师的军队。第2团1营随后移驻两当、凤县。到3月，有消息说，1营要同驻在徽县的2营换防。1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州（今乾县）、礼泉县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山里去，抵触情绪很大。中共营党委认为举行兵暴的条件已成熟，遂派地下党员刘书林向陕西省委请示。陕西省委派省军委书记刘林圃前往两当协助领导兵暴。4月2日，两当士兵开始暴动，先后将3个连连长击毙，该营营长逃脱，全营200多人撤出两当县城。在城外刘林圃简单地向士兵作了动员，指出起义部队回陕北会合刘志丹的部队当红军，士兵们表示同意。随后，部队连夜沿两当河北上，急行军70华里，到达两当县境的太阳寺。在此，刘林圃代表陕西省委宣布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

第5支队，推选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第1连连长吕剑人，第2连连长高瑞岳，第3连连长由许天洁兼。部队继续北上，一路且战且走，得不到给养和休整，到达麟游时，部队有人动摇，企图投靠国民党军刘文伯部，另一部分人主张向亭口方向转移，与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就到三原武字区与农民配合开展斗争。结果执行了向亭口转移的意见，部队行至乾州时，遭土匪武装袭击，部队溃散，两当兵暴失败。

靖远兵暴，是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1932年5月由谢子长、焦唯炽(化名赵仪三)领导国民党甘肃警备第3旅士兵在靖远发动的。1929年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派张东蛟、王千等共产党人到该部队做兵运工作，建立了党的组织。后来，在党员比较集中的该旅第2团成立党委，张东蛟任书记。1932年5月5日，在组织兵暴的紧张时刻，张东蛟被旅长王子元扣押。该旅吕振华营和教导队仓促举行兵暴，当天傍晚，张秀山等人带出200多人，枪100多支。在打拉池，张秀山宣布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4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唯炽，同时讲解了红军的性质、任务，宣布了红军的纪律。当时因部队与谢子长、焦唯炽失去联络，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部队编为两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曹炳奎，第2大队大队长张秀山。不久，起义部队在打拉池东山一带遭遇敌骑兵追击，激战一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后分为三路分别向海原、静宁、定西前进。因部队分散行动，分别被敌缴械。5月30日，谢子长、杜润滋、张东蛟等集合失散士兵200多人，在距靖远城外90里的水泉堡打出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编为第1、第2、第3三个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唯炽(未到任)，参谋长杜润滋，秘书长邬逸民，第1支队司令杜鸿范，第2支队司令张东蛟，第3支队司令王儒林。6月，游击队遭敌围攻，张东蛟牺牲，部队转战到甘肃海原的园子河，合编为1个

支队即第3支队，王儒林任司令，杜润滋任政委。其间，谢子长奉陕西省委指示返回陕西。随后，游击队转战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5县，部队曾发展到400余人，并增编了第4支队，支队司令兼政委孙作宾。不久，在水泉再次遭到敌人围攻，游击队损失严重，最后解散。

靖远兵暴失败后，谢子长毫不气馁。1932年7月初，谢子长派杨林到合水县西南部的西华池向国民党新编11旅特务营中共特别支部传达了相机暴动的指示。西华池是甘肃庆阳至陕西的一个要点，镇内驻有特务营营部及第1、第2两个连。中共党组织掌握的第1连，战斗力强，是该营的主力。杨林和中共特支书记、第1连连长高鹏飞等研究决定，依靠第1连的力量发动兵暴。随后，高鹏飞派班长宋廷璧（中共党员）和在西华池几十里外盘克塬活动的陕甘游击队联系。三天后，宋廷璧带回刘志丹、阎红彦的回信说：“有把握即举行起义，红军在盘克塬接应。”当晚，中共特支召开会议，决定于次日下午举行暴动。7月9日，趁第2连出操时，共产党员、第1连2排排长曹胜荣等带领第1连全体战士将第2连包围缴械，并解除了营部的武装，将敌营副扣押。随后，高鹏飞集合部队讲话，讲明了起义目的，投奔红军的意义。同时宣布了几条纪律。他的讲话得到了士兵们的拥护。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镇。当天晚上，起义部队将所有的文件、印信、旗帜全部烧掉，并对部队进行了临时编队，高鹏飞、杨林等率领约170余人的队伍前往盘克塬与陕甘游击队会合。

西华池兵暴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在陇东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这次兵暴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和红军游击队取得了密切联系，得以及早会合，从而避免了过去兵暴部队长时间孤军作战，多面受敌，终被打散、拖垮的结局。

四、西北地区兵运工作的得与失

中共在西北地区开展的兵运工作，推动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促进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西北的中共党组织在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阀部队和地方武装内部进行的兵运工作，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对于牵制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瓦解敌军力量，策应南方主力红军的军事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兵运工作的开展，使国民党军队兵变此起彼伏，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宁地区的统治，特别是由高鹏飞、杨林领导的陇东国民党新编第 11 旅的兵运工作成效最大，由于准备充分，在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接应下，西华池兵暴取得成功，参加兵暴的国民党军队两个连 170 余人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2.为西北地区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由于兵运工作的开展，使一些国民党官兵加深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 17 路军中兵运工作的广泛开展，促使该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段时间内，不与红军为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不搞摩擦的友军，最后于 1945 年起义。其中赵寿山、孔从洲等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3.为中国共产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他们为红 26 军、红 27 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西北地区开展的兵运工作的目的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

革命武装，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但这不是发展革命武装根本的办法。正如刘志丹指出：“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出去搞。”所以，尽管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积极努力，取得了相当成绩，但除西华池兵暴外，其他地区的兵运工作没有达到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创建红军的预期目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盲动主义的影响。同全国一样，当时受“左”倾冒险主义干扰，兵运工作中出现盲动主义，在敌我对比力量悬殊，起义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发动士兵暴动，导致失败。安康兵暴和靖远兵暴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兵暴前和兵暴过程的组织、部署不够缜密。安康兵暴是在士兵还没有发动起来，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起义，只坚持了一天一夜；靖远兵暴中，甘肃警备第3旅副旅长张东蛟、军法处主任王儒林，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条件不成熟，不主张立即兵暴，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结果兵暴后不到6天就失败了。

2.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实行“要兵不要官”的策略。为了实现瓦解敌军的目的，除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外，还必须与在国民党军队上层开展工作结合起来，利用国民党军队上层之间的矛盾和国民党地方军阀及杂牌军队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矛盾，争取某些国民党军队起义或中立，以扩大革命力量。这方面，一些地方取得了相当成绩，如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了红7军和红8军；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领导原西北军国民党第26路军发动了宁都起义，成立了红5军团。但由于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统一战线的建立限定在下层群众范围内，在兵运工作中提出“要兵不要官”的口号，排斥争取国民党军队上层军官的策略，使西

北地区的兵运工作困难重重，甚至对担任国民党军各级官长的中共党员也采取不信任态度，在兵暴前夕的关键时刻撤销其党内职务，削弱了兵运工作的领导力量。

3.个别领导干部在兵运工作中存在右倾错误。有的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领导干部，偏重走合法道路，热衷于在国民党军队做官，对党的兵运工作积极性不高，个别地方出现了在兵暴的关键时刻，临阵逃脱的现象。有的地方虽已具备了兵暴的条件，而且自己已经暴露的情况下，还不举行兵暴，以致被敌逮捕，前功尽弃。

4.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尚未形成。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西北地区革命力量较为薄弱，还没有一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也没有来得及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许多地方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虽然掌握了一些部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络和配合，孤军奋战，流动作战，最后被优势敌人各个击破。后来刘志丹在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后指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 70 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谢子长也指出：“搞革命武装，依靠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装备工农，建立和逐渐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被敌人打垮。”

第四章 幼年武装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西北地区的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相继失败，没有达到建立红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遂把武装斗争的重心放在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上，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先后创建了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并实现了两支游击队的会师，揭开了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一、晋西游击队的创建

1930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新军阀之间混战连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同年5月，爆发了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余万，历时近半年。军阀混战，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消耗和牵制了国民党进攻红军的力量，客观上为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和红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十几个军，约10万人，创建了遍及南方11个省的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已完成了创建阶段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战略展开，红军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红军不断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北方，中共北方局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逐渐活跃起来，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兵运工作的开展，为北方游击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和骨干力量。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冯玉祥失败。阎锡山避居大连，商震就任山西省国民党政府主席。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等国民党地方军阀部队退入山西，山西政局一片混乱。在各路入晋的军阀部队中，如驻平定的高桂滋部、驻汾阳的冯玉祥军官教导团、驻侯马的杨晓初部

以及太原炮兵团等，都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上述情况，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了契机。中共北方局决定，以兵运工作骨干为基础，在山西创建工农红军，开展武装斗争。随后，以刘天章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委抽调在冯玉祥的汾阳军官教导团和高桂滋部从事兵运工作的拓克宽（拓荒）、杨重远、胡廷俊、吴岱峰等人，从太原兵工厂抽调了马佩勋、尹子安、安世人等人，同时中共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人，前往晋西筹建红军游击队。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31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1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山西省的孝义、中阳、汾阳三县边界的娄底村（属孝义县）正式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治委员，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第1中队队长阎红彦兼，第2中队队长白锡林。全队共计40余人。游击队成立后，开始在吕梁山区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成立不久，山西省汾阳县永安镇国民党军1个排起义，编为晋西游击队第3中队。

晋西游击队的成立与活动，严重威胁到山西省国民党当局的统治。1931年8月，继商震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调其第72师并加强1个炮兵团，采取步步为营、四面围攻的战术，“进剿”游击队。因敌强我弱，晋西游击队活动区域日益缩小，处境十分困难。这时，中共山西省委被破坏，游击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悲观失望，主张压枪分散，待机再起；有人要与敌死打硬拼。在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晋西游击队领导认为：“难以继续在晋西坚持下去，而西北方面，军阀割据林立，矛盾多端，统治比较薄弱一些；许多军阀部队中还有党的秘密活动，陕北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and 群众基础也较晋西好些，且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时晋西游击队中的干部大部分是陕北人”，遂决定执行中共山西省委

原来提出的“如果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来攻，游击队无法立足时，可以过黄河到陕北打游击”预案。随后，游击队进行了整顿，能在山西立足的，分散潜伏做地下工作。余下 30 人左右，全为共产党员，于 9 月 3 日在石楼县辛关附近的龙王庙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过河不久，拓克宽牺牲，部队到达安定县南沟岔休整，选举阎红彦为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吴岱峰为副大队长。

晋西游击队在陕西安定枣树坪，通过中共地下党员谢德惠（谢子长的哥哥）和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马文瑞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在安定任家砭小学教书。马文瑞派中共地下党员任光腾找到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将晋西游击队来陕的情况作了汇报。陕北特委动员强龙光、强世清、马云泽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青年农民参加晋西游击队，并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必要时向陕甘边活动，与刘志丹领导的武装会合。晋西游击队随后主动出击，在安塞的平桥、侯家河湾打了两个胜仗。游击队所到之处，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抗粮抗捐，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在此期间，晋陕之间还活动着一些土客武装，他们竞相称雄，各踞一方。仅在黄河西岸的陕北清涧、安定等县境内就有师储杰、杨琪、杨鼎、肖永胜等 7 股，约 1000 余人。这些武装中，有些人与陕北的共产党员阎红彦、杨重远、强龙光、强世清、白锡林、白雪山、李宗白、马云泽等有亲戚或朋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产党影响。刘志丹、谢子长还先后派出共产党员雷恩钧等人，到这些队伍中进行争取改造工作，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不久，师储杰、杨鼎、杨琪、肖永胜等土客武装要求与晋西游击队联合行动。晋西游击队队委会讨论后，认为这些土客武装成分复杂，纪律很坏，但为了利用和争取他们，提出其接

受 3 个条件可在一起行动，一致对敌，但不正式编入红军游击队。3 个条件是：（一）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二）不抢老百姓东西；（三）不强奸妇女。这些土客武装接受了上述条件，被单独编为 1 个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中共安定县委和晋西游击队先后给该支队派出共产党员任指导员，进行教育改造工作。同时，抽调晋西游击队部分人员，组成一个执法队，维护游击队军纪。

关于晋西游击队和土客武装会合后部队的番号问题，后来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晋西游击队转战陕北后番号为陕北支队；一说为陕北支队是土客武装在陕北接受共产党领导后的番号。

要搞清上述问题，首先应弄清陕北支队番号的由来。据当时的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回忆，晋西游击队“过河前，山西省委曾给陕北特委通知，游击队过河后接受陕北特委领导”。当时的晋西游击队政委黄子文找到他汇报请示工作，赵伯平作了 4 点指示：

- 1.晋西游击队因在陕北活动改称陕北支队；
- 2.部队活动区域在井岳秀和杨虎城部交界地区，必要时转到子午岭活动；
- 3.考虑到敌强我弱，部队不要攻打县城，以减少伤亡；
- 4.陕北特委将发动陕北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军，帮助游击队发展壮大。

这几点指示原拟由黄子文回部队传达，但这时接中共北方局通知，黄的爱人李盛云在北平被捕坐监后，行将分娩，准备假释，要黄回去照顾。黄便回北方局去了。以上几点指示后来晋西游击队是否收到，赵在回忆中没有提及。

据当时参加晋西游击队任游击队经济主任，并负责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联络接洽工作的马云泽回忆：“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到陕北以后，没有接到陕北特委和省委改变番号的指示，所以，仍沿用晋西

游击队的称号。收编杨琪、师储杰等土客武装后，也来不及请示省委或特委。所以，队委会决定将他们暂时编为陕北支队，并派骨干担任各队的指导员，实行统一领导。”此处，马云泽提供了陕北支队番号是收编后的土客武装，晋西游击队没有改变番号的佐证。这里，马云泽认为晋西游击队没有接到陕北特委和省委要其改变番号的指示，陕北支队是晋西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给土客武装的番号，而赵伯平的回忆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代表特委提出的包括关于“晋西游击队因在陕北活动改称陕北支队”的4点指示是否传达到晋西游击队。这样，晋西游击队是否接到陕北特委的指示成为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不久即通过马文瑞与陕北特委建立了联系。因此，存在晋西游击队接到改变番号指示的可能性。

据马文瑞回忆，晋西游击队和中共安定县委在讨论游击队与师储杰、杨琪、杨鼎等土客武装联合行动时，决定“把他们编为一队，名为陕北支队”。讨论时，中共陕北特委派来的张资平也在场。马文瑞当时已是陕北特委委员，他认为上述意见也是陕北特委的意见。张资平是特委书记赵伯平派来传达要求晋西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指示的。由此似可推测，张资平可能带来了特委关于陕北支队番号的指示，陕北支队本来是特委给晋西游击队的番号，但经过晋西游击队和中共安定县委研究将这一番号给了收编而来的土客保运武装。至于晋西游击队在陕北活动时的番号，马文瑞在1984年3月17日写的《回忆陕北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明确指出：“晋西游击队到陕北后番号没有改变。”另外，原晋西游击队的主要领导阎红彦、吴岱峰（晋西游击队在陕北活动时两人分任正副队长）等人后来的回忆文章以及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3人共同撰写的《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一文中，在谈到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活动时的情况，都没有提到改变番号，也只字没提陕北支

队，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不过，在陕北活动的晋西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包括阎红彦、吴岱峰等人大多数为陕北籍人，晋西游击队在陕北活动期间也确实接受了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如果改称陕北支队，他们的回忆对此应该有所反映，没有必要回避。看来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没有改番号的说法较可信。1993年11月6日，吴岱峰在给王世泰的信中提到了陕北支队的情况，称“1931年农历9月间，红军晋西游击队对收编的土客杨琪、师储杰部编为‘陕北支队’”。这正好与马文瑞、马云泽的回忆相印证。

查当时的历史文献，也未发现晋西游击队改称陕北支队的记载。1932年3月15日，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共河北省委的第一号报告，汇报了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的情况，也没有提到改番号的事。如果当时改了番号，应该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有所反映。根据以上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分析，可以推测，晋西游击队在陕北活动期间仍沿用旧番号，陕北支队很可能是与晋西游击队联合行动的土客武装的番号。

二、南梁游击队的成立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兵运工作中，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什么地方建立革命军队，还在探索之中。陕甘边境地区的境内山川纵横交错，梢林密布，交通闭塞；人口稀少，居住分散，没有产业工人；这里的土地80%以上集中在地主手中，加之1928年~1929年持续旱灾，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纷纷聚众起事。当时的陕甘边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条枪就可以占山为王，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这里聚义，封建社团哥老会也在这里占有地盘。

南梁，位于甘肃陇东庆阳、合水和陕北的保安、甘泉县边界的桥山山脉中段，因为这里中心山梁上有一座清末修筑的堡子——南梁堡，

故而得名南梁。当时，在桥山山脉中段子午岭的密林中聚集了一大批绿林武装。这些人当中，确有一些浪迹江湖、打家劫舍的土匪，但更多的是不堪反动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

面对陕甘边界极为复杂的社会情况，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革命的发展至关重要。西北的中共党组织针对哥老会、土匪对革命的态度不同采取了区别对待、争取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较成功地解决了会、匪为害问题，扩大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

1929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对陕甘边界南梁地区饥民斗争的领导，建立农民联合会，发展共产党员，创建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甘党目前的主要任务在加强兵运工作的同时，“打入农村中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土匪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自己的武装力量。”

民团是地主武装，土匪是流氓的武装，这两者在陕甘边界以及南方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有相当大的存在。民团土匪的基层人员既有与贫苦农民相联系的一面，又有欺压工农群众的一面。前者是可以对之争取改造的基础，后者是必须对其进行改造的理由。因此，争取、改造民团土匪的武装，成为党面临的一项重要统战工作。

如何认识和对待此类武装呢？早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在和陕西省委组织委员李子洲的谈话中认为：“土匪亦多是穷苦农民，他是可以帮助土地革命的，我们不要视土匪为敌人，也不可取利用方式。我们对他取弟兄的态度，则他们一定能为我们的力量。”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斗争决议案》指出，“对土匪，不要害怕他们，而要积极地去联络他们……要把他们看作农民的兄弟，一般的拉在同一战线上去”，这次

会议同时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也指出：“土匪原来多是破产的农民，被乡村封建阶级不断的经济压迫，不得已而才上山的。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确是贫农的好朋友，是农村阶级斗争中别动的生力军。应择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径的诚恳地与之联络。打进去后即积极地改变他们的心理，使之于劫富济贫的口号之下，积极地帮助贫农，扫除乡村中的封建阶级的势力。”？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公司出版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世界介绍了刘志丹。书中写道：“远在西北的群山里，另一位黄埔军校学员刘志丹为陕甘宁苏区打下了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的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天上的神鞭……”

根据陕甘边界的社会特点，刘志丹提出了“占山头闹革命”的口号。他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里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在山上站住脚。他在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同时，深入陕甘边界地区的绿林武装和哥老会以及民团，建立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争取和改造工作，积极为建立革命武装做准备。

哥老会是当时在陕甘一带兴盛的民间帮会组织，“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具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考虑到哥老会的双重性，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对争取改造哥老会寄予很大希望。1930年，刘志丹在保安县永宁乡的王庄，由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等人介绍加入了哥老会，称“西北堂”刘大爷。刘志丹加入哥老会后，利用“大爷”的身份，先争取“大爷”，后争取“兄弟”，把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后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赞扬说：“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

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陕北暴发了由陕北特委发动的饥民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到了南梁地区。赵连璧和杨培盛等人，在南梁梢山拉起了饥民武装，打富济贫，开仓分粮。广大贫苦农民组织“红枪会”、“口袋队”，抗租抗税抗捐，“吃大户”，自发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刘志丹即派中共党员霍维德等，以“皮货商”（当地人叫皮客）的身份为掩护，到南梁一带串连贫苦农民，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1930年2月，刘志丹再次来到南梁，串连张殿成、王殿斌等5名长工，以给宁夏军阀苏雨生招兵的名义，进入甘泉冯会仲民团盘踞的刘老庄，缴了民团的4支枪，给了杨培盛，支持他们发展队伍。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1年9月，刘志丹兵运工作失败后，偕马锡五到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召集活动在合水、庆阳的赵连璧、杨培盛两支绿林武装和合水县高嘴铺贾生财民团，进行整编，组建了陕甘边第一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即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下辖3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2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武；第3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全队300余人。南梁游击队成立后，挥戈北上，在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游击队旗开得胜，士气高涨。此后，游击队在南梁、西华池一带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积极开展打击反动民团的斗争。刘志丹数年奔走陕甘各地，历尽艰辛，终于创建了一支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关于西北革命斗争历史上是否有南梁游击队，在原西北红军老同志之间有不同的认识，史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1994年9月6日，吴岱峰在给王世泰的信中，就王世泰著的《回

忆我的红军生涯》关于南梁游击队一事提出质疑。他说：“1931年农历9月下旬，红军晋西游击队转战到南梁地区打听到志丹同志的消息，即派经济主任马云泽同志，将志丹同志接到晋西游击队驻地阎家砭，受到阎红彦队长和杨重远政委等同志的热烈欢迎。红彦同志还将一支最心爱的驳壳枪赠给志丹同志。当时我是晋西游击队副队长也在场，在这期间志丹同志始终未提过什么‘南梁游击队’的事，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南梁游击队’的实体，在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之前，有几股民间武装，活动在乔山地区，杨培盛领导的武装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子长县党史办访问杨培盛时，杨说：1931年下半年我手下有几十人，赵二娃（即赵连璧）手下也有几十人，我们所带的人各是各的，根本没有‘南梁游击队’的名字。访问的录音带存在子长县党史办。1982年4月，我在延安访问过杨培盛，他同样说：1931年他带的人‘没有南梁游击队这个名字’。”

然而，从现有资料分析，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会合时，的确有一支武装存在。只不过刘志丹在南梁活动期间组织的武装，可能没有接受上级党组织授予番号的指示，南梁游击队只是人们对刘志丹领导的游击武装的一种习惯称谓，如西北红军一样，不是上级组织授予的正式番号。因刘志丹领导的这支革命武装活动在南梁地区，故被人们称为南梁游击队。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叫起，现已无法考证。抛开称谓不谈，可以认为作为一个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实体应该是存在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据时任晋西游击队队长的阎红彦回忆：“1931年10月间，我们终于在南梁堡的林锦庙和志丹同志会合了……志丹同志因为人地很熟，他很快就号召起一批人，成立了一支队伍。”此外，晋西游击队在南沟岔活动时，由党组织介绍参加晋西游击队，建国后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维钧回忆：“10月，晋西游击

队来到南梁一带活动，找到了刘志丹。当时刘志丹领导的部队有 200 多人，编为三个队。”另据陕西省咸阳市党史办访问杨培盛的材料中，杨的回忆与子长县党史办访问材料他时的说法自相矛盾。在这份材料中杨说：“1931 年 10 月，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找刘志丹……，我们南梁游击队总指挥是刘志丹，下设 3 个营，共四五百人，300 多支枪。一营长是赵二娃；二营长是杨培盛；三营长是贾生财。这两支游击队于 1931 年 10 月下旬，在陕甘边界地区的林锦庙会合，经过整顿，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这里杨培盛明确说明了存在南梁游击队的事实。

其二，查历史文献。1932 年 6 月 2 日，在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杜衡以陕西代表团的名义就陕甘游击队情况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游击队是由 3 部分组成的”，其中“刘志丹部在保安一带，人 100 余，枪六七十支。”

其三，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时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其中第 2 支队由刘志丹兼任队长，辖 3 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任 3 个大队长，这在历史上无大的争议。如果不承认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前有一个在南梁活动的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如何组成就不好解释。

1986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其中对包括南梁游击队问题在内，参加座谈会的西北红军干部即统一了认识，指出：“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农民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活动，到 1931 年下半年发展到 300 余人，在陕甘边的南梁地区组成南梁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后来它们都是组成西北红军的基础……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通知还要求，“今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

三、“借水养鱼”——新堡整编

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进入南梁地区。月底，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会合。

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会合后，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两支游击队成分都十分复杂。就南梁游击队而言，主要由哥老会会员，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士兵，民团团丁和贫苦农民组成，此外还有些土匪。这些人在刘志丹等人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如赵连璧，他出身贫农，1929年为逃避地主逼债，到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当兵，后任班长，刘志丹太白夺枪时曾作内应。此后，奉刘志丹之命在太白组织武装。杨培盛原是镇川的一个店员，做羊羔皮生意，后被张廷芝部下抢劫，刘志丹给了他几支枪帮助他建立武装。相比之下，晋西游击队组建时，共产党员较多，但部队成分也比较复杂。除部分兵工厂工人、农民、学生外，也有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士兵，加上进入陕北后收编的土客武装，成员多为绿林出身，因此，晋西游击队在“群众中得到好土匪的名与誉”。

南梁和晋西两支游击队，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

1.南梁游击队中赵连璧等领导的农民武装和晋西游击队中师储杰等领导的土客武装参加游击队前，主要由破产农民、民团团丁、哥老会成员等组成，成分十分复杂，但主要斗争目标是指向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

2.赵连璧、杨培盛等武装最初是在刘志丹的帮助下成立的，一直服从刘志丹的指挥。贾生财受刘志丹革命影响也很大。而师储杰等领导的土客武装很早与陕北的共产党人有联系，后来这些武装加入游击队后，愿意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

3.由于两支游击队成分复杂，且未及整顿，内部都带有较浓厚的绿林习气，存在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但相比较而言，因晋西游击队

内部共产党员成分较多，并对接受其领导的土客武装有约法三章，且成立有执法队，纪律比南梁游击队较好。

鉴于南梁和晋西游击队上述特点，对于南梁和晋西两支游击队的性质，要作历史的具体分析，不能因部队有一定的土匪成分、纪律不好就笼统地斥之为“土匪”武装。

关于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性质问题，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批转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对这两支游击队的性质，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经过座谈，大家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加以分析。从本质上看，南梁游击队成立初期，成分比较复杂，作风纪律不够好。晋西游击队与陕北地方‘保运’武装合编以后，也存在类似问题。但是，这两支游击队当时都有党的领导，它们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后来它们都是组成西北红军的基础。因此，尽管当时部队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部队的番号也有不同叫法，但应肯定这两支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会合，为推动陕甘边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后，为推动革命战争向全国发展，中共中央确定《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向非苏区的陕西等8省提出了“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发动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专门指示陕西省委加紧农民运动，建立红军，逐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边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加紧了组建红军的准备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对会合后的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极为重视，立

即派谢子长、高岗到南梁地区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移动，首先在枸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指示成立了由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的中共队委会。游击队进行了临时编队，晋西游击队和土客武装编为第 1 支队，南梁游击队为第 2 支队。据马锡五回忆，两支队伍会合以后，“整个部队没有什么公开的名义”。随后，部队移驻甘肃庆阳新堡地区，高岗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汇报。

对于省委的指示，中共队委会成员一致表示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懈和成分不纯问题，应当整顿。但同时也认为当时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会合后的部队力量仍很弱小，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部队应在南梁一带活动，使部队有所依托。同时应利用陕甘军阀之间矛盾，因势利导，使会合后的游击队站稳脚跟，并争取一段时间进行休整，而当务之急是为稳定部队，解决部队的食宿和过冬物资缺乏的困难。

这时，国民党甘肃军阀陈珪璋暂编第 13 师正在扩充实力，派人与刘志丹等商谈收编游击队。为了保存和壮大游击队，麻痹敌人，中共游击队队委会研究决定，派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同陈谈判，在坚持独立自主、保证不被分散吃掉的原则基础上，编入陈部，取得合法地位，以济军需，争取一段休整内时机。经过谈判，达成以下协议：

（1）游击队番号定为国民党暂编第 13 师骑兵第 11 旅，部队驻防新堡、城壕川一带休整。

（2）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

（3）拨给过冬军装 1500 套，军饷 3000 元。

（4）拨给修枪造枪工具 15 驮，修械工人 20 余人。

（5）拨给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

随后陈珪璋派其警卫团长刘保堂前往新堡点编部队。

对于这次整编，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游击队把部队原来的支队、大队、中队建制，改成团、营、连的编制。旅部成员均为中共党员，构成了中共领导核心。全旅下辖两个团，每个团设有中共党支部。第1团团长师储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2团团长刘志丹兼，党支部书记刘约三。每个团各辖4个营。营设有教导员，连设有指导员，确保了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

由于陈珪璋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冬衣等得到解决，士气更加旺盛。刘保堂到部队后，草草例行了一下点验手续，即宣布整编结束，部队遂投入了紧张的训练。

鉴于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为了巩固这支部队，谢子长、刘志丹等决定利用整编之际，采取“拜把子”的形式来加强部队的内部团结，并进行了拜把子香堂大会。据马云泽回忆，当时按年龄排了“八大兄弟”，即：师储杰、杨琪、杨重远、谢子长、刘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我弟兄志投意洽，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这个“金兰谱”言简意赅，既包含个人感情，也有明确在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拜把子香堂大会，虽然带有封建性的江湖色彩，但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起到了加强部队内部团结、稳定部队的作用。

总之，新堡整编较好地运用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达到了“借水养鱼”的目的，对游击队渡过困难、稳定军心、增强团结、生息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建立了党的组织，保证了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但是，这次整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即：政治上缺乏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很好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忽视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偏重强调团结，对部

队中存在的不良习气和违纪现象，没有进行必要的纪律整顿；对部队中的不良成分，没有进行及时的改造和清除。这一切反映了当时部队主要领导的幼稚和建军经验的不足，为后来部队发生的危机和“三嘉塬缴枪”事件埋下了伏笔。

新堡整编以后，陈珪璋急于彻底吞并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一方面派代表与谢子长、刘志丹谈判纠缠；一方面在部队拉拢串连，暗中策反，动摇军心。同时在游击队防地周围集结军队，企图在谈判不成时，以武力解决。在游击队内部，一些土客、镖头也乘机鼓噪“换旗”。恰在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部，南下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鉴于上述情况，中共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立刻转移，摆脱陈部。转移途中在柳村塬歼敌两个连，粉碎了陈珪璋的“收编”阴谋。之后，部队来到子午岭山麓的正宁县柴桥村休整。

四、打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旗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为响应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要求会合后的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早日打出红旗，组建红军游击队。根据游击队存在的实际问题，中共游击队队委会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研究后认为，将部队立即改编为无产阶级性质的红军队伍是困难的，如果直接打出红军的旗帜，只会徒有其名，降低红军的威信。为此，须有一个过渡的组织形式。根据当时全国出现的新的革命形势，1932年1月初，在甘肃正宁，中共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将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关于当时打出“西北反帝同盟军”旗帜的原因，中共陕西省委在1932年1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经有

过说明，报告指出：“当时为什么叫反帝同盟军？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阶级，到处充满乱抢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这说明当时游击队的确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

1932年1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北月明塬柴桥子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任，副官长杨琪。全军300余人，分两个支队和1个警卫大队。第1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2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为委员。

1932年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给游击队发出指示信，要求游击队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向党和群众有相当基础的关中道之三水（今枸邑）、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方向发展。该信指出：“你们现在的部队成分是非常的不好，又不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大部分还是土匪成分，流氓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这样部队绝不能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同时现在的土匪行动还是继续，这样无疑是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的。因此，现在的唯一迫切工作是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尽〈大〉量地吸收附近的贫农、雇农、苦力来参加，使逐渐转变到这些成分上来。”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立即开始转入整训。部队组织领导骨干和党团员学习游击战术和中央红军的经验。对基层干部和战士进行了反帝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同时还开办了班排长军政训练班。这次整训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加强了两支部队的团结，为以后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

五、“三嘉塬缴枪”事件

为适应武装斗争发展的要求，1932年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再次给陕甘边游击队发出指示信，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发动群众，扩大苏维埃影响。加强自身教育，健全党组织，改变游击队成分，树立铁的纪律。随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巡视部队，指示部队立即改编为红军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开辟苏维埃区域。

1932年2月上旬，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县三嘉塬。据吴岱峰回忆，部队到三嘉塬不久，派阎红彦去西安汇报工作。阎红彦从西安带回《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文件，并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陕甘游击队的指示。在西安期间，阎红彦还通过在杨虎城部任警卫团团长的地下党员张汉民和史唯然搞了一汽车枪支弹药，运回了部队。

这时，在如何整顿部队、官兵一律月薪20元等问题上，西北反帝同盟军领导层发生了分歧。2月6日，中共同盟军队委会以贯彻中共陕西省委反右倾主义、反调和倾向指示的名义，在没有通知部队主要领导人、队委会委员之一的刘志丹，没有请示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随后，召开反帝同盟军全体大会。会上，谢子长首先讲话，强调了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对部队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谢子长话音刚落，第1支队突然将第2支队包围，第2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第3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被当场打死，第1支队随之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整个第2支队的枪。这即是“三嘉塬缴枪事件”。

缴枪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第1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等人的极大恐慌，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于是开始密谋叛逃。他们原计划除掉谢子长后再将部队拉走。但要除掉谢子长，必须首先除掉阎红彦，把警卫大队缴械。在要不要除掉阎红彦的问题上，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

一些老土匪坚决要求把他杀死；另一些人说，阎红彦没有官架子，打仗勇敢，是好人，不能杀。最后，师储杰放弃原来计划，在缴枪事件后的第三天，率领旧部离开同盟军，投降了杨虎城的部队，被杨虎城任命为营长。师储杰临走时将派往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雷恩钧、程玉清裹胁而去。后来，雷恩钧、程玉清又设法辗转返回了部队。

“三嘉塬缴枪”事件是西北红军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部队由七八百人顷刻间仅剩 100 多人，使刚刚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受到了严重削弱。

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可概括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的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和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情绪，特别是中共六大决议中的错误决定，是导致缴枪事件的主要原因。1928 年 7 月，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中指出：

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此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三嘉塬缴枪，枪杀赵连璧的基本政策依据。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认为同盟军“大部分还是土匪成分，流氓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同时现在的土匪行动还是继续”，多次指示部队进行整顿，要求改变部队的成分。谢子长也认为“第二支队纯系土匪复合而成”，“只有坚决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才能建成红军部队”。

第二，赵连璧等人本身及其部队存在的不良习气，严重违反群众纪律，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缴枪事件发生前，第 2 支队发生了赵连璧以外出打土豪为名，带领部分人抢群众东西，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为此，群众向谢子长、刘志丹报告了此事。谢子长认为这是

严重破坏同盟军声誉的问题。遂秘密召开队委会，决定缴第 2 支队的枪，把赵连璧处死。

第三，当时西北中共党组织缺乏军队建设的经验，特别在中共陕西省委一再敦促要部队整顿，改编成红军游击队情况下，西北反帝同盟军主要领导对部队整顿的方式发生严重分歧，就如何改造成分复杂的武装，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是发生缴枪事件的重要原因。

赵连璧及第 2 支队纪律不好，这是事实。问题的关键是这支部队成立后，党的基层组织不完善，党的领导比较薄弱，部队疏于管理，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和改造。要把这支部队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武装，必须清除政治上反动的惯匪，严肃军纪，彻底进行整顿改造。这也是建立无产阶级性质军队的必然要求。那么，这支部队当时是否有不采取缴枪的方式而改造成革命武装的可能性呢？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应该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赵连璧及第 2 支队长期受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影响，尽管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但其斗争矛头是指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地主豪绅，愿意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在当时并没有反叛之意。如缴枪事件发生后，同是绿林出身的第 2 支队第 2 大队大队长杨培盛被遣散，一度离开部队，但不久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参加了庆阳游击队。从当时的情况看，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必须采取极端手段的地步。所以，对整个第 2 支队缴械，方法无疑过于简单，造成了部队部分人员叛逃、大量减员的不良后果。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嘉塬缴枪”事件在近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有较大争议，主要是原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干部之间有分歧。一方认为，第 2 支队就是土匪武装，缴枪是必要的，是形势所迫；另一方则认为缴枪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团结。1986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批转的冯文彬、宋时轮《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对此事件做出了结论性意见：

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其实，对于如何对待加入革命队伍的绿林武装，在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正确的方法。当时井冈山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农民武装，虽然在 1926 年夏和 1927 年初，这两支部队分别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但仍充满浓厚的封建性和土匪习气。湘赣边界中共党组织一直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1927 年 10 月 3 日，古城会议在讨论和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此，何长工回忆：“在古城会议上，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正是毛泽东这种过人的胆略和胸怀，对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方针，在其部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才使袁、王部队“变成了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很快站稳了脚跟。袁、王部队发展成为

红四军的 4 个主力团之一。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成功，是毛泽东军事统一战线思想的一次重大实践和胜利，为改造类似袁、王的农民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不幸的是，当后来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由于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激化，中共湘赣特委放弃了团结、改造的方针，1930 年 2 月，发生了错杀袁文才、王佐的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给湘赣根据地后来的建立与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这一事件与“三嘉塬缴枪”事件一样，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第五章 打出红旗

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在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正式打出了红旗，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推动了西北地区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创建正式的红军奠定了组织基础，标志着中共领导的西北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三嘉塬整编

“三嘉塬缴枪”事件以后，谢子长等一方面努力稳定部队，一方面根据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加紧进行部队改编，准备正式打出红旗。根据自愿原则，愿留则留，要走的发给路费，遣送走了一批“成分复杂”的人。为补充部队，陕西三原武字区和枸邑县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 100 多名青年农民参军。“为政治上能号召群众起见”，改编后的部队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 年 2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全体指战员在三嘉塬集合，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会上，中共枸邑县特别支部派第五伯昌，将一面写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谢子长。谢子长接旗后讲了话。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第五伯昌和农民代表黄子祥和战士代表等也分别讲了话。

游击队设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下辖 3 个步兵大队，1 个警卫大队和 1 个骑兵团。其中第 1 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委高岗；第 2 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兼；第 3 大队大队长雷恩钧，政委程玉清；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团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政委杨森。全队“人数共 400 余人，枪 300 余支，都是好枪”。

游击队成立后，按照红军建军原则开始在部队建立健全党的组织

和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游击队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书记李杰夫。各大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各中队建有党小组，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各大队设有政治委员。负责士兵的政治教育，建立了由政治委员直接领导的宣传队，陕甘游击队成立时，在内部进行了政治动员，向士兵“说明红旗之意义及游击队之政治任务”，陕甘游击队布告第一号——《告农友书与告士兵书》，由士兵委员会讨论后公布，士兵委员会还讨论并通过了游击战争纲领和纪律大纲。

游击队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兵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建立有士兵委员会（也称战士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并对军官进行监督。正式提出了“每人每月发薪 20 元”。

三嘉塬改编正式打出了红军游击队的旗帜，公开了部队的性质和任务，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缴枪事件造成的重大损失，为在西北地区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初步基础，标志着中共领导的西北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陕甘游击队成立之初，由于部队建设缺乏经验，各项工作还没有完全来得及展开，不能适应土地革命战争的要求。因此，中共陕西省委对其工作不甚满意。1932 年 3 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陕甘游击队驻地巡视。根据杜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于 3 月 6 日作出了《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对全国和陕西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对陕甘游击队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决议》就陕甘游击队建设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和规定，大致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陕甘游击队的任务。《决议》批评游击队在“执行游击战争纲领上，仅是逮捕豪绅，分配粮食，对于游击战争中的许多严

重任务是根本没有执行”。“游击战争中的根本任务——土地革命，根本忘掉了，不能马上没收执行。分配土地不解决，使农民群众绝对不能热烈的起来拥护”。鉴于上述情况，《决议》要求“立刻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在游击区域内，马上没收豪绅、地主、寺院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决不能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决议》认为“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唯一前提。”应该说，这一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其要求基本上是正确的。

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目的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任务。这反映了以农民为主力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征。《决议》批评了游击队群众工作的薄弱，指出“很明显的在游击队所在地的四五里路周围，以及已经行动过的地方，农民还认为是刘大人、谢大人的军队，还没有听过红军是什么，更谈不到苏维埃了”。“对于建立群众组织与武装群众的工作是忽略了”。《决议》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加强红军苏维埃的政治鼓动工作。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纲领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的纲领是什么，中国苏维埃发展状况等，给群众清楚的解释，使群众能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进行这个鼓动工作，除群众大会外，应用各种方式去进行，使群众对红军苏维埃游击队能够彻底的认识。”“建立当地的各种群众组织——农民代表协会、雇农工会等，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摧毁豪绅的统治后，马上建立乡村或一区一镇的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

第二，关于陕甘游击队的政治建设。针对游击队政治工作存在的缺点和党的领导的薄弱问题，《决议》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的组织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由队委直至支部必须有经常的工作计

划，经常召集会议，有系统地讨论党的策略，一切游击队斗争中的一切工作问题，使党的工作能够经常有系统地进行。支部纪律，必须树立起来。发展自我批评，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与工作精神。党的组织应尽力发展到游击队中新进来的农民或白军士兵中去，队委或支部必须按期检查。各支部都要经常开流动和短期训练班，培养新的积极干部。”

《决议》要求建立实际的政治工作，“绝不能有名无实，政治委员，必须使群众中有威信的同志担任。政治工作条例必须绝对服从，必须经常地召集士兵委员会，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领导，建立兵委的经常工作，召集各种的群众会议，解释党的政治策略与游击战争纲领，使每个同志每个战斗员，彻底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而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游击队的战斗力，把党的政治威信建立起来”。同时，针对游击队的成分复杂情况，必须对游击队进行彻底改造，“应征调工人、贫农、苦力大批到游击队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土匪、流氓意识作拼命地斗争”。

对于宣传工作存在的薄弱问题，《决议》指出：“首先要加强宣传队的组织，按军事编制。每大队设一宣传队，受政治委员的指导，经常讨论宣传工作的方法，同时应有经常的工作计划。政治部和政治委员，要经常检查宣传工作的成绩和进行的程度，绝对要改正宣传工作只是临时‘抱佛脚’，只是张贴标语、传单，这样是不能使政治影响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此外，决议还要求抓紧对白军士兵的工作，“派遣俘虏过来的白军士兵兄弟回到白军中去，领导士兵斗争，组织士兵哗变，投到游击队中来”。

第三，关于后勤保障工作。《决议》要求游击队想各种办法解决粮秣和经费问题，“利用鄂豫皖苏区的经验，发起打豪绅的竞赛，规定奖励办法，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等”。《决议》认为要根本解决

粮秣和经费“最主要的还是配合军事政治条件，加强游击队中的鼓动工作，加强群众工作的建立，夺取几个城市。”“积极建立军事根据地，医院、军需、经济都应积存在根据地，尤其军医院，更应很迅速的建立起来。”

此外，《决议》还对部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出了要求：“各部都要有条例，经常的计划和报告，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经常的检查和督促，绝对不能形成无组织的散漫。”这对于克服部队游击习气，使游击队趋于正规，建立正式红军有重要指导意义。

由于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受此影响，这一《决议》明显带有“左”的色彩。如指责游击队在阳坡头待机歼敌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不进攻的战略”，把正确执行俘虏政策说成是“对白军军官采取右倾机会主义办法”。

《决议》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命令陕甘游击队向三原、富平、耀县等敌军兵力集中的平原地区打游击，指令“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实现一切纲领后，再向另一地区游击”，并认为粮秣和经费问题只有“夺取几个城市，才能根本解决”。这些要求，是“城市中心论”在西北地区的翻版，超出了陕甘游击队的能力，显然是错误的。

尽管这些规定还不很完善、不全面，个别规定甚至是错误的，但主要方面还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也基本符合《古田会议决议》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陕甘游击队的实际，对陕甘游击队的全面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按照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游击队建设的指示，陕甘游击队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部队的自身改造。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建立了民主制度。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但在初创时期，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古田会议之前一样，陕甘游击队在建立

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一度也滋长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据阎红彦回忆：

连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大小事情都要由委员会来决定，胜利品也要由它来分配。没有专职的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和战士一样轮流做饭，喂马，一样轮流站岗放哨。马匹只分给骑兵，交通员和病号骑，指挥员从来不骑马。指挥员要是一次战斗没有指挥好，或有什么缺点，士兵委员会就要召开大会批评他。甚至是，只要有人不赞成他当指挥员，他就当不成了。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讲民主，是完全正确的，被撤职的人，也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为了纠正上述错误，提高游击队的政治素质，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陕甘游击队组织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件和中央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列宁室（俱乐部），明确了士兵委员会的职责，纠正了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想，游击队有了明确的分工，指挥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部队的建设和作战问题。

关于“每人每月发薪 20 元”问题，“三嘉塬缴枪”事件前，中共反帝同盟军队委会对这一问题曾经有过争论，三嘉塬改编后，实行了几次。但由于红军的经费来源主要为作战、打土豪所得，十分有限，还要拿出一部分购买枪支弹药，另外有一部分要送给中共陕西省委做活动经费。所以，每人每月发薪 20 元并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这说明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薪金制的时机还不成熟。不久，部队实行了供给制，不再提“官兵一律月薪 20 元”的口号，而以“财政公开”，“平等待遇”，“有钱大家用，无钱大家穷”，“优待战斗员”等口号来代之。但“每人每月发薪 20 元”的提出和实行，反映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本质，与国民党军队官兵待遇悬殊、克扣士兵军饷的做法完全不同，这在初期对号召国民党士兵参加革命队伍，巩固和

扩大红军游击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后勤工作方面，武器装备和经费，主要靠作战缴获补充。游击队建立了军需处和经理部、医务室、并成立了一个小型修械厂。

为广泛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动员劳苦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陕甘游击队还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如在颁发的布告中，宣布了红军游击队的八项任务，即：

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阀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

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律铲除。

三、原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作无效。

四、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

五、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

六、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

七、建立农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八、创建西北工农红军。

布告提出的八项任务，宣传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宗旨和主张，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颁布，有力地推动了陕甘游击队的发展，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二、违命出击

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游击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基地。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建立根据地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向何处发展，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游击队领导人与中共陕

西省委的意见却不一致。1932年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曾指示陕甘边境游击队（即晋西和南梁游击队会师部队），其游击区域以“三水、淳化、三原、富平、长武等各[为]主要方向”，和这一带的农民斗争相结合。而谢子长、刘志丹主张应该向北发展，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一带酌情建立根据地。陕西省委则认为陕甘边界的桥山地区，缺少大革命的影响，没有党的工作基础；这里穷乡僻壤，人口稀到极点，游击队经济上毫无出路，且政治影响不大，因此主张在渭北（即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等地）、西路（即关中盆地以西之永寿、邠县、凤翔等地）地区建立根据地。省委认为，游击队只有进入这一地区，攻占若干城镇，经济上才有出路；这里人口稠密，便于扩充部队；这里迫近关中，对敌人威胁大，易于扩大影响。所以，中共陕西省委在其历次给陕甘游击队的“指示”、“命令”、“决议”、“报告”中，都反复阐述和强调了这一方针。

三嘉塬改编后，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东入陕西，向渭北地区游击。2月13日，攻占枸邑县职田镇，消灭当地民团，捣毁了敌区公所。随后，在该镇召开群众大会，烧了区公所的账簿和地主豪绅的契约，组织了农会，领导群众打土豪，进行分粮抗捐。

陕甘游击队占领职田镇后，国民党第17路军警卫团第3营和分子邠县、枸邑、淳化三县民团约千余人前来进攻。警卫团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团长张汉民也是中共党员，曾给西北反帝同盟军送过枪支、弹药和医药。此时，在警卫团第3营第7连担任连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派人将敌人的进攻计划通报给陕甘游击队。

获得敌人即将进攻的情报后，15日，谢子长当即率陕甘游击队前往职田镇以东20里的阳坡头设伏。

敌人到职田扑空后，次日向阳坡头开进。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被红军哨兵发现，遂鸣枪报告。谢子长指挥两个大队迅速

出击，将敌前卫击退。敌主力展开，以猛烈火力向游击队射击，与游击队形成对峙。谢子长当机立断，派两个班向敌人迂回侧击，敌人顿时动摇混乱。这时李明轩乘机上马转身向后跑，并大声呼喊“红军来了，快跑！”士兵跟着竞相后逃，游击队趁势全线反击，敌溃不成军，自行逃散。游击队向敌追击，将敌警卫团第3营和部分民团歼灭。此役歼敌500余人，缴枪500余支。战后，对俘虏宣传了革命道理，对其愿意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开欢迎会，编队入列，其余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受伤俘虏进行了救护包扎，将敌尸体用牛车送往枸邑。优待俘虏政策，揭穿了敌人“红军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阳坡头战斗后，陕甘游击队在职田镇进行了休整。随后于2月19日，谢子长、刘志丹等率陕甘游击队渡过马栏河，向南运动。

这时，陕西省国民党地方当局又调集了几个团的兵力，在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淳化、枸邑、邠县等县民团的配合下，从东西南三面向陕甘游击队扑来。陇东军阀陈珪璋也配合正宁、宁县、合水三县民团在北面堵截。

面对四面受敌，重兵压境，如何确定部队的行动方向，成为摆在陕甘游击队领导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月21日，陕甘游击队在耀县香山召开中共队委会，讨论了省委关于南下三原、富平创建根据地的指示。会议认为该地区敌军兵力集中，地处平原，不利开展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应寻找敌之薄弱处，创建根据地。决定向同官、宜君、中部地区发展。

会后，谢子长带领部队向东南转移，在击溃庙湾民团之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后转锋东向，乘元宵节之夜，袭击耀县照金镇，全歼照金民团。随后，游击队进入宜君地区活动，在焦家坪袭击了反动的宜君民团，在地方党的配合下，组织和发动群众，分了豪绅的粮

食。之后，谢子长率部队转入宜君县西北约 10 里的艾蒿洼。在此遭到敌 86 师一个营和地方民团的进攻。游击队猝不及防，敌人已冲到总指挥部附近，危急时刻，游击队童子班英勇出击，打退了敌人进攻。谢子长随即组织部队反击，游击队转危为安。这次战斗，童子班立了大功，战后在军人大会上，谢子长宣布童子班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王有富任队长。

3 月初，敌派重兵来攻，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转至中部县尚畛子地区休整。期间，国民党陕军孙蔚如第 17 师与甘军陈珪璋暂编第 13 师在陇东地区火并。陈部在混战中失败后，在正宁湫头一带拉兵抢马，到处骚扰、残害百姓。国民党地方官府助纣为虐，为其索粮派款。当地土匪也趁火打劫，激起当地群众的强烈反抗。正宁南塬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抗粮抗捐，准备以“交农”的形式，围攻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并成立了 300 余人农民自卫团武装。得此消息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改变原定向三水游击的行动计划，前去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开辟根据地。红军游击队的到来，鼓舞了群众斗志，农民自卫团情绪十分高涨。鉴于这种情况，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在群众的配合下奔袭正宁县城山河镇。

山河镇是位于一个狭窄的小平原上，南面一条深沟，东、西、北三面城墙高筑，只有东西两个城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敌在镇内驻有陈珪璋暂编第 13 师两连步兵，还有一门迫击炮，且听说游击队来攻城的消息，已做好了守城准备。3 月 19 日，陕甘游击队由月明塬出发。当时，正遇大风，尘土飞扬，土雾弥漫，加上冬雪初融，路滑难行。部队行至九龙畔时，因向导迷路，又耽误了时间，赶到山河镇时，已失去战机，造成白天攻坚。

游击队到达山河镇后，即向守敌发起攻击。由于没有重武器，游击队攻城不克，伤亡较大，被迫转移，进入正宁县南部寺村塬休整。

在寺村塬，陕甘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农民协会、儿童团、妇女组织，并于3月20日将农民自卫团改编为农民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任命杜兴邦为总指挥。此后，陕甘游击队在东至子午岭，西至泾河畔，长约百余里的范围内分兵发动群众，为建立革命政权做准备。为宣传发动群众，游击队在各个村庄显著地方刷写革命标语，主要内容有：“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分财产”，“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摧毁豪绅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权机关”等。

4月3日，游击队队委会在寺村塬新庄子山神庙场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有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以西，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枸邑、正宁交界地区以内，共计72个村的赤卫军、贫农团代表和陕甘游击队千余人参加。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唐桂荣任副主席。

据时任陕甘边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和回忆：物色革命委员会领导人选时，“当时提出革命委员会的条件是要家里穷，有威信。为找一个最穷的，把寺村塬的人几乎都考虑遍了，结果找到车家沟张进元。这个人家里很穷，有父母和弟兄5个，弟兄3个长年给地主拉长工，都是单身汉。张进元人穷志气大，又会说理，语言流利。因此，就选准了他。唐桂荣家里是中农（西城人），很老实、敦厚，在群众中有威信，也被选为对象。”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委员会。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农民协会、赤卫军、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同时对赤卫军进行了整编。陕甘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分粮食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应当地群众要求，在赤卫军的配合下，再次进攻山河镇。当时，游击队的部署是由步兵担任攻城，骑兵在城西阻击西锋镇之敌暂编 13 师的援兵，赤卫军布置在二线以作接应。部队激战两天一夜，因缺乏攻坚火力，战斗失利，游击队伤亡很大，由 300 多人减员到 100 多人。战后，游击队撤往山河镇城东约 20 里之西坡村休整。不久陈珪璋暂编第 13 师 1 个营向西坡村扑来。游击队以少量兵力，边打边退，引诱敌人进入游击队伏击圈。敌伤亡惨重，残部逃往山河镇。战后，陕甘游击队返回寺村塬。

回到寺村塬不久，陕甘游击队接到中共枸邑地下党组织报告，说枸邑县城敌人防守空虚，只有国民党军 1 个连和民团五六十人以及警察 20 余人。中共队委会决定奔袭枸邑县城。谢子长率游击队星夜兼程，于 4 月 21 日拂晓隐蔽至枸邑城下。经激战，游击队分两路攻进该城，消灭了民团团部及监狱守敌数十人。约有二三十人逃到城东北山上魁星楼内。因魁星楼地势险要，建筑坚固不宜强攻，游击队未予攻击，敌人龟缩在上面也不敢放枪。游击队在城内召开群众大会，在大街两旁刷写标语，宣传革命主张；发动群众，分了豪绅的粮食、财物，处决了国民党县长。当天晚上，游击队主动撤离枸邑城，开往马家堡。

枸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部队获得了大批给养。陕甘游击队在宜君的作战活动和群众工作，扩大了红军影响。很快在群众中吟唱着关于总指挥谢子长的信天游：

红军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砸开万年链，
全靠谢青天。

.....

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后，新成立的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因失去武装依托而停止活动。

由于陕甘游击队没有执行南下渭北、西路的指示，受到中共陕西省委严厉批评。1932年3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中要求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毫不迟疑地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到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中进一步提出“游击队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的路线，要分两部分游击，向枸邑、三原、富平发展，配合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坚决反对‘上山’、‘退避’的右倾观念。”1932年3月21日，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甚至不顾客观实际，提出要游击队“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配合3000武装农民和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夺取三原，建立苏维埃政权，“很快的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

以上这些要求超出了陕甘游击队的能力，就连当时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中央也认为：“今天夺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

三、“南北分家问题”的解决

鉴于陕甘游击队不积极执行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南下的方针，加之游击队领导人因处理内部矛盾不当使游击队减员80%，作战不利又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陕西省委决定改组游击队领导。陕甘游击队到达马家堡的第二天，即1932的4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和刘志丹、黄子文从西安来到陕甘游击队。当天晚上，杜衡传达了省委

指示，对游击队未南下渭北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负责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并撤销了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停止了党组织和士兵委员会的活动。部队由原来 4 个大队分编为第 3、第 5 支队。第 3 支队支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供给主任刘约三；第 5 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部队改编后，遵照先前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杜衡命令第 3、第 5 支队分别进入西路、渭北地区活动。

谢子长被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后，被派往甘肃靖远国民党王子元部做兵运工作。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 3 支队西进邠县、永寿一带活动。一天，永寿县监军镇恰逢集市，刘志丹将部队兵分两路：刘志丹率步兵直达五峰山，一路骑兵 50 余人，攻打监军镇。游击队在监军镇街道上与敌民团展开战斗，歼敌 20 余人，缴枪 30 余支，并放火烧了敌人的碉堡，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声威。接着游击队袭击常宁镇民团获胜。4 月底，3 支队袭击永寿常宁镇和礼泉南坊、叱干民团，缴枪 50 余支。

4 月 21 日，阎红彦率 5 支队南下三原，进入武字区，在武字区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配合下，攻打马额镇民团获胜。22 日，三原武字区 3000 多名群众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在文龙堡召开大会，欢迎陕甘游击队第 5 支队。大会由黄子文主持，杜衡代表省委讲了话。大会决定由陕甘游击队、三原党组织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取代国民党在武字区的政权。会后，武字区群众发动起来，青年农民纷纷参军，5 支队扩大到 300 多人。

西路、渭北乃军事战略要地，第 3、第 5 支队分头进入上述两地区后，国民党杨虎城第 17 路军迅速做出反应，派重兵分 3 路进行“进剿”，一路从三原、泾县、淳化一带向北进攻；一路从永寿、邠县、

枸邑一带向西进攻；一路由甘军陈珪璋部从陇东的宁县、正宁一带堵截。危机时刻，中共陕西省委急令第3支队和第5支队立即会合。

5月10日，陕甘游击队第3、第5支队在枸邑县清水塬集结。为统一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兼第3支队队长，李杰夫任政委兼第3支队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此后，两个支队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北上桥山，转战于郿县（今富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地。

5月15日夜，陕甘游击队北上途中，奔袭枸邑县马栏镇，歼敌第86师256旅第511团2个连和1个营部及民团一部，缴获长短枪200余支。5月17日，游击队进至桥山南段宜君杨家店凤凰山，再歼敌511团2个连，战后奔袭宜君焦家坪，将守敌民团全歼。5月20日，游击队进至咸（阳）榆（林）公路，先后在宜君县哭泉、大石板歼灭两股民团，随后又在五里镇歼灭民团100余人。接着进入中部县境，在店头、龙坊镇消灭了几股民团。5月27日，游击队与尾追的国民党第17路军42师250团和86师511团在郿县吉子岷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游击队全力突出重围，摆脱了敌人，转至郿县宁武镇。

在宁武镇，游击队接当地农民报告，国民党军第86师256旅513团1个营驻扎宜川县英旺镇，准备“进剿”红军游击队。

英旺镇俗称鹰儿窝，位于宜川县西约60华里。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乘敌立足未稳，消灭该敌。游击队一夜急行军，5月31日拂晓将敌包围，迅速发起攻击。当时敌人还在睡梦中，做梦也没想到游击队会来袭击。战斗打响后，他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有些士兵、军官及其太太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当俘虏。这次战斗，歼灭敌人500余人，缴枪300多支，子弹2万余发，马20余匹及一批军需物资。

至此，陕甘游击队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转战，进行大小战斗9次，8次获胜，歼敌1400多人，缴枪1200余支，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路

“进剿”。

6月初，陕甘游击队奔袭甘泉临真镇。临真镇驻有敌军1个营。战斗打响后，游击队攻占敌外围阵地。因3支队2大队高岗率部临阵撤退，致使战斗失利，被迫撤出战斗。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仍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命令游击队东下韩城，企图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威胁西安，夺取大城市。刘志丹虽然反对游击队远离陕甘边，但由于游击队政委李杰夫坚持执行省委指示，刘志丹只好服从。

6月2日，陕甘边游击队转移到韩城。6月4日，游击队总指挥部与中共韩城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不夺取城市，到乡村游击，帮助农民建立赤卫队、穷人会等组织，在韩城开辟苏区。6月8日，游击队消灭了集义镇民团一部，开进韩城上官庄一带。这时正是收麦季节。这里群众基础好，老百姓公开贴出标语欢迎游击队。游击队在上官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并从游击队抽出30余支枪，帮助建立了一支50余人的赤卫队。

陕甘游击队在韩城的出现，立即引起国民党第17路军的警惕和不安，他们急忙调集陕西警备第3旅和第42师的两个团在韩城围攻陕甘游击队。为避敌人锋芒，刘志丹指挥部队向雨山、香山一带转移，准备利用山区与敌周旋。途中与敌遭遇，因敌强我弱，经过两日激战，战斗失利，部队伤亡甚大，被迫撤出战斗，刘志丹率主力回师陕甘边境，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队和少年先锋队去黄龙山、洛川一带游击。

韩城战斗失利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是不现实的，也是错误的。6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几经周折，转战到甘肃正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这时，部队仅剩200多人，士气低落，思想混乱，悲观情绪蔓延。游击队领导内部在游击队的发展方向上发生

了严重分歧。政委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认为，渭北一带群众基础好，主张部队南下三原心字区、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打游击；总指挥刘志丹和参谋长杨重远等人则认为，三原一带是平原地区，距敌统治中心近，游击队不易立足，提出北上桥山打游击，理由是那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理条件好，东可进陕北，西可出陇东，回旋余地大。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李、黄进一步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的分裂主张。接着李、黄带领原三原参军的数十人另驻一地，准备南下，部队出现了“争人争枪争马，几乎发生火并”，红军游击队面临分裂的严重局面。关键时刻，第5支队支队长阎红彦率所部归队，得知上述情况，坚决反对“南北分家”。接着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正宁县梁掌堡召开会议，总结了部队两个月南北转战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决定以正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会议选举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高保山，政委黄子文；第2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刘志丹；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会后，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

南北分家问题的出现，实质上是陕甘游击队内部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主张的冲突。梁掌堡会议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避免了红军游击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后来，在西北红军历史上，关于南北分家问题，西北红军的老同志有过争论。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批转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认为：“‘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7月上旬，在谢子长领导下，共产党员高鹏飞、杨林领导的西华池兵暴取得成功，拉出170多人。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和骑兵大队前往迎接。陕甘游击队与高鹏飞、杨林兵暴部队在宁县盘克塬胜利会师。

杨林后来回忆了会师的情景：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队长是强龙光，是陕北安定人，是我的同乡、同学和老朋友。只见他穿一身蓝色便服，手里提着马尾蝇刷，两把盒子枪左右交叉挂在身上，骑一匹枣红大马，十分威武。副大队长是杨琪，陕西延川人，戴一顶瓜皮帽，胖胖的圆脸，留着八字胡须，穿一身商人衣服，手拿白色蝇刷，身挂一把盒子枪，骑一匹大白马。政委是杨森，陕西乾县人，穿一身学生服，挂一把盒子枪，骑一匹大黄马。这两位杨同志，我过去未见过，是初次相识。其余官兵都是老百姓的装扮，有的还穿着和尚道士衣服。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红绸带子，后来我才知道这叫‘牺牲带’，是忠于革命、勇敢杀敌的标志。在骑兵大队引导下，起义部队继续朝北前进。当晚，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会合，领导会见了我们。”

起义部队受到游击队的热烈欢迎。会师后，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从中抽出一小部补充骑兵大队，其余编为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政委由第1大队第1中队指导员阎润平担任。不久，陕甘游击队在南柴桥子召开中共队委会会议，高鹏飞、杨林被吸收为中共队委会委员。

西华池兵暴，打击了西北军阀在陇东的势力，震惊了敌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给困境中的陕甘游击队有力的支持，鼓舞了士气，陕甘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

四、艰苦奋斗

游击战是弱小的武装同强敌作战的主要形式。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前两个多月，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取得胜利。但中共陕西省委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不顾客观实际，指示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的西路、渭北等平原地带建立根据地。游击队进入上述地

区后，在强敌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返回陕甘边界桥山地区。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在其制定的军事计划中仍然提出：“边区的军事地形是有利于平原战的，敌人的大部兵力不能展开，运动非常困难，因此红军的平原战术即可开始运用，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术中。”“边区中的防御工程必须开始按照各处的险要地形建筑，搜集一切旧式的大炮火器配备在这些工程上面，红军开始演习阵地和平原战。”

1932年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甘肃正宁湫头、南邑一带休整。为了贯彻“左”倾军事冒险计划，1932年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李艮到部队后，批评游击队在桥山的游击战争，是实行“上山主义”、“逃跑路线”，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游击队领导对李艮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批评，李艮对中共游击队党委会产生了怀疑，强调着重解决游击队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连续召开干部会议，不切实际地大谈“尽快创造新苏区”，追查“反革命”。他违背组织原则，在中共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由高岗等7人组成的“秘密队委会”。

在游击队连续开会无休止地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镇的晁团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塬到寺村塬的村庄要道，加固了湫头镇民团驻地王郎坡寨子的防御工事，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敌人进攻面前，李艮要求“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争中的思想”等框框，并置敌情于不顾和客观现实，限令20天将游击区五顷塬土地分配完毕，建立根据地。

五顷塬是正宁县湫头塬北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亩土地。刘志丹、阎红彦等认为当时在那里搞分地运动、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具备条件。据王世泰回忆，当时“李艮坚持己见，一意孤行。他召开会议，布置分地任务，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只见李艮夸夸其谈，

总指挥阎红彦常是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低头不语。我们这些党员到群众中宣传、动员分配土地时，遭到群众拒绝，有个老汉对我们说‘娃呀，分地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敢要。白军、民团一来你们就跑，我们要下地，全家性命难保呀。’这些情况我们如实向李艮作了汇报，但他很不以为然，还批评我们不会做群众工作。”

随后，李艮又以拔据点为由，命令部队进攻王郎坡寨子。王郎坡寨子，东、西、北三面临沟同，地势险要。寨内驻有敌军 70 人左右。游击队强攻一天未克，伤亡 50 多人，只得撤回驻地。至此，李艮提出的分地运动只好作罢。

8 月中旬，国民党甘军鲁大昌部向陕甘游击队五顷塬驻地进攻。李艮要求游击队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进攻”，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的口号。游击队仓促应战，苦战一天，未能阻止敌人进攻，伤亡 30 多人，最后被迫转移到三嘉塬秦曲、狼牙洼、前马塬一带。部队在这里未及休整，鲁大昌部一个团从西南方向向游击队进攻。部队在撤退中遭受很大伤亡。最后，部队分散突围到达枸邑县马栏集结，此时部队仅剩 200 余人。

由于李艮的错误，陕甘游击队在王郎坡、五顷塬、三嘉塬三战皆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纷纷起来指责李艮。李艮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怀疑游击队内部的“反革命阴谋闹事”。但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他已控制不了局面，便借口向省委汇报，离开部队回西安了。

鉴于李艮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共陕西省委对李艮进行了严厉处分，明令取消了“秘密队委会”，但对陕甘游击队的估计仍然是错误的，继续坚持并强调改造陕甘游击队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领导”。8 月 30 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新任命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谢子长回到部队后，首先整顿了部队，以稳定军心。陕甘游击队建制保留了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随后，中共陕北特委、三原、枸邑等县党组织又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军。游击队士气复振。部队在马栏稍作休整后，在谢子长、刘志丹领导下即南下耀县照金一带活动。

9月初，国民党军队再次向陕甘游击队发起新的“进剿”其部署是：甘肃陇东警备第97、第98团从正宁、宁县一线自西向东进攻；第86师第256旅第511团从同官由东向西进攻；第17路军警卫团和何全升游击支队由邠县、枸邑向北逼近；富平、同官、耀县民团由耀县向西进攻，企图将陕甘游击队消灭在照金地区。

9月11日晨，陕甘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约5华里的杨柳坪，获悉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已由耀县出发，向照金进犯。总指挥部以退为进，主动撤离照金，使敌人扑空。

9月11日傍晚，敌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进抵照金，以为游击队“溃逃”，放松了警戒，部队在照金外围的坟滩、柿坪宿营。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抓住战机，连夜奔袭照金。实施武装侦察的突击队20多人乘大雾弥漫，隐蔽进达照金，未发现敌人，遂向坟滩前进。接近坟滩时，敌民团正在集合，奋勇队向敌发起攻击。游击队主力闻枪声后，迅速兵分三路，沿山脊向坟滩、柿坪进攻。敌民团在游击队三面打击和突击队的堵截下，仓促应战，并连续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大部被歼。余敌分两路沿石川河、清水河谷地逃窜，在游击队主力和骑兵队前后夹击下，也被消灭。

这次战斗，歼灭敌民团400余人，活捉三县民团反动首领党谢芳、蔡子发等7人，缴枪300余支。游击队无一人伤亡，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战后，谢子长命令游击队战士严加看管俘虏，准备以他们为人质换取武器弹药，但因战斗频繁，没有机会实现这一计划。后来，在部

队北上途中，经谢子长批准，在艾蒿店子将他们处决了。

照金战斗结束后，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锋芒，向西转移，准备在淳化县安子洼休整，不料在此遭敌何全升部袭击，激战一天，双方互有伤亡，入夜陕甘游击队撤出战斗，北上到正宁县刘家店又遭甘军警备旅第 78 团袭击，游击队迅速摆脱敌人，进入马栏一带。

9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到达南梁、东华池一带。游击队总指挥部获悉保安县城只有一个连驻守，于是决定奔袭该城。游击队日夜兼程 200 余里，进驻距保安县城 90 里的瓦子川石卯湾。稍事休息，准备第三天拂晓袭击保安城。但因向导迷路，部队到达保安城下时，天已大亮，原作战计划被迫改变，战斗由偷袭变为强攻。战斗中又发现原情报有误，敌人兵力不是 1 个连而是 3 个连。致使游击队在攻城中受到较大伤亡。第 1 大队大队长高保山牺牲，强龙光、高鹏飞等受伤。陕甘游击队被迫撤回南梁，途中在郿县墩儿梁、八卦寺又遭国民党第 86 师张子英团和高雨亭营袭击，陕甘游击队再次受到损失。

陕甘游击队作战接连失利，元气大伤。1932 年 10 月，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部队减员到 200 余人。因已至冬季，中共队委会开会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筹粮筹款，以渡过难关。会后，刘志丹带 70 多人到甘肃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打富济贫，解决部队的过冬问题；杨森、黄子文带 60 人左右到三原武字区活动；谢子长带 30 余名战士在关门子、艾蒿店、平定川、瓦子川一带活动，负责照料伤病员；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团进入照金，准备设法与省委取得联系。

10 月中旬，阎红彦、杨重远率领的骑兵团，经上畛子、小石崖、石底子、关门子、转角、马栏、马家店、衣食村、照金、北梁、卧牛村进入三原武字区。走了这么一大圈，游击队既没寻到战机，也没有搞到物资。有人提出北上搞些大烟土，以解决部队给养。随后，阎红

彦、杨重远率骑兵队北上秦陇古道，天亮时到达耀县庙湾灵底寨子。骑兵队刚到灵底寨，接当地群众报告说，今天早上将有 30 驮大烟土向庙湾、耀县方向来。骑兵队迅速赶到灵底与马栏之间的老爷岭，将马拴在岭的东坡，队员们在路两旁的树林里刚刚埋伏下来，就发现马栏方向的沟里来了一队兰州的烟商。阎红彦用望远镜一看，原来驮的是水烟箱子，有 50 多驮。当烟贩马队进入游击队埋伏圈时，游击队员立刻冲出去，将马队包围。队员们用大刀将烟箱一箱箱砍开，发现每箱里面都有一层水烟，一层大烟包，共从水烟箱里搜出 380 多包（每包 150 两）大烟土。然后，骑兵队将大烟土装上驮骡，向北急驰，在拓儿塬的段家庄找到了刘志丹、谢子长。随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用一部分烟土购买枪支弹药，一部分送交中共陕西省委。

游击队在二将川、葫芦河休整一个星期后，抽调 30 多名战士与骑兵队一起北上陕北，给中共陕北特委、北方局各带去 5 包大烟土，陕西省委 10 包。当途经安塞时，在一个真武洞的大殿内，发现了由宁夏到安塞的烟商，经盘查，又搞到大烟土 180 包，当日，即由谢子长等人送往陕北特委、陕西省委。谢子长等人走后，骑兵队继续向北前进，在徐家沟遇到陕西韩城的马贩子赶着 300 多匹马。骑兵队用大烟土换了 30 多匹马，随即南下返回二将川，与刘志丹会合。

在骑兵队活动期间，刘志丹率领一支部队在合水、庆阳交界的黑木塬、塔尔塬、店子塬一带开展游击，筹集到一批粮食，解决了部队过冬问题。

经过近两个月的休养生息，陕甘游击队恢复了元气，士气高涨。12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各路在甘肃合水县黑木塬重新会合，随后南下，进入照金地区。

红军陕甘游击队只有短短的十个月历史，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在战略指导上存在严重错误，始终没

有解决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没有建立赖以立足和发展的战略基地，其作战方针也明显带有军事冒险主义的特征，陕甘游击队屡遭挫折，并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稳固发展和西北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尽管如此，经过艰苦的斗争，陕甘游击队多次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剿”，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积累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为在西北地区创建正式的红军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六章 正式建军

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必须建立一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红 26 军的建立，是陕甘边游击战争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正规红军，红 26 军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成为西北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红 26 军的成立

1932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完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进一步把侵略的战火引到中国其他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与日本签订屈辱性的《淞沪停战协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对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围剿”。1932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 50 万军队，对南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在陕甘地区，国民党军队也不断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攻，企图将弱小的红军游击队扼杀在摇篮里。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实现土地革命的纲领，必须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建立正式的红军。早在 1928 年，毛泽东就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红军陕甘游击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推动了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因其不是正规武装，军政素质与正式红军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还没有力量遂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不能适应土地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共陕西省委强烈希望早日在西北地区成立正式红军。

1932 年 3 月 21 日，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仅 1 个多月，中共陕西省

委即向中央报告：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已于一月前在陕甘边境枸邑举行宣誓授旗典礼，发表宣言、通电、指令等。共编制 3 个大队，设总指挥部，人数共 400 余人，枪 300 余支，都是好枪。……据昨天来信，已回到陕甘边境；不久又到旬邑，人数已达千余人，枪千余支。

红军游击队连续不断的胜利，政治影响非常地深入到农民、士兵群众中去，大大提高了农民士兵的决心和勇气。

军事上必须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

接到陕西省委来信以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分析了陕甘边革命斗争高涨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迅速崛起并“日益壮大起来”的形势，于 4 月 20 日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在“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开展’。”决议还就红军的改造，军政建设，编制，后勤工作，根据地建设，以及红军的基本任务、战略方针作了具体要求：

A.以武装农民为新的主要的成分，最大限度地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陕西省委必须从西安动员大批的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建立在这部队中的工人的骨干；B.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C.立即开始建立红军的政治工作，指令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

埃政权与党中[央]的代表，他对于部队的纪律，政治觉悟与战斗力的加强等等与军事指挥员负有同样的责任，党的团的组织的任务是提高红军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他们应该在政治委员的指导之下工作。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D.最初应该编成一师（按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翻[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E.红军的军械军需及给养的补充来源，只能把军阀的军队作目标为着这个目的，可以而且应该实行游击敌人后方的辎重队和交通队。

中共临时中央上述决议送达陕西后，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和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在《决议》中，陕西省委指出，根据陕甘游击队的情形与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认为编制1师现在还是不可能的”，“现在应当成立红军一个团（依红军编制法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连可编枪七八十支）”。决定番号暂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独立团，在此基础上以后再扩充为红41师。

6月2日，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主持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成员杜衡，就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及其以后的情况作了专题报告。其中，就成立红军问题中提出：“省委认为过去对中央的报告是不符合实际的，使中央对游击队没有实际的了解，马上成立红军二十六军编制一师是不可能的。但立刻建立正式红军，完成以上任务是最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目前严重任务。所以决定游击队中成分好的、党员、团员集中起来，成立红军一团，把好的枪支都集中到红军中来。其余编成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番号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独立团。在边区和农民斗争开展的区域，号召农民

参加红军，以加强红军的基础。省委动员西安兵工厂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到红军中，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骨干。红军的加强，实际执行红军的政治条例，以确立党的领导骨干，提高党的威信。”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讨论创建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6月26日，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强调指出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边新苏区，要红26军“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8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给陕西省委发来指示信，重申了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8月25日，根据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和中央的8月1日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即编成红军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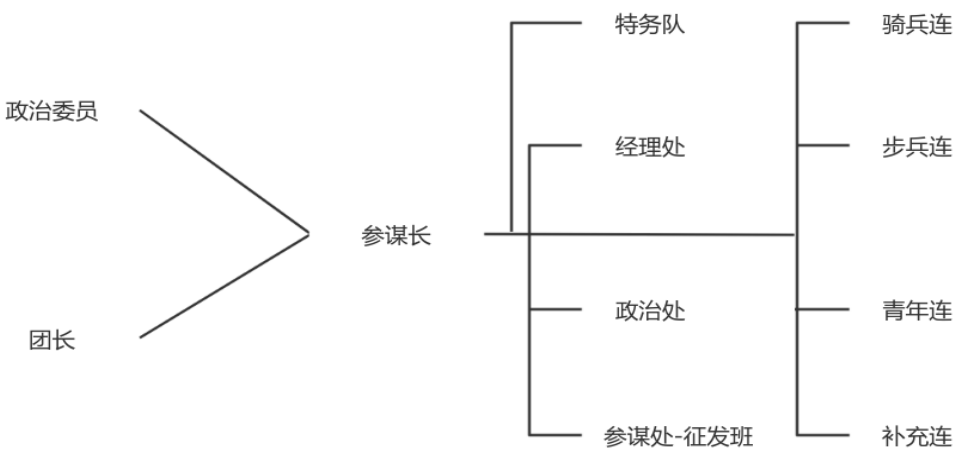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陕甘游击队的作战活动遭受了重大挫折，发展极为艰难。尽管如此，陕甘游击队的存在和巩固还是为在西北组建正式的红军提供了现成的部队基础。经过两个月的休整，陕甘游击队战斗力得到恢复。12月18日，奉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部队进至陕西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

红26军的组建是在“左”的气氛中进行的。陕甘游击队到达陕西宜君不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陕西的积极推行者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常委的身份来到部队，传达中央和省委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的指令。12月20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宣布了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的决定，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命令。会上，杜衡指责谢子长、刘志丹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犯了“梢山主义”、“上山逃跑主义”、“土匪路线”错误，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

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人的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一错误决定），强令他们去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为保留军事领导骨干，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杨重远被留在了部队，但未受到重用。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在部队改编时，杜衡为控制部队，决定团长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中队长以上一律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师克寿任共青团团委书记。红26军成立时仅有军的番号，没有军、师建制。1933年1月9日，郑毅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称“现在编制还没有按照中苏政府的法令，因为物质方面不够，所以暂时新旧混合编制成的，不过我们正在新的编制路上走着，以达到中苏政府红军组织法令规定的编制。”在郑毅的报告中，还汇报了红26军第2团当时的编制，如下图：



杜衡在同日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关于部队编制的汇报基

本与郑毅一致，但杜衡报告中称部队“共编3个连——骑兵连、步兵连、青年连”，没有提及补充连。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青年连不久改称少先队。关于团部的构成，杜衡的报告称有政治处、参谋处、管理处。据王世泰回忆，团部设有参谋处、经理处、管理处。而郑毅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未提及管理处。关于红26军成立时的兵力情况，郑毅在报告指出全团“除步兵连（9班制）足额外，其余都不足……人数300余名，枪150余支。”但杜衡给省委的报告中称“编制后枪支150余支，人数200余人”，这和王世泰回忆大致相同。

尽管红26军成立时，兵力较少，并受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但成立红26军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而且它成立时也很精干，适应当时游击战争的要求，它的成立是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的开端，标志着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红26军成立后的曲折斗争

正式红军和游击队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后者的自由散漫，军政素质有明显的提高。红26军成立后，即着手开展部队的全面建设，加强正规建设，取得了相当成效。

红2团成立后，为将部队真正改造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坚持把军队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团一级建有党委会，连一级都建立了党支部，由指导员任支部书记。积极从优秀战士吸收发展党员，全团有中共党员30多人，巩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突出强调政治工作，颁布了由刘志丹起草的《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在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突出军政训练，加强教育是开展部队正规建设的主要途径。为适应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红26军一成立，即注重提高自身军政素质，利用作战间隙训练部队。“每日两操两讲堂，余自习训练八小时，但行军作战时则停止，并成立军事政治速成训练班（两星期），实行上

课”

为了解决红军干部缺乏问题，中共陕西省委要求红 26 军遵照中央“即刻开始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培养新的指挥员”的指示，立即成立随营学校。“第一期三十人，成分三分之二主要是工农，由各地和游击队派送；二十六军选择十人，期限一月。随营学校不仅训练新干部，而且成为二十六军的中心力量”。接到省委指示后，红 26 军随营学校于 1933 年 1 月成立，由李杰夫任校长，汪锋兼任政委。军政训练的加强和随营学校的成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政干部，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得到提高。

红 2 团成立时，照金及其周围地区主要有焦家坪、瑶曲、庙湾、柳林、马栏、照金、香山、高山槐等一些当地民团控制的据点。在对待民团问题上，刘志丹提出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正确意见。他认为，凡与我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反动民团，坚决消灭之，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经过刘志丹多次做工作，照金根据地附近的庙湾夏老么（夏玉山）、建庄的贺世兴、小石崖的罗连成、嵩嘴铺的贾生财、太白镇的李绪增民团，和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不但不打红军，还帮助红军买枪支弹药，安置红军的伤病员。对国民党地方民团实行团结、争取的方针，为幼年的红军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红 2 团成立不久，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决定拔掉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根据刘志丹建议，红 2 团决定先打弱敌，消灭焦家坪民团。同时，派李妙斋为代表，前去庙湾和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夏老么民团谈判，与之达成了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的协议。

1932年12月26日，红26军第2团按预定部署，奔袭焦家坪。焦家坪位于宜君县西南，四面环山，一水中流，驻守民团约60人，战斗力较差。第二天拂晓，红2团便衣队首先与敌交火，红军骑兵连一个冲锋，打乱了敌人阵脚，红军冲进了民团据点。当时，团丁们正在吃早饭，就稀里糊涂当了俘虏，敌团总逃脱。这场战斗，干脆利索，俘敌60余人，缴枪60余支。红2团首战告捷，鼓舞了士气。

焦家坪战后，1933年1月初，红2团经衣食村南下照金香山寺附近一带。关于香山寺，王世泰在《回忆我的红军生涯》中曾有过描述：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部笔架山，建立于唐朝中期。寺内，广厦千间，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精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四周，苍松翠柏覆盖，怪石突兀峭立，山径崎岖蜿蜒，地形险峻独特。是陕甘两省边界闻名遐迩的古迹。

当时香山寺占有陕甘两省边界土地10万余亩，每年的地租收入惊人。当时正值灾荒之年，外地逃难到此地的大批饥民，缺衣少粮。红2团党委决定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在香山寺，红2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并由渭北游击队组织将香山寺数千石粮食分给穷苦百姓。分粮斗争为群众送去了共产党的深情，并为群众指出了为生存而斗争的革命道路，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分粮结束后，政委杜衡认为香山寺地势险要，敌人可以据此屯兵进攻红军，遂下令放火烧掉了香山寺，使这座宏伟壮观的千年古刹建筑被付之一炬。这一举动，不仅毁掉了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也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火烧香山寺后，红2团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在照金中心区域扫除了民团、保甲等反动势力。随后南下，消灭照金、枸邑民团各一部，奔袭淳化铁王镇，消灭民团数十人，横扫了照金地区的反动势力，开辟了以薛家寨为中心，跨越宜君、枸邑、淳化等县边界的红色区域。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加红军。

红 2 团组建了步兵第 2 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部队发展到 300 余人。这时，在红 2 团帮助下，先后建立了枸邑、照金、芋园、香山、宜君等 5 个游击队。

红 26 军的建立和发展，使西北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据《甘肃公报》1933 年 1 期记载，1933 年 1 月，陕西、甘肃两省军阀头目密谋，对红军实行“会剿”。1 月 12 日，甘肃省国民党政府密令庆阳、正宁、合水、宁县会同驻平凉的第 38 军对红军“严防协剿”。陕西国民党军事当局也陆续增派主力和地方民团进攻红 26 军。

由于红 26 军初期发展顺利，在王明“左”冒险主义驱使下，政委杜衡头脑逐渐发热起来。在军事策略上，他主张打倒一切，反对任何统一战线，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民团实行妥协；在作战问题上，搞军事冒险主义，把当时红军正当的游击战当作“游击主义”来反对，主张阵地战。大讲利用大好形势，打大仗，创造红军的战绩，加快建立根据地的步伐，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提出红 2 团攻打耀县庙湾夏老么民团。

刘志丹、杨重远则认为，庙湾是夏老么民团指挥部所在地，地形险要并筑有坚固的碉堡，其民团团丁多系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目前红军尚无力量吃掉他；同时，夏老么过去和红军有过来往，曾给红军游击队提供过武器给养和情报，养护过红军伤员，与红军保持着互不侵犯的关系。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群众带来危害。

但杜衡根本听不进刘志丹、杨重远的正确意见，凭借军政委的权力，强行下令攻打庙湾。1933 年 1 月 9 日晚，在杜衡和参谋长郑毅指挥下，红 2 团分步骑两路向庙湾行动。由于事先对山路行程估计不足，步兵连虽先行出发，10 日拂晓前未到达指定位置，而此时骑兵连已按时进入阵地。10 日 8 时，骑兵连与夏老么民团接火，遂发起

攻击，由南街冲进庙湾镇里，立即遭敌碉堡火力阻击。骑兵连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身先士卒，率领部队连冲数次，未能奏效，遂下马步战。不久，刘志丹率步兵赶到，投入战斗。但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火力猛烈，红军没有炮火，缺乏攻坚能力，多次组织强攻都没成功。红军遭到较大伤亡，曹胜荣牺牲，张秀山也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栽到马下，被战士拼死救回。面对如此险恶形势，参谋长郑毅重新组织突击队，反复冲锋四五次，结果每次都被敌人用手榴弹打了下来。红 2 团被迫撤出战斗，转到老爷岭、前后芋园一带休整。

庙湾之战，红 2 团不但没有打下庙湾，部队反而伤亡二三十人，骑兵连还损失了不少马匹。干部战士对杜衡、郑毅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检讨战斗失利原因。为平息众怒，推卸责任，杜衡撤去郑毅参谋长的职务，将其降为第 1 连连长。同时，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并派强世清接任骑兵连连长。杜衡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被迫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完全不懂”，“威信是削弱了”，要求省委考虑更换政委

庙湾战斗后，红 2 团返回照金地区。不久，为解决粮秣问题，红 2 团决定留下配合游击队组织发动群众，开始建政准备工作，骑兵连向宜君方向活动。为加强骑兵连的领导，又委派团参谋处长杨重远兼任指导员。

骑兵连离开照金向北开拔的当天，夜间在衣食村的一个半山坳里宿营。因走漏消息，半夜夏老么带民团突然来袭。骑兵连仓促应战，战马狂奔乱叫，无法展开，只得向后山撤退，等部队摆脱敌人，战马已损失过半。骑兵连绕道宁县、正宁返回照金。

骑兵连遭敌袭击，主要是指指挥员麻痹轻敌，宿营地选择不当造成的。刘志丹、王世泰等团首长并没有追究骑兵连指挥员个人责任。但强世清却引以为咎，坚决要求辞职离队回家乡安定打游击。经劝阻无

效，团首长只得同意。骑兵连连长由杨琪继任。

1933年2月，国民党第17路军骑兵团、警卫团、特务团和当地民团以孙辅成为总指挥，进攻照金根据地。夏老么也在北部与国民党“围剿”部队遥相呼应。在强敌进攻面前，刘志丹等主张应转入敌后，避敌锋芒，争取主动，寻机歼敌。杜衡则主张红军坚守根据地，打防御战，强令红2团进入芋园地区，坐等敌人进攻。

2月4日，第17路军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庙湾民团，分三路围攻红2团驻地上芋园和下芋园。在危急时刻，渭北游击队及时接应，红2团跳出敌人合围，转入外线。夏老么率庙湾民团进入根据地，在香山一带，屠杀了六七十名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

2月上旬，红2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塬、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并在湫头石炭沟设伏，全歼王郎坡寨子民团，击毙民团团总赵世坤。

芋园战斗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又一次失败。这次战斗，红2团由于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致使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此后，在根据地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李妙斋指挥照金、香山、枸邑、淳化等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不断骚扰袭击敌人，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不久被迫撤出根据地。

庙湾战斗的失败，使中共陕西省委认为红26军的编成和作战方针都需要改变。为此，1933年2月3日，陕西省委在给红26军政委杜衡的指示信中指出：

“在今天红二十六军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还不具有根据地坚大强固能与南方红军所能比拟的。因此他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要的应当采取游击战术。红二十六军生长成为正式的有力队伍，还需要一个过程，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

.....

省委认为红二十六军今天还不应当“撑架子”的办法，免[勉]强按红军条例编制，也不是编成一个大游击队。因为过渡[度]的扩大起来，不易迅速移动，粮秣供给困难，移动难于隐蔽，容易使敌人识破其企图，也就不容易完成其游击任务；并且在敌人大包围之下，容易被敌人击溃。因此省委的意见，红二十六军今天应当配合当地群众，编成许多小的游击支队，这种小支队人少的缺点是可以利用神速的动作，突然的袭击诡计等等方法来[补]救的。采取的战术应当是游击，所谓“阵地战”还不是红二十六军今天所能胜任。游击应当有计划的进行，这就是说应当注意侦察、设埋伏、破坏敌人交通、袭击敌人运输队、征发队，解决敌人部分武装。要很好地运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办法，各支队彼此要有很密切的联络。每支队都应有一个至几个秘密的隐蔽地。要这样很有计划的进行游击，就需要一个指挥部，统一这些支队的行动。我们特别看重这些小游击队的编成，必须将现在红二十六军里面久经战斗，政治上非常坚定的战斗员，分别与当地斗争的群众编成小游击队，这才能更发挥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

信中还特意声明：“这里的意见绝不是取消红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名义固然要保持），相反地，这正是[在]积极开展游击运动中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

从客观上讲，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 26 军应当采取游击战术的指示，符合当时实际，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指示同时又要求红 26 军编成许多小游击队，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势必会分散红军的力量，削弱红军的战斗力，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不利。

省委指示信到达部队后，杜衡认为该指示违背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精神。3 月初，红 2 团在取得外线作战胜利后，返回照金。3 月 7 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 26 军发出指示信，要求建立统一指挥部，领导陕甘边区和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又强调 2 月 3 日的指

示信是正确的。

这时，杜衡以部队代表身份回到省委机关提出反对意见，并提议召开省委会议，讨论2月3日省委的指示信并改组省委。3月23日，在省委会议上，省委书记孟坚做了自我批评，承认2月3日的指示信犯了严重的取消主义错误。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停止了省委孟坚、贾拓夫、刘映胜（杨声）三人的职务，由共青团省委书记袁岳栋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杜衡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暂留省委工作，派王烈（即汪锋）代理红26军政委。

三、开辟照金根据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红军在南方诸省已取得成功的经验。陕甘游击队成立后近一年的发展与挫折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此，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已有所认识。1932年4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研究了陕甘边的政治形势，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适时向陕西省委提出了成立红26军和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任务。同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发展陕甘边新苏区是党在北方革命的第一任务。但由于当时“城市中心论”在党内仍有严重影响，陕甘游击队选择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陕甘游击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中共陕西省委改变原来要陕甘游击队在渭北、西路创造根据地的设想，一度曾想在枸邑、淳化和甘肃正宁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客观实际，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边区军事计划》中，提出创造以枸邑、淳化鞞子坡、耀县照金、正宁山河塬等11个地区，“周围四百里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新构想，随后逐步将创造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放在照金地区。

照金地区位于陕西省耀县的西北部，与淳化、枸邑、宜君、同官

等县交界，西接陕甘边腹地，北连桥山山脉子午岭中段，南俯渭北平原，东临成榆公路。这里沟壑纵横，山岳叠嶂，地势较为复杂。以前，陕甘游击队经常在此活动，群众基础较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影响陕甘两省，是开展武装割据，进行游击战争较为理想的区域。

红 26 军成立时，即确定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932 年 12 月 22 日，杜衡在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指出：

“我和几个同志谈话，即以此地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具备了以下几个条件：（1）这里是三水、淳化、耀县、三原、宜君五县的中心，接连陕甘边，尤其是接近了开展的渭北群众斗争，与渭北新苏区的创造是起到了最密切的联系配合，红二十六军在这里更能飞速的推动渭北新苏区的创造。（2）这一区域内有西路各地逃到的灾民，约略估计总有 20 余万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的要求是万分迫切。这一带的土地是集中起来的，这是我们创造苏区和根据地的最有力的条件。（3）群众的动员是更迅速地，同时接近三原、耀县，动员广大群众到二十六军的各种问题是更有利的，而且很快的可以解决了的。（4）粮食这一带是很多的，红军是可以得到充分的给养。（5）军事地形上是有利的，前面东西部是平原，后面是山，进攻、防御都是有利于我们的。”

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毛泽东提出的红军执行三大任务的要求，红 26 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部署，开始在照金地区实施开辟陕甘边新苏区的计划，积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1933 年 1 月 4 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地区，筹备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1933 年 3 月 8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6 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由秦武山继任），习

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

边区特委成立后，根据省委发展党组织的要求，在红 26 军的帮助下，逐乡逐村地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先后在北梁、黑山峪、金盆、老爷岭、香山等地建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和 1 个区委。当时，中共陕甘边特委辖有中共枸邑县委和耀县两个县委，同时照金地区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较大提高。

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红 26 军还积极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到 1933 年春，在照金地区共建有 18 支游击队，人数 900 多人。为了统一游击队的指挥，协调各游击队的行动，1933 年 3 月 7 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应立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根据省委这一指示，3 月中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 26 军在兔儿梁建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又称耀县游击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后李牺牲，黄子文、吴岱峰先后继任总指挥），习仲勋兼政委（7 月，习仲勋负伤，由张秀山接任），参谋长史进财。下辖照金、耀县、枸邑、淳化、宜君等地的游击队。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部成立后，指挥根据地内各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取得战斗的胜利。

3 月 15 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 26 军发出指示信，提出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和扩大红 26 军的中心任务，并决定建立红 26 军直辖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3 月中旬，红 2 团攻打铜川县的金锁关，消灭民团 30 余人，随后进入三原县武字区，组建了红 26 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后由黄子祥接任），政委金天华（后由张培述、刘映胜、张秀山接任），参谋长李天保。26 日，中共陕西省委向渭北游击队发出指示，要求征调人员将红 26 军扩充为一个师。4

月 17 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发出《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工农红军，完成为红 26 军扩编 1 个师的任务。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加强了对边区各游击队的领导，并对游击队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先后遣散、处理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游击队 6 支队队长硬老八参加革命后，恶习不改，竟然强奸妇女，1933 年 4 月，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兔儿坪召开游击队员大会，处决了硬老八。通过对游击队的整顿，提高了广大游击队员的阶级觉悟和纪律观念，为向红 26 军输入合格战士提供了保障。

在红 26 军的帮助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大力开展了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赤卫军和少先队在站岗放哨、肃清敌特，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果实，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不久，即迁到薛家寨。薛家寨海拔 1500 余米，地势险峻。寨上有 5 个天然岩洞，洞里十分宽大，其中 4 个相互贯通，以 4 号洞最为险要，原是当地人朱吉祥和其父修炼道教的地方。红军在照金一带打游击时，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朱吉祥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劫富济贫，深受感动，主动要求参加游击队，并将岩洞献给红军作为营地。

红军上寨后，发动群众在山上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改造山寨，整修岩洞，洞内设置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和存放粮食和物资的仓库，红军游击队也常驻扎在洞内。薛家寨遂成为红军重要的后方基地。

红军医院有 3 名医生，主要救治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并为根据地群众看病。修械所最初只有从西安兵工厂来的桂生芳、惠子俊等几个

人，后来发展到 40 余人，他们在岩洞内利用近乎原始的土设备修理武器，制造土炸弹、土地雷。他们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威力很大，在保卫薛家寨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服厂有二三十个女工，她们平时为红军游击队缝制军服，战时站岗放哨值勤，因红军医院人手少，被服厂的女工还承担了红军医院浆洗纱布、照顾伤病员的工作。

4 月 5 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 15 日给红 26 军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主持下，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雇农出身的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政府党团书记）。依照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组织法，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文化、教育、内务及肃反委员会。在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还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源、马栏川等乡村基层革命委员会，建立公开和秘密的农会 20 多个。至此，基本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枸邑等县边境的苏区。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结束了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无后方战略基地的被动局面。习仲勋认为：“照金根据地的建立，在西北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上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党在西北地区第一次建立的山地游击队根据地”，“是红二十六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兵败渭华

为消灭红 26 军，阻止照金根据地的发展，4 月下旬，国民党第 17 路军骑兵团、警卫团、特务团和第 86 师 511 团等 4 个正规团与陕西的枸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 6 县民团，约 8000 余人，分 4 路“围剿”照金根据地。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红 26 军第 2 团党委、中共陕甘边特委、

革命委员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 2 团转入外线，寻机歼敌，金理科、李妙斋、习仲勋领导游击队、赤卫军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会议还指出，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迎接恶劣残酷环境的到来。会后，红 2 团转战陕甘边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宜君等地，不断取得作战胜利，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用袭击、伏击的方法不断骚扰敌军，加之指挥国民党军“围剿”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同情革命，敷衍应付，对上假报战绩，国民党军最后撤出照金根据地，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5 月 10 日，强世清、李成荣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1 支队南下，在宜君上畛子与红 26 军第 2 团会合。红 2 团给 1 支队补充了枪支弹药；1 支队将所带马匹送给红 2 团骑兵连。为加强 1 支队的领导，刘志丹派杨重远担任 1 支队政委，马佩勋为副支队长，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

正当红 26 第 2 团和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期间，杜衡回到部队，仍任政委。“在边区正是群众斗争高涨与游击战争开展的时候”，他悲观失望，情绪消沉，特别是“在敌人‘围剿’面前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他悲观地认为：“敌人力量大，后方失守了，群众跑光了，没有粮食，创造不出根据地，扩大不了红军。”根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精神，杜衡主张红 2 团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北上，“打通国际路线”，“与外蒙接洽”。这一主张遭到中共陕西“省委、陕甘边特委及三原县委的一致反对”。

1933 年 6 月 17 日，红 2 团完成外线作战后，返回照金根据地休整。当日，红 26 军党委和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的工作和红 2 团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有 3 种意见：一是以李杰夫为代表，主张北上去内蒙古活动，打通国际路线；二是以刘志丹为代表主张原地活动或向陕北发展；三是以杜衡为代表，

主张南下渭华。杜衡在会上说明了南下的有利条件，大意是：（1）南下渭华地区有地下党的组织，可以配合接应；（2）南下活动地区是渭华暴动的地区，有群众基础；（3）南下地区已有小游击队在活动，可以配合作战（事后证明没有小游击队）；（4）可以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5）南下地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人口稠密，部队可以发展。

会上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支持刘志丹意见，反对南下。习仲勋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转达了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因杜衡称南下是省委的意见，会议否定了前两种意见，通过了南下渭华、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的决定。

6月21日清晨，红2团召开全团官兵大会，杜衡在会上作了简短动员讲话。早饭后，部队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当天下午，部队到达桃曲源休息。这时，淳化县保安队错把红2团当作小股游击队，进行偷袭，结果被红军一个反冲锋，被打垮，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6月22日，红2团由桃曲源出发，行军100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汇合。在此，红2团和渭北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杜衡继续奢谈创造渭华根据地的意义和所谓优越条件，坚持红2团南下，并逼刘志丹表态。游击队领导人黄子祥、张秀山对红2团南下表示异议，认为红2团孤军深入敌人腹地，不利于红军开展斗争，建议红2团停止南下，重返照金根据地。但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意见，强令红2团尽快南渡渭河。

第二天拂晓，红2团途经长坳，与富平县民团发生激战，因部队急于执行南渡渭河的命令，部队黄昏撤出战斗。到达三原寇家庄。在此，杜衡突然提出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杜衡将部队集合起来，宣布成立红26军南下指挥部，由王世泰任总指挥，汪锋任政委，刘志

丹任参谋长。

杜衡离开部队后，部队继续南下，绕过高陵县城，到达渭河畔之贺家窖，在此歼灭守渭河的民团 10 余人，俘虏民团团总（后在长安东 5 里外的地方枪毙了），24 日拂晓，顺利渡过渭河，进入临潼骊山地区。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 2 团南下消息后，对红 2 团的处境甚为焦虑，认为南下很可能将红 2 团断送在渭华一带，立即派省委书记袁岳栋急赴三原阻止部队南下。在三原，袁岳栋正巧与杜衡相遇，遂在三原民众教育馆，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及黄子文、刘映胜和杜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严厉批评杜衡强令部队南下的错误，其他同志针对杜衡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红 2 团返回照金根据地，由赵伯平通知中共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阻拦部队。遗憾的是，命令传达到高陵时，红 2 团已渡过渭河。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又指示巡视员贾拓夫派数路交通追赶，均未达到目的。杜衡回到西安后，于 7 月 28 日和袁岳栋同时被捕，两人随即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

红 2 团渡过渭河后继续行进，来到距西安 20 里的灞桥附近。在这里适逢杨虎城部一个连正在上操，红军乘机收了他们的枪。这时，从灞桥方向开过来载着毛巾、被服等物资 10 辆卡车。红 2 团随即截获了这批汽车，并给战士们分发了车上的日用物品。杨虎城闻讯后，立即下令西安戒严，并急调驻渭华的警备旅在高塘各拗口布防，调商洛 1 个团在南山峪口阻截，从西安派两个特务团追击，兵力约四五百人，对红 2 团形成包围态势。为摆脱敌人，红 2 团一部分步兵乘缴获的汽车，来到临潼山脚下，等全军到齐后，打坏汽车。

当天黄昏，部队在骊山脚下宿营。这里离西安约 50 里，距临潼 20 里，随时可能受到敌人合围。但是部队人困马乏，战士们疲惫不堪。

眼下又临险境，右有西安方向敌重兵追击，后有渭河天堑挡道，左有临潼方向敌人的封锁，大家感到前途渺茫。

当晚，中共红 2 团党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有人主张南下，有人主张撤回根据地，争论不一。关键时刻，刘志丹表现出持重和远见。他认为：进亦险恶，退亦险恶。进，尚可与敌周旋；退，唯有与敌决一死战。再以党内是非而论，中途返回，胜败都难以分清曲直。最后，他陈述了败于进，而不败于退的利弊，说服大家统一认识，做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竭尽全力继续完成南下任务。

第二天拂晓，红 2 团与追上来的敌军 1 个团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向东秦岭地区转移，连续一天一夜急行军 150 里，进入蓝田流峪口，与拦截的民团展开激战，消灭了部分民团，随后进入商县境内。这时，刘志丹给商县霸龙庙民团团总李凌玉写了封信，大意是红军经过此地，粮食、军火困难，请他帮助。为表示友好，红军送给李凌玉一头骡子作为礼物。李回赠了一些粮食和其他东西，然后红军继续行进，到达蓝田张家坪一带。

秦岭地区地形十分复杂，悬崖陡峭，道路崎岖，森林茂密，荆棘丛生。由于未见地方党组织接应，人生地不熟，不时遇到大雨，即刻山洪暴发，河水大涨，部队常被河水阻隔，行动十分困难，人马拖得疲惫不堪。长期活动在黄土高原上的骑兵和驮军需品的骡马，在狭谷石路上不仅无法发挥作用，行动反而不便，有的已成了跛子。敌人很快发现红军行踪，两个团紧跟着围攻上来，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

7 月中旬的一天清晨，红 2 团领导在张家坪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开会期间，突遭敌人袭击。开会的干部听到枪声，立即冲出会场，但部队已被敌人冲散，四处乱跑。刘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突围。两天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

攻下，刘志丹和汪锋带领的部队大部英勇牺牲和散失，王世泰带领的一部分队伍，找到刘志丹后，即在南山隐藏，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两月余。后来，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吴岱峰等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历经千辛万苦，先后辗转回到照金根据地。

红 2 团失败后不久，赵伯平在渭北巡视工作，一天，在野外的小路上遇到了杨琪。杨琪见到赵伯平后失声大哭，抱怨刘志丹导致了这次南下的失败。赵伯平安慰他说：“失败是痛心的，但不能因此灰心，革命道路虽然曲折，但我们还有其他部队和渭北游击队，只要继续斗争，一定能取得胜利。”同时向他指出：“这次失败主要是杜衡的错误，不要错怪刘志丹。”赵伯平将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杨琪，杨琪这才如梦方醒，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红 2 团南下渭华地区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正式红军几乎全军覆灭，教训极为深刻，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地实行。杜衡尽管不懂军事，但他以钦差大臣自居，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南下渭华的问题“并没有在一般干部中间作深切的讨论，只是上层几个负责同志讨论决定”，“政治委员给战斗员讲话只说‘到渭华去总能使大家有白面吃’”，没有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最后，杜衡强令弱小的红军脱离山区根据地，进入敌人力量强大的关中平原作战，导致红 2 团孤军深入，陷入流动作战的不利局面。尽管以刘志丹等对南下的决定持有异议，但对身兼红 26 军及其第 2 团政委的杜衡的错误决定没有约束力，只能违心服从。

其次，受“左”倾路线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城市中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占主导地位，并得到了西北地区党的部分领导的积极拥护，杜衡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所以，红 2 团南下渭华失败，不仅仅是杜衡的个人问题，也与红 26 军个别领导的支持不无关系。

渭华地区地处战略要地，是西北国民党当局统治的中心，企图在该地区建立红军根据地，以威胁西安，必然会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重蹈渭华起义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覆辙。

再次，杜衡等人对渭华地区形势的估计是主观的，片面的，盲目的。红 2 团南下时，正是陕西国民党当局统治的稳定时期，渭华地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红 2 团渡过渭河后，不但没有群众欢迎，地下党也找不到，更没有游击队在活动，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正在川陕根据地同国民党川军进行反围攻作战，也无法与之取得联系，红 2 团进入该地区后，立即陷入了敌人重兵围攻、孤立无援的困境，最后难免一败。

第七章 重整旗鼓

红 26 军南下渭华失败和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的形势非常严峻。暂时的困难没有压倒陕甘边革命的人民，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的领导下，重新举起了红 26 军的旗帜，组建了红 26 军第 42 师，并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一、红 26 军的恢复及第 42 师的组建

红 26 军第 2 团南下失败后，照金根据地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红 2 团南下时将地方游击队的 4 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 40 余人，不到 30 支枪。国民党调动大批兵力对照金地区进攻。根据地失去了红军主力的依靠，中共陕西省委及时总结教训，决定培养新的红军主力，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保卫照金根据地，开辟陕甘边新苏区。

正当陕甘边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在陕西耀县发生了国民党第 17 路军骑兵团起义事件。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军中工作，1928 年先后参加领导麟游、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到杨虎城部工作，曾任师司令部参谋、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新兵训练处处长、骑兵团团长，深得杨虎城信任。1933 年 6 月奉杨虎城命令到渭北耀县一带“剿共”，并被任命为“剿共”总司令。这时，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王泰吉派人与中共三原县委书记赵伯平等联系，表示要起义参加抗日，请求派人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多次指示该部中共地下党员秘密组织起义工作。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提出的“脱离杨虎城的关系，树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旗帜”的指示，7 月 21 日，王泰吉率全团官兵在耀县起义，当日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军。起义部队迅速解除了耀县民团武装，打开耀县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收编了雷天益民团，组织宣传队，张贴布告、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了县政府和城里几家大地

主的粮仓，发动贫苦群众开展分粮、分财物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起义成功后，骑兵团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谈国帆任参谋长。下辖 5 个大队，全军共 1200 多人。

耀县起义，正值陕甘地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它的成功举行，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陕甘地区的武装斗争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义一星期之后，王泰吉率起义部队向三原北部进军，试图争取驻三原的杨竹荪团起义。起义部队离开耀县时，雷天益分队没有跟随，后继续与红军为敌。

由于部队中党的基础差，加之起义后没有及时对部队进行整顿，部队士气并不高。不久，起义部队途经三原心字区轳轳把，与第 17 路军孙友仁特务团遭遇，激战一天，战斗失利，大部溃散。后来在红 4 团接应下，王泰吉率余部百余人转到照金根据地，在薛家寨脚下的绣房沟与习仲勋率领的游击队会合。

耀县起义的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和耀县县委决定成立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兼政治指导员张邦英，副队长张仲良，下辖 3 个分队：第 1 分队长陈国栋，第 2 分队长安天民，第 3 分队长张智怀。游击队成立时有长短枪 10 余支，其余为土枪、大刀、梭镖等。耀县游击队成立后，镇压了耀县阿姑社豪绅左善楚、左国明、左国鼎三兄弟和东区孙家塬的张廉明等，给群众分粮、分财物，并缴获了部分民团的枪支，很快发展到八九十人，六七十条枪。7 月 29 日，耀县游击队进入照金薛家寨附近，打退了追击王泰吉起义部队的孙友仁团的进攻。接着，又在高山槐歼灭雷天益民团 20 余人，随后进驻照金的薛家寨，不久改称耀县游击队第 3 支队。

7 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富平游击队等武装改编为红 26 军第 4 团，拟以红 4 团为主力开展陕甘边游击战争。7

月 24 日，红 4 团在三原武字区正式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一个骑兵班，共计 120 余人。第二天，召开了红 4 团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原渭北游击队员外，有群众一二百人。大会由黄子祥主持，中共三原中心代表赵伯平向部队授予了写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的红旗。红 4 团成立后，遂成为陕甘边地区的红军主力。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 26 军政委杜衡被捕叛变后，杜衡带领特务到处捕捉中共地下党员。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省委遭到完全破坏，西安和关中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这时，国民党报纸不断刊载红 26 军失败、“刘志丹梟首”的消息。由于红军游击队连续遭到失败，加上敌人的宣传，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中产生了悲观情绪，士气比较低落。

8 月初，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 6 个团的兵力，对渭北根据地“进剿”，红 4 团冲破敌人围攻，北上照金地区活动。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任务。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 4 团相继进入照金，壮大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照金游击队也发展到第 1、第 3、第 5、第 7、第 9、第 11 等几个支队，还有淳化、枸邑等地的 12 支游击队，游击战争在耀县、淳化、枸邑迅速开展起来。

为解决红军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方针问题，纠正部队中存在的悲观情绪，1933 年 8 月 14 日（一说为 20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时，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从西安脱险回到根据地的省委巡视员高岗，以省委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时，有人认为“省委的破坏，二十六军和义勇军的失败，游击战争没有出路了”，“主张把部队解散，把枪隐藏起来”。会议批

评了这种悲观情绪。为便于协调作战，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红 4 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等武装。随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被撤销。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实际，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陕甘边特委提出了坚持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和“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原则。

陈家坡会议是陕甘边面临危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重要时刻召开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重建红 26 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粉碎敌人的“围剿”，促进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反映了陕甘边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红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要原则，为以后陕甘边、陕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指导方针。陈家坡会议以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红军集中兵力，以敌军连排单位为作战对象，寻找战机，不断取得作战胜利。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由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率红 4 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第 3 支队向东出击，锋芒首指庙湾，消灭夏玉山民团一部，在高山槐歼灭耀县雷天益民团 100 余人，缴获部分武器，然后乘胜袭击柳林民团，歼灭敌人数十人。9 月初，红 4 团向西出击，在邠县龙马、高村、柏子坡一带消灭民团 100 多人。尔后转入正宁金村庙一带活动，消灭地主武装一部，缴获长短枪 10 支。

9 月中旬，陕甘边红军主力进入合水，在固城川与强世清带领的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会合。这时的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已发展到 70 余人，马 30 余匹。两军会合，战斗力增强，红军士气高昂。

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主力与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会合后，部队继续南下，准备攻打枸邑县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张洪镇。

张洪镇位于柞邑西南 30 多华里，是有数百户人口的大镇。镇内驻有民团 70 余人。因张洪镇城池坚固，不易强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由柞邑游击队诱敌出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9 月 21 日晨，陕甘游击队冒雨南下。下午 2 时许，柞邑游击队攻城后佯败后退。敌人果然上当，派柞邑民团一部出城追击。游击队且战且退。敌民团追至邠县底庙，进入红军伏击圈，被全部歼灭。尔后，红军游击队扮成团丁，令俘虏带路，骗开张洪镇城门，红军游击队大队人马随后攻进城中，击毙柞邑民团团总，消灭敌县政府内民团 10 余人，活捉国民党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及一批恶绅，游击队无一伤亡，缴获大量物资。战斗结束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处决了国民党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 12 人，并组织群众分财物。次日经马栏镇返回照金根据地。

国民党军多次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的失败，引起国民党南京最高当局不安。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根据地中心薛家寨。1933 年 9 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国民党军 1 个正规团及耀县、淳化、柞邑、同官等 4 个县民团，共千余人进攻照金。当时，红军游击队主力正在外线作战，照金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同敌作战，薛家寨只有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留守，兵单势薄。在战斗激烈时，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战士、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敌人向寨上轮番进攻，根据地军民凭险据守，奋勇阻击，并巧布地雷阵，以自制“麻辫手榴弹”等武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酣战中，山风骤起，阴云密布，大雨滂沱。根据地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和张秀山率领游击队从绣房沟及时赶回，和留守武装会合，猛烈向敌反击，敌狼狈溃退。陕甘边军民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李妙斋在战斗中中弹牺牲，吴岱峰继任游击队总指挥。

1933年夏，杨琪、高锦纯、黄罗斌、王兆相、刘约三、魏武等红2团主要骨干陆续回到照金根据地。这批干部分别被分配到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和照金游击队工作。10月初，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等也辗转脱险回到照金，红军的领导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任红4团第2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刘志丹等人回到部队，部队士气振奋。当时，刘志丹与习仲勋谈起红2团南下失败的教训时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由于实现了统一指挥，并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有了进一步发展。

国民党军围攻照金根据地的失败，使蒋介石非常恼怒，当时的《西京日报》发表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1933年10月上旬，杨虎城调集4个正规团和周围6个县的民团数千人，准备对照金根据地发动进攻。

当时，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有400余人。面对气焰嚣张的敌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与敌周旋，决定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带领各游击队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红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第3支队和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转至外线合水一带寻找战机。

10月中旬，陕甘边红军获悉甘肃合水县城仅有陇东杨子恒部赵文治团（陇东警2旅第5团）1个连和该县保安队，共约300人，且

战斗力不强，遂决定长途奔袭。刘志丹率红军游击队从照金出发，横穿马栏川，沿子午岭山麓，经正宁、宁县，日夜兼程北上。15日下午，部队到达合水县黑木塬，立即封锁消息，进行攻城准备，并派出侦察人员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变化。18日晚，红军冒着大雨，急行军30多里，抵达合水城东。

合水县城又称“葫芦城”，是座依山而筑的城池，城墙高而坚固，两面均有深沟，最高点葫芦把修有碉堡。因红军缺少攻坚武器，刘志丹等决定采取偷袭的方法。王世泰担任攻城总指挥。以红4团第2连和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担任主攻，挑选20多名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登城突击队，其余部队在城外隐蔽，待攻城突击队攻城成功后，再发起攻击。晨3时许，攻城部队进入预定位置。王世泰指挥突击队架云梯攻城。由于城墙太高，云梯不够长。急切之中，老游击队员柴正祥挺身而出，拔出刺刀，插入城墙，身体悬空，不停倒换刺刀，一点点爬了上去，然后抛下绳子。突击队员们攀绳而上，打死哨兵，冲进碉堡，收缴了还在梦中的敌人的枪支，占领了制高点。红军主攻部队得到信号，在强世清带领下迅速冲进城内，与敌激战1小时，占领全城。合水国民党县长康麟乘乱逃跑，公安局局长李彦率部起义，余敌被全歼。红军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随后打开监狱，救出被敌人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余人，包括前西北反帝同盟军第2支队第2大队大队长杨培盛。红军没收了国民党县政府和地主土豪的财产，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群众。

红军主力转至外线以后，国民党军数千之众从中部、宜君、枸邑边界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0月13日，杨虎城部孙友仁团进占照金，耀县民团进占老爷岭，庙湾民团进战芋园。10月15日，孙友仁将机炮阵地设在龙家寨，向薛家寨抵近射击。边区领导机关率领留守的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共200余人奔向各处关隘，全力扼守，

连连挫败敌人的进攻。入夜，孙友仁团在叛徒、原龙王寨游击队队长陈克敏的带领下，从后山岷岷旁边的一条石缝攀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陕甘边特委组织根据地军民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遭到很大损失。为保存力量，陕甘边特委决定放弃薛家寨，组织边区党政军机关分头突围：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由黑田峪方向撤退。

10月16日，薛家寨失守。敌人占据薛家寨后，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屠杀。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一些群众被敌杀害。陕甘边特委率游击队经柳林、杨家店、转角镇、石底子进入陇东。10月19日，在正宁县柴桥子（一说宁县盘克塬）与陕甘边红军会合。此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军后方机关转驻南梁地区平定川、豹子川一带。

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主力攻占合水县城的第二天，得知孙友仁团进攻薛家寨的消息，随即撤出合水城，赶回照金增援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途中得知薛家寨已失守，部队遂改道北上。

合水一战，陇东国民党军阀丧师失地，敌赵文治恼羞成怒，率全团700余人紧紧咬着红军不放，企图与红军决一死战。鉴于敌来势凶猛，刘志丹率红军采取疲劳战术，与敌周旋。红军在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一带牵住敌人十余日。敌军被拖得疲惫不堪，锐气大减。10月28日，红军抓住战机，在庆阳县毛家沟门（今属华池县）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9时许，赵文治团进入红军伏击圈后，红军发起冲锋，激战至下午，敌人全线崩溃，红4团骑兵追击敌人10余里，大获全胜。此战，共歼灭敌人近200名，缴枪200多支，赵文治团元气大伤，余部逃回庆阳县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共产党人和红军第一次建立山地根据地的尝试。它的丧失，使陕甘边红军再次陷入无后方战略基地的困境。为解

决根据地重建和红军的发展问题，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部队整编、根据地建设和红军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决定：第一，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成立红26军第42师；第二，军事后方北移陇东南梁，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第三，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是西北红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摆脱了王明“左”倾路线干扰，独立做出自身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从挫折走向勃兴的转折点。

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定，1933年11月7日，红26军第42师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未设军一级机构和领导），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下辖第3团、骑兵团和师属警卫连。其中第3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 and 红4团的少年先锋队及原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后返回人员合编而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后由黄罗斌继任），下辖3个连，第1连连长赵国卿，第2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全团共计200余人。骑兵团由红4团编成，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下辖2个连，第1连连长李志柏，第2连连长高占胜，共计100余人，战马60余匹。同时成立了中共红42师党的委员会，书记杨森。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上级党组织，特委其他成员分散在红42师各部队，全边区党的工作实际由红42师党委领导。

原来中央给陕甘边红军的番号为红26军第41师。陕甘边成立正规红军师，并没有采用41师的番号，而是42师。这与其在陕甘边地区的主要对手杨虎城第17路军冯钦哉部番号相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红42师的成立，把陕甘边红军建设推进

到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骑兵团的建立，适应了西北地区的特点，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红军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

二、陕甘边根据地的开辟

包家寨会议上，刘志丹提出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三个根据地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刘志丹在总结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认识到根据地不能仅限一个，应同时建立几个，以便使红军有回旋余地，各根据地间也可彼此支持，互相策应。会议确定第 1 路游击队以陕北安定为中心，向南发展；第 2 路以陇东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第 3 路以关中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三路又以南梁为中心，红 26 军第 42 师居中策应，帮助各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陕甘边红军与其他各路红军长期隔绝，孤军奋战，生存与发展环境极为恶劣，关于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三个根据地的设想，把陕甘边和陕北的游击战争作为全局统一考虑，不仅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也促进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战略协同，在战略上是高明的，符合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而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也说明：要取得游击战争的胜利，根据地不能仅限一个，而应同时建立几个，以便红军有回旋的余地，各根据地间也能相互呼应和支持，有利于粉碎敌人的围攻，保障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确立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三个根据地的决策是正确的，为以后实现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以及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统一，最后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础。

包家寨会议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符合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必须在敌人统治中心较远而又力量薄弱的地区的思想。陕甘两省交界之桥山山脉北段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势优越，但群众基础及经济条件较差，政治影响所及不大，发展空间较小；南段群众基础和经济条件较好，但距敌人统治中心近，是其

必争之地。中段经济条件虽不及南段，但比北段要好，且梢林遍布，沟壑纵横，地势险要。南梁地区正位于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甘肃省庆阳、合水和陕西鄜县、保安四县交界之处，在 1930 年前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这一带就活动过，刘志丹在此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共产党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南梁地区东距陕北军阀高双成部队驻守的延安约 300 多华里，西距国民党甘军谭世麟驻守的庆阳 260 多华里，北距土匪张廷芝部盘踞的保安约 300 华里，距其他较大城市更远，反动势力鞭长莫及。红军面对的一线敌军多为地方民团，战斗力弱；二线敌军主要是地方实力派，他们派系复杂，相互牵制，战斗力也不强；仅有国民党正规军杨虎城部有一定的战斗力，但部署在洛河沿线和洛川一线，对此威胁不大。

按照包家寨会议的部署，红 42 师师党委决定，挥师南下，帮助照金根据地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游击区，创建第 3 路游击队。

11 月中旬的一天傍晚，红军来到宜君县杨家店子。当晚，派出的 3 个红军战士外出侦察敌情，被驻扎在焦坪的国民党驻军发现被俘，暴露了红军的位置。次日清晨，浓雾笼罩着整个杨家店子上空，镇子一片模糊。井岳秀第 86 师第 256 旅第 511 团的 1 个连前来偷袭。骑兵团奋起应战，向镇外冲锋，在红 3 团的协同下，经反复冲杀，战至下午，全歼敌人 120 多人，缴获长短枪 120 余支。敌连长李文杰被俘，他自称是刘志丹同学，请求宽大处理，并要求见刘志丹。请示刘志丹后，刘志丹不见，并命令将其处决。这场战斗，红 42 师也有较大伤亡，有三四十个伤员无处安置，因此，红 42 师改变南下计划，第二天向南梁地区进发。

红军进入南梁地区后，立即兵分两路，红 42 师师部率第 3 团东进咸（阳）榆（林）公路，消灭了沿线部分民团，然后奔袭甘泉，进攻受挫后，部队转由洛河川向北前进，在葡萄沟门击溃井岳秀第 86

师 1 个营。骑兵团向西北行动，横扫新堡、二将川等地民团，在荔园堡、阎家洼子全歼陕西国民党警备骑兵团第 2 团张廷芝部两个新兵连。不久，全师在二将川会合。南梁境内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纷纷外逃。红 42 师经过分兵作战，在南梁地区初步站住了脚跟。为便于开展群众工作，红 42 师成立了以吴岱峰为首的后方工作委员会。趁作战间隙，红 42 师组织部队以连为单位，到各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创建南梁根据地工作全面开展的基础上，12 月中旬，刘志丹率红 42 师再次南下正宁地区，恢复了正宁根据地，打开了关中游击区的局面。

1934 年 1 月，红 42 师师长王泰吉要求去豫陕边割据势力刘桂堂部做兵运工作，得到师党委批准。王泰吉离职后，由刘志丹接任师长。

王泰吉离开部队不久，在陕西淳化县通润镇被旧相识国民党淳化县第 3 区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王泰吉被捕，在淳化县被押十余日，后解至西安国民党绥靖公署军法处。王泰吉被捕后，遭受严刑，始终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曾写了多篇革命诗词，以表其志。在淳化县通润镇写的诗二首：

其一：

二十八岁空蹉跎，
为谒故人入网罗，
狐鸦交结吾有愧，
悬晴待看事如何。

其二：

几经奋起几颠沛，
愧无良平智量深，
引颈辞世诚快事，
瞑目庆祝红旗飞。

在西安国民党绥靖公署军法处写的绝命诗：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系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在西安国民党绥靖公署军法处写的绝命词：

为国寂将门儿掩，谁也不见。学秃陀参禅，象睡佛咒天，将孔孟抛在一边。劳什子吓破英雄胆，咱从来不说奈何天。这头颅任你割断，这肉体任你踏践，一切听自然。

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为帮助第3路游击队扩大游击区，2月，红42师南下进入淳化、枸邑一带活动，整顿了各游击队，打击了当地反动民团。随后，部队准备北上南梁休整。途经正宁县湫头塬南邑村宿营，当晚发生了师政委高岗违反军纪，企图强奸妇女的事件，在群众和部队中造成了极坏影响。三天后，部队进入南梁廉家砭，召开了师党委会。会议对高岗给予了严肃批评和处理，撤销了高岗的师政委职务，调其至第2路游击队任政委。同时宣布杨森接任红42师政委。

随着红42师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的广泛开展，陕甘边革命政权的恢复时机已经成熟。1934年2月25日，在中共红42师党委主持下，在甘肃合水县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会议，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还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基本形成，为进一步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基础。

5月28日，中共红42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照金根据地失守后一直处于停顿状态的中共陕甘边特委的工作，由张

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并决定杨森任红 42 师师长，高岗复任红 42 师政委。同年 8 月，张秀山调任红 42 师党委书记，惠子俊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

1934 年 7 月，在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已经进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对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以及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等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建设方面，着重要求积极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政权建设方面，提出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特委的这一决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战略性的决策。以此为标志，陕甘边根据地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此后，陕甘边东区扩展到安康、郿县，西区扩展到庆阳以北，南区扩展到关中。1933 年 10 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张邦英任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机关设在中部县小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相继设立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 5 个县委和红色政权。

1934 年 11 月 4 日～6 日，根据中共陕甘边特委 7 月决议精神，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在选举边区工农兵代表之前，因为根据地文化落后，许多人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刘志丹则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选为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取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实行这个办法，群众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很快选出了代表。

大会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一致通过了由刘志丹为大会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由蔡子伟主持起草的《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及《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大会决定将革命委员会改称苏维埃政府。经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工农监察、肃反、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会议还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仍由刘志丹兼任，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赤卫军总指挥为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参谋长梅生贵兼。同时在原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的基础上，扩充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大队，郭锡山、宋飞任正、副大队长。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全体与会代表和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及周围群众3000多人，在荔园堡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会场四周书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铲除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革命标语。会上，习仲勋、刘志丹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还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和阅兵式。当时，刘志丹曾充满豪情地写了一首题为《荔园堡阅兵》的四言诗：

陕甘儿女多豪气，
赤手空拳争权利。
今日武器扛上肩，
列队阵阵成铜墙。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已经形成。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第2路游击区和第3路游击区

联成一片。根据地范围扩大到东到陕西宜君县的临真镇，南到陕西淳化、耀县，西到甘肃的庆阳、环县，北到陕西的定边、靖边。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区 3 个行政区：中心区辖华池、合水、庆北、赤安、靖定、安寨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枸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各县相继成立了中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及区、乡一级党委和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颁布和实施政令法规，加强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陕甘边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有土地委员会，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陕甘边的土地革命，依据《井冈山土地法》，结合过去的斗争经验，重点放在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上，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酌情给地主留一些土地（多是山地、坏地），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对富农则适当保留土地，征收多余土地。一般不触及中农利益。另外，还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促进流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发行了布制货币，面值有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与当时流通的银元等值，可互相兑换。在荔园堡开设了集市，广招各处商贩前来贸易，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根据地实行不征粮、不派款政策。党政军的开支主要取之于作战和没收豪绅地主财物。部队自力更生，建设牧场，开展种植养畜，减轻了群众负担。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苏区各区、乡普遍开办扫盲班、夜校，建立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并设立了禁赌、禁烟、放足委员会，开展了“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劝诫吸鸦片烟、劝废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的六劝活动，不断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中共陕甘边特委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布尔塞维克生活》，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红军西北报》，刊登红军的战报及党和政府的决议。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极大地教育了根据地人民群众，动员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1936年，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中描述了在刘志丹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的一些情形：

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来，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他针对着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牛羊予一般农民，反对苛捐，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

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刘志丹十分注意密切军政关系。他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和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有一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人路过军政学校操场时，刘志丹正组织学员训练，见习仲勋等人来了，立即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习仲勋敬礼报告，欢迎习仲勋给大家讲话。习仲勋一向将刘志丹当作领导，论年龄刘志丹也比习仲勋年长10岁。习仲勋一下不知如何是好。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就不在乎了。”刘志丹以身作则，尊重地方政府的领导，令习仲勋很受感动。另外，刘志丹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为红军胜利提供了不尽的源泉。

三、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红26军的恢复和扩大以及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建立，给陕甘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威胁。甘肃省国民党政府在一个训令中称：

“刘志丹股，负隅自固，骚扰至甚。”1934年2月，陕甘国民党军队以8个团的兵力万余人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部署是：南面以国民党第17路军驻陕西耀县的干部团、驻小丘的特务团，进攻照金地区；北面以陇东绥靖司令部驻守庆阳的赵文治团、仇良民团，进攻南梁根据地；西南面以驻守枸邑的何高侯团分割照金、南梁两地的联系；以杨子恒部王子义团为总预备队，进占合水待机；东南以第17路军冯钦哉师1个团，在中部、宜君一线布防，阻止红军东进；北面以驻延安、保安一带的陕军张瑞卢团，封锁洛河川，防止红军北进。

为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共红42师党委制定了以第3路游击队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军主力到外线，寻找战机，打击弱敌的作战方针。

1934年快过春节时，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负担，让红军战士过个好年，刘志丹决定趁春节期间，率部队南下耀县、同官一带活动，打土豪，搞一些经费。随后，红42师在照金集结，并派侦察员到耀县县城附近侦察。在石底子，红军收编了由黄龙山窜逃过来的土匪杨谋子部，令其跟随红军行动。2月13日，正是腊月三十，红军攻占了距耀县县城50余里的北塬生义堡，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地主准备的年夜饭，让红军足足吃了一个礼拜，红军过了一个好年。

2月23日，红42师离开生义堡，在耀县、同官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向南梁进发。部队行至合水县蒿嘴铺时，被红军收编的杨谋子企图率所部脱离红军。杨谋子曾在黄龙山为匪多年，无恶不作，慑于红军威力，为保全实力，不得已接受红军改编，但并不赞同红军主张，更不愿受红军纪律的约束。如果让这股土匪再度流窜民间，将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红42师党委决定消灭这股土匪武装。鉴于这股土匪多是亡命之徒，特别是杨谋子的7名贴身保镖，枪法很好，

号称“提枪不落空”，为避免红军不必要的伤亡，刘志丹召集干部作了周密部署。抓捕行动由王世泰具体指挥，命令骑兵团做好战斗准备，以防不测，同时命令部队做好出发的准备。王世泰带了几个警卫员，在大街上与杨谋子相遇，为稳住杨谋子，王世泰与其闲聊。不久，刘志丹派人通知两人到师部开会。杨谋子不知是计，与王世泰一起来到师部。当两人走进师部大门，早已埋伏在门后的红军战士冲上去将杨谋子擒获，并缴了他和他的两个护兵的枪。杨谋子被擒后，王世泰返身出门，发出暗号，红军战士一举将杨谋子所部全部擒获。经师党委研究，当场枪毙了杨谋子及其手下几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其余经过教育，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消灭杨谋子后，部队返回南梁根据地。

3月上旬，在第2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刘志丹率红42师由南梁出发，进入照金以调动敌人，随后挥师东进，先后袭击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民团，歼敌百余人。接着挥师北上，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突然袭击保安蔺家砭、崖窑，消灭国民党张廷芝部1个连。3月29日，袭击国民党庆阳第4区驻地高桥，俘敌区长高明山以下30人，缴获30余支枪和大批物资。嗣后，对元城发起攻击，红42师第3团一举占领元城街道，消灭谭世麟民团1个连，毙俘守敌100余人。然后红42师主力直扑赵家梁子，又歼灭谭世麟之子谭振武带领的1个骑兵团，缴获枪50余支，战马50余匹。

由于连续取得作战胜利，红军士气非常高涨。在第2路游击队配合下，刘志丹率领部队由南梁北上，向合水县城前进，摆出要攻打合水的架势，并有意将消息透露出去，以诱使庆阳之敌救援，准备乘虚袭击庆阳县城。4月1日，红军进至合水城附近，庆阳守敌陇东警备旅王子义团闻讯后，果然派其副团长潘立庭率两个营和团直属队（1个机炮连）增援。该团与红26军初次交战，认为自己是国民党正规军，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显得十分骄横。次日他们从庆阳赶到合

水后，得知红军已向西华池方向转移，随即跟踪尾追，并带了许多绳子，扬言要捉红军俘虏。

西华池位于一条南北狭长、东西临沟的小平原上。在北面的塬边，有一道残留的古土城墙。

4月2日临近中午，红42师进抵该镇，师部和第3团驻在镇内；骑兵团和第2路游击队驻在镇外东沟塬畔史家湾各村庄。正当红军解鞍饮马、休息吃饭时，敌人排成两路纵队，杀气腾腾扑来。

在北门外的红军哨兵发现敌情后，鸣枪报告。刘志丹迅速集合部队，命令王世泰带领第3团部署在北城墙外和城墙上阻击敌人；杨森率骑兵团从东面绕到敌人背后夹击；第2路游击队从东沟畔堵截。当敌人从西南面冲进镇子后，突遭红3团火力迎头痛击，敌遭杀伤后，始以战斗队形展开，向红军猛扑。红军以猛烈火力阻击敌人，敌伤亡惨重，攻势受挫。骑兵团趁机迂回敌后，冲垮了敌人的指挥机关和机炮阵地，敌军乱作一团。镇内久红军步骑配合，发起反击。在红军游击队前后夹击下，敌人无力抵抗，纷纷缴械投降。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除敌副团长带十几个人逃脱外，红军全歼国民党“围剿”军主力王子义团2个营另1个机炮连，毙俘6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战马50余匹。这是陕甘边红军建军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西华池大捷后，国民党军闻风丧胆，士气低落，陇东敌人暂不敢出来与红军作战。红42师将一些重武器和物资送回南梁，并将缴获的武器装备了第2路游击队。红军主力随后南下，帮助第3路游击队打击南线之敌。

西华池惨败使国民党陕甘军阀恼羞成怒，匆忙调整“围剿”部署，派驻庆阳的仇良民团骑兵营和谭世麟民团军向南压来；调马恭章骑兵团驻守山河镇，封锁西路；调冯钦哉部1个团在直罗镇、黑水寺、杨

家店子、转角镇一线拦截；命何高侯团在数县民团的配合下由淳化、土桥出击。

4月下旬，红42师第3团和骑兵团从耀县稠桑出发攻打同官梁家塬，击毙敌营长范子畴，活捉区长梁子峰。5月初，刘志丹率红42师向耀县挺进。途经马栏镇时，决定顺便打下该镇。因敌据守坚固堡垒，一时攻克不下，红军遂放弃进攻，直抵耀县城附近。随后，刘志丹命令王世泰率第3团主力夜袭咸榆公路上的同官黄堡寨，缴获民团枪支二三十支，没收大批烟土、钱财和其他物资。打下黄堡寨后，红42师在耀县活动约一个星期，经过两天行军，准备夜袭淳化县城。红军到达淳化县城城墙下，天已大亮。当主攻部队第3团向城东、城南运动时，被敌人发现，遭猛烈火力射击。红军遂撤出战斗，转移到马家山村休整。

第二天，刘志丹正在给部队讲军事课，第3路游击队报告说敌何高侯团两个连由土桥开往淳化途中，在三里塬休息。接到情报时，红42师首长决定消灭这两连敌人。遂命令驻守三里塬下塬的骑兵团和游击队从两面包围敌人，第3团由马家山跑步赶到三里塬投入战斗。等敌人发现红军时，已无法逃跑，被迫龟缩在甘家嘴抵抗。

战斗打响后，第3团第1、第2连分别由村东、村北，骑兵团从村南发起攻击。由于村南地形不利骑兵展开，师政委杨森命令战士下马徒步向敌进攻。敌人凭借场院拼命射击，冲锋时，师政委杨森头部负伤。红军用火力压住敌人，实行强攻，突破敌人阵地。敌人即刻土崩瓦解，纷纷缴械投降。经两个小时激战，除少数几个敌人从一条小沟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缴获180余支枪和部分物资。红军也伤亡三四十人。战后，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任师政委，骑兵团政委由高锦纯接任。

从三里塬战斗缴获敌人的文件中，红军得知敌人即将调整部署，

开始新的“围剿”。鉴于敌军兵力较大，南线地形不利于红军反“围剿”作战，为摆脱敌人，红 42 师决定将重伤员交给第 3 路游击队照顾，部队向北转移。红 42 师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于拂晓前到达甘肃正宁的五顷塬。这时，部队人困马乏，吃完早饭，正准备休息，突然敌甘肃陇东警备司令部的马恭章骑兵团袭击，战斗中，部队被敌冲散，人员和物资都受到一些损失。后红军直插富县和尚塬，击溃冯钦哉拦截部队 1 个营。6 月 20 日，红 42 师第 3 团和第 2 路游击队一部北上，在保安瓦子川给来袭之敌 86 师第 512 团第 2 营以沉重打击，歼其 100 余人，余敌退回保安。红 42 师在外线取得胜利后，回师南梁，迫使仇良民、谭世麟部撤出南梁。至此，红 42 师在陕甘边游击队和赤卫军的配合下，经过大小战斗 30 多次，歼敌 3000 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反“围剿”的胜利，使红 26 军第 42 师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南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也更加巩固和扩大。

四、红 42 师的发展壮大

红 42 师成立后，开始实施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三个根据地的计划。至 1934 年初相继成立了第 1 路、第 2、第 3 路游击总指挥部，开辟了第 2、第 3 路游击区，1934 年春，仅南梁、玉皇庙、白马庙、二将川、东华池等 5 个赤卫队，就拥有队员千余人。6 红 42 师抽调一批军事干部，拨出部分武器弹药，装备地方游击队，游击队力量得到迅速发展。红 42 师在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又不断从地方游击队中得到补充，使其自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由赤卫军到游击队，再到主力红军的发展模式。

第 1 路游击队是 1933 年 11 月，以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为基础组建的，该支队同陕甘边红军一起作战月余，打了不少胜仗，部队由原来的 70 多人发展到 100 多人。为加强该支队的领导力量，陕甘边红

军曾派惠泽仁、魏武、康健民到该队担任领导。11月中旬，为执行开辟第1路游击区的计划，在总指挥强世清、政委魏武带领下，该支队离开东华池开赴陕北安定活动。后来，强世清、魏武、惠泽仁等人牺牲，原计划未能实现。

包家寨会议结束后不久，即1934年1月，在庆阳、合水、保安等游击队基础上，陕甘边第2路游击总指挥部在南梁成立，总指挥杨琪，2月高岗到游击队任政委。是年春，第2路游击队从保安县境沿洛河向东发展。至这年秋天，在西起方家河，东至石门子，以下湾寺为中心的百里大川建立起根据地，成为南梁根据地东区。这块根据地东进依托黄龙山，可发展甘泉、鄜县、宜川、洛川地区游击战争，直抵韩城，威胁关中；北去安塞、延安、延长，可与陕北游击区呼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第2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陕甘边特委领导和红42师的帮助下，先后组建了安塞4支队、甘泉5支队、延安支队、鄜县7支队、宜川8支队，到1934年秋，第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部队已有千余人。

1934年2月，按照包家寨会议精神，陕甘边第3路游击指挥部在关中成立，总指挥张明吾（后由王安民、陈国栋接任），政委黄子文（后由张仲良、张邦英接任）。第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初成立时，只有平子、枸邑、淳化、照金4个游击队，每个游击队七八人，多者30余人，总共有近百人枪。之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帮助下，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游击队处于劣势的情况，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运用偷袭和引诱敌人出来后进行伏击围歼等办法，避免打硬仗，以小胜积大胜，迅速打开了局面。同时，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下一些不堪豪绅地主压迫的农民群众，参加了游击队。同时，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组织哗变，弃暗投明，参加了

革命队伍。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战，到 1934 年秋，在耀县、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邠县、甘泉等地，先后组建了 14 个游击队，人枪扩大了四五倍，其中平子游击队在队长何秉正领导下，由最初的 8 个人，发展到三四百人。

为了壮大红军主力，1934 年冬，遵照红 42 师党委指示，从平子游击队抽调了 100 多人，编为红 42 师第 3 团第 3 连，另抽部分游击队员与彬县起义的民团王富贵部一起，编为第 4 连。这样红 3 团发展成为有 4 个连队建制的部队。

1934 年 7 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当前全国革命浪潮正在猛烈地向前推动，边区党的任务是“普遍的开展游击运动”，特委“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完成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同时要扩大四十二师为一军的号召”。

遵照陕甘边特委指示，9 月 19 日，红 42 师党委在正宁县湫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 42 师第 1 团，作为南区坚持斗争的核心力量。红 1 团是以第 3 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正宁 4 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抽调宁县第 3 支队、正宁第 5 支队一部组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步兵连，共 200 余人。第 1 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第 2 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后来又建立了 1 个骑兵连和 1 个步兵连。红 42 师第 1 团组建后，在红 42 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先后消灭了中部楼坊塬、雷庄等地的民团，摧毁了邠县、宜君、中部一带的国民党政权，开辟了洛川、宜君、中部游击区，直接威胁敌咸榆公路的运输线。

为充分发挥南梁东区这块红色区域的作用，扩大正规红军，10 月初，陕甘边军委和红 42 师党委在南梁阎家洼子宣布，以第 2 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 42 师第 2

团，任命刘景范为团长，政委胡彦英，参谋长王生荣，政治处主任朱奎。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约 180 人。后来又组建了骑兵排。第 2 团组建后，先后消灭了旦八寨子的曹俊章民团 50 余人，打败了国民党第 256 旅 512 团一个营的进攻，并配合第 3 团在头道川的新寨、白家屯消灭了王希清、王定邦民团。

不久，红 42 师又成立了师属独立营和警卫营，骑兵团也发展有 4 个连队。

1934 年 10 月，国民党军队集结大量兵力，进剿盘踞在黄龙山土匪武装。梁占魁匪部郭宝珊营随黄龙山土匪首领贾德功、梁占魁等向甘肃庆阳进发，准备接受国民党邓宝珊及马鸿逵的改编。到庆阳不久，郭宝珊率部离开。贾德功、梁占魁等人被邓宝珊和马鸿逵部队包围，贾德功被打死，梁占魁率少数人突围。

郭宝珊为人侠义正直，手下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为了争取他，刘志丹曾两次派黄罗斌，后又派马锡五去做他的工作，在他军饷困难、军心不稳时，给他送去羊、马等，以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共产党和红军的争取下，10 月 20 日，郭宝珊率部在庆阳城东 30 里的新堡宣布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来，郭宝珊在谈到他起义经过时说：

“在行军途中，曾碰到红军的骑兵部队，并没有向我们开火（当时红军想消灭我们是很容易的）……在我拉上部队没有什么去处的时候，碰到马锡五来慰问我们，刘志丹也派人给我们送了三匹马。这时我觉得红军对我还是不错，投了他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就下了决心投奔红军。”11 月 10 日，陕甘边党政机关在荔园堡集会，欢迎郭宝珊率部起义，郭宝珊部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归红 42 师指挥。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于振学任参谋长。下辖 3 个大队，第 1 大队队长段荣启，第 2 大队队长王东来，第 3 大队队长杨茂堂。

西北抗日义勇军组建不久，梁占魁、史老么、梁占庭、王老九、

刘占彪等人率其在庆阳突围的残兵败将 100 余人投奔红军，算作一个大队，称“独立军”，统归抗日义勇军指挥。但梁占魁等匪性不改，不服调遣，并预谋要消灭抗日义勇军，拉走部队重返黄龙山。红 42 师党委研究决定，由郭宝珊率抗日义勇军缴了他们的械，枪毙了王老九、史老幺，梁占魁、梁占庭兄弟二人和刘占彪乘机逃脱，不久，也被红军消灭。红军对梁占魁等下属人员进行了教育，愿参加红军的编入义勇军，其余的发放路费准其回家。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 42 师党委为改造义勇军的成分，补充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军，部队迅速扩大到 200 余人。同时派共产党员担任大队政委和中队指导员，在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干部战士进行了党的政策、新旧军队对比和纪律教育，给干部战士戒烟治病。义勇军随红 42 师所到之处，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情慰问，使这些过去打家劫舍的土匪体验到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和参加红军的光荣。经过整顿改造，西北抗日义勇军面貌一新，很快成长为西北红军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1935 年 10 月，郭宝珊由马佩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宝珊部改造成功，为改造类似的土匪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西北红军史上匪运工作一个成功范例。据黄罗斌回忆：“郭宝珊出身贫寒，曾当过长工，从山东流落陕西，参加了“‘绿林’部队，后当了营长。刘志丹曾派人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做他的工作。当国民党企图利用改编消灭他的部队时，他毅然决然地率部投奔红军，被编为抗日义勇军。后来这支部队经过我党的改造，成为一支很能战斗的部队。”

红 42 师第 3 团、骑兵团的不断壮大，第 1 团、第 2 团的成立，郭宝珊抗日义勇军的归建，使红 42 师兵力得到迅速扩大。由于大量游击队改编为红军，农民成分大量增加，迫切需要提高部队军政素质。红 42 师成立后，贫雇农占大多数，少数为工人、学生和国民党士兵、

民团团丁、绿林人员。1934年6月20日，红26军第42师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报告汇报了恢复红26军、成立红42师的经过，称：“部队的成分，工人占5%，雇农占50%，贫农占20%~30%，及其他成分占20%。因为部队工人成分很少，所以农民意识特别浓厚。”希望“中央无论如何在最短时间给四十二师派最得力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四十二师及各游击队”。

1934年7月，为提高红军的军政素质，《陕甘边特委关于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指出：“要扩大部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室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师、团设有党委，由杨森兼任师党委书记，连建有支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确立民主制度，坚持官兵平等原则；实行严格的纪律，制定了纪律“暂行条令十八条”，如规定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破坏武器者处死刑，强奸妇女者处死刑，缴获战利品不归公者处死刑等。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制定了“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的法规。这些纪律和法规的实施，保证了对人民利益秋毫无犯和为政清廉，深得根据地人民的拥护。

为了加紧教育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红42师成立时，刘志丹亲自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军事训练的教材。1934年10月，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了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后由刘景范接任），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龚逢春等任教员。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中的中

下级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干部。教学内容：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等；军事课有“制式教训”（基本动作）、“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等。此外还训练了 10 多个号兵。至 1935 年春，学校共举办了三期，培训干部 200 余人。后来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的一部分。

红 26 军的恢复和发展，壮大了陕甘边红军的力量，为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和西北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第八章 陕北崛起

在刘志丹领导红 26 军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在中共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领导下，在游击队发展壮大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27 军第 84 师，创建了陕北根据地，形成了与陕甘边根据地彼此呼应的有利态势。与红 26 军相比，红 27 军尽管成立较晚，但作为陕北地区的主力红军，是西北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形成做出了贡献。

一、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的创建

陕北是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东临黄河与山西隔河相望，北与绥远交界，西与宁夏、甘肃陇东接壤，南面是关中的渭北平原。这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辛亥革命后，长期为封建地方军阀井岳秀盘踞。1927 年 10 月爆发的清涧起义，打击了井岳秀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了陕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陕北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开展游击战争准备了组织条件。

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和胜利的消息在陕北广为传播，这对陕北的中共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929 年，为了建立革命武装，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西的党组织曾派许多优秀党团员到国民党军阀部队和民团中去做兵运工作，为开展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1930 年 4 月 15 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分析了陕北的政治形势，要求陕北特委加强党的领导，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变，进而“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伍”；强调指出“组织红军的主要路线，一方面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战争，夺取敌人武装，集中农民武装，而来武装红军；一方面还要加紧兵士运动，进行兵变。由兵变而组织的红军最有意义，最为重要，不特战斗力强，而且影响到敌人军队”。

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认为陕北党的工作有基础，可以做全省工作的中心区域，以绥德、米脂、清涧为中心，配合横山、佳县灾民斗争，并以延安、榆林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发动陕北游击战争。“在斗争中加紧游击战争的训练，在秋收斗争中转变成为游击队直至红军的组织。武装组织的基础，必须是贫农、雇农及农村工人中心，对于参加武装组织的分子应特别加紧政治教育与训练，以准备转变为游击队。”同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编制游击队，立刻开始游击战争”。由于时机不成熟，上述指示没有得到执行，兵运工作也没有达到建立红军的目的。此后，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12月，北方局特派员王芾南（王林）到陕北传达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宣布陕北特委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在山西不能立足，进入陕北，中共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派出几十名党、团员和青年参加。其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的创建和发展，在陕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1931年夏开始，中共陕北特委加强了农村工作，在各地建立基层党组织、秘密联络站和农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搞武器、买枪，或联络兵运人员，或搞民团的枪械，首先在延川、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南区等地开展了武装斗争。

1931年12月中旬，延川共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到榆林向中共陕北特委请示工作，要求夺取反动民团的武器，建立革命武装。陕北特委研究后，派刘善忠帮助高朗亭策划此事。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等4人携带香烟等礼品以慰问为名，前往清涧县淮宁湾雷雨珠山寨子民团驻地。当时民团团总不在，团丁十分大意。就在他们抽烟谈笑之时，刘善忠、高朗亭等人将民团的6支枪缴获。第二天，在上田家川村，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

长，高朗亭任政委。游击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延川、清涧、安定、绥德、延长、延安等县，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

4月18日拂晓，中共延川县委领导延川游击队，在群众配合下，袭击了永坪镇民团，活捉了永坪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焚烧了区公所的税捐档案，缴获步枪17支。当天，中共延川县委在永坪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宣布将延川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任司令员，高朗亭任政委，杨作栋任参谋长（后叛变被处死）。部队迅速发展到了70余人，30余支枪，编为3个中队。先锋队利用永坪镇的延川县立第3高级小学的油印机，印刷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明军律》各200余份，广为张贴，还张贴了没收基督教会牧师吕仙笙和高利贷者刘光明的布告，宣布全区人民免交捐税。

西北先锋队在永坪活动了一天，傍晚准备撤出时，突遭瓦窑堡驻敌2个连的骑兵袭击，部队猝不及防被冲散。第二天，刘善忠、高朗亭和部分队员在田家川会合后。20日拂晓，他们来到距永坪镇15华里的一座叫姐姐圪堆的山上，将西北先锋队的军旗插到山上真武庙顶上。失散的队员望见军旗陆续奔上山来，到22日下午整队点名时，除一个受伤被俘的队员未到外，西北先锋队队员全部归队，另外还增加了3名新队员。在全体队员大会上，刘善忠检讨了自己组织指挥方面的失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号召大家振奋精神，去迎接新的战斗。随后，部队向绥德县田庄方向进发。4月底，西北先锋队发展到100多人。不久，刘善忠、高朗亭各率部分队员分开行动。5月20日，混入先锋队的哥老会分子董凤清等人将刘善忠杀害，叛变投敌。第二天，高朗亭收集了刘善忠所带的分队，被指战员公推为司令员兼政委。6月初，部队在延长县梢沟宿营时，与高岗、党益三率领的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第2大队1个中队会合。高岗等人当时是在临镇战斗中与

刘志丹指挥的部队失去联系，正在寻找陕甘游击队主力。这时，先锋队约有 80 人编为 2 个中队，经高岗动员，与他们一起寻找刘志丹。后来，与陕甘游击队会合的计划没有实现，在辗转战斗中，西北先锋队只剩十几个人和十几条枪，只好返回延川、安定、清涧之间的游击根据地。

7 月，西北先锋队进行了教育整顿，肃清了哥老会成员。10 月初，为加强对部队的领导，中共陕北特委派马明方等进一步整顿了部队，并将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9 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规定其任务为：“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造陕北新苏区。”同时成立中共支队常委会，马万里任书记。

第 9 支队组建后，在安定、清涧、绥德、延川、延长一带活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打击土豪劣绅和收税、收款的官吏。1933 年 2 月 9 日，第 9 支队在安定县栾家坪秀延河桥伏击国民党安定县长刘述明，将其击毙，并将第 9 支队的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及显眼地方，迅速撤离。敌县长被打死的消息传出后，在敌人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4 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将第 9 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任命强世清为支队长，李成荣为政委，领导延川、延长、安定地区的群众，公开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斗争和摧毁反动保甲制度的斗争。

游击队的活动引起陕北国民党地方统治者的恐惧，驻安定的国民党驻军和民团加紧对游击队的围攻，使游击队无法在陕北立足。5 月，强世清率陕北第 1 支队南下陕甘边，与红 26 军会合，配合红 26 军攻打枸邑县城，补充长枪 50 余支，战后，红 26 军派杨重远为第 1 支队政委，强世清与杨重远率队返回安定，5 月 29 日，在安定县谭家与瓦窑堡敌军发生战斗，杨重远牺牲。

第1支队返回陕北后，不断出击，杀死玉家湾北一区区长，袭击北二区区公所。活动范围由安定县西区、北区扩大到东区、南区和横山县边界。部队发展到50余人，4个分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第1支队在强敌进攻面前，十分被动。9月，红1支队被迫再次南下陕甘边，经枸邑时与红26军第4团会合。第1支队配合红26军攻打陕西枸邑县张洪镇，化装成民团冲进镇内，歼灭守镇民团10余人，活捉国民党县长。随后，又配合红26军主力攻入甘肃合水县城。

陕甘边包家寨会议将陕北第1支队改称第1路游击队，强世清任总指挥。1933年11月7日，部队得到补充，返回安定。11月20日，游击队向国民党枣树坪驻军发起进攻，由于敌情不明，被敌包围，遭受较大伤亡，部队最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战斗中，总指挥强世清身负重伤。12月15日，因叛徒告密被捕，1934年3月4日在安定县城惨遭杀害。

枣树坪战斗后，游击队向北转移，在延安北区文家铺与敌民团遭遇，作战再次失利，魏武牺牲，部队进入安定北区，由白德胜代理队长，张承忠代理支队政委。随后，在延长关庄又遭袭击，部队被打散。1支队返回安定北区时仅剩10余人，遂埋藏枪支，转入地下分散斗争。

至此，陕北第1支队遭到暂时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安定县，敌人疯狂报复、屠杀革命者，安定县监狱被敌人抓进二三百名革命同志。白德胜及其爱人陕北第一个游击队指导员、19岁的共产党员任志贞被捕，一起被敌人杀害。临刑路上，白德胜和任志贞威武不屈，一直高呼“共产主义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在瓦窑堡南门外英勇就义。

陕北革命斗争困难境况，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石心）到天津，任中央驻北方代表，主

持北方地区工作。陕北特委改归其领导。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北方工作。到天津后，又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18师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到北平。11月，孔原派谢子长回陕北任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以加强陕北武装斗争的领导。不久又派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参加陕北特委工作，分别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同时，派杨濮回陕北任北方代表驻西北政治特派员。杨濮回陕北后被捕叛变。

1934年1月下旬，谢子长回到陕北，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立即着手恢复红1支队的工作。他找回原1支队失散的队员，取出了隐藏的枪支，在安定西区山沟的窑洞里对游击队员进行了培训，帮助大家总结失败的教训，鼓励大家东山再起，恢复红1支队。

经过一段艰苦努力，3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在安定刘家圪崂正式恢复，李胜堂任支队长，刘子清（后叛变）任政委，谢绍安任副支队长，以安定西区的李家岔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在谢子长领导下，红1支队不断取得作战胜利，声势渐大，建立了安定、延川游击根据地。6月，窑子砭战斗胜利后，红1支队发展到50余人枪，谢绍安任队长，贺晋年任政委。

二、陕北游击队的建设与发展

早在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给陕北特委指示中，就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队的建立做了全面指示：“陕北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策略是：领导农民反捐税与抗租抗债的斗争，开辟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在这一基础上去组织地方暴动，巩固苏维埃阵地。”

“依据游击战争的便利……以中部、延安、榆林、靖边为4个游击区域。”“集中农民武装，选择积极勇敢的失业工人、雇农、贫农编制游击队（2至4小队为1中队，2至4中队为1大队，三五人一支枪，

不必一兵一枪)，立刻开始游击战争。目前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是进攻的，在战术上仍可活泼地运用朱、毛游击战术。各个游击队之间，必须有中心队伍，有集中的指挥，统一的行动。游击队必须有明显的行动纲领，应当包[括]苏维埃政权与当地群众迫切的要求，公开地普遍到群众中去宣传，并且应当特别努力于群众工作。”“游击队的分子，必须在斗争中加紧政治军事训练，使每个游击队都成为群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游击队所到之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分粮，不交租债，焚烧契约田界，消灭敌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以至召集群众大会，群众代表会，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在游击队中应当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培养一部分最积极的勇敢的分子，准备在深入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适时地创造红军。”上述指示，涉及游击队的编制、战略战术、军政建设、任务诸方面，对以后陕北游击队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由于当时陕北地区尚不具备建立游击队的条件，而且当时中共陕北特委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兵运工作上，企图通过兵运工作，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因此，上述指示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高起家圪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陕北的社会基本情况、革命斗争形势，根据红1支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阐述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明确提出了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会议决定将陕北划分为3个游击区域，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3支队分别在安定、绥清、神府3个地区活动，扩大和建立游击队；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崔田夫为书记的新的中共陕北特委。

高起家圪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红军游击队的方针，标志着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对创建陕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结束后，特委委员分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陕北地区创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迅速展开。

1934年1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南圪村召开党、团联席会议。郭洪涛传达了北方代表对陕北工作的指示，指责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慑于上级领导的权威，中共陕北特委虽然没有拒绝北方代表的指示，但决定按高起家圪扩大会议精神，继续加强第1支队，发展第2、第3支队，在绥、米、葭、吴新建第4、第5支队。

由于陕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共陕北特委于1934年4月上旬，在葭县南区神堂沟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为创建一个红军师而斗争；扩大游击根据地，并进而连成一片；把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南圪村、神沟堂会议的召开，推动了陕北红军游击队发展。

陕北游击队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分布广泛。陕北游击队建立时，南方各战略区红军已有相当规模，相邻的陕甘边地区游击战争也有了一定发展，并成立了具有正式番号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与之相比，陕北游击战争发展相对比较滞后，其重要原因是：客观上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多年经营，统治较为严密，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初期，特委机关一直辗转于米脂、榆林、绥德等县城内，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危险。主观上因为陕北的中共党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仍把工作的重心和注意力放在兵运工作上，忽视了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和游击队的建立。因此，游击队建立的较晚，规模也不大。但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建立以后，特别是中共陕北特委高起家圪会议后，由于明确了方针，

加上各级党组织的重视，陕北的游击战争迅速得到发展，各地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主要成立情况及分布如下：

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1933年7月初，清涧共产党员王聚德等人缴获敌人3支驳壳枪。8月5日，由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崔田民主持，以王聚德的3支驳壳枪为基础，在清涧东区王家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支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第2支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绥德、清涧边界一带。成立不久，即镇压了绥德南区区长薛运通，出示布告历数其罪行，宣布没收其财产，将没收的银元、元宝等一半送陕北特委作活动经费，一半留支队购买武器弹药，扩大了游击队的力量。1934年1月21日夜，第2支队在第1支队的配合下，由白雪山率领，冒雪袭击清涧县解家沟，杀了9个半豪绅和收款员（其中一个杀而未死，故称半个）。这一行动，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绥德边界一带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当地群众很快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二十三年世事乱，起了红军闹共产，红军的头头白雪山，一心要在解家沟把工作办，一黑夜杀了九个半。”

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1933年秋，中共神木南区区委根据陕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建立游击队问题进行了充分酝酿，10月18日，在尚家岙成立神木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同年11月7日，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以神木特务队为基础，加上陕北特委送来的3支枪，在神木县松树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支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队员近20人，有枪五六支。第3支队成立后，领导内部在活动方式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游击队力量弱小，不能与敌人硬拼，不能让党组织和群众受不必要的损失和牵连；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干共产党红军，就不能怕这怕那，应该和敌人公开大干，不要怕群众受损失，受了损失可以逼他们起来造反。

分歧影响了支队领导的团结。为解决两种意见之争，陕北特委派高朗亭任第3支队队长，刘晓春任政委，调马万里和王兆相回特委工作。不久，神木县委书记贾怀光任政委，王兆相返回游击队继任队长。1934年1月，第3支队在沙坡西沟、呼家庄、红交寺等几个地方镇压土豪、收款员，声振神、府、葭3县。

陕北游击队第4支队。1933年1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张达志、马佩勋等人在吴堡县樊家圪坨成立抗日义勇军，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1934年2月6日，义勇军袭击葭县木头峪民团获胜，杀死民愤很大的团总张东蛟，使国民党地方当局不敢下乡催粮催款。2月15日，吴堡抗日义勇军在樊家圪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4支队，支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辖两个分队，20余人，8支枪。第4支队成立后，制定了军纪，进行了教育整顿，开始在葭县南区、吴堡、米脂东区和绥德北区一带活动，开辟了葭吴绥米边游击区。3月7日，第4支队第二次攻打木头峪，处死3个向敌人告密的反动分子，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活动。随后，开往清涧，与第2支队会合，袭击清涧县店子沟李成善民团，取得胜利，缴枪10余支。

陕北游击队第5支队。1933年5月，中共绥德县南区区委成立王家沟游击队。是年冬，绥德中共党组织发动王家沟、铁茄坪一带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杀死了当地的豪绅、衙役、区长，获得部分资金，买了6支枪。翌年4月下旬，经中共陕北特委批准，绥德县委以王家沟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5支队，支队长崔正冉，政委马万里，配合2支队开辟绥德、清涧、延川东区游击区，绥德南区遂成为该县的中心苏区。

陕北游击队第6支队。1934年6月，葭县特务队成立，队长郭玉人，政委樊文德。不久，以葭县特务队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6支队，支队长郭玉人，政委樊文德，活动在葭县和米

脂边界地区。是年冬，高桂滋部 1 个排长起义，带来 13 支步枪，1 挺轻机枪，交给第 6 支队。游击队士气大增，部队发展到五六十人。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特别是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陕北特委又陆续新组建了一批红军游击队。据崔田民回忆，到 1935 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所辖游击支队已有 25 个，分布情况如下：

第 1、第 16、第 20 支队在安定地区；第 2、第 5、第 12、第 14 支队在绥、清地区；第 3、第 7、第 11 队在神府地区；第 4、第 6、第 15、第 21 支队在葭县、吴堡地区；第 15 支队在米脂地区；第 23 支队在米西（今子洲）地区；第 8 支队在横山地区；第 9、17 支队在延川地区；第 10、第 13、第 22 支队在靖边地区；第 12 支队在安塞地区；第 18 支队在延安地区；第 19 支队在延长地区。以上各支队的番号，只编到第 23 支队，其中有两个第 12 支队，两个第 15 支队。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和壮大，使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同时也为在陕北建立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红军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陕北各地游击队成立后，针对队员素质较差的状况，在中共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除了部队编制为游击队的形式外，基本上是按照正式红军的要求，开展了部队军政建设，为建立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红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4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起草了《关于陕北游击队的工作与创造新苏区问题致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信》，分析了整个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肯定了一年来陕北党和游击队发展的成绩，批评了存在的不足，从 7 个方面对游击队的工作与创造新苏区的问题作了指示。其中涉及游击队的建设问题，有如下几点：

第一，要求党“立刻动员起来，到广大群众中去与他们打成一片，领导与组织他们的一切斗争”，强调“在游击区域内，党的任务，不

是对于组织真正红军或创造几个地方苏维埃政权口头上的空喊，而是真正地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去，领导他们从斗争中来求得实现”。提出要在群众斗争中扩大现有的游击队，反对关门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

第二，关于游击队的军政建设，提出：“在发动群众斗争与猛力扩大游击队中去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强的无产阶级骨干，提高游击队的政治军事水平。只有这样，游击队才能得到巩固，以便将来为创造红军的任务而斗争。”并提出了5条具体意见：

（一）关于实现党对红军游击队绝对领导问题，指出“首先需要树立党的坚强的领导。游击队应该是在特委掌握与领导之下，特委应肃清过去随便派人到游击队作政治委员的现象，选派最好的同志到游击队去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与骨干”。要加强游击队中党的支部和共青团组织的建设，要求“每个游击队中应建立健全党的支部与团的小组（团小组在党支部领导下工作），经过地方党部的领导与游击队中的政治委员去加强对于现有的党支部工作的领导。党的团的组织任务是提高游击队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游击队纪律与战斗力”。明确了政治委员的地位、职责和权限，指出“在游击队中的政治委员，是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每个政治委员的任务是执行与完成党的决定，经常地去进行与领导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监督军事长官的行动。在非党群众的军事长官的游击队里，一切命令没有政治委员的签字，应该是不发生任何效力的”。这些意见和要求符合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对于确立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有重要意义。

（二）号召彻底改造游击队的基础与成分，并说明这“是目前巩固游击队的中心任务之一”。要求“以阶级标准来确立巩固游击队的组织。一方面要在斗争中吸收广泛的群众来参加游击队，另一方面应保证贫农雇农与工人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改造目前恶劣基础与成分的游击队”。鉴于西北地区复杂的社会情况，陕北游击队和陕甘边地

区游击队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复杂成分。加强对游击队成分的改造，无疑对建立无产阶级性质军队有重要作用。

（三）加强游击队的军政训练，提高游击队的军政素质。关于游击队员的政治教育工作，指示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如：“经常召集队员大会与讨论会，在操演时野战时做关于政治问题的报告。在游击队中建立读报小组，指定同志念报给群众听，做简单关于政治问题的解释。设列宁棚，将党的书籍、文件、报纸与游艺品有规律地陈设起来，让每个队员充实他的政治生活。编辑各样壁报与随军墙报，在政治委员领导下，吸收队员参加通讯与编辑工作，有计划地经常出版。以及经过队员群众的游艺组织，来提高与加强游击队员的政治文化水平与战斗的生活。”

来信要求提高游击队员的基本军事素质，“在军事技术上，必须使得每个游击队员了解使用武器中的常识（如擦枪、修枪、瞄准射击，利用地形旗语绘图与避免新式武器的攻击，新的现代化战术等），尽可能地节省械弹，坚决纠正过去只埋头放枪耗费子弹、枪械的现象”。

（四）要求游击队实行严格的纪律。指示信认为“建立游击队中的纪律是巩固游击队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游击队的纪律应“建立在队员的政治了解与自觉的基础上，应使每个游击队员有坚决特性与顽强的战斗的精神”，“使每个游击队员从政治经验与生活中相信党的路线的正确，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游击队的纪律”。

（五）陕北游击队应“按照以前中央军委关于游击队问题的指示正确的编制起来”，名义为“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同时准备以最巩固的成分、战斗力最强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起正规的红军。

第三，指出了陕北游击队的发展方向及战略战术。指示信说：“坚决反对游击队无固定的行动方面，东奔西突地为提枪工作而游击的现象。目前应以现有的基础为根据地（首先就是安定、清涧、绥德

边区、神木与吴堡）向保安发展”，然后“集中力量向南发展，牵制敌人对川陕边区红军的进攻，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依据于适当的政治条件，来争取陕西苏维埃的胜利”。

关于游击队的战术，来信要求陕北游击队研究“第一支队与红二十六军过去在军事上、战术上的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必须记着最基本的战术，机密的审慎的准备神速而突然的袭击”，“避免不胜任的硬战”。

第四，关于游击队的基本任务，来信指出“除了以武装力量打击与消灭国民党军队以外，更要用全部工作人员与政治机关作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同时，指出了瓦解敌军工作的重要性及方法。

此外，来信还就创建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游击区开展拥护游击队的群众运动等问题作了指示。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这封指示信，其主要内容符合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较全面地提出了红军游击队发展和建设的主要问题，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正规红军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和陕北各红军游击队的实际，中共陕北特委加强了共产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每个支队都设有政治委员，建有中共党支部和队委会，各游击支队直接受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和当地县委发生横的关系。

为解决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的武器问题，除了主要靠作战缴获外，一些县、乡还建立了兵工厂。1934年秋，在吴堡县北区、清涧县刘家山分别成立了兵工厂，生产土造枪支武器，以补充新式武器的不足。

三、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使陕北军阀井岳秀十分恐惧。为消灭陕北红军游击队，并配合陕甘两省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

“围剿”，1934年5月，井岳秀命令所部第86师第256旅、第258旅各一部，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对陕北的安定、清涧、神木三个游击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国民党军以连排为单位，采取分散多股，逐村蚕食推进的战术，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摧毁游击根据地。

当时，陕北地区只有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等游击队和一个义勇军，人枪共300余，在兵力数量上、装备上都远不及敌军。为粉碎敌军的“围剿”，中共陕北特委确定了“适时地集中兵力，配合游击队，各个击破敌人；加强士兵工作，瓦解敌军，争取里应外合”的方针。

为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集中力量，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坚决击退敌人进攻，保卫根据地，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扩大会议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杨道峁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7月中旬，谢子长指挥第1、第2、第5支队，在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安定城，打开监狱，释放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缴获了一批物资。这是陕北红军游击队成立后攻克的第一座县城，这一胜利，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斗争情绪，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由于陕北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1934年7月，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及赤卫队200余人，南下陕甘边，以取得红26军的帮助，支持陕北反“围剿”战争。7月25日，陕北游击队与红26军第42师在南梁阎家洼子会合。后来，贺晋年在纪念谢子长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谢子长，刘志丹老战友重逢，非常高兴。陕甘边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和红42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热情慰问陕北来的战友。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

农民主政权建设和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 42 师和陕甘边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还给陕北游击队赠送了三十多支步枪。这些活动充分表现了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位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和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和亲密的战斗友谊。”

7 月 28 日，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红 42 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红 42 师师长杨森介绍了部队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建设情况；会议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 26 军的两封指示信。这两封信“因受当时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不顾客观事实地把红 26 军坚持游击战争，为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信中指责红 26 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与会者“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还不知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但都感觉到那些空洞的议论，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所以，大家对那两封信，没有进行议论，会议中心则集中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会上，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对陕甘边党、政、军工作进行了部署，决定红 42 师第 3 团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行动，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第一次“围剿”；请求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调高岗到上海临时中央局学习受训（后未去），由谢子长兼任红 42 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

阎家洼子会议对于加强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联系，促进两支红军的战略协同和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谢子长回到陕北，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陕北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局面大为改观。他带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一路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和不断胜利，在陕北人民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在陕北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县，“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南下陕甘边后，为了保护国民党军“围剿”区域的麦收，中共陕北特委将第4支队从佳县、吴堡调到绥德、清涧地区，并在各个山头上设置岗哨，监视敌人的行动。游击队白天保护群众麦收，晚上袭扰敌人，使敌人十分疲惫和恐慌。7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8支队在安定李家川村成立，栾新春任支队长，刘明山任政委，贺吉祥任副支队长。

8月15日，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和红26军42师第3团，返回陕北根据地安定县西区。针对敌人的军事部署，谢子长决定红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指挥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与王世泰带领的红42师第3团联合作战。

8月17日，驻安定石湾的井岳秀第86师515团1个连向陕北根据地进犯，窜入安定西区景武家塌。谢子长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这股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敌。次日拂晓，由红42师第3团担任主攻，首先从景武家塌东北面山头上冲了下来，占领了景武家塌的塆畔山，堵住了敌人的退路。贺晋年带领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从东南方向冲进了村子。敌军突出村子，拼命向山上爬，被红3团用手榴

弹打了下来。敌军向北突围，又被陕北游击队打了回去，压到沟底。有十几个漏网的敌人向南逃窜，被游击队追上全面消灭。这一仗，陕北游击队和红3团南北夹攻，毙敌30多名，俘80多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支。

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陕北人民的胜利信心，小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活动，安定县的形势大为好转。这次战斗后，红军在玉家湾稍加休整，然后挥戈东进。经过南沟岔、老君殿，于8月22日到达绥德南区的张家圪台。敌军驻店子沟515团1个排扑来，红军立即还击将其歼灭。敌人见红军占领张家圪台，急令薛家崾515团1个连前来增援，被红军击溃。

张家圪台战斗结束后，红军进到袁家沟附近。此时，中共清涧地下党组织派人请求红军拔掉敌河口镇据点。河口镇地处无定河和黄河的交汇处，敌86师3营1个连和一些地主武装驻守在这里，是清涧、延川守敌的一个战略支点，对红军游击队活动妨碍很大。谢子长同意地下党的要求，决定消灭该股敌人。

8月26日深夜，谢子长率红42师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冒雨从袁家沟出发抵达河口镇。河口镇背靠大山，两面临河，地势险要。27日拂晓，战斗打响。红3团担任主攻，从山顶直扑敌阵。陕北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截断敌人东逃后路，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敌军见红军攻势凌厉，急忙退进几个碉堡和村边工事里，凭坚固守。由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数次组织进攻未果。谢子长指挥位置原在高山顶上，见攻坚未克，亲到前沿查看地形，被敌人从碉堡中射出的子弹击中胸部负伤。后来，黄罗斌回忆谢子长负伤的经过：“谢子长同志和我在一连阵地上，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李德胜同志和清涧县某区的一个区委书记（名字记不清了）。该区委书记身背装有标语的书包，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他沿着阵地的掩体，半跪着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打

人!’话音刚落，敌人一枪打过来，他当即倒地牺牲了，与此同时，谢子长同志也负了伤。这是敌人的同一颗子弹。由于我们几人处在同一侧面的直线上，该区委书记同志在前边喊话，我们另外 3 人在背后斜着身体观察。子弹过来后，穿过区委书记的身体，在我的前襟上穿了个洞，又打掉了李德胜同志上衣的一颗扣子，然后在谢子长同志的胸部横擦而过。”

红军与敌激战竟日，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困难。谢子长负伤后，其他指挥员考虑一时难以打下该据点，经商量决定红军撤出战斗。河口国民党守军怕红军再来进攻，第二天逃进清涧县城，河口镇遂成为苏区。

河口之战结束后，红军游击队北上攻打横山县董家寺，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营。

谢子长率游击队返回陕北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经过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和董家寺战斗，拔掉敌军 3 个据点，毙敌 200 余人，俘虏 100 余人，缴获步枪 100 多支。与此同时，活动在神府、佳吴地区的陕北游击队第 3、第 4、第 6 支队也积极作战打击敌军，不断取得胜利。敌人只得收缩兵力，改变以营连为单位作战，以团营为单位守据点，各据点深挖沟，高筑寨，断山梁等，加强防御。这样，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对陕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被粉碎。

1934 年 9 月，完成北上支援陕北游击队作战任务的红 26 军 42 师第 3 团奉命返回陕甘边归建。

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抵制了“左”倾路线的干扰，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特点，组成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集中兵力，形成我对敌局部之优势，各个击破，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榆林城国民党的《上郡日报》1934 年 8 月 31 日载：“近日陕北驻军多被赤匪缴

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正是谢子长等人的正确指挥，使敌人对红军无可奈何。

2.得到红 26 军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尤其红 26 军第 42 师第 3 团直接参战，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同时也说明陕北根据地建立正式红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作战。陕北红 1、第 2、第 5 支队南下后，绥、清地区各游击小组、赤卫队配合红 4 支队实行坚壁清野，各村巡逻，封锁敌人，捕捉敌探。同时，在各山头设置岗哨，监视敌军。河口之战，根据地群众主动给红军修路、送粮、送饭，赤卫队和赤少队也手持大刀长矛，积极参战，给敌以较大威慑。

4.红军游击队官兵的英勇奋战，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河口之战，谢子长身先士卒，亲临火线，英勇负伤，为广大指战员做出了表率。

5.积极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国民党军队不断哗变，也削弱了敌军力量。

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保卫和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红军游击队进一步积累了实战经验，技术战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为改编为正式红军创造了条件。

四、陕北根据地的创建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随着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逐步建立起来的。与其他地区不同，由于陕北正规红军成立较晚，陕北根据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先通过游击队开辟若干小的红色游击区域，然后由点到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过程中，游击队起了重要作用。

1934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提出开展武装斗争，使苏区联成一片，建立革命委员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5月，游击区域和游击队代表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决议》提出，“巩固与发展游击区域，一直到创造新的苏区”，“在陕北很快地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府，统一军事行动”。

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兵力，退守较大的据点。1934年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寺塬里召开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案》，决定利用敌人尚未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之前的时机，要求陕北共产党组织抓紧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开展土地革命。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决议案》中有关土地政策规定，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后来，在实施中调整为参加革命的地主、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可以同农民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

红军军事上的胜利，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创造了条件。许多分散的红色村庄逐步联成几个小块根据地，县、区、乡革命政权纷纷建立，到1934年10月，陕北地区已建立神木、葭县、吴堡、绥德、安定6个县级革命委员会。各县革命委员会设有土地、粮食、经济、军事、肃反、文化教育、劳动等委员及秘书长。改建为苏维埃政府后，各委员改称部长。到1935年1月，除神府、葭县边苏区外，葭吴绥米边界苏区与绥清边界苏区（包括延川一部分）联成一片，进而绥清苏区与安定苏区（包括安塞、靖边、横山、绥德、米西各一部）联成一片，并向延长、延安一带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1935年1月29日～31日，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陕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通过了《陕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土地法》、

《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1月31日，数千群众集会，热烈庆祝陕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5年，陕北根据地正式颁布了《土地法》。

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展开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各级政府发动群众，领导贫苦农民继续开展土地分配运动，颁发土地证；组织群众，成立青年团、互济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进行扩红、优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发展根据地经济，组织生产，成立了贸易局，开展贸易，发行货币（纸币），建立财政制度；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兴办了列宁小学、农民夜校和识字班，普及文化教育并辅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工作。此外还印发了不定期的《赤色西北》报。

为动员人民支持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从1934年底到1935年初，土地分配工作在安定、葭县、吴堡、绥德、清涧、秀延、神木等县普遍展开。虽然执行了“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等“左”的政策，但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它废除了陕北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地主豪绅在陕北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田租、粮款、捐税负担，特别是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1934年10月15日，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报告中指出：“苏区的劳苦群众参加分配土地的斗争异常热烈。这些群众的斗争形势直接地普遍、开展了陕北的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红军与白匪作战时，经常有几百几千的农民武装配合，游击队、红军不论需要多少农民配合，随时就可以号召来，甚至农民一听见枪声自动地跑来帮助红军作战，这一顺利的客观形势直接地创造了陕北新红军与苏区。”

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时，陕北根据地已有安定、吴堡、清涧、秀

延、靖边、横山、绥德、延川、延水、延长、葭县、佳芦、米脂、米东、米西、神木、神府等 17 个县，共 40 万人口。其范围东滨黄河，西迄白于山，南临延河流域，北依长城沿线。这一区域，除县城和几条交通大道被国民党控制外，广大乡村、集镇都为红色区域。

五、红 27 军第 84 师的成立

陕北革命形势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正式的红军。1934 年 5 月初，陕北各红军游击队及游击区域代表在葭县王家畔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总结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后陕北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陕北建立正规红军的要求及原则：

责成各支队于最短时间完成创造 1 师红军的任务，继续创造 2 师以至 1 军的任务。

1.各支队大力地号召工人雇农贫农参加部队、联合赤卫队，要广大的劳苦群众解除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每支队要完成 1 团的任务，按照红军的编制，3 班 1 排，3 排 1 连，3 连 1 团，3 团 1 师，于最短时间完成 1 师人的任务。争取陕北创造新苏区的 1 县与数县的首先胜利，作有力的实际的配合南方红军的英勇斗争，扰乱敌人的后方，以粉碎敌人的绝望的五次‘围剿’。

2.号召勇坚决的青年工人雇农参加红宫，建立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每团红军中完成 1 连少年先锋队的任务。

3.陕北各支队现没有总指挥部的组织，联合共同建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组织，以便指挥各支队的行动。

4.在红军中与游击队中要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党必须派忠实可靠与有能力的党员，[担任]游击队与红军中的政委、政治指导员以执行党的策略与路线，严重地注意红军中和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

5.红军中与游击队中必须注意到成分问题，大批的工人、雇农、

贫农参加，坚决地淘汰土匪流氓及一切不可靠的分子。

6.红军组成以后，固然要运用游击战术，但同时要练习平原战，锻炼成真正的工农红军，加强他们的战斗力，以胜利完成创造陕北新苏区的伟大任务。

7.在 1 师红军的任务完成以后，必须要普遍地开发游击战争，与红二十六军取得军事联络，以期完成军事上伟大的胜利。

8.红军和游击队内要加强党与团的领导，形成真正的工农红军。团在红军中必须是党有力的帮手。红军和游击队里，要严重地注意政治教育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加强红军的战斗力。

上述决议表明，随着陕北地区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建立正式红军的要求已列入中共陕北特委的议事日程。虽然当时各游击支队力量较弱，尚不具备成立正式红军的条件，这一决议对推动游击队的发展，加紧建立正式红军的准备工作，并确保共产党对即将成立的陕北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提升陕北红军及游击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游击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后，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经过反“围剿”作战，陕北红军游击队得到了锻炼加强，成立正式红军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34 年 8 月 28 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塬里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案》，决定扩大赤卫军、少先队和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分配土地；正式成立陕北红军独立师，将陕北游击队第 1、第 2、第 3 支队扩编为陕北红军独立第 1、第 2、第 3 团，同时组建新的第 1、第 2、第 3 支队；成立陕北游击队第 9 支队。会后，特委书记崔田夫赴天津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请示工作，要求派干部加强陕北的工

作，并给陕北正式红军番号以统一陕北的红军组织和领导。

根据寺塬里会议精神，1934年9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其所辖各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11日，中共陕北特委“责成二、三支队于最短期间，立即各完成1团红军的任务”。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9月18日，陕北游击队第1、第8支队在安定崖窑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1团，团长贺晋年，政委刘光（不久马佩勋接任），参谋长路文昌。辖步兵第1、2、3连和骑兵连，共200余人，枪近百支。谢子长带着伤病出席了红1团成立大会。会上谢子长讲了话，并亲自给红1团授了旗。在红1团成立的同时，又组建了新的第1支队，支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同日，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在神木王家庄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3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镇西。辖第1、第2连和先锋连，共200余人，枪百余支。同时组建了新的第3支队。

11月4日，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在清涧县东区大马家山（一说为小马家山）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2团，团长郭育仁（任三），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化名马三）。辖第1、2、3连和学兵连，约300余人，枪百余支。随后成立了新的第2支队，支队长惠安良，政委惠爱胜。这样，在短短1个多月时间内，陕北就组建了3个红军正规团。当时，未建立师部及任命师级军政主官。各团在中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下独立活动。

陕北红军独立师第1、第2、第3团成立后，积极作战，不断取得胜利。1934年9月28日，第1团和陕北游击队第8支队、第13支队配合攻克靖边十里嘴崖窑敌军据点，缴枪7支。10月15日，第1团一部和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及第13支队攻入安定县城，打死民团团总李丕成，缴枪10余支，子弹千余发及部分物资。1935年1月19日，第1团与陕北游击队第9支队会合，在延川县青坪川王家圪

垱歼灭延川县民团，击毙团总刘广汉，俘获民团团总高善亭及团丁 200 余名，缴枪 200 余支。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第 1 团连续作战，将横山、安塞、延安苏区逐步连接起来。第 2 团成立后，策动清涧东区地主武装、大刀队哗变，成功扩大红军 200 余人。

第 3 团成立后，在府谷等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34 年 9 月，国民党军对陕北神府苏区进行“围剿”。井岳秀第 86 师第 258 旅两个团，对陕北红军独立师第 3 团，实行“围堵”和“追剿”。陕北独立师第 3 团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直捣敌后府谷北区重要集镇哈拉寨，消灭当地民团，处决联保主任。敌军尾追而至。红军避其锋芒，甩开敌人，南下葭县，同敌人兜起圈子。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忽东忽西调动敌人，把敌军拖得筋疲力尽。这时，驻万户峪敌 86 师第 512 团第 8 连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德超率领下起义，加入红 3 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军不得不于 11 月底结束了“围剿”。

对于陕北红军独立师的成立，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及时作了指示。1934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同意关于建立红军独立师的请求，指示“把游击队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成分最好的部分编成正规的红军”。首先完成“红军的独立师，”并给予陕北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 27 军的番号，要求陕北红军“真正按照红军的编制组织起来，保障其中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的骨干”。中共河北省委也于 10 月 22 日发出指示信，要求陕北特委在“广泛组织群众的武装，加紧锻炼这些武装的基础上，把阶级成分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游击队、少先队、赤卫队，组织成正式的红军”。指示信指出，“红军是否是红军，不能只是决定在他们的名义上，而最主要的决定在他们的战斗力，政治觉悟，阶级成分与党的领导人”。要求陕北特委，“首先集中力量来健全安定的 1 团红军，

依照这一基础成立红军师”。1934年10月15日，中共陕北特委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报告中汇报了红军独立师的组成和游击队、赤卫队的发展情况，请求“中央派红军中的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各1人以上，担任[陕北]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急需，“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请送来”。并就陕北红军独立师的编制问题，向中央作了请示。

1935年1月30日，在安定县白庙岔陕北红军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隶属中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第27军只宣布军的番号，未建立军部，也未任命军一级军政领导。但成立了红84师师部。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下辖第1、第2、第3团，由陕北红军独立师第1、第2、第3团改编而成。不久，活动于葭县、吴堡地区的第6、第15支队合编为陕北红军独立第5团，团长王士杰，政委慕生忠。辖第1、第2、第3连，共180余人。因第84师第3团长期在神府地区活动，遂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第3团（又称神府独立团），将陕北红军独立第5团改编为第84师第3团，纳入84师建制。至此，陕北已有1个师的主力红军，1个正规独立团，几十个游击支队和2万余人的赤卫军。

同红26军第42师和陕甘边主要作战对象国民党军42师番号一样，红84师的番号与其在陕北的主要作战对象之一，刚刚从河南调入陕北参加“剿共”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部相同，其目的都是为了在部队行动时迷惑敌人，隐蔽自己。对此，国民党军也有认识，1935年3月，国民党陆军84师政训处长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称：“匪军部队番号多仿效剿匪各部队，以淆乱听闻。”

红27军第84师成立后，由于部队由游击队改编而成，军政素质亟待提高。同时，为使广大官兵了解红军的性质和建军宗旨，克服小农意识和旧军队不良习气，促使部队尽快从游击队向正规红军的转变，在师党委的领导下，部队结合整编，集中时间对官兵进行了“红军是

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才能当好红军”教育，着重帮助大家树立官兵平等观念，反对打骂士兵和不服从管理；树立军民一致观念，反对欺压群众和侵犯群众利益；树立严守纪律观念，反对自由散漫和不听指挥。上述教育活动较好地克服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和完成各项任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陕北正规红军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有较大提高。红 27 军第 84 师成立后的第二天，主动出击，在安定县南沟岔歼灭国民党军高桂滋部一个连，并击溃了由老君殿开来的国民党援军。接着，红军乘胜东进，在清涧县川口镇阎王砭歼敌两个排，在延川县贺家湾歼敌一个连和国民党民团 30 余人。红军连战皆捷，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红色区域也迅速得到扩大。

红 26 军和红 27 军的相继创建，把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创建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九章 统一指挥

随着陕甘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红 26 和红 27 军实现了组织指挥的统一，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西北地区局面迅速打开，为中共中央和南方主力红军的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一、周家岭联席会议

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受到严重损失，南方的几个重要战略区，如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1934 年起各主力红军相继被迫开始进行长征。而西北地区的陕甘边、陕北的红军，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左”错误路线的干扰，不断发展壮大，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不仅保存下来，而且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出现了连成一片的趋势。到 1935 年初，陕甘边根据地已发展到洛河川，陕北根据地则扩展到延河边，两区之间相隔安塞、延安、甘泉 3 县，相距不足百里。并且这 3 县的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活动着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的安塞第 4 支队、甘泉第 15 支队、延安第 6 支队和陕北的安塞第 6 支队、延安第 18 支队等。而这一地区国民党的力量也比较薄弱，处在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夹击中，无力阻止两支红军的进攻。两个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实现两支红军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条件已经成熟。

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红军迅速发展和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

红 26、红 27 军积极奋战，不断扩大战绩。国民党陕甘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西北红军的活动“日益加甚”，“攻城陷地”，占据“数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声势的壮大，不仅沉重打击了陕甘地区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且也引起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不安。他在《西北问题》上发表文章，惊叹“陕北之共祸，自民国十五六年即发生，所以根深蒂固，清剿不易”。“剿匪部队疲于奔命，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陕甘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国民党最高当局十分震惊，蒋介石为此坐卧不安。他深知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进一步扩大，不仅影响西北地区，而且还会影响华北以至全国的形势。他决心尽快铲除西北红军。1934 年 10 月，蒋介石在积极部署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的同时，飞抵西安、兰州、银川（旧名宁夏）和太原等地，与杨虎城、马鸿逵、阎锡山等面谈，筹划陕西、甘肃、宁夏、山西 4 省军阀部队联合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与此同时，为加强陕北剿共力量，从河南洛阳调高桂滋第 84 师经山西进入陕北。会同陕西、甘肃、宁夏、山西 4 省军阀部队，准备对陕甘边、陕北的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

这时，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武装虽有很大发展，但与敌军相比，无论兵力与装备仍明显处于劣势，且两支红军不统一，分别隶属两个平行特委领导，而两个特委又各有自己的直属上级。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并推动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迅速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集中兵力，统一指挥。

据郭洪涛回忆，1934 年 9、10 月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黄翰（即张子华）到陕北巡视工作，郭洪涛和李铁轮（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向他汇报了陕北党和苏区的情况，建议红 26 军一部到陕北和陕北红军汇合，集中兵力打击进犯苏区之敌；由于谢子长伤势严重，建议刘志丹来陕北统一指挥两支红军队伍。黄翰同意了他们的意

见，并为此给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 26 军写了信，该信经谢子长看后送出。

1934 年 12 月底，接到黄翰的指示信后，刘志丹率红 26 军第 42 师第 2 团和陕甘边游击队第 5、第 6 支队进入陕北。翌年 1 月中下旬，刘志丹前往安定县水晶沟、灯盏湾探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及反“围剿”斗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共识。

1935 年 2 月 5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岭附近的刺儿圪塔（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谢子长因伤情加重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志丹主持。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在惠返回陕甘边传达联席会议期间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为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后崔田夫接任组织部部长），高岗为宣传部部长（后为张秀山），白茜为妇女部长；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原来所属之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继续领导陕甘边党政军民组织。同时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指挥红 26、红 27 军，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参谋长朱子休，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会议讨论了刘志丹与谢子长共同商讨的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决定集中红 26 军第 42 师一部和红 27 军第 84 师主力，在陕北地区作战，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国民党军第 84 师，并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

参加会议的郭洪涛后来回忆：“1935 年 2 月 5 日，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郭洪涛、马明方等，由白坚同志担任记录。会上，先研究了军事问题，大家认为，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

剿’，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 26 军、红 27 军和游击队。在决定成立西北军委后，又产生了西北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于是又一致同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委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所属各县仍由陕甘边特委领导。

会议接着讨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计划。一致认为，集中红 26、红 27 军主力，打击深入安定、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之敌是完全正确的。会议还讨论了打通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及打通神府苏区的问题。认为打通神府边需从两面进行，一面从米脂西区和横山东南区向神府边发展；一面从佳吴边向北发展，这是需要通过游击队发动群众去进行。这两点大家的认识都是一致的。”

周家峪会议是西北红军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实现了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初步实现了红 26 军和红 27 军的统一指挥与协同作战，为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有些历史文献将会合的红 26 军和红 27 军统称为陕甘红军或陕北红军，人们也统称其为西北红军。

2 月 7 日，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刘志丹在赤源县的冯家梢塬村，宣布了西北军委的组成和办公机构名单，西北军委机关正式开始办公。当时除成立参谋部、政治部外，还成立了作战训练科，科长雷恩俊；情报侦察科，科长高朗亭；总务处，处长刘汉武；经理部，部长张成武；医疗卫生科，科长高朗亭兼。

二、谢子长去世

1934 年 8 月，谢子长在清涧河口镇战斗负伤后，仍旧紧张地坚持工作，指挥战斗，为陕北红军独立师和红 27 军的创建日夜操劳。直到 10 月，他的身体实在不能支持了，才离开部队回到离家乡不远的游击区杨家崾休养。

一天，在湫滩沟召开赤卫军大会，谢子长不顾伤重，坚持前往参加大会。在高岗等人陪同下，谢子长到了会场附近，因伤势太重，躺在一个窑洞的炕上不能起来。会上，大家听说老谢来了，情绪十分激动，一致要求见见老谢，经解释才安定下来。当时，赤卫军请来了一个红枪会的武师，在会上给群众宣传“硬肚术”（即气功），说什么“刀枪不入”。谢子长要高岗去给群众讲，说“这个玩意骗敌人可以，可不能骗自己人。咱共产党可不能讲迷信”。高岗出去一说，那个武师当场要试。当时，谢子长很为难。不试，赤卫军会有人相信这人的“硬肚术”；试，肯定会被打死。最后，和窑洞里的人再三商量，决定当场考验，以教育大家。结果把那人从肚子上一枪打死了，大家才都不相信什么“硬肚术”了。

谢子长离开部队，回家乡附近养伤期间，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时刻侦察谢子长的行迹，图谋杀害。为避免发生意外，红军和群众把他转移到周家岭，再转移到磁屹湾。1935年1月，谢子长等刚转移到安塞韩平里村，敌人追来，相距只有十多里。他忍着伤痛，对负责看护他的游击队员薛明山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不能让敌人把我活捉去。”

1935年1月，刘志丹看望谢子长时，两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谈完工作后，谢子长握着刘志丹的手说：“看样子我的伤是不易好，陕甘宁全部军事工作由你负责，这个担子也只有你担了！”刘志丹拉着谢子长的手安慰说：“你是老大哥，你好好养伤，病好了还要你担！”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该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刘志丹和谢子长相互信任，密切合作，充分体现了两位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由于谢子长伤势太重，在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休养。快过春节时，他的伤情开始一天天恶化，但他仍关心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生活。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伤已无好转的希望时，痛苦地对家里人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享年38岁。

鉴于谢子长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为防止敌人乘危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对谢子长的逝世暂时保密，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遗体由身边的战友和亲属秘密埋葬。

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历尽艰难困苦。他的逝世，是西北人民的一大损失。为了纪念这位革命领袖，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于1935年决定将其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谢子长的亲属时，对谢子长给予了高度评价。1939年毛泽东两次为其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写了碑文。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了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朱德题词：“民族英雄，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彭真等也题了词。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道：

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

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三、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投入的兵力共6个

师，4万余人。1935年2月初，国民党军完成“围剿”的军事部署：井岳秀第86师7个团，由北向南，在府谷、神木、葭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一线，重点进攻神府；以高桂滋第84师4个团进驻米脂、绥德、延安、延川、清涧，安定等县，插入陕北根据地腹地；以马鸿宾第35师（附国民党陇东警备第2旅第6团）7个团在陇东曲子、环县、合水、庆阳一线，蒋介石嫡系杨步飞第61师6个团在枸邑、正宁、宁县一带，杨虎城部冯钦哉第42师4个团，在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一线；阎锡山晋军第71师集结于黄河东岸，其中第206旅已西渡黄河，占据了吴堡、绥德一些要点，重点“清剿”陕北地区。

为加强“围剿”陕甘地区红军的兵力，2月13日，蒋介石致电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已调派第60师、第59师及补充第1旅、第2旅援陕，并以朱绍良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胡宗南为前敌副总指挥。3月，成立了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驻陕北参谋团，在保定行营少将参谋处长毛侃带领下，进驻绥德，以监视、控制地方杂牌军，调整军阀之间的关系，协调各部军事行动。

国民党军这次“围剿”袭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做法，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采取围堵结合，分区“清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加强地主武装民团、组织还乡团、“铲共义勇队”等，开展破坏、抢劫、暗杀，制造白色恐怖。在政治上进行反共宣传，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建立“肃反会”，设立坐探据点，刺探红军情报；在经济上严密封锁通往根据地的交通要道，禁止军用物资、工业品和群众生活用品等进入根据地，同时命令根据地内的国民党敌特对交通要道、群众生产工具和牲畜等进行破坏，企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

此时，虽然西北红军已有较大发展，但红26军和红27军主力加

起来总共也只有 4000 人左右，不及国民党“围剿”部队的 1/10。而红军的武器装备更远不如国民党军。为打破敌人“围剿”，在刘志丹及西北军委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其一，确定了主要打击对象，周密安排作战计划。根据陕甘边、陕北敌我态势，西北军委和刘志丹认为，敌人此次“围剿”规模虽大，但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和弱点：敌战线广袤，兵力不敷，缺乏机动性；蒋介石将自己的嫡系部队置于二线，驱使杂牌军为前锋，各派军阀矛盾重重，难以协调；杨虎城对蒋介石早有戒心，故其 42 师进至甘泉后，料不会再向北进；马鸿宾虽大举进攻南梁，但为保护宁夏地盘，不会冒险深入；井岳秀力求巩固“陕北王”地位，不愿豁出老本。只有高桂滋自持武器精良，来势汹汹，直接深入陕北腹地，对根据地构成直接威胁。但高部也有致命弱点：高部士兵多为冀鲁豫人，初到陕北，人地两生，且不习惯山地作战。高桂滋原是井岳秀部下的一个连长，与井岳秀有旧仇，后脱离井投靠蒋介石，发展为一个师。高入陕后欲取而代之，双方矛盾很深。鉴于上述情况，西北军委决定首先打击突入根据地的高桂滋先头部队，以解除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

反“围剿”主要打击对象确定以后，西北军委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步，先调动分散在绥德、清涧、安定、延川中心苏区的孤立之敌，以运动战消灭之；第二步，以奔袭奇袭的方式，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苏区外敌守备薄弱孤立据点和城镇，逐步将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并打通与神府苏区的联系。具体部署是：以红 26 军第 42 师第 3 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 27 军第 84 师会合，组成主力兵团，由西北军委直接指挥；红 26 军第 42 师第 1 团牵制敌 61 师，在三水、淳化、耀县、宜君开展游击战争；红 26 军第 42 师第 2 团完成阻击 35 师任务后，北上环县、定边、靖边活动；红 26 军第 42 师骑兵团在宜

川、韩城、成榆公路一线游击。红 26 军主力转入陕北后，地方游击队坚持南梁地区斗争，陕甘边区后方机关必要时向洛河川转移。

其二，统一游击队指挥系统，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为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景范接任，统辖陕甘边地区各游击队。陕北根据地组建陕北军分会，主席马义，统管清、绥、葭、吴地区的游击队。陕北各游击支队集中编成第 1、第 2、第 3、第 4、第 5、第 6、第 7 共 7 个游击纵队，分别划定活动区域和作战任务。

其三，进行政治动员，做好反“围剿”斗争思想准备。根据周家硷会议精神，刘志丹亲自拟写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经西北工委和军委讨论，于 2 月 18 日正式发布。该《动员令》为绝密件，注明各师、团党委、各军分会、各游击队纵队常委讨论，了解任务后自行焚毁，不许保存。《动员令》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了敌我斗争的形势，阐明了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意义和必胜条件，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战术等。该动员令言简意赅，极具鼓动性。4 月初，西北工委向各级党部及各级政府党团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开展抗日示威活动，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投降政策；组织突击队及游击小组向外发展，扩大苏区；普遍实行坚壁清野，巩固苏区；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苏区收入；发动工农群众参军，扩大红军和游击队，动员全体人民彻底粉碎第二次“围剿”。

2 月 18 日，西北军委命令红 26 军第 42 师第 3 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准备与红 27 军第 84 师会合，组成主力兵团，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中心地带的敌第 84 师。

1935 年 1 月 31 日，也就是红 27 军第 84 师成立后的第二天，在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领导下乘敌第 84 师立足未稳，兵力分散，主动出击，在安定南沟岔首战全歼其第 499 团 1 个前哨加强连，并击溃

了由老君殿开来的国民党援军。接着，红 84 师穿过敌防线，东渡无定河，进入清涧县境内，配合游击队反击敌人。2 月 13 日，红 84 师在清涧县川口镇阎王砭歼敌两个排，击毙敌连长。3 月初，红 84 师在延川县贺家湾全歼向延川护送军饷之敌 1 个连和国民党民团 3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 2000 多枚银币。红 84 师三战三捷，取得对高桂滋部初战胜利。随后，红 27 军转到安定县白庙岔集结待命。

4 月下旬，刘志丹率红 42 师第 3 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北上作战，途中于横山县寺儿沟歼敌 1 个连。

5 月 1 日，红 26 军第 42 师同红 27 军第 84 师在陕北赤源县白庙岔会师，当日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刘志丹在讲话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点打击对象和作战方法，强调两支红军一定要互相配合，搞好团结，互相学习，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的局面。两支红军的代表在会上也表了决心。会场洋溢着兄弟部队亲密团结的气氛。会后，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

5 月 4 日，在秀延县玉家湾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范子文任秘书长，统一指挥红 26 军和红 27 军的作战行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后，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形成了一个拳头，大大提高了西北红军的战斗力。

5 月初，国民党第 84 师 502 团 1 个营进占杨家园子，企图切断根据地秀延县与清涧县、延川县的联系，维护其清涧至瓦窑堡一线的交通。为拔掉这个钉子，给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打开局面，5 月 7 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分 3 路向敌开进。抗日义勇军为主攻部队，从蜜蜂峪出发，攻占玉皇峁制高点；红 84 师第 1 团由魏家岔出发进攻杨家园子西街；红 84 师第 2 团从冯家岔出发，直插杨家园

子东街。同时命令陕北游击队第 9 支队和赤卫军、少先队在杨家园子南山准备投入战斗。

刘志丹率抗日义勇军接近玉皇峁时，看到杨家园子寨墙高且坚固，周围又是开阔地，不宜强攻。刘志丹当机立断，将部队撤至吴家寨一带待机歼敌。当红军撤退时，天已大亮，被杨家园敌人发现。敌人兵分两路，一路向青皮梁追击抗日义勇军，一路向吴家寨方向追击红 84 师第 1 团。贺晋年率第 1 团边打边撤，部队撤到吴家寨时，接赤卫军报告：瓦窑堡敌人 1 个连押解一批“犯人”，正向吴家寨方向开来。贺晋年急忙将情况报告西北军委前指，并把部队带到吴家寨西边铺儿上埋伏下来。8 日 8 时许，敌人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发起冲锋，全歼其前卫排。余敌丢下“犯人”，掉头向瓦窑堡方向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峁歼灭该股敌人。

这时，从杨家园子追来的敌人已占领吴家寨及其后山。贺晋年率部返至黄家山与红 84 师第 3 团第 2 连会合后，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敌退居白家园、王家坪北山构筑工事。刘志丹命令红 42 师第 3 团和抗日义勇军立即从魏家岔、蜜蜂峪出发，向白家园北山发起进攻。红 84 师第 1 团在吴家寨、白家园侧击敌人并截断其向杨家园子的退路。在红军的连续突击下，敌营长郭子峰率残部被压缩到一个山沟里，全部被消灭。

此役，是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第一次战斗，击毙敌营长郭子峰以下 50 余人，俘敌 450 余，缴枪 500 余支，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

在吴家寨战斗的同时，5 月 7 日，敌 84 师 500 团第 3 营及团直属机炮连护送 1 个团的军饷、军装及军用物资和军官家属，由清涧出发，前往瓦窑堡，途经马家坪时遭陕北游击队第 9 支队阻击。5 月 9 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赶到马家坪，命令红 42 师第 3 团和红 84

师第 1 团由马家坪分别向北、西两个山梁上的敌人发起攻击，红 84 师第 2 团和抗日义勇军也从西侧向马家坪敌人攻击，敌人乱作一团，溃不成军。不到两个小时，战斗即告结束。此仗打得干净利索，击毙敌营长左向亨以下 40 余人，俘敌副营长以下 450 余人，缴获长短枪 450 多支，轻机枪 27 挺，重机枪 2 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辎重物资。

西北红军会合后，吴家寨和马家坪战斗，共歼灭高桂滋部 2 个营又 2 个连，红军军威大振，敌军受到极大震动，慌忙将驻安定老县城的敌第 84 师第 500 团第 1 营和驻延川永坪镇的第 1 营撤至瓦窑堡。5 月 10 日，红军解放安定县城和永坪镇。从此，敌人士气低落，1 个连或 1 个营不敢出城袭扰苏区，陕北军事斗争形势大为改观。

5 月 10 日，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在玉家湾召开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向西北工委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并对下一阶段的作战方针、计划提出了建议，提出转入外线进攻，攻打兵力孤立之敌，争取在“红五月打通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实现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会议对刘志丹的报告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同意刘志丹的建议，决定继续坚持游击运动战的方针，积极向敌占领地域进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同时也不放弃在条件成熟时攻取敌人占领的城镇据点。

根据玉家湾会议上刘志丹的建议，西北军委前指决定首先攻打延长县。延长农产品丰富，又有石油和炼油厂，占领延长有助于解决红军的粮食和经费问题。为了迷惑敌人，西北红军首先挥师东进，准备攻打晋军驻守的据点定仙塬。因该据点寨墙高，地势险要，不易攻取。5 月中旬，刘志丹遂率红军西返，进至清涧无定河边。5 月 20 日，在张家圪台歼灭敌 84 师第 499 团 1 个连，击毙敌连长，俘 150 余人。驻苏家岩之敌听到枪声，派 1 个连渡无定河出援，也大部被歼。接着，刘志丹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佯攻绥德、米脂，摆出到神府与神府红军

独立团会合的态势，调动敌人到北线集结。西北红军主力则隐蔽南下，到达延长县大连沟一带集结。立即派出侦察部队到延长县周围侦察地形及守敌情况，并且严密封锁消息，积极准备攻城用的云梯等工具。

延长县北面靠山，南临延水河。城内有两个制高点：一是城西北角的山包，山上有寨堡；二是城东北角的碉堡。守敌为敌 84 师直属骑兵连约 140 多人，还有民团团总李鸣吾指挥的延长、延川两县的反动民团 200 余人，县警队及矿警队各三四十人，共计 400 余人。为调动敌人，5 月 27 日，刘志丹命令红 84 师第 2 团和延长游击队诱敌出城，红 2 团和游击队开到延长城东 20 里的塬上，打土豪、分财物，大造声势。李鸣吾果然上当，立即率 100 多人出城，向城东扑去。红 2 团与敌民团接触后，边打边退，一直把其引到距延长县百里之遥的茄子腰。正当李鸣吾骄横无忌，城内敌人也认为平安无事时，28 日，西北红军主力秘密运动到延长城北 70 里的交口、拓家川一带，进行攻城准备。29 日下午，红军从拓家川出发，翌日晨三四点钟到达延长城下。当天拂晓，刘志丹命令红 84 师第 2 团从城东北角发起攻击，同时派一部协助郭宝珊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从北面登城，红 42 师第 1 团攻击城西北角寨堡和西门外油矿。不到 3 小时，敌骑兵连被歼，矿警队被迫缴枪投降，延长城被红军占领。李鸣吾发现上当时，气急败坏，在返回老巢途中，被红军全歼于贺家腰。李鸣吾亦被红军当场击毙。

延长战斗，红军以伤亡 10 余人的代价，生俘延长县县长董公绶和敌骑兵连连长汪进河，毙伤俘敌 4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500 余支，战马 100 多匹，无线电台一部，银元数十万。延长县城解放，红军砍掉了高桂滋由绥德到延安的尾巴。

西北红军攻占延长县城后，国民党军第 84 师分散孤立之军如惊弓之鸟，仓皇撤退，地方民团也失魂落魄，纷纷向红军投降。延川临

近延长，守敌 84 师 1 个连惧怕被歼，连夜弃城逃往清涧。6 月 1 日，西北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延川。延川县民团自动投诚，延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至此，宜川以北，咸榆公路以东，经临镇、延长、延川，直到绥德以南地区，敌除死守绥德、清涧、瓦窑堡外，再也没有力量进攻红军了。

攻克延长后，刘志丹率领红军南下甘泉，西进到下寺湾休整。西北军委前指决定，集中兵力，攻克敌人盘踞在安塞县境的各个据点，肃清西线之敌。安塞县处于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的中间地带，解放安塞，拔掉敌据点，就可使两个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6 月 10 日，刘志丹派陕北游击队第 4 纵队围攻安塞县高桥镇，同时命令红 84 师第 1 团增援。迫于红军压力，安塞高桥民团于 6 月 16 日投降。在高桥民团被围困期间，延安民团百余人在团总李汉华带领下，前来援助高桥，被红 1 团击溃，李汉华当场毙命，红军俘敌 20 余人，缴枪 20 余支。随后，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围攻安塞县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该寨三面环沟，地势险要，驻有民团近 200 人。西北军委前指决定红 42 师第 3 团主攻，红 84 师第 1 团打延安援敌。守城敌人见红军攻势凌厉，连夜弃城逃到延安县城，6 月 20 日，红军进寨，活捉了正在办交接手续的新旧两任县长和县政府要职人员数十名，缴获全部公文档案和大批物资。

打下兴隆寨后，西北军委前指决定拔掉安塞境内敌人最后一个据点李家塌。李家塌三面被天然的大沟环绕，沟壁陡峭，南面是断崖，寨墙很高。这是个非常反动的“土围子”，有一大批豪绅地主及其家属躲藏在此，驻守 200 多名反动民团。他们控制陕甘边与陕北两根据地必经之地，经常外出抢劫群众财物，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危害很大。

刘志丹率红军于 6 月 17 日拂晓包围了李家塌。西北军委前指部

署，由红 84 师第 1 团担任主攻，红 42 师第 3 团阻击保安援敌，义勇军和红 84 师火力支援红 84 师第 1 团，红 84 第 3 团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敌人凭险死守，红军多次进攻未能奏效。红军采用坑道作业，准备爆破，炸掉寨墙，但很快被敌人发现。敌人在夜间加深了外壕，红军挖的坑道被外壕切断，敌人还向壕里扔手榴弹，将坑道炸塌。四五天过去了，寨子还没有打下来，指战员们都很着急。22 日，刘志丹来到寨子附近。他听取同志们汇报后，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寨子周围，发现在寨子南崖上有一条被雨水冲刷而成的一个裂缝，立即派通信员将参战指挥员叫来一起观察这一裂缝。他把望远镜摘下递给贺晋年，说：“老贺。你看，对面的崖壁上有个裂缝，能不能从那里扒上去。”贺晋年顺着刘志丹手指的方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石崖及其周围地形后，深思了片刻，说：“可以扒上去。”刘志丹说：“这个方向是敌人薄弱部位，扒上去后，出其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使主力从东门进寨。打响后，义勇军和红 2 团可以用火力支援你们，封锁敌人的主力南调。等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再调整部署，他就来不及了。”他严肃地说：“在如此险要的悬崖峭壁上作战，必须挑选一批速度快、动作利索、攀登技术高、耐力强、政治条件好的党团员担当此任。我们将给敌人来个‘飞檐走壁，脑后摘金瓜’的打法，全歼顽敌。”

贺晋年接到命令后，立即挑选了 30 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在贺晋年率领下，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登上南崖，迅速向寨墙接近。不料被敌人发现，密集的火力向突击队射来。危急时刻，掩护部队以强大火力压住敌人，突击队飞快冲上去，搭起人梯，翻过寨墙。冲击时，贺晋年被敌人推下来的石块砸中，顿时血流如注。连长冯德胜第一个冲上寨墙，被敌人击中腹部，但他继续坚持战斗，用冲锋枪猛扫敌人，掩护其他队员冲锋。突击队员们像激怒的狮子，凶猛异常，猛扑过去，

和敌人展开白刃战。经过与敌殊死搏斗，突击队占领寨墙，并向东寨门发展，很快夺取东寨门，随后放下吊桥。主攻部队迅速冲进寨子，经过一场激战，到傍晚将敌全部歼灭。

此战，歼灭敌人数百名，俘敌民团团总唐海燕，缴获长短枪 200 余支。至此，安塞县全境解放，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安塞解放后，西北军委前指突然接到中共西北工委来信，称敌井岳秀部有进犯安定苏区动向，要红军回师保卫苏区。刘志丹认为敌人对安定苏区可能有小规模进攻，但大举进攻的可能性不大，经和前指其他领导商量，决定红 84 师第 2 团返回安定向石湾一带活动，打击进犯西北工委、西北军委之敌。同时调红 42 师第 2 团北上，随主力奔袭靖边。尔后，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进至青阳岔、卧牛城地区，进行攻城准备。

靖边城地处榆林通往定边、安边的要道，一面依山，两边傍水，城墙高筑，碉堡林立。驻有国民党第 86 师 256 旅第 2 营。该营有 3 个步兵连和 1 个机炮连，共 400 余人。敌营长曲志鹏富有作战经验，该营是一伙封建集团式的、裙带关系较深的亡命徒，武器装备虽然较陈旧，但有一定战斗力。靖边城还有县警队、县民团、县保安队 170 余人。

根据靖边敌情和地形，西北军委前指决定抗日义勇军攻打西山寨，红 42 师第 2、第 3 团由东南角突破，得手后向钟鼓楼发展进攻；红 84 师第 3 团攻打南门城楼，红 84 师第 1 团为预备队；陕北游击队第 3 纵队在楼沟嘴一带准备阻击横山方向援敌。规定各团在抗日义勇军未打响前，不准开枪，不要过早惊动敌人。

6 月 27 日下午，西北红军主力由青阳岔、卧牛城出发，28 日凌晨，部队隐蔽渡过芦河，接近靖边，各团按指定位置展开，准备拂晓发起攻击。抗日义勇军因向导误将“皇府城”当作西山寨，走错了路，

耽误了时间，直到天亮，还未到达西山寨。这时，红 42 师第 2、第 3 团的突击队已经从东南城角攀登上去，消灭守敌 10 余人，在沿城墙向南门发展时，被敌哨兵发现，顿时全城枪声四起，偷袭变成了强攻。红 42 师第 2、第 3 团后续部队从突破口迅速投入战斗，占领东门，随后在向钟鼓楼进攻时受阻。刘志丹命令预备队红 84 师第 1 团投入战斗，绕道从东门突破敌人防线，于 11 时攻占城隍庙据点。尔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击北门城楼，一路向钟鼓楼发展进攻。与红 42 师第 3 团夹击攻占了钟鼓楼。与此同时，抗日义勇军与西山寨守敌展开激战，攻克西山寨。红 84 师第 3 团也很快攻占南城城门。敌营长曲志鹏见大势已去，率少数随从落荒而逃，被红军追上击毙。

靖边战斗，歼敌 500 余人，俘国民党县长、县党部书记和民团团总，击毙敌营长曲志鹏，缴枪 500 余支，迫击炮 6 门。靖边城战斗的胜利，打出了红军的军威，震动了三边（靖边、安边、定边）。保安守敌闻讯弃城逃窜，6 月 30 日，红军进占保安。

7 月 3 日，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区苏维埃政府进驻延川县永坪镇。

7 月初，刘志丹率红 42 师第 2、第 3 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 84 师，在绥德三皇峁歼敌一个工兵连 100 多人。7 月 17 日，刘志丹又命贺晋年率红 84 师第 1 团，乘敌外出抢劫群众粮食时，在老君殿高家塌全歼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伤敌团长艾捷三。高桂滋部再也不敢主动出击，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随后，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往瓦窑堡。

西北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经过半年的艰苦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2200 余人，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 3000 余人，缴长短枪 30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陆续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 6 座县城，实现了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联系、

将两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意图，在 20 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 30 多个县，根据地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根据地人口逾百万，西北主力红军发展到 5000 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约 4000 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北线作战的同时，在南线，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红 42 师师长杨森、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率红 26 军第 42 师第 1、第 2 团和骑兵团及游击队、赤卫军坚持了陕甘边苏区斗争。

刘志丹率红 42 师第 3 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以后，1935 年 1 月 15 日，国民党军马鸿宾 35 师分两路自宁夏出发，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至悦乐，另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柳村塬。2 月 21 日，两路敌军先后占领庆阳、悦乐、元城、柔远等地。所到之处，移民并村，构筑工事，步步为营向前推进。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红 42 师第 2 团、第 2 路游击队和赤卫军采用疑兵之计，用毛毡在老爷岭等处搭起“帐篷”，在密林里到处竖起红旗。白天分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游动，晚上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不时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敌人，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敌军被阻滞老爷岭以西地区达 1 个月之久。2 月初，陕甘宁 3 省敌军向陕甘边苏区进攻。3 月中旬，红 42 师第 2 团完成抗击敌 35 师后，按原定作战方案，在陕甘边西北、东北区向敌人发动进攻。

4 月 1 日，红 42 师第 1 团在宁县瓦扇子遭敌马鸿宾 35 师骑兵团包围，红军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毙敌 10 余名。但部队损失严重，有 30 多人牺牲，27 人被俘。

4 月下旬，红 42 师第 2 团在杨清川伏击国民党第 17 路军警 3 团骑兵连获胜。5 月中旬，红 2 团奔袭宁寨川五城镇，消灭民团百余人，接着北上定边，在韩城洼摧毁敌张延芝的修械所，随后，转师南下，

攻克吴旗镇。在两个多月的运动中，红 42 师第 2 团消灭了一批反动武装和民团，开辟了定边以东、靖边以西游击区，部队也得到了扩大。6 月下旬，奉西北军委命令，红 42 师第 2 团北上归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参加了攻打靖边的战斗。

1935 年 1 月 27 日，红 42 师骑兵团在师长杨森率领下，全部身着国民党军服，向西出击，经东华池，越子午岭，绕过正宁槐树庄、山河镇、宁县早胜镇，强行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旬的秦渠。遂后袭击淳化通润镇。1 月 30 日，奇袭位于西兰公路的长武县城，歼民团近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筹款数万元，极大地震动了敌人。

为保护西北交通要道，国民党当局被迫调兵遣将，加强防务。2 月上旬，杨森率骑兵团再次出击，东进延安城附近，配合延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和赤卫军在延安高桥川等地活动。2 月中旬，骑兵团诱敌 84 师 501 团第 2 营及延安民团 200 余人进入高桥川口，歼敌近百人，随后骑兵团在杜甫川消灭延安南川 30 里铺民团数十人，缴长短枪 50 余支。2 月下旬，骑兵团向宜川进击，先后消灭由临真镇开往甘泉县城民团和金盆湾民团各 50 余人，缴枪各 50 余支；接着袭击甘泉临真镇，全歼该镇民团百余人。在宜川云岩打垮阻击红军之敌，俘 40 余人，缴枪 50 余支。然后转向狗头山、后湫天，两地民团不敢抵抗，自动缴枪 30 余支。小寨子民团，也慑于红军声威，被迫放下武器。3 月上旬，骑兵团返回南梁根据地。

1935 年夏初，西北军委命令骑兵团到宜川、韩城一带活动，牵制南线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在陕北的反“围剿”作战。

5 月初，骑兵团由南梁出发，经下寺湾到达临真镇一带，寻机歼敌。5 月 21 日，部队向宜川县城逼近。上午 9 时许，部队行至平陆堡南塬时，尖兵班发现宜川县民团 160 余人向平陆方向运动。杨森命令部队迅速展开，抢占有利地形，前卫第 2 连正面进攻，第 1、第 3

连从敌人左右两翼迂回，对敌进行攻击。敌遭突然打击，不知所措，一部缴械投降，余敌逃向屯石村。骑兵团第2、第3连追至屯石村，将敌包围。敌除少数坠崖毙命外，其余均被生俘。这次战斗，骑兵团共歼灭敌民团副团总以下150余人，缴枪百余支，将宜川县民团基本消灭。

屯石战斗后，骑兵团接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参加解放延长战斗。到延长时，战斗已结束。西北军委前指将缴获战马百余匹补充骑兵团，组成骑兵团第4连。随后，西北军委前指命令骑兵团仍回宜川，牵制敌人。6月初，骑兵团攻打宜川城不克，挥师南下，在洛川、宜君、韩城三县交界的观音堂消灭民团20余人，遂向澄城、合阳、韩城一带出击。在澄城县城附近骑兵团消灭民团50余人，在合阳甘井镇消灭民团60余人，接着奔袭韩城附近，打土豪、分财产，筹款万余元。随后，沿黄龙山返回洛河川下寺湾。

7月上旬，骑兵团和第42师第1团在郿县羊泉会合，消灭中部县龙坊塬杨相之民团，随后活动于郿县、宜君、洛川、中部一带，消灭小股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中部、宜君游击区，一度截击咸榆公路的君宜至洛川一带公路，给敌人运输造成极大困难。7月中旬，红42师第1团和骑兵团再次南下，在白水、合阳、澄城、韩城一带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1万余元，有力配合了主力兵团的北线作战。完成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1团返回照金地区。

3月，在神府活动的红27军第84师第3团改称神府独立团，温治恭任团长，杨久谟任政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神府独立团坚持了神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积极寻机作战，消灭小股敌军，歼敌数百人，缴枪400余支，牵制了敌井岳秀部队对陕北根据地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西北红军主力在北线的反“围剿”作战。

由于南线红 42 师第 1 团、第 2 团、骑兵团和第 2、第 3 路游击队以南梁根据地为中心，四处出击，寻机歼敌，牵制了国民党军马鸿宾 35 师、冯钦哉 42 师、杨步飞 61 师，有力地支援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北线与高桂滋的作战行动，为粉碎敌人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加强西北红军建设

在刘志丹和西北军委的正确指挥及全体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西北红军的作战形式实现了由游击战为主向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加强了正规建设，西北红军的各项工作有了长足进步，颁布了法令法规，执行严格的纪律，部队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后勤工作得到加强，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善，战斗力大为提高。西北红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严明的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反“围剿”“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1935 年 5 月初，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和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西北红军对战利品的管理十分严格。攻打延长、延川时，西北红军不仅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以及豪绅地主的大量物资。为了严明军纪，专门成立了以张达志为主任的没收委员会，规定“没收的东西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准拿走一点；没收人员都要佩戴红袖章，防止有人浑水摸鱼；没收的东西要清算上账，工作人员要互相检查，一丝不苟”。对于战利品，缴获的军用物资和枪弹，补充作战部队；物资钱财送回后方交地方政府处理。当红军攻占延长县城后，为维护城市秩序，要求部队严格军纪，遵守法规，不得随意上街，不准私入民房。指定红 27 军第 84 师第 1 团团长贺晋年带队维持治安，

对违纪和违规行为者予以惩处。

为了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西北红军执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俘国民党军官兵不杀不辱，进行宣传教育，对愿参加红军者表示欢迎；愿回家者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主动向红军缴械者，还可以得到奖赏。优待俘虏政策，对红军建设和瓦解敌军起了重要作用。参加红军的一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来许多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红军的排长、连长。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被放回的国民党军官兵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令国民党军将领大伤脑筋。后来，国民党第 84 师第 251 旅旅长高建白回忆说，“如何安置俘虏，成了最大的难事，第二五一旅为了免得影响部队的思想，将所有放回官兵，都送绥德师部设法安置。”

为提高红军指战员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西北军委在所属各部队设有军事教练员，同时还建立了随营学校，训练战士和班长以补充部队。1935 年 7 月上旬，西北军委在延川县永坪镇开办了陕甘晋军政干部学校，抽调红军部队班、排长，培训基层军政指挥员。吴岱峰任校长，张秀山任政委，张文舟任教育长，李登赢任政治主任，王世英任校务长。此外还建立了赤少队训练大队，对各地赤卫军队长进行了一次短期培训，时间十余天，由刘志丹亲自主持，讲解游击战术，学习操练武器，培养了一批不脱产的人民武装指挥员。

西北军委成立后，西北红军后勤保障能力也比以前有大的提高。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开始时，刘志丹在对军事进行部署的同时，对建立后勤供应、修械所和红军医院作了安排，同时在清涧地区和下湾寺两地建立军委办事处，负责红军勤务工作。据高朗亭回忆，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成立了 3 个大小不等的被服装厂，给红军缝制军服；组建了 3 个红军医院；建立有十几个修械厂（所），有的可以制造骑兵枪和手榴弹；西北军委利用缴获的药品和俘虏的 2 名医生，在

原有的红军医院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医院。全院 30 多人，设有洗衣队、看护班。在延长战斗中又吸收了几名医生，扩大了医院的规模，能够收治伤病员 150 人。由于作战不断胜利，红军的装备和物资供应得到了较大改善。特别是战勤动员条例的颁布，使红军的后勤工作有章可循，也大大提高了根据地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在根据地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的紧密配合，英勇作战取得的结果。同时，也和刘志丹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分不开。他在指挥作战中，善于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常常出其不意，以劣胜优，胜不骄败不馁，及时总结经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连对手国民党，对刘志丹的军事指挥也十分佩服，并对其战法作了概括。据 1935 年 11 月西安出版的《政治旬刊》报道：“刘志丹的战法，取之于孙子：‘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人，’‘避实击虚’，‘以众击寡’，‘识众寡之用’，‘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者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能避之。’‘利而诱之，乱而劳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刘为黄埔军校毕业，我军黄埔出身者众矣，为何匪能用之战，我不能矣！值得深思。”但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由于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西北红军作战不断胜利，每次作战胜利缴获颇多。据国民党延长县县长董公绶 1935 年 5 月 16 日给陕西省国民党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说，西北红军仅从高桂滋的第 84 师缴获“枪支不下三千，机关枪亦近百架。”不久，红 84 师第 1 团将缴获的八二迫击炮、重机枪编组为 1 个机炮连，这是西北红军最早的重武器连，部队火力配置有了较大提升，战斗力有了较大提高。

第十章 汇入洪流

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与西北红军在永坪镇会师。西北红军与红25军的会师壮大了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但正当西北根据地革命形势顺利发展的时候，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错误肃反事件，使这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硕果仅存的苏区几乎毁于一旦。中共中央及时到达陕北，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错误的肃反，挽救了西北红军。此后，西北红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汇入了中国革命武装的主力洪流。

一、开始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统一，并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阎锡山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报告中称：“全陕北23县……完全赤化者8县，半赤化者10余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

1935年7月，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正率陕甘支队向陕甘边界挺进。蒋介石在加强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调集东北军和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5省军阀部队13个师又5个旅，约10万人，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方针，组织对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企图在南方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一举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其部署是：南线以张学良东北军第67军为“围剿”军主力，在洛川以南地区集结，准备向北推进；北线以高桂滋的第84师和高双成的第86师，据守横山、神木、清涧、绥德、米脂一线，阻止红军北上；东线为晋绥军5个旅，沿黄河布防，先头部队已到宋家川（今吴堡县城）、枣树坪一带，阻止红军东渡；西线是马鸿宾部第35师，分布在合水、庆阳、环县，阻止红军西进。

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发展

到 1 万余人，但仍仅及国民党军 1/10，且尚未进行很好休整。西北军委立即投入新的反“围剿”准备工作。1935 年 7 月 5 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朱理治来到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机关所在地陕西省延长县永坪镇。7 月 21 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但没有召集在前线的西北工委委员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工委委员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指示信》、《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等 5 封指示信。通过了《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还通过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错误地认为西北红军“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不让敌人踏进苏区的一寸土地”，要求西北红军“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胜利，坚决执行向南发展的路线”，要“争取这次战役的全线胜利”，“联系陕南与川陕苏区为一片”。这次会议并没有研究和拿出应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具体措施。

这时，在前线的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在刘志丹领导下，积极准备反“围剿”斗争，决定乘敌人新的“围剿”未部署就绪之际，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敌人。西北红军主力首先打击东线态势较孤立之敌，再打北线之敌，然后寻歼南线之敌；红 42 师第 1 团及骑兵团继续在陕甘边坚持斗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人的行动；各地红军独立营、团、游击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8 月 1 日，西北红军主力乘敌立足未稳和东线晋绥军态势孤立之机，于清涧东北之袁家沟、花岩寺集结，组成精干部队轻装秘密北上，

进至吴堡、宋家川地区。西北军委前指决定，以一部兵力进攻清涧慕家塬守敌，主力进至慕家塬以南地区隐蔽待机。

慕家塬是个土寨子，四周有寨墙，当时驻有晋军 206 旅一个连。8 月 10 日拂晓，贺晋年带领红 27 军第 1 团偷袭慕家塬。当突击队把云梯搭上寨墙准备攀登时，敌人突然打了几发照明弹，把附近照得通明。红军战士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一下子退了下来。这下红军被敌人发现，机枪、步枪一起开火，部队只好撤下。

第二天，西北军委前指把红 26 军第 3 团调了上去。下午，贺晋年、王世泰各自指挥一支突击队，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从寨子东北部强行攀登，王世泰指挥攻城时负了伤，红军冲进了寨内，守敌一个连全部被歼，红军占领全寨。当时，通信不发达，敌人各据点间多数没有电话联系，主要靠骑马通信。11 日下午慕家塬守军已被消灭，但周围据点的敌人还不知道，仍按上司命令纷纷赶来增援。12 日早上，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的敌人共约 1 个营又 2 个连的兵力到达慕家塬畔，遭到红军迎头痛击，狼狈逃窜。西北红军同阎锡山的晋绥军初次交战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热情，增强了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信心。

为“围剿”西北红军，阎锡山派出飞机助战。8 月 16 日，国民党驻绥德参谋团主任毛侃密电报告蒋介石和杨虎城、邵力子，陕北红军游击队在吴堡县定仙塬南约 20 里的洗马湾击落国民党军军用飞机 1 架，俘两名驾驶员。

慕家塬战斗后，西北红军移到绥德东区梁家甲、义尚坪、深沟一带。这时，驻葭县的井岳秀部 1 个营兵力进犯苏区。红军不顾疲劳，发起反击，一举打垮敌军，敌营长弃马而逃。

8 月 12 日，西北工委派张秀山、霍维德两人来到义尚坪，传达工委要求红军主力打回到神府苏区的指示。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

开会议，研究后决定暂不到神府，部队撤回绥德苏区，攻打只有晋绥军 1 个营驻守的定仙塬。并指示神府独立第 3 团向葭县发展；米脂、横山游击队向北发展，支援神府地区的斗争。

8 月 20 日，西北红军主力进到定仙塬附近，刘志丹命令红 27 军第 1 团一部包围定仙塬，其余部队分布在敌人可能增援的必经之地待命。

8 月 21 日上午，晋军正太路护路军第 3 旅旅长马延寿带领第 6 团自军渡渡过黄河入陕，增援定仙塬。当敌人进到尽绊栏沟附近时，刘志丹命令红 84 师第 1 团从正面发起攻击，第 2 团、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5 支队断敌后路，红 84 师第 3 团从南侧攻击；同时命令红 42 师第 3 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从北侧攻击。仓促间，敌人在附近山头构筑了野战工事，拼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红 42 师第 1 团突击队几次冲到敌人前沿阵地，因伤亡较大被迫撤了下来。战斗呈胶着状态。这时，红军 1 个连绕到敌人侧后夹击，将督战的敌营长打死，敌人开始向后退却。红军展开全线反击，将敌人压缩到尽绊栏沟附近，结果除敌旅长化装逃跑外，其余被全部消灭。这场战斗俘敌 1800 余名，缴获长短枪 1900 余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 2 门，骡马数十匹。

慕家塬、定仙塬战斗的胜利，给晋绥军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定仙塬战斗，西北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指挥灵活机动，作战英勇顽强，成为西北红军首次取得消灭敌人 1 个整团和旅部的战例。红军游击队乘胜收复了葭县、吴堡、绥德地区大块革命根据地，解放了几十个村寨的群众。

定仙塬战后，国民党晋绥军除留部分兵力收缩在宋家川、石堆山等坚固的工事里，主力被迫撤至黄河东岸。从此，晋绥军再也不敢大规模渡过黄河进攻红军了。

定仙塬战斗结束后，西北红军主力转到延川县的文安驿、禹居镇

一带休整，积极进行南下作战的准备。鉴于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永坪扩大会议时，在前线作战的执委和军委委员没有参加，西北红军前指邀请朱理治和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到文安驿传达会议内容。朱理治到部队后，从8月27日开始，主持召开红26、27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以及永坪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案，用了3个半天，传达给连以上党员军政干部。会议讨论了西北红军主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朱理治要求红军“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地进攻敌人”，要夺取绥德县城、延安县城、清涧县城和瓦窑堡等“中心城镇”。朱理治这一主张，遭到刘志丹等大多数人的反对。刘志丹等人认为：西北红军的装备条件，还不能担负以攻坚战来夺取中心城镇的任务；对于瓦窑堡等中心城镇之敌，只能利用敌处在我红色农村层层包围之中的优势，使用群众武装，采取长久围困的战术，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机夺取，而绝不能采取强打硬拼的战术。西北红军主力只能去南线，对立足未稳的东北军寻机打击。但朱理治固执己见，坚持攻打清涧县城或瓦窑堡。

随后，刘志丹只好以红42师第3团一部南下鄜县、甘泉地区，侦察敌情，牵制南线东北军，西北红军主力则奉命沿永坪川、青坪川两路开进瓦窑堡城郊外围。

9月3日，刘志丹率团以上指挥员到瓦窑堡郊外的黑山梁和米粮山西南高地勘探地形。只见敌人在瓦窑堡郊构筑了大量的工事，城墙内外碉堡林立，山寨相连，构成相互支援的火力网。城外都有梅花陷坑，连成梅花套环，围绕城寨。大家看后，一起研究，决定暂时不能攻打瓦窑堡。

而清涧县城敌人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更不能硬攻硬打，否则将会把西北红军主力断送掉。西北红军前指决定先将北面威胁苏区横山之敌消灭，消除背后隐患，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南线敌人。

随后，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北上，于9月9日到达横山鲁家河一带集结，进行攻城准备。9月11日凌晨3时，部队开始攻城，但因城墙太高，准备的云梯达不到高度，偷袭不成，遂改为强攻，战至下午，仍未攻入城内。因部队伤亡较大，主动撤出战斗。西北红军攻打横山虽未能得手，但迫使国民党第86师收缩兵力，并抽调了“围剿”神府革命根据地的第258旅的部分兵力，减轻了陕北红军独立第3团、神府地区各游击队的压力。奔袭横山县城，虽因技术上的缺点，失去突然性，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根据地后方的战略目的。

西北红军主力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的作战，除奔袭横山县城不克外，以较少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巩固了北部战线，为迎接红25军的到来和下一阶段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同时，部队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人员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进一步改善。西北军委新组建了3个直属队：100人左右的步兵侦察连、80人左右的骑兵侦察连和500余人的少共营。

二、红15军团的组建

横山战斗后，西北红军主力南下，准备打击南线的国民党军。此时，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经过河南、湖北、陕南、甘肃，历时10个月的艰苦转战，于1935年9月7日，进入陕甘边根据地保安县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在此，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部队进行了进入西北根据地的政治动员，教育指战员严整军容，遵守纪律，讲究礼节，注重团结，尊重地方政府，虚心向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学习。

9月9日，红25军到达保安县永宁山，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获悉红25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组

织动员干部群众欢迎慰劳红 25 军，并亲自带着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 25 军。西北工委组织部当即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指出：“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我们党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陕甘同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通知》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开往延川县永坪镇与红 25 军会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欢迎红 25 军，发动群众自动地捐助各种食品和鞋袜，派代表慰问劳苦远征的红 25 军。

西北军委接到通知后，刘志丹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部队干部会议进行欢迎红 25 军的动员。他指出：红 25 军到达陕北是一件大事，革命的力量更强大。红 25 军是老红军。他们带来了建设红军的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不要错过。两军会合后，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忠诚老实、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有好饭让给老大哥先吃，有好房子让给老大哥住；调什么就给什么，不能讲价钱；打仗要主动配合，缴获战利品要主动相让。总之，要顾全大局，不能有本位主义。大家一致拥护刘志丹的讲话，各团分别作了传达，并南下永坪迎接红 25 军。

9 月 15 日，红 25 军到达永坪镇，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的夹道欢迎，热情慰问。当天，在永坪召开了欢迎大会。

9 月 16 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回到永坪镇，与红 25 军胜利会师。两军相会，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会师的前奏。后来，徐海东在回忆和刘志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写道：“和习仲勋同志会面后，我们又经过连续 4 天的行军，到达了永坪镇。在这里，我们和刘

志丹会面了。志丹同志穿的十分朴素，沉静谦虚，看来，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他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对革命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和战士的爱戴，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我们见到他，真是高兴万分。”

两军会师后，为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红 25 军慰问和参观访问，学习他们的建军、作战经验。两军干部相见，开怀畅谈，亲如一家。同时，西北军委前指还把直属的 500 多人的少共营拨给红 25 军以补充部队。

当日，根据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朱理治、聂洪钧即与程子华组成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

第二天，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红 25 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 15 军团。

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马明方、王达成、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白茜、刘志丹、高长久、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为委员。改组后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范子文为秘书长，戴季英为参谋长，白如冰为供给部部长。新组成建的红 15 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军团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军团直属交通队、手枪队。参谋长刘志丹兼，政治部主任高岗，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红 25、红 26、红 27 分别改编为第 75 师、第 78 师、81 师。第 75 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 78 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 81 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全军团共 7000 余人。

9 月 18 日，在永坪召开了两军胜利会师和庆祝红 15 军团成立大会，同时纪念九一八事变 4 周年。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前

来参加。会场四周张贴着“欢迎红二十五军”、“庆祝红军胜利会师”、“团结起来，坚决抗日”等标语，满场飘扬着红旗。会上，徐海东、刘志丹等分别代表红 25 军、西北红军讲了话，号召两支红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而英勇奋斗。

9 月 26 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及东北军部队“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时，其东北军第 110 师、第 129 师已进抵延安；第 100、第 106、第 109、第 117 师等 4 个师经合水向西北根据地进犯。龟缩在陕北重要据点的第 86 师、第 84 师也蠢蠢欲动，形成与东北军夹击红军的态势，企图消灭刚刚组建的红 15 军团。

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 15 军团认真分析了敌我当前形势，决定迅速南下，打击延安一带的东北军，打破敌人的南北夹击，为下一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条件。随后，红 15 军团从永坪镇出发，经过 3 天急行军，绕过延安县城，于 9 月 28 日到达甘泉县城以北的劳山一带。当天，徐海东、刘志丹等军团首长带领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了劳山附近的地形，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歼灭孤军冒进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第 81 师第 243 团围困甘泉县城，吸引延安之敌增援，主力隐蔽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大、小劳山一带丛林中。

10 月 1 日下午，东北军第 110 师主力由延安增援甘泉，进入红军劳山设伏阵地，经 5 小时激战，被红军全部歼灭。此战，红军击毙敌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敌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逃到甘泉毙命。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 37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00 余支、轻重机枪 180 余挺、七五山炮 4 门、八二迫击炮 8 门、战马 300 余匹和电台

1 部。红军劳山战斗的胜利对敌震动甚大，驻守瓦窑堡一带的第 84 师一面星夜南逃绥德县城，安定县全境解放。

10 月 5 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这时，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

劳山战斗后，红 78 师骑兵团到郿县、洛川一带侦察敌情。师长杨森带领骑兵团歼灭东北军第 107 师 1 个营。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遂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封锁，企图逐步缩小苏区，最后消灭红军。10 月 20 日，东北军第 107 师第 619 团并加强第 620 团 1 个营进驻郿县榆林桥。红 15 军团决定乘其构筑工事未成，立足未稳之际，消灭该敌。红 15 军团仍以第 81 师第 243 团继续围困甘泉之敌，主力由王家坪地区南下，10 月 25 日拂晓，红军乘晨雾弥漫、视觉不良之机，由东西两面向固守榆林桥东北军发起攻击，全歼守敌 4 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 1800 余人。之后，又乘胜攻下郿县张村驿据点及附近的土围子多处，缴获了很多粮食。

这一阶段反“围剿”作战的胜利，重创了南线国民党“围剿”部队的有生力量，为彻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在红 15 军团反“围剿”作战期间，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已突破天险腊子口向陕北挺进，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迎接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做出了贡献；劳山、榆林桥战斗对东北军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张学良放弃“剿共”，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原因之一。高福源经教育争取，提高了抗日救国的觉悟，为后来红军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没有躲过的错误肃反

劳山、榆林桥战斗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但张学良不甘心失败，重新组织力量，由董英斌率领5个师分两路向根据地猛扑过来。

正当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之际，发生了令人痛心的错误肃反事件，造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及西北红军的严重危机。这是西北红军历史上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也称陕北肃反）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要求各根据地“应特别注意与蒋介石派到苏区与红军中从内部进行破坏我们红军的走狗们斗争”。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中，要求各根据地党部和苏维埃政府对“AB团”、“改组派”等反革命分子“做最坚决的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先后进行了“肃反”。

由于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长期与中央缺乏联系，肃反工作开始并没有波及这里。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尚在长征途中，来不及肃清“左”倾路线在各地的影响，加之陕甘地区交通不便，致使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共中央的变化一无所知。随着仍然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到来，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没能躲过错误肃反的厄运。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到陕北后，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在西北根据地得到贯彻并占据统治地位。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到陕北推行“左”倾路线。据朱理治回

忆：在朱理治被派到陕北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告诉他：“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要他“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孔原给朱理治看了一本有关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叫《肃反》，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反是伟大的胜利。这本肃反的小册子对朱理治影响很大。朱理治到陕北后，7月15日，他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这些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许多内容贯彻了“左”的路线。会上通过的《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对西北的形势和党的工作作了极“左”的估计，要求西北党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8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派聂洪钧为西北代表团成员也抵达陕北。9月16日，西北代表团的成立，标志着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工作并任组织部部长的郭洪涛，负责纠正所谓陕北特委执行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的错误。早在1934年8月，阎家洼子会议上所传达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批评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的两封信，郭洪涛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还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写了《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并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机关报《西北斗争》上发表。中共派驻西北代表团成立后，郭洪涛反映了红26军的一些问题，他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后来成为陕北错误肃反的依据之一。

红25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带来了关于张汉民案件的材料，由此进一步增加了“左”错误路线执行者对红26军及刘志丹的不信

任。张汉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根据党的指示长期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担任团长。张汉民团有党员、团员 200 多人。1935 年春末，杨虎城将张汉民团扩编为警备第 3 旅，并命令张汉民带领全旅对红 25 军进行尾追。张汉民曾数次派代表与红 25 军联络，并送过军用地图、军事情报，帮助购买过无线电台零件和西药等。1935 年 4 月，警备第 3 旅尾追红 25 军至陕西柞县九间房时，被红 25 军缴械，张汉民被俘虏。当时，张汉民向红 25 军领导讲明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和与刘志丹等有联系的情况。但红 25 军参谋长戴季英未经调查，把张当作敌人杀害于商县龙驹寨。时任红 25 军政治部主任的郭述申后来回忆张汉民被害情况时说：“陕西省委曾通知 25 军，张也派人给 25 军送过情报。但 25 军认为张是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红 25 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带来了张汉民案件的材料。据此，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认定刘志丹“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

基于对陕甘边党和红 26 军的错误认识和评价，1935 年 9 月，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鄂豫陕省委永坪联席会议上，朱理治提出“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会后，西北代表团研究了肃反问题，认为“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红 26 军中（即当时的第 78 师）。朱理治在《西北斗争》上以笔名煌岗发表《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文章，为肃反制造舆论。9 月 22 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省委各部、各党团、各级党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其中计划之一就是“颁布赤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

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

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在红 26 军和红 27 军及陕甘边根据地干部中实行了肃反，并指定前方的肃反工作由聂鸿钧负责，后方由戴季英负责。“肃反”中，“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采取了“逼、供、信”的方法，造成乱供乱捉，株连无辜。他们先是拘捕在后方工作的西北军委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干部，随后，将肃反延伸到前线，在洛河川前线部队活埋了一批干部。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先后被捕。

决定逮捕刘志丹时，劳山战斗刚刚结束，刘志丹还在前线。由于刘志丹在西北红军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群众中威信极高，“左”倾路线执行者担心逮捕刘志丹会引起不测，就谎称要他到北线指挥作战，欺骗他离开部队。刘志丹骑马赶赴瓦窑堡途经安塞旧城时，碰到通信员给 15 军团送急件，通讯员认识刘志丹，就把信交给了他。刘志丹打开信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他感到十分震惊。但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他强压对“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卑劣行径的怒火，几乎是在瞬间作出了牺牲自己的决定，镇定地把信交还给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直奔瓦窑堡。

蒙受不白之冤，对一个革命者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当刘志丹无意中看到逮捕自己的密信时，当时，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带领自己的部队，与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者相对抗；二是只身逃离，远走异地。但他几乎是在瞬息之间作出了牺牲自己的选择。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维护红军的团结，他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顾全大局，反映了他的高尚品质。

到达瓦窑堡后，刘志丹立即被监禁起来。“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对刘志丹的行为不能理解，竟然胡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刘志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狱中受尽折磨，随时可能被处死，但他对党始终忠心耿耿，泰然处之。

这次错误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当时红 26 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在机关学校工作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捕。不久，肃反又迅速扩大到红 27 军和陕北地区，一些干部被捕或调离重要工作岗位。肃反发生前后虽然只有几十天时间，但危害很大，有许多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逮捕，有的被无辜杀害，一些干部被调离重要工作岗位，如张达志、李赤然就由师、团政委的职务调走。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敌人大规模的“围剿”，肃反造成了红 26 军、红 27 军广大官兵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干部战士自杀、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同时，也使红 25 军与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关系紧张起来，当时，红 25 军还缴了红 26 军部分人的枪，引起了根据地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

错误肃反使红军力量严重受到削弱，国民党军乘机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四、肃反问题的解决

正当红 15 军团进行第三次反“围剿”、西北红军及根据地内部发生肃反事件、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

1935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率红军攻占天险腊子口，接着越过

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从国民党一份报纸上了解到在陕北尚有相当大的根据地和人数众多的红军，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中共中央率领的北上红军进行了整编，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榜罗镇，中共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当地红军会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当时，毛泽东在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讲了五个问题：第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第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第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第四：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达陕北集中；第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红军北上抗日的意图，注意扩大新战士等。上述讲话对红军进入陕北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动员，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第二天，在此，毛泽东很快通过游击队长张明科找到陕甘边区第2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等人。他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以及肃反和刘志丹等人被捕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当即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山、贾拓夫携带电台，赴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宁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王首道三人到达瓦窑堡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慎重处理”的方针，他们在瓦窑堡展开了大量的调查访问，掌握了大量事实，并仔细翻阅了案卷。他们发现其中所列刘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

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他们还陆续提审了几个所谓“犯人”，当“犯人”得知是中央派来的人了解情况时，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的“口供”，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全是“逼、供、信”的结果。王首道等人还询问了刘志丹本人。刘志丹因是“首犯”，见面时戴着手铐，钉着脚镣。刘志丹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

1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讨论了中央到达陕北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央指示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由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成员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根据地的肃反工作。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也亲自过问并参与处理了肃反事件。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被释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为严明党纪，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对制造这起错误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作出了处理：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洪钧以严重警告处分。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予分配工作。西北中央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了肃反错误，使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刘志丹出狱后不久，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刘志丹一见到周恩来，激动地说：“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刘志丹的手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第二天，周恩来带领刘志丹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还亲切地安慰刘志丹：“你和陕北同志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刘志丹听后十分感动，说：“中央来了，以后事情就好办了。”他向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代表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表示要跟党中央革命到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谦虚地表示说：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在此前后，一些受过迫害的西北根据地的干部，曾要求刘志丹向中央、毛泽东反映，处理原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刘志丹胸怀坦白，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另一方面又一再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的。1936年初，他要习仲勋转告受过整的同志：“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的同志都不计较个人恩怨，勤恳工作，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

亲密无间。

由于中共中央的及时到达陕北，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错误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刘志丹等人得以幸免于难。1942年11月，在中共西北局在延安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演说中，深刻指出：“如果中央晚来一步，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怕是会损失了。”

发生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和其他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来势猛，规模大，危害重，是值得后人深刻反思的一种历史现象，必须从中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作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成森林”。“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是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和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和

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

西北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群众非常热爱共产党和红军。宗派主义者利用人们的这种朴素感情，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来推行错误肃反政策。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

错误肃反事件的迅速解决，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挽救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南方红军落脚陕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内部条件。

但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提出和清算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西北中央局在审查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问题，迅速释放刘志丹等一大批被捕干部，对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 26 军的政治路线未作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其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认为：“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由于上述不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停止肃反后，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1942 年，在中共西北局主持的陕甘宁高级干部会议上，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重新审查了西北根据地的肃反问题，于 12 月 12 日作出了《中央关于 1935 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正确分析了路线是非，指出 1935 年 9、10 月间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恶果，而造成

这种错误肃反的原因，是以朱理治为代表执行并发展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登峰造极的结果。决定认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1935年11月间中央的决定中，对陕甘边和红陕26军的领导者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这些估计现在证明都是错误的”，因此决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处分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然而，关于西北历史上错误肃反问题，尤其是肃反的责任问题，在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此，中共中央于1983年指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负责干部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五人小组会议认为发生在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正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确定“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种问题争论”。五人小组会后经过协商，邀请原陕甘边方面代表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陕北方面代表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参加座谈会。经过分别协商和全体座谈，作出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五人小组在“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和“关于错误肃反问题”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认识。至此，关于西北革命（西北红军）历史及肃反等重大原则问题有了最后结论。

五、参加革命的奠基礼

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为了打垮从甘肃尾随陕甘支队的国民党3个骑兵团，中央领导人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切尾巴战斗。毛泽东强调：这一仗，我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打好，作为我们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见面礼！

1935年10月21日早晨，陕甘支队利用吴起镇一带有利地形，

在塬上深沟设伏，经数小时激战，击溃 3 个骑兵团，俘敌约 700 人，缴获战马 1000 匹。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并窜扰陕北苏区的计划。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问题。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完结，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短期休整后，于 10 月底经保安东进，11 月初，在甘泉地区的下寺湾与红 15 军团会师。

红 15 军团得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把盼望中央红军的激情都凝聚在对中央红军的支援上：每个连抽出机枪 3 挺，其他枪支弹药若干送给中央红军；经济部拿出 1 万元边币，卫生部调出部分衣服、医药用品等，派人送给中央供给部；在劳山和榆林战斗中入伍的解放战士全部拨给了中央红军。毛泽东和彭德怀于 10 月 26 日收到这些雪中送炭的物款后，立即发出感谢信，热烈庆贺 3 支红军的会合，信中写道：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久已听到 26 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25 军同志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甘肃、陕西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会合的消息，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现在中央红军、红 25 军和陕北红军这 3 支红军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发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11 月 3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发布通令，委任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后来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委委员。

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原红军陕甘支队编为第1军团，西北红军和红25军仍以第15军团名义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命令发布后，各部队进行了改编。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5个师又4个团，计1万余人。为加强部队的团结，进行了干部交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派到红15军团的师以上干部达十余人，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内部也进行了干部交流。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15军团会师，对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重点。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重新调整部署，以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分别由郿县、合水东西对进，南进北堵，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以北、洛河以西地区，并解甘泉之围。

中共中央分析了陕北的战局和敌我态势，确定了“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决定以直罗镇为战役枢纽，打一场大的歼灭战，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11月6日和7日，红1军团由甘泉以西的定边集、下寺湾，先后进抵郿县西北的秋林子和甘泉西南的老人仓地区；红15军团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口号鼓舞下，攻克张村驿及其附近的几个小据点。为调动敌人，红15军团第81师第241团加紧进攻甘泉。

国民党军西北“剿总”见甘泉危急，于11月17日命令第57军主力3个师沿葫芦河向直罗镇、郿县前进，以解甘泉之围。19日，国民党军第57军先头部队第109师进至黑水寺地区。红一方面军决

心抓住 109 师比较独立突出的有利战机，求歼该师于直罗镇地区。当天，毛泽东来到东村一带，随即组织、部署直罗镇战役。

19 日，方面军指挥部进至张村驿，红一方面军进至直罗镇东西的石咀、凤凰头、上下莫河地区集结。

11 月 20 日晨，敌 109 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 3 路继续沿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于当日下午 16 时，进入直罗镇。红一方面军当晚将其包围。

21 日拂晓，红 1 军团主力自北、西北、东北 3 个方向直罗镇发起攻击，红 1 军团第 4 师 1 个团插向安家川以东高地，断敌退路。红 15 军团主力（欠第 81 师）自西南、南、东南分 3 路向直罗镇发起进攻，红 15 军团第 78 师一部堵住敌向东去路。在红军的突然打击下，敌 109 师顿失战斗力，战至中午 12 时，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部 500 余人，退入镇东南之土寨内，固守待援。

红军以一部兵力围困敌 109 师残部和阻击由郿县西援之敌第 117 师。22 日上午，红军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敌第 106 师、第 111 师。该敌在遭红 1 军团阻击后，23 日被迫向太白镇撤去。24 日，红军追至张家湾至羊角台歼敌第 106 师 1 个团。敌 109 师残部待援无望，于 23 日夜突围，红军发起追击，全歼残敌，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敌人 1 个师另 1 个团，最终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关于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毛泽东总结有四个条件：“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他认为“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对当时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时局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

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六、刘志丹的牺牲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前后，全国形势正发生急剧变化。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国民党政府同日军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制造了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们书》，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保卫苏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召开了为期近10天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总任务下，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的扩大红军”。根据这一方针，决议一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向山西和绥远发展，以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苏区；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应在战略上继续牵制国民党力量，削弱其力量；长江南北的游击队应在民族战争的号召下努力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

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制定的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对于指导党和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共中央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并在发展中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举行东征。12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根据地军民开始东征准备。12月下旬，以陕北独立第1、第2、第4团为基础，组建了红28军，辖3个团1200余人，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同时，红29军也在陕甘边成立，暂编2个团，由肖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委。

红28军成立不久，中央军委决定临时组建北路军，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宋任穷为政委。北路军除红28军外，还有以原红26军改编的红15军团78师、军委骑兵团，任务是向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牵制北线敌人，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北路军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屡战获胜，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完成任务后，原部队归还建制。刘志丹、宋任穷仍担任红28军的职务。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东征宣言》。接着，红一方面军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挥戈东征。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和红28军、红30军。

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渡黄河东征作战。按照方面军的命令，第一步渡过黄河后，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之敌，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敌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在东岸建立临时作战根据地。渡河战斗打响后，红军以迅猛果敢动作，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至21日，红1、红15军团，北从沟口南到河口约100里的地段渡过黄河。红1军团由沟口渡河后，向中阳之关上村

方向发展。红 15 军团从河口渡河，向石楼、隰县方向发展。至 23 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塘马各镇在内的横宽百余里、纵深 70 里的地区，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为阻止红军进攻，阎锡山急忙将入陕晋绥军撤回山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致电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命令红 28 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援助神府苏区，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区，然后楔入晋西北地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行动。从 3 月中旬开始，红 28 军从横山出发，进占了宋家河、吴堡等要点，并配合地方武装收复了陕北苏区的一部分被占地区。3 月下旬，红 28 军由吴堡北上，进入神府地区，攻占高家塔、沙峁镇，基本恢复了神府根据地。

部队进入神府后，中共神府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了欢迎祝捷大会。当地群众兴高采烈，有不少老百姓从远道赶来，要亲眼看一看刘志丹。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刘志丹“老刘”。

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根据地，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大家传播着红军胜利的捷报，有人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信天游，在陕北群众中传唱起来：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闹共产。
二月里来刮春风，
江西来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来势力重，
他坐上飞机在空中

后带百万兵。

.....

3月31日，红28军由贺家川附近的山坡渡口湾渡过黄河，摧毁河对岸罗峪口国民党军指挥部，迅即向黑峪口、康宁镇地区发展。4月13日，刘志丹、宋任穷接彭德怀、毛泽东电令，要求红28军向黄河沿岸挺进，“相机消灭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

接到命令后，刘志丹，宋任穷率红28军由金罗镇出发，向三交镇地区挺进。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一个重要黄河渡口，河西就是陕北根据地绥德。该镇驻有国民党军一个团，设有坚固工事。为了打好这一仗，刘志丹昼夜不眠，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4日，在进攻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当他得知第1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其留在军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自己亲自来第1团指挥所。在第1团指挥所，刘志丹和黄光明团长、王再兴政委一起研究突破敌人碉堡的方案。刘志丹对他们说：“这次战斗，是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现在三交镇周围大部阵地已经被我占领，只剩下东北面那个主要山头，敌人集中力量拼死固守，二团那面硬攻不好奏效，你们这面一定要设法积极动作，夹击敌人，使敌人士气动摇，我们好迅速地歼灭他们。”说完，他手持望远镜，带着红28军特派员裴周玉和几个参谋及警卫员一起来到最前沿阵地。

午后，当刘志丹在前沿阵地手持望远镜探出身子观察敌人地形时，突然被敌人碉堡里的机枪射出的子弹击中左胸，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他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裴周玉：“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裴周玉等人急忙将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所

在的阵地上。宋任穷政委跪下身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刘志丹已不能说话，不多时即停止了呼吸。这位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陕甘地区人民的领袖牺牲时，年仅 33 岁。刘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

刘志丹牺牲后，宋任穷将此消息立即电告中央，并派人护送刘志丹的棺柩渡过黄河，运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4 月 24 日，驻瓦窑堡的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 3000 人在南门举行追悼大会。会上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介绍了刘志丹的生平事迹；周恩来、秦邦宪等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致了悼词。会后，刘志丹的遗体在瓦窑堡城外 3 里处水沟坪山脚下安葬。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向刘志丹的家属表示慰问。

刘志丹追悼会开过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的这一评价，既是对刘志丹的褒奖，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1936 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以志纪念。

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是“红军模范。”1942 年，刘志丹牺牲 6 周年之际，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陕甘边区在延安专署广场举行了各界人士近万人参加的公祭大会，5 月 2 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公葬。

仪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以及李鼎铭先生，边区党政军机关团体为志丹陵题了词。

1970年3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述了上山下乡的意义后，充满激情地谈到了刘志丹。他说：

“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是值得纪念的。

1935年，在陕北贯彻“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搞肃反，提出的材料都是莫须有的。他们决定逮捕刘志丹，信却落到了刘志丹的手里。刘志丹看了信后，泰然自若，对送信的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如果他回来商量一下，局势会有变化。但是，他单身匹马到了瓦窑堡，表现了对党忠贞不二。

在黄埔的时候，刘志丹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我教过他，但学生多，我不认识他。我们到了瓦窑堡，给他平了反，我跟他谈话时，他表现很谦虚。后来，毛主席带部队东征时，刘志丹率领28军，我是和他一起去东征的。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达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两个瞎子看不见，跑到窑洞里，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刘志丹后来在攻打三交时牺牲了。

我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和他一起打过仗，时间很短，接触却很多。他很谦虚，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党员。他和方志敏、彭湃、韦拔群一样，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出身虽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他是投降了无产阶级来搞农民运动的啊！

在延安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只举刘志丹这一个例子……”

刘志丹牺牲后不久，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内战扩大，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适时结束东征，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28军随红军主力撤回河西地区，回到陕北。

东征战役历时75天，红军共消灭敌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东征期间，扩充红军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东征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又举行了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开辟出纵横200多公里的新根据地，使西北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粉碎国民党新的“围剿”阴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附录一

西北红军大事记

1927 年

7 月 15 日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国民军辖区豫陕甘地区开始“清党”反共。

8 月 8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太雷在武汉接见陕西省委代表李子洲，对陕西省委工作作出指示。

9 月 26～27 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确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方针和措施，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 9 项决议案。

10 月 12 日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领导的清涧起义爆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12 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率领的清涧起义部队 1 个营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

1928 年

1 月 12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 26 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下，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暴动，并将全省划分为关中、陕南、陕北 3 个暴动区。

1 月底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遭强敌围攻，受到很大损失，部队被迫解散。

5 月 1 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陕东特委在渭南崇凝镇领导农民起义，揭开了渭华地区农民暴动的序幕，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

5 月初中共枸邑（今旬邑）区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枸邑县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攻入县城，成立枸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起义武装称红军渭北支队，共 40 余人。月底，起义失败。

5 月 10 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新编第 3 旅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在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16 日，起义部队在华县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设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总指挥部。8 月上旬，起义部队在河南邓县失败。

1929 年

2 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加强农民运动，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谢子长当选特委军事委员。

4、5 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认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兵运工作）、灰色（改造土匪）、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派党员、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队。会议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

5 月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与敌人展开斗争，夺取了该县民团的领导权。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通过《陕西问题决议案》。根据中央决议，中共陕西省委把瓦解敌人，组织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目前扩大红军计划大纲》，指出扩大红军与有计划地组织兵变，成为目前军事工作的两大任务。

1930 年

1930 年春刘志丹、谢子长等前往陕、甘两省交界地区开展兵运工作。

4 月 15 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致信中共陕北特委，指出党在陕北的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发动兵变，扩大红军，

组织游击队伍，发动游击战争。

10月1日刘志丹率一部武装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袭击了陇东民团军第24营，击毙正、副营长，缴枪60余支，震动陕甘边界。

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中共北方局派高维翰（李杰夫）传达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为贯彻立三错误路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1931年

3月中共中央作出《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强调开展兵运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1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山西省孝义县成立，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6月刘志丹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甘肃军阀陈珪璋谈判，刘志丹被任命为陈部第11旅旅长。

9月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集合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武装，组成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即南梁游击队。

9月3日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进入陕北。部队到达安定南沟岔休整，选举阎红彦为大队长，杨重远任政治委员。

9月10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塞平桥取得入陕后的第一仗胜利。

9月11日晋西游击队收编了师储杰、杨琪、杨鼎三支保运武装，改编为一个支队，即陕北支队。

10月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会师。

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庆阳新堡游击队驻地，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红军的指示。不久，成立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统一指挥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行动。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到南梁地区，传达省委要求坚决执

行游击战争的指示，要部队整顿后南下，并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 年

1 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到部队巡视，指示部队立即改编为红军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开辟苏维埃区域。

2 月 6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发生缴枪事件，使刚刚建立的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受到严重削弱。

2 月 12 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

2 月 13 日陕甘游击队攻占枸邑县职田镇。

2 月 15 日陕甘游击队在枸邑镇阳坡头设伏，歼灭国民党第 17 路军警卫团和民团 300 余人。

3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就陕甘游击队建设问题作了较详细的指示。

3 月 8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规定游击战争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的影响，摧毁豪绅在乡村的一切政权，指示游击队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严格的纪律。

中旬，陕甘游击队配合群众武装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围城一天撤离。

3 月 20 日陕甘游击队进至寺村塬，将群众武装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

3 月 21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陕甘边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必须准

备成立正式红军”，要求中央给予正式番号。

3月陕西延川县共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等夺取清涧县淮宁湾国民党民团枪支，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不久，中共延川县委将延川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

4月1日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南塬千余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正宁县城山河镇。攻城两日未克。

4月2日习仲勋、刘林圃等发动国民党陕西警备第3旅第2团1营在甘肃两当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不久部队遭敌围攻溃散。

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寺村塬召开群众大会，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

4月20日中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请示报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

4月21日，陕甘游击队奔袭枸邑县城，歼敌100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占的第一个县城。

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到陕甘游击队传达指示，撤销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游击队分编为第3、第5支队。

5月5日谢子长、焦唯炽（化名赵仪三）领导国民党甘肃警备第3旅士兵在靖远发动暴动。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4支队，不久，因分散行动，部队被敌缴械。5月30日，谢子长、杜润滋、张东蛟等集合失散士兵200多人，重新打出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随后，游击队转战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5县，历时2个多月，后遭敌人围攻，最后解散。

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

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治委员。同日，陕甘游击队发布布告，宣告红军的性质和根本任务，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和白军士兵，积极拥护和支援红军游击队。

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和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提出根据西北地区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成立红军1个团，番号暂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独立团，在此基础上以后再扩充为红军第41师。

6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上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要红26军“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

6月底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甘肃宁县麻子掌、梁掌堡一带。为克服悲观情绪，队委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并免去刘志丹总指挥职务，推选阎红彦任总指挥。同时，将第3、第5支队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

7月8日在共产党员高鹏飞、杨林等组织领导下，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国民党新编第11旅特务营两个连举行暴动。暴动部队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西华池兵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

7月23日陕西省委代表李艮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并传达省委关于“为实现创建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的工作”的指示。

8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关于创建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地加紧这一工作”。

8月中旬李艮不顾大敌当前，在五顷塬强行分配土地，命令部队

打阵地战、攻坚战，致使陕甘游击队在王郎坡、五顷塬、三嘉塬战斗失利，遭受严重损失。

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按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即编成红军一团”。

8月30日谢子长再次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9月初陕甘游击队奔袭照金，歼灭民团400余人。

9月下旬陕甘游击队进入南梁、二将川一带活动。后北上，强攻保安县城未克。

10月中共陕北特委指示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9支队。

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杜衡到陕甘游击队，着手筹建红26军。陕甘游击队奉陕西省委指示，进至陕西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杜衡任红26军兼第2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

12月27日红26军第2团攻打焦家坪，消灭宜君县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支。

1933年

1月初红26军第2团在耀县香山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并将香山寺粮食分给饥民。后由杜衡提议，焚毁了香山寺。

1月10日杜衡命令红2团攻打庙湾夏玉山民团失利。战后，杜衡撤销了郑毅的参谋长职务，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1月红2团随营学校成立，校长李杰夫，政委汪锋。

2月中共陕北代表团通过了《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

指出今后陕北党的工作方针必须是“在广泛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开展游击运动，改造和扩大游击队，创造陕北新的苏维埃区域”，并确定了陕北游击队的行动纲领。

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在清涧王家山成立，罗永宽任支队长，高朗亭任政委。

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

3月上旬杜衡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由汪锋代理红26军第2团政委。

3月中旬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妙斋，政委习仲勋。

4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指示陕甘游击队第9支队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

4月杜衡重返红26军，继续担任军、团两级政委。

6月17日红26军党委和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下一步工作行动计划。杜衡凭借职权强制会议通过了部队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

6月29日红2团在三原县二台子，同渭北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杜衡强令部队尽快渡过渭河。

7月中旬红2团在陕西蓝田张家坪村遭敌袭击，战斗失利，伤亡很大。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带领部分战士分头突围，在秦岭山中进行艰苦斗争。

7月21日国民党第17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率领下宣布起义，被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7月22日耀县游击队成立，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张邦英。

7月24日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4团。

7月28日红26军政委杜衡、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在西安被捕，随即叛变，中共陕西省委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7月下旬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国民党第17路军孙友仁特务团在三原辘轳把遭遇，战斗失利，余部撤入照金根据地。

8月5日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在清涧王家山成立。

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世泰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并确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8月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6个团兵力对三原武字区、心字区进行“围剿”。红4团被迫撤出武字区，北上照金，渭北根据地失守。

9月中旬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部队攻打陕西枸邑县张洪镇，歼敌县长以下160人。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等历尽艰险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任红26军第4团2连连长。

10月16日国民党第17路军孙友仁团及民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被迫撤离薛家寨，照金根据地陷落。

10月18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率红军攻克合水县城。

11月3日~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26军第42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1月7日红26军第42师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同日，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成立。

11月中旬红42师进入南梁地区，开始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11月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改称第1路游击队。不久，部队回到

安定（今子长），战斗失利，被迫埋藏枪支，转入地下分散斗争。

12 月上旬刘志丹率红 42 师南下正宁地区，恢复了正宁根据地，打开了关中游击区的局面。

12 月底谢子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革命武装斗争。

1934 年

1 月初红 42 师师长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长由刘志丹接任。

1 月下旬高岗因违反军纪，被红 24 师党委撤销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师政委。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回到陕北，着手准备恢复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1 支队。

1 月陕甘边区第 2 路游击总指挥部在南梁成立，总指挥杨森，政委高岗。

2 月 15 日吴堡抗日义勇军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 4 支队。

2 月 25 日中共红 42 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召开群众会议。再次选举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

陕甘边区第 3 路游击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张明吾（后由王安民、陈国栋接任），政委黄子文（后由张仲良、张邦英接任）。

2 月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 8 个团的兵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3 月上旬刘志丹率红 42 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进入照金地区。

3 月 8 日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正式恢复。

4 月 2 日红 42 师在西华池全歼国民党第 17 路军杨子恒部王子义团两个营另一个机炮连。歼敌 600 余人。

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南区神沟堂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为创建一个红军师而斗争。

4月下旬陕北游击队第5支队在绥德王家沟成立。

5月初陕北游击区域和游击队代表会议通过《开展游击运动与创建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决议》，提出在陕北建立正式的红军。

红42师进入南梁，进至二里塬歼敌两个连。之后，又在高凤坡、和尚塬、瓦子川连续作战，取得了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5月28日红42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调整加强了红42师和游击队的各级领导，决定恢复陕甘边特委，成立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

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86师在地方民团配合下，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6月陕北游击队第6支队成立。

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

7月17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打开安定县城，救出被关押的200多党员和群众。

7月25日谢子长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及赤卫队200余人南下陕甘边，同红26军第42师在南梁会合。同日，陕北游击队第8支队在安定李家川村成立。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红42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红42师第3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撤销高岗红42师政治委员职务，任命谢子长为红42师政治委员。

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要求迅速成立红26军第1、第2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协同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打通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8月初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赤卫队和红26军第42师第3团，返回陕北根据地。

8月17日谢子长指挥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与红42师第3团联合作战，在安定景武家塌歼敌1个连。22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歼敌2个排。

8月26日谢子长在河口镇战斗中负伤。

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塬里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决定正式成立陕北红军独立师。同日，陕北游击队第9支队成立。

9月上旬红26军第42师第3团奉调返回陕甘边。

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1、第3团分别在安定、神木成立。

9月15日谢子长带伤临阵指挥第二次攻入安定城，击毙安定民团团总李丕成。

9月19日中共红42师党委在湫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42师第1团，作为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9月28日陕北红军独立师第1团在陕北游击队第8、第13支队配合下，攻克靖边十里嘴崖窑敌军据点，缴枪7支。

10月15日陕北红军独立师第1团一部和陕北游击队新第1支队、第13支队攻入安定县城。

10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到陕北，指示统一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游击队。

谢子长因伤势严重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养伤。

1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2团在清涧成立。

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

11月10日郭宝珊率领的起义部队在荔园堡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治部主任。

1935年

1月29日～31日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正式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

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在安定县百庙岔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

1月31日红27军在安定县南沟岔歼灭国民党军高桂滋84师第499团一个前哨连。

1月刘志丹率红42师第2团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在安定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二人就建立陕甘边、陕北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机构，制定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计划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共识。

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和红26、27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西北军委成立后，西北红军实现了组织指挥的统一，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2月13日红84师一部在清涧县阎王砭歼敌2个排。

2月18日刘志丹发布《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西

北军委命令红 42 师第 3 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 84 师大部组成主力兵团，重点打击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地带的敌 84 师。

2 月 21 日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

2 月蒋介石调驻河南的高桂滋 84 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总兵力约 4 万多人，对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3 月初红 84 师主力部队在清涧县贺家湾全歼向延川护送军饷之敌 1 个连，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 2000 多元银币。红 42 师第 2 团抗击进犯陕甘边的敌骑兵，毙俘伤各数十人。

3 月下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驻陕北的参谋团，在少将主任毛侃率领下抵达绥德。

3 月在神府活动的红 84 师第 3 团改称神府独立第 3 团，温治恭任团长，杨久谟任政委。

4 月 21 日红 42 师第 2 团在南梁地区完成阻击敌 35 师的任务后，在杨清川伏击杨虎城警 3 团骑兵连获胜。

4 月下旬红 42 师第 3 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北上陕北作战。途中在横山寺儿沟歼敌 1 个连。

5 月 1 日红 42 师第 3 团、抗日义勇军与红 84 师主力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村，组成主力兵团。

5 月 2 日西北军委颁布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和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章。

5 月 3 日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在安定玉家湾成立，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治委员。

5 月 7 日西北红军主力首战安定县吴家寨获胜，歼敌 1 个营。

5 月 9 日西北红军主力在安定县马家坪歼国民党军 84 师 500 团 1

个营和 1 个机炮连。

5 月 10 日安定县国民党守军被迫撤至瓦窑堡，安定县遂告解放。这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解放的第一座县城。同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对下一阶段作战方针、计划提出了建议。

5 月中旬红 26 军骑兵团在宜川县屯石岷岷，歼灭宜川县民团。

5 月 20 日西北红军主力在绥德清涧县交界处张家圪台歼国民党军第 84 师 499 团 1 个连。

5 月 30 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延长县城。

6 月 1 日延川县城国民党守军连夜北逃清涧，延川县城遂告解放。全县苏区连成一片。

6 月 15 日西北红军主力在延安县高桥镇击溃敌 1 个连，击毙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

6 月 20 日西北红军主力解放安塞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

6 月 27 日西北红军主力攻克安塞县敌军最后一个据点李家塌，安塞全境解放。至此，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6 月 28 日西北红军占领靖边县城。

6 月 30 日保安县城国民党守军北逃安边，保安县城遂告解放。这是西北红军解放的第 6 座县城，粉碎了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7 月 3 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北区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进驻延川永坪镇。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永坪镇开办了陕甘晋军政干部学校。

7 月 17 日刘志丹率红 42 师第 2、第 3 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 84 师在绥德县老君殿全歼国民党第 84 师 1 个营，击溃 2 个营，击毙其团长艾捷三。

7月21日中共西北工委在永坪镇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及红26军的指示信，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对西北形势作极“左”的估计，决定成立陕甘省委，同时通过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陕甘全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加强对红军、游击队、群众和革命战争领导，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

7月当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之际，蒋介石调集以东北军为主力军的10多万兵力，并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开始部署对西北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全歼清涧慕家塬国民党守军1个连，第二天击溃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援敌1个营又2个连。

8月21日西北红军主力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吴堡县定仙塬歼灭晋军1个团，首次取得消灭敌人1个整团和旅部的胜利。

9月9日红25军经庆阳、合水县抵达保安县永宁山，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等人的热烈欢迎。

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攻打横山县城不克。

9月16日红25军与西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同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组成，朱理治任书记。

9月17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红25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分别改编为红15军团第75、第78、第81师。

9月18日在永坪镇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和红15军团成立大会。

10月1日红15军团在甘泉劳山地区设伏，歼东北军第110师大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俘敌3700余人，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

劳山战斗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在陕北大搞错误肃反，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逮捕。

10月12日红15军团攻克鄜县（今富县）榆林桥据点，歼东北军107师4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与安定县交界的铁角镇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陕甘支队入陕作战、与陕甘红军会师，以及巩固扩大西北根据地等问题。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中央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0月20日毛泽东等了解到西北根据地正在错误肃反，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下寺湾同红15军团会师。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被释放。刘志丹出狱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11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陕北安定县瓦窑堡。

11月中旬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

11月21日～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保卫苏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2月17日～2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12月下旬红28军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

1936年

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联合署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就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问题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名义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

3月31日刘志丹率红28军渡过黄河，攻占河对岸罗峪口渡口。

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附录二

西北红军人物谱

刘志丹（1903～1936）

名刘景桂，字子丹。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秋，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1926 年秋毕业后，被派往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1928 年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工作，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1929 年，受党派遣，在陕甘边和甘肃平凉等地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1931 年到陕甘边领导武装斗争，先后任南梁游击队总指挥，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 2 支队支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总指挥，红 26 军第 2 团政治处长、参谋长，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红 26 军第 42 师参谋长、师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共西北工委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说谢子长），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领导了西北红军的创建和西北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红 25 军同西北红军会师后，任红 15 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35 年 9 月，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同年 11 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获释。任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红 28 军军长，北路军总指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 年 2 月参加东征。4 月 14 日在山西中阳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谢子长（1897～1935）

原名谢世元，又名谢德元，号浩如，化名秋阳。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定县民团团总，陕军第 11 旅第 12 连连长，中

共陕甘区委直属军队支部委员，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委员。1927年参与领导清涧起义，后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副总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3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在陕北、陇东等地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宁夏国民党军骑兵第4师第11旅旅长，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3团团长，1930年8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同年10月，调往上海中央特科受训，1931年1月回到陕甘地区。1932年5月，组织领导和甘肃靖远起义，先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同年12月，再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受训”，1933年夏，派往天津工作，后派往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许权中师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到北平。1933年11月回到陕北，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后兼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领导了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8月26日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

（以下人物按姓氏笔画为序）

习仲勋（1913～2002）

曾用名白水光，陕西富平人。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入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进入照金根据地。历任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第5支队政治委员，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共青团陕甘边特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地区军事部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政委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关中警备区政治委员，

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第 120 师暨晋绥军区独立第 1 旅政治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广东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长，广东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马云泽

陕西绥德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从事兵运工作。1931 年，参与创建晋西游击队，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红军游击队经济主任、党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纪委检查委员会常委等职。

马佩勋（1907～1984）

曾用名马沛雄、马英。山西孝义人。1931 年 5 月，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神（木）府（谷）特务队特派员，佳县抗日义勇队政治委员、队长，南梁游击队队长，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副队长、第 4 支队政治委员，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特务队政治委员，陕北独立第 1 师 1 团政治委员，西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西特委书记，八路军第 115 师独立支队第 2 团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 212 旅政治委员，吕梁军区第 7 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吕梁军区副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 2 纵队副司令员，晋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晋西南军区司令员，山西省总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

机械工会主席，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兼党组书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马锡五（1899～1962）

陕西保安人，1931年参加南梁游击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梁游击队军需，西北反帝同盟军第2支队军需长，陕甘游击队军需主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部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安民（？～1934）

陕西三原人。中国共产党员。1931年参加陕甘边武装斗争。1933年任红26军第4团1连指导员。后任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第3路总指挥。1934年12月底，在耀县老爷岭战斗中牺牲。

王世英（1907～1948）

甘肃正宁人。中国共产党员。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陕北红2团、红1团参谋长。参加了陕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48年11月在正宁县龙嘴子牺牲。

王世杰（？～1935）

陕西佳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红军，任陕北游击队第6支队支队长，陕北红军第4团团长，红27军第84师第3团团长。参加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1935年在陕西安定（今子长）作战中牺牲。

王世泰（1910～）

陕西洛川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9月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后任红26军第2团团长，红26军第4团第2连连长，

红 26 军第 42 师第 3 团团长，中共陕甘省委军委委员，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庆（阳）环（县）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军分区、庆环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警备第 3 旅兼第 3 军分区政治委员，陕甘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 4 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 4 军军长，第 2 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 2 兵团兼甘肃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甘肃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兆相（1909～）

陕西神木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历任红 26 军特务队队长，神（木）府（谷）特务队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3 支队支队长，陕北红军独立师第 3 团团长，红 27 军第 84 师第 3 团团长，中共神府特委军事部副部长，神府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 120 师留守处副主任，留守兵团警备第 6 团团长，山东纵队第 1 支队副支队长，山东清河军区独立团团长，渤海军区第 4 军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 7 师第 22 旅旅长，第 6 纵队第 18 师师长，解放军第 49 军第 162 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后勤学院后勤组织系主任、高级班主任，高级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院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伯栋（1911～1938）

陕西商县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 26 军第 4 团连长、团政治委员，中共汉中特委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抗日战争后，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1938 年 7 月 25 日在商县被国民党顽固派暗杀。

王思温（1909～1936）

又名王士文、王思恩。陕西葭县（今佳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后任陕北红军独立师第1团连长、营长，红27军第84师第1团团长。参加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6年在靖边作战中牺牲。

王泰吉（1906～1934）

字仲祥，曾用名南阳郎。陕西临潼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转入河南南召地区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入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率国民党第17路军骑兵团在陕西耀县起义，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第42师师长。1934年初到豫陕边从事兵运工作，同年3月，被捕就义。

王富贵（？～1935）

陕西彬县人。1934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26军第42师第3团副团长，红15军团第78师第232团副团长、团长，1935年10月在陕西劳山战斗中牺牲。

王有富（1918～1933）

陕西耀县人。1932年春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童子班班长、少年先锋队队长。1933年任红26军第2团少年先锋连连长。同年11月在陕西甘泉洛河川战斗中牺牲。

孔令甫（1913～1970）

又名孔林甫。河南镇平人。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26军第42师骑兵团排长、连长，第2团副团长、团长。后任红15军团骑兵团团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骑兵游击师司令员，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骑兵旅副旅

长，河南军区第2支队副司令员，第2军分区、河南军区桐柏军分区、皖西军区第1军分区、皖北军区安庆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5师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工程师师长，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白坚（1911～1968）

曾用名白鉴、晓白。陕西靖边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共青团保定特委书记、中共东北军骑兵第2师工委书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师委书记、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初由中共北方局派往陕北工作，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中央蒙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副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白锡林（1908～1933）

陕西清涧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清涧起义。1931年参加筹建晋西游击队的工作。任晋西游击队分队长。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警卫大队大队长。红军陕甘游击队警卫大队大队长。1933年在山西河津县瓦池镇战斗中牺牲。

冯树立（1911～1935）

字玺玉。陕西韩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后，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骑兵团政治委员。1935年在陕北作战中牺牲。

冯盛昌（？～1935）

陕西葭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陕北红军某团政治委员。1935年在陕西安定瓦窑堡战斗中牺牲。

吉合（1905～1983）

曾用名田德修。河南鄆城人。1925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北工委军事部部长，红26军干部训练班主任、作战科科长，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12月再次赴苏联。1938年回国后在新疆工作，后被新疆反动当局扣押。1946年获释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东路军司令部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第一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外军部副部长，院办公室副主任、院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朱子休

又名朱子修。陕西绥德人，中共党员。曾任红27军第84师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辽北军区参谋长，辽南军区副司令员，西满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骑兵司令部参谋长，龙江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委员，辽江军区参谋长，解放军第47军第160师师长，湖南军区常德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因病去世。

任浪花（1909～1936）

原名任天贤。陕西耀县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西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政委。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作战。后任红15军团第81师参谋长。1936年在瓦窑堡病故。

师储杰

陕西绥德人。原为陕北保运武装首领。1931年10月，参加革命，任红军陕北游击支队总指挥，随晋西游击队进入陕甘边，与南梁游击队会师后，任1支队支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第1支队支队长。三嘉塬缴枪事件后投降杨虎城部队，任营长。

刘玉芳（？～1936）

甘肃人。1934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26军某团团长。1936年在陕西黄陵双龙镇牺牲。

刘汉武（？～1935）

陕西绥德人。中国共产党员。1935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同年秋在陕西延川永坪牺牲。

刘约三

陕西保安人。中国共产党员。1931年参加南梁游击队的创建，历任陕甘红军游击队党委委员，红26军第2团经理处处长，保安游击队队长，红15军团直属骑兵团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等职。

刘永培

甘肃宁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宁县半坡农民起义，参加陕甘红军游击队，先后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3支队支队长，第4路游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边南区（照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陕甘省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主任。陕甘独立师第3团政治委员。

刘光显（？～1935）

陕西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后任红27军第84师第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陕北红军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5年在陕西米脂作战中牺牲。

刘明景（？～1935）

陕西延安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陕北红军第4团政治委员。1935年在陕西横山作战中牺牲。

刘振华（？～1936）

陕西米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支队政治委

员、独立师政治委员。1936年在陕西米脂作战中牺牲。

刘映胜

又名杨声。陕西渭南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后任中共渭南县委临时书记，渭北游击队政治委员。1933年参与领导耀县起义，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被捕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安某中学任校长。

刘景范（1910～1990）

曾用名刘荡平、王二。陕西保安人。刘志丹胞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游击队班长、中队长、副大队长、支队长。1933年任红26军第42师第2团团长，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保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分会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三边（靖边、安边、定边）游击司令兼政委，中共庆（阳）环（县）分区区委书记。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历次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陕甘宁边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西北野战兵团后勤部、西北野战军后勤部、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民政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刘震西（？～1935）

曾用名刘振西、刘鸿飞。陕西蒲城（一说神府）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后任陕北红军第3团参谋长。1935年在作战中牺牲。

许培仁（1912～1986）

曾用名许佩仁、许纲维。陕西神木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陕北红军，历任红27军独立团经理处处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政治委员，陕北独立师第1支队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总务科科长、校供给部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兵站部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2分部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海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南海舰队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

杜衡

又名杜君励，陕西佳县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特派员。1932年进入陕甘边根据地，任红26军政委兼红2团政治委员。同年7月被捕叛变，1949年逃往台湾。

杨琪（1895～1936）

字建亭。陕西延川人。早年为陕北“保运”武装首领。1931年10月，参加红军游击队，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26军第2团管理处处长。1933年后，任陕甘边第2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第42师第3团参谋长，红27军第84师师长。参加了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28军第252团团长。1936年3月，在绥德岱王庙战斗中牺牲。

杨森（1907～1936）

曾用名杨宗楷。陕西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后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第4团政治委员，骑兵团政治委员，第42师政治委员、师长，中共红26军42师党委书记，西北工委委员、军委委员。参加了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红25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后，任红15军团第78师师长，红2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36年任红30军参谋长，同年5月上旬在军渡战斗中牺牲。

杨凤歧（？～1936）

陕西安定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9 支队政委。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6 年 5 月牺牲。

杨文模（1912～1972）

曾用名杨谢琪、杨丕显、杨问在。陕西神木人。1932 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神（木）府（谷）红军游击队第 3 支队政委，陕北红军独立第 3 团政委。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后任陕西省军事部供给部部长，神府红军独立师参谋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神府军分区参谋长，陕甘宁边区保安第 4 团代理团长、团长，解放军冀热辽军区第 13 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东军区副参谋长，第 53 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司令部训练部副部长、动员部部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

杨重远（1894～1933）

曾用名杨仲远、杨忠远、杨敬熙，号弘毅。陕西绥德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10 月参加清涧起义。1928 年在国民党第 47 军从事兵运工作，任中共第 47 军委员会书记。1931 年参加组建晋西游击队，任游击队党总支部书记、政治委员。后任陕甘红军游击队参谋长，陕甘红军游击队第 5 支队参谋长，红 26 军参谋处处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1 支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陕甘根据地的创建。1933 年 5 月在安定谭家岭战斗中牺牲。

杨培盛

1932 年参加革命，任南梁游击队第 2 大队大队长，后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第 2 支队第 2 大队大队长。1932 年 2 月，“三嘉塬缴枪事件”后被遣散，不久又参加庆阳游击队。

李艮（1903～1933）

字育初，化名愚痴，陕西长安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1932 年春任省委组织部部长，6 月，代理书记，7 月进入陕甘边根据地，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不久，回西安，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1933 年初，任红 29 军政治委员，同年 4 月牺牲。

李杰夫

又名高维翰。陕西长安县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委军委书记。1932 年进入陕甘边根据地，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政治处主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3 支队政治委员。红 26 军随营学校校长。1932 年 4 月，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933 年离开陕甘边根据地，后在江苏被捕叛变。1949 年逃往台湾。

李赤然（1914～）

曾用名李宗贵。陕西安定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安定县区委书记，红 27 军第 84 师第 2 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后任红 15 军团第 81 师第 241 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关中独立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两延（延川、延长）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警备第 5 团、警备第 1 旅第 3 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部长，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 4 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军骑兵第 6 师政治委员，第 4 军第 12 师、兰州警备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副政治委员，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高级防空学校、空军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启明（1915～）

山西神池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 26 军第 42 师

第3团连长，团参谋长，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大队长。参加了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处科长、副处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延属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陕西省副省长、省长，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妙哉（1902～1933）

曾用名王玉玺、王宪、王之宪、李华峰、李妙斋。山西临汾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10月领导甘肃平凉士兵起义。后任陕甘游击队第7支队支队长，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红26军特派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斗争。1933年9月在薛家寨战斗中牺牲。

李映南

陕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任红26军第42师第3团政治委员。

吴亚雄（1903～1936）

曾用名吴伟华。陕西横山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后任陕甘边第2路游击队第4支队支队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4总队总队长，陕北游击队第1、第4总队指挥部总指挥，陕北红军第4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团长。参加了创建西北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1936初任蒙汉游击队队长，开辟内蒙古游击区。同年9月在定边红柳滩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吴岱峰（1903～）

曾用名吴振东。陕西安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西北军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参加安徽阜阳起义。从1931年起，历

任晋西游击队第 1 大队副大队长，陕甘游击队第 2 大队大队长、第 3 支队参谋长，红 26 军第 3 团团长，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军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军事主任，陕甘晋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北路军、延属军分区参谋长。参加了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庆环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 3 旅副旅长，绥德警备区、榆林军分区、陕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北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汪锋（1910～1998）

曾用名王立、王烈、王君治。陕西蓝田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渭华起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军委书记。1932 年任红 26 军代理政委兼第 2 团政治委员，红 26 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1933 年后，任中共陕南特委委员，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驻国民党军第 17 路军特派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部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留守兵团关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共鄂豫陕边区委兼边区政府主席、军区政治委员，西北民主联军第 38 军政治委员，中共陕南区委书记、陕南军区、解放军第 19 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政协主席，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文华

陕西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红 26 军第 42 师第 1 团团长代理政治委员。

张文舟（1912～1986）

曾用名霍昭汉、霍佐汉、霍金保。山西沁县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参加陕甘边红军，后任红 26 军第 42 师副连长，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陕西省军事部参谋科科长、参谋长，中共延川县委军事部部长，红 29 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军参谋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2 团参谋长，留守兵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 3 旅参谋长、副旅长，联防军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第 4 纵队、第 4 军、第 2 兵团、甘肃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装甲兵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参谋长，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装甲兵学院第一副院长，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策

陕西高陵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任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红 26 军第 42 师政治部科长，第 2 路游击队总部经理处长，红 26 军第 42 师特派员、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张邦英（1910～）

陕西耀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军第 17 路军中共营委书记。1933 年后，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陕甘红军游击队耀县第 3 支队政治委员，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部长，陕甘边第 3 路游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边南区区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关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陕甘宁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延属地委书记兼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9 旅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陕南区委第一书记兼陕南军区政治委员，第 19 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纪律部部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张达志（1911～1992）

又名张廊志。陕西葭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佳县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1935 年 1 月起，历任红 27 军第 84 师政委兼第 1 团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委员，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党务书记，延川没收委员会主任，西红 15 军团第 81 师政委、第 78 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陕北独立第 1 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延长地委书记，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6 团团长，第 120 师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游击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第 4 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炮兵司令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仲良（1907～1983）

陕西耀县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耀县北区游击队队长，红 26 军第 42 师第 1 团政治委员，中（部）宜（君）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关中特区武装部部长。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关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警备第 1 旅政治委员，中共关中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 4 纵队，第 4 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秀山（1911～1996）

曾用名张绍武、张鸿毓。陕西神木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宁夏、甘肃从事兵运工作。1932 年参加领导靖远兵变。历任红 26 军第 42 师骑兵连政治指导员，骑兵团政治委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 26 军第 42 师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工委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军委委员，陕甘晋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参加领导了陕甘边红军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后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神府红军独立师政治委员，神府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区委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明吾（？～1933）

又名张明伍。陕西淳化人。中国共产党员。1931年参加陕甘边斗争。1933年任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第3路总指挥。同年冬在照金地区作战时牺牲。

张毅忱（1911～）

曾用名张国旗、王大宏、刘晓春。陕西吴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历任第2、第3、第5支队政治委员，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秘书处秘书，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指挥部政治部科长。参加了陕北红军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后任红15军团政治部科长，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部科长，红15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科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4支队第11大队政治委员，第7支队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2支队政治委员，第1军分区、南进支队政治部主任，晋绥军区第11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绥南地委书记，解放军绥蒙军区第11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工业厅厅长、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进堂（？～1937）

陕西清涧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独立师第2团团长。1937年2月在陕西佳县火龙庙剿匪时受伤后牺牲。

陈国栋（1903～？）

陕西耀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耀县游击队队长。后任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第3路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第42师第1团团长，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委员，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陕甘宁独立师第3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畜牧厅厅长等职。

武开章（1904～1986）

陕西佳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独立第 3 团政治处处长，中共神府特委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神府分区区委书记，中共绥蒙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处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范文德（1908～1935）

曾用名樊文德。陕西吴堡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1934 年起，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6 支队支队长，陕北红军第 4 团参谋长，红 27 军第 84 师第 5 团参谋长、第 3 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陕北红军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5 年在安定（今子长）被国民党军杀害。

拓克宽（1902～1931）

陕西绥德人。1931 年参加筹建晋西游击队，任晋西游击队队长，1931 年 9 月在陕西安塞牺牲。

赵连璧（？～1932）

又名赵二娃。曾为绿林武装首领。1931 年 9 月，参加革命，任南梁游击队第 1 大队大队长。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第 2 支队第 1 大队大队长。1932 年 2 月，“三嘉塬缴枪事件”中被错杀。

赵国卿

河南人。1933 年参加耀县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任红 26 军第 42 师骑兵团团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 年 2 月，作战中负伤。后脱离革命。

周维仁（？～1936）

陕西米脂人。1931 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任红 27 军第 84 师供给部、红 15 军团第 81 师供给部政委

员。1936 年在陕西保安病故。

郑毅（？～1933）

曾用名郑彦青、郑延清。河南人，中国共产党员。1929 年参加商（城）起义，曾任红军第 32 师第 98 团团长。后到陕西工作，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兼军事部部长，红 26 军参谋长兼第 2 团参谋长。1933 年春在陕西铜川县北同官附近作战中牺牲。

赵启民（1910～1997）

陕西蓝田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加入红军游击队。后任泾阳游击队第 3 中队队长，红 26 军第 42 师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后任红 15 军团第 78 师参谋主任，陕北区苏维埃军事部科长、延长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红（宜）宜（川）延（长）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独立第 2 团团长、独立师第 3 团团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参谋长，第 5 支队参谋长兼第 10 团政治委员，第 2 师第 5 旅政治委员，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路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第 2 纵队、华东野战军第 7 纵队、解放军第 34 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政治委员，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赵德胜（？～1936）

陕西户县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陕北红军独立团代理团长。参加了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6 年 3 月在小桥战斗中牺牲。

胡廷俊

中国共产党员，红军陕甘游击队警卫大队政治委员。

荣子卿（1900～1932）

河北唐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参谋长。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队政委。1932 年

冬在西安被敌人杀害。

段德才（？～1935）

陕西人。1934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26军第4团团长。1935年在陕西宜川牺牲。

冠居才（？～1936）

陕西长武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陕北红军独立团团长。1936年2月在小桥作战时牺牲。

贺大增（1906～1977）

陕西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27军第84师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后任红15军团第81师第243团营政治教导员，第78师第243团政治委员、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2团政治处主任，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第5师政治委员，解放军第39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河南分校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沈阳军区第1文化学校、海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吉祥（1915～）

陕西安定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游击队。曾任红27军第84师排长、连长。参加了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后任红15军团第81师第243团营长、副团长，陕北红军独立师第1团团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川县保安大队大队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独立第3营营长、保安第2团团长，解放军绥蒙军区绥西军分区司令员、晋中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独立第6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吉林省军区、

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晋年（1910～2003）

陕西安定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在陕甘地区从事兵运工作。1932 年参加陕甘红军游击队，任骑兵大队副大队长，后任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政治委员，陕北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总指挥，红 27 军第 84 师第 1 团团长。参加了陕北红军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5 年 9 月起任红 15 军团 81 师师长、红 27 军军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1 团团长兼三边（安边、靖边、定边）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 3 旅兼三边军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骑兵纵队司令员、第 7 纵队副司令员、第 11 纵队司令员，第 15 兵团副司令员兼第 18 军军长，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防空、卫戍、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和中朝联合运输司令员。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寇金财（1910～1935）

1932 年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 26 军第 42 师第 1 团代理团长。1935 年在陕西柞邑作战中牺牲。

聂洪钧（1905～1966）

又名聂鸿钧。湖北咸宁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江西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1929 年参加领导鄂南农民起义，任农军总指挥。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9 年 1 月回国，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后任红 10 军政治委员，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 年 9 月，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北方局代表身份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中央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

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参谋长，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湖南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贾生财

曾为民团团总。1931年9月，参加革命，任南梁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第2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

高岗（1905～1954）

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陕甘地区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委委员，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参加领导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后任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司令部司令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区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司令员，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3年伙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54年自杀身亡。

高山保（？～1932年）

河南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曾任第1大队大队长。1932年9月于陕西省淳化县安子洼战斗中负伤后牺牲。

高文智（1914～）

陕西郿县（今富县）人。1934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分队长，补充师连政治指导员、师供给部总务科、会计科科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粮秣科科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供给部粮秣科科长，中央军委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副部长，辽西军区供给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东线供给部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军需生产部部长，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第3部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企业部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

高朗亭（1913～1994）

曾用名高明镜。陕西延川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川游击队政治委员，西北红军先锋队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政治委员，第3支队、第9支队支队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西北军委情报侦察科科长兼医疗卫生科科长，红军医院院长。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安市市长，甘肃省合水县县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武装动员部部长，八路军留守兵团第385旅副政治委员，绥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宝鸡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司令部武装动员处处长，青海军区司令员，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研室副主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高维嵩（1916～1985）

陕西安定人。1933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安定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红27军第84师第1团营教导员，红15军团第75师第223团党总支部书记，红30军第263、第264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

边区保安第2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第8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解放军第4军第11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青海省军区、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高锦纯（1912～）

陕西米脂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边游击第2大队政治处干事，红26军第42师第2团党支部书记，耀县游击队政治指导员，第42师骑兵团政治委员兼党务委员会书记。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后任红15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总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司令员、第5旅政治委员，中共胶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中共陕西省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解放军第4军第10师师长、副军长、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新疆分局第一副书记，自治区第一副主席，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郭宝珊（1904～1970）

河北南乐（今属河南）人。早年参加国民党军队，曾任第17路军营长。1934年10月起义，参加红军，任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15军团第78师第234团团长，红28军边防团团长，陕北独立师第3团团长，神（木）府（谷）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第8团副团长，延属军分

区司令员，警备第4旅旅长，解放军第4军第12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师长、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郭炳坤（1914～1977）

陕西蒲城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26军第42师第1团政治委员，第3作战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9团团长，警备第3旅副政治委员，三边（安边、靖边、定边）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司令员，中共三边地委书记，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警备第3旅旅长，解放军第4军第11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干部部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预备役干部动员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北海舰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郭洪涛（1907～）

曾用名郭洪恩、郭惠卿、孙耀祖。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榆林地委组织委员，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历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北方局派驻陕北代表团秘书长，中共陕甘晋省省委副书记，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北军委委员，中共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苏鲁皖分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唐澍（1904～1928）

字东园，又名唐树人，河北易县人。1924 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领导清涧起义，任陕北军事委员会军委书记，“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总指挥。1928 年参加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同年 7 月，在战斗中牺牲。

谈国帆（1905～1986）

陕西临潼人。1925 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与王泰吉一起领导国民党第 17 路军骑兵团起义，任西北抗日义勇军参谋长。参加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渭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渭北军分区教导团副团长，西北军区三原军分区副司令员，陕西军区咸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武装部部长，甘肃省体委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黄子文（1908～1947）

曾用名黄成章。陕西三原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领导三原农民起义。1931 年参加组建晋西游击队，后任晋西游击队第 1 大队政治委员，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红 26 军第 2 团政治部主任，郿（县）耀（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三原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渭北游击总队第 1 支队副队长。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47 年在三原陵前小道口战斗中牺牲。

黄子祥（1895～1982）

陕西三原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组建游击队，曾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红 26 军第 4 团团长、骑兵团团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渭北游击总队副队长。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关中军分区副司

令员，三原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政协副主席。

黄罗斌（1916～）

陕西蒲城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渭北游击队代理政治指导员，红 26 军随营学校班长，第 42 师第 3 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陕甘边红军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后任红 15 军团第 78 师 232 团政治委员，陕北第 2 作战区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神（木）府（谷）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 3 旅第 7 团团长、副旅长，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 385 旅副旅长，警备第 3 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自治区区委副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甘肃省副省长、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曹胜荣（？～1933）

中国共产党党员，红 26 军第 2 团骑兵连连长，1933 年 1 月在庙湾战斗中牺牲。

龚逢春（1908～1978）

陕西城固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后，任西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中共红 26 军第 42 师委员会书记、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部长，陕甘边第 2 路游击队政治委员，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察冀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晋西北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三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西南局党校党委书记、校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康健民（1916～1977）

曾用名康廷文、康亚东。甘肃定西人。1932年7月参加西华池兵暴，随后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红26军骑兵团政治指导员、连长、代理团长，红15军团骑兵团、红28军骑兵团、红1军团骑兵团团长。参加了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骑兵旅旅长，绥蒙军区绥中军分区司令员、骑兵旅旅长、骑兵第1旅旅长，第一野战军骑兵第1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委员，军长兼河北省石家庄卫戍区司令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阎红彦（1909～1967）

曾用名阎候雁。陕西安定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1931年参与组建晋西游击队，后任第1大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第1大队大队长，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大队大队长、第5支队支队长，陕甘游击队代理总指挥。参加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赴苏联学习。1935年回国后，任黄河游击师（沿河游击队）司令员，红30军军长、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3团团长，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解放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军管会副主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川东区委副书记、川东行政公署主任、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惠子俊

陕西长安人。中国共产党员。1931年参加陕甘边革命斗争。曾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修械所所长。陕甘边红军第2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边特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工农检查委员长，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1935年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撤职。

惠世良（1909～1935）

曾用名马山、马三。陕西清涧人。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参加红军，任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中队长，陕北红军第2团参谋长，第2支队支队长。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1935年2月在清涧高杰村战斗中负伤牺牲。

谢绍安（1908～1935）

曾用名谢诏安、谢连城。陕西安定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后，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分队长、副支队长，中共陕西省委保卫大队大队长，陕北红军第4团团长。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5年10月在横山作战中牺牲。

程玉清

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

强龙光（1903～1932）

陕西安定人。曾参加清涧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历任骑兵班长、骑兵中队长、骑兵大队长。1933年底，奉命至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1933年秋在河北沽源县平安堡战斗中牺牲。

强世清（1912～1934）

陕西安定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抗日反帝同盟军、陕甘边红军游击队骑兵队长。1933年初，被红26军派到陕北开展武装

斗争，先后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支队长，1933年1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4年4月4日，在安定县城英勇就义。

雷恩钧（1903～1985）

又名雷恩俊。陕西安定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后任陕北游击队执法队队长，游击支队支队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参谋长，关中军分区、三边（安边、靖边、定边）军分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局局长、工业厅厅长，甘肃省监察厅厅长、中共甘肃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政协副主席。

路文昌（1910～1936）

陕西安定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支队长，陕北红军独立第1团参谋长，红27军第84师第1团副团长、第2团团长，第15军团第81师第241团参谋长、第81师参谋长。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6年春在清涧、延川边界地区战斗中牺牲。

慕生忠（1910～1994）

陕西吴堡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后，任中共吴堡县委书记，陕北红军第15支队、独立第5团、第6支队、第2纵队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白区工作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第2作战分区司令员。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安以东作战分区司令员，中共洛川地委宣传部部长，晋绥军区第9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樊文德（？～1935）

陕西吴堡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先后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6 支队政治委员，红 27 军第 5 团参谋长。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5 年被“左”倾路线执行者杀害于安定董家寺。

魏武（1911～1933）

又名王子元，陕西户县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 2 月加入红军陕甘游击队，历任中队长、中队指导员、队委委员。1933 年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 1 支队政治委员。同年 11 月在安定文家铺战斗中牺牲。

注：

本书主要收录参加西北红军创建及在西北红军担任一定职务的干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而没有在西北红军任职者未被收录。另因资料所限，少数西北红军干部也未能收录。

附录三

西北红军序列表

一、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

(1927年12月30日~1928年2月30日)

总指挥 唐 澍

副总指挥 谢子长

参谋长 阎揆要

第1分队

第2分队

第3分队

第4分队

二、西北工农革命军

(1928年5月16日~1928年8月上旬)

前敌总指挥部

总指挥 唐 澍

政委 刘继增

参谋长 王泰吉

参谋主任 高克林

总顾问 许权中

经委主任 杨晓初

政治部主任 廉益民

政治部副主任 吴浩然

经理部主任 王庆兰

卫生部主任 邢运堂

军法处处长 许尚志

第1大队 大队长 赵亚生

第2大队 大队长 武培谟
第3大队 大队长 谢子长（兼）
第4大队 大队长 雷天祥
骑兵团 团长 许权中（兼）
赤卫队 队长 张汉俊

三、晋西游击队

（1931年春～1931年9月）

大队长 拓克宽 阎红彦（后）
政委 杨重远
副大队长 阎红彦
吴岱峰

第1中队 中队长 阎红彦（兼）
第2中队 中队长 白锡林
第3中队 中队长 不详

四、南梁游击队

（1931年9月）

总指挥 刘志丹
军需 马锡五
第1大队 大队长 赵连璧
副大队长 刘景范
第2大队 大队长 杨培盛
副大队长 白冠武
第3大队 大队长 贾生财
副大队长 谷聚山

五、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1年1月～1932年2月11日）

总 指 挥 谢子长

副总指挥 刘志丹

参 谋 长 杨重远

经济处主任 马云泽

副 官 长 杨 琪

第 1 支队 支队长 师储杰

第 2 支队 支队长 刘志丹（兼）

警卫大队 大队长 白锡林

六、陕甘游击队

（1932 年 2 月 12 日～1932 年 4 月）

总指挥部

总 指 挥 谢子长

副总指挥 刘志丹

政 委 李杰夫

参 谋 长 杨重远

政治部主任 黄子文

第 1 大队 大队长 阎红彦

政 委 高 岗

第 2 大队 大队长 吴岱峰

政 委 杨重远（兼）

第 3 大队 大队长 雷恩钧

政 委 程玉清

警卫大队 大队长 白锡林

政 委 胡廷俊

骑 兵 队 队 长 强龙光

副队长 杨 琪

政 委 杨 森

七、陕甘游击队

(1932 年 4 月下旬~1932 年 5 月上旬)

第 3 支队 支 队 长 刘志丹

政 委 李杰夫

参 谋 长 吴岱峰

供给主任 刘约三

第 5 支队 支 队 长 阎红彦

政 委 黄子文

参 谋 长 杨重远

注:

1932 年 4 月 22 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部队编为二个支队。

5 月 10 日,为统一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兼第 3 支队队长,李杰夫任政委兼第 3 支队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

八、陕甘游击队

(1932 年 6 月下旬~1932 年 8 月)

总指挥部

总 指 挥 阎红彦

政 委 李 艮

第 1 大队 大 队 长 高保山

政 委 黄子文

第 2 大队 大 队 长 刘志丹

副大队长 吴岱峰

政 委 刘志丹(兼)

第3大队 大队长 高鹏飞

政 委 阎润平

骑兵大队 大队长 强龙光

注：

1932年6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政委李杰夫离开部队回西安，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8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重新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建制保留了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团。9月中旬，部队分散活动。

九、红26军第2团

（1932年12月～1933年7月）

团 长 王世泰

政 委 杜 衡（兼） 汪 锋（后代）

参 谋 长 郑 毅 刘志丹（后）

参谋处处长 杨重远

政治处处长 刘志丹

管理处处长 杨 琪

经理处处长 刘约三

骑兵连连长 曹胜荣 强世清（后一）

杨 琪（后二）

指导员 张秀山

步兵第1连连长 李亚夫

指导员 李秉荣

步兵第2连连长 吴岱峰

指导员 高锦纯

少年先锋队 队长 王有富

指导员 魏 武
随营学校 校 长 李杰夫
政 委 汪 锋

注：

红 26 军成立时仅有军的番号，没有设立军部和任命军长，只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第 2 团，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

十、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1933 年 8 月～11 月）

总指挥 王泰吉

政 委 高 岗

参谋长 刘志丹

红 4 团 团 长 黄子祥

政 委 杨 森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总司令 王泰吉

参谋长 谈国帆

政治部主任 刘映胜

注：

刘志丹任职时间为 1933 年 10 月。

十一、陕北红军总指挥部

（1934 年 7 月～1934 年 9 月）

总指挥 谢子长 贺晋年（后）

政 委 郭洪涛

参谋长 贺晋年

陕北游击队第 1 支队

陕北游击队第 2 支队

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

十二、红26军第42师

(1933年11月~1935年2月)

师 长 王泰吉(1933年11月~1933年12月)

刘志丹(1934年1月~1934年5月)

杨 森(1934年5月~1935年2月)

政 委 高 岗(1933年11月~1934年1月)

杨 森(1934年1月~1934年4月)

张秀山(1934年4月~1934年5月)

高 岗(1934年5月~1934年7月)

谢子长(1934年7月~1934年12月)

张秀山(1935年1月~1935年2月)

参 谋 长 刘志丹

政治部主任 黄子文 龚逢春(后)

第1团 团长 陈国栋

政委 张仲良

第2团 团长 刘景范

政委 胡彦英

第3团 团长 王世泰

政委 李映南 黄罗斌(后)

骑兵团 团长 黄子祥 杨 森(后一)

赵国卿(后二)

政委 杨 森 张秀山(后一)

高锦纯(后二)

西北抗日义勇军 司令员 郭宝珊

政 委 任浪花

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 校 长 刘志丹（兼）

政 委 习仲勋

十三、陕北红军独立师

（1934 年 8 月～1935 年 1 月）

第 1 团 团 长 贺晋年

政 委 刘 光 马佩勋（后）

参谋长 路文昌

第 2 团 团 长 郭毓仁

政 委 马万里

参谋长 惠世良

第 3 团 团 长 王兆相

政 委 杨文谟

参谋长 刘镇西

注：

红军陕北独立师成立时，未建立师部及任命师级军政主官，各团在中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下独立活动。

十四、红 27 军第 84 师

（1935 年 1 月～1935 年 2 月）

师 长 杨 琪

政 委 张达志

参谋长 朱子休

第 1 团 团长 贺晋年

政委 马佩勋

第 2 团 团长 郭毓仁

政委 马万里

第 3 团 团长 王兆相 王世杰（后）

政委 杨文谟 樊文德（后）

十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 年 2 月～1935 年 9 月）

主 席 刘志丹（一说谢子长）

副主席 高 岗

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白 坚

参谋长 朱子休

前敌总指挥部（1935 年 5 月 4 日成立）

总 指 挥 刘志丹

政 委 高 岗

政治部主任 白 坚

秘 书 长 范子文

1.红 26 军第 42 师

师 长 杨 森

政 委 张秀山

第 1 团 团长 陈国栋 贾义斌（后）

政委 张仲良 郭炳坤（后）

第 2 团 团长 孔令甫

政委 胡彦英

第 3 团 团长 王世泰 黄罗斌（兼）

政委 黄罗斌

骑兵团 团长 赵国卿 康健民（后）

政委 高锦纯

西北抗日义勇军 司令员 郭宝珊

政 委 黄罗斌 马佩勋（后）

2.红 27 军第 84 师

师 长 杨 琪

政 委 张达志

参谋长 朱子休

第 1 团 团长 贺晋年

政委 马佩勋

第 2 团 团长 郭玉人

政委 马万里

第 3 团 团长 王士杰

政委 樊文德

陕甘晋军政干部学校 校长 吴岱峰

政委 张秀山

附录四

西北红军的演变

西北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红 26 军和红 27 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支英雄的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南方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南方主力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编入红一方面军。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红 26 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原红 27 军参加了西北剿匪斗争。此后，这两支红军部队分属于有关野战部队和大区，为保卫、建设伟大祖国和加快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现根据有关资料，将西北红军两支部队演变情况概要介绍如下：

一、红 26 军历史演变概况

时间	建制称谓	备注
1932 年 12 月	红 26 军第 2 团	红 78 师 232 团和红 73 师合编 红 78 师 233 团和红 75 师合编 原红 26 军部队合编
1933 年 11 月	红 26 军第 42 师	
1935 年 9 月	红 15 军团第 78 师	
1937 年 8 月	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 687 团	
	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 688 团	
1937 年 12 月	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 689 团	
1940 年 2 月	八路军第 2 纵队第 344 旅 689 团	
1940 年 6 月	八路军第 4 纵队第 4 旅第 9 团	
1941 年 1 月	新四军第 3 师第 29 团	
1945 年 9 月	新四军第 3 师第 10 旅 29 团	
1945 年 11 月	东北人民自治军第 3 师第 10 旅 29 团	
1946 年 1 月	东北民主联军第 3 师第 10 旅 29 团	
1946 年 8 月	东北民主联军第 2 纵队第 5 师 14 团	
1948 年 1 月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 2 纵队第 5 师 14 团	
1948 年 11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9 军 116 师 347 团	
1950 年 10 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9 军 116 师 347 团	
1953 年 8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9 军 116 师 347 团	

二、红 27 军历史演变概况

时间	建制称谓	备注
1935 年 1 月	红 27 军第 84 师	归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东地区留守处指挥 与 120 师师属炮兵营合编 与边区保安第 4 团合编
1935 年 9 月	红 15 军团第 81 师	
1936 年 4 月	红一方面军直属第 81 师	
1937 年 1 月	红 27 军	
1937 年 10 月	八路军 120 师师属辎重营	
1937 年 11 月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 1 团	
1942 年 10 月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 3 旅第 7 团	
1946 年 9 月	西北野战军第 4 纵队警备第 3 旅第 7 团	
1949 年 2 月	第 1 野战军第 4 军第 11 师第 32 团	
1952 年 7 月	西北军区直属第 11 师第 32 团	

主要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2.《列宁军事文集》，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3.《斯大林军事文集》，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4.《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3册，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 7.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92。
- 8.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 9.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 1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 1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 1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文史资料》第14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15.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3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16.陕西省军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军事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冀晋绥地区陕甘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1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1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4。

19.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沈阳：白山出版社，1994。

20.兰州军区政治部编著：《光辉的历程——人民军队在西北斗争史概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21.王世泰：《回忆我的红军生涯》，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1993。

22.张振德、赵喜民主编：《西北革命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3.吴志渊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24.房成祥著：《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5.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26.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 27.俄向军著：《陇东民主革命简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3。
- 28.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3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 3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 3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 3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 34.徐占权主编：《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 35.吴学海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 36.廖国良等主编：《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 3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38.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北京：军事

科学出版社，2003。

后记

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西北红军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经过重新构思、补充而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诞辰 100 周年。军事科学院有关部门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其间《刘志丹纪念文集》编辑组有同志建议，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一部反映西北红军创建与发展的书，这也一直是我的一个想法。为此，我又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回忆材料和访谈记录，并吸收了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一书。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刘国语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一室主任、少将、技术三级）倾注了大量心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支绍曾（少将）等领导、专家和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廖国良教授（少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黄少群教授等，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给予了热情鼓励，认为该论文填补了军事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为了深入研究西北红军，并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我曾于 1999 年 4 月赴陕西、甘肃西北红军活动过的地方进行考察、调研，先后走访了兰州军区司令部编研室、政治部编研室、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军事志编写办公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军区司令部军事志编写办公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中共延安市委党史办公室、延安革命纪念馆、刘志丹纪念馆等单位，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他们是刘时雨、魏其群、雷云峰、姚文琦、房成祥、黄兆安、张军孝、王光荣、米世同、赵芳珍等，另外，还走访了刘志丹的女儿女婿刘力贞、张光夫妇。

本书能够付梓出版，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宣传部严皓部长给予了大

力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解放军档案馆馆长刘英、政委张兵的关心和支持。我的导师刘国语研究员和军事科学院徐占权研究员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王世忠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对在我研究西北红军和本书的写作出版中给予过帮助的所有首长、军内外专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本书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恳读者批评指正，以匡不逮。

作者

2003 年 10 月于北京西山